

余习广

主编

湖南人民出版社

位卑未敢 忘忧国

——“文化大革命”上书集



余习广 主编

位卑未敢忘忧国

——「文化大革命」上书集

湖南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王娅丽

装帧设计：贺旭柏端

00636
5.6

位卑未敢忘忧国
——“文化大革命”上书集

余习广 主编

责任编辑：王娅丽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67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望城县湘江印刷厂印刷

1989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6 插页：2

字数：341000 印数：1—41610

ISBN 7—217—00636—8

D·74 定价：5.65元

序 言

当科技革命的浪潮在全世界汹涌澎湃之时，“文化大革命”的狂潮却淹没了中国：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一挥手，亿万红卫兵和中国人高擎“红宝书”热泪滚滚，“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的狂呼声如雷行长空，惊天地，泣鬼神；毛泽东一声令下《炮打司令部》，上至国家主席、委员长、部长，下至厂长、生产队长，统统被“打倒”；“敢闯、敢干、敢造反”的红卫兵，以“破四旧”、“砸烂封、资、修”之“壮举”，使神州名胜古迹捣毁殆尽，中外图书典籍付之一炬；“文攻武卫”、“全民皆兵”，大刀、长矛、狼牙棒遍地挥舞；大炮、飞机、坦克声满天轰鸣，从川、黔、湘、鄂、鲁到陕、甘、新……到处是武斗、混战，参加的人上万到几十万。广西庆功宴吃的是人肉、人肝；广东、山东“语录牌”下示众的是人头、人尸；派斗、武斗、“斗私批修”，夫妻分道扬镳，父子反目成仇……“文化大革命”，山河流血，国将不国。

然“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中国历史几千年，外患时起，内乱丛生，隔二、三百年，便来一场改朝换代的大变乱，天翻地覆。中国历史千年不绝，就在于中华民族有那么一种文化精神——“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激励起一代又一代壮烈千古的仁人志士，在民族、国家危难之时挺身

而出，倡大义，平天下，拯救江山与黎民苍生。这种“位卑未敢忘忧国”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正是中国历史相续之根，正是中华文明立世之本。

“文化大革命”，又见千古风流之英雄本色。在一片红色狂潮之中，一批又一批有胆有识、忧国忧民的志士仁人，舍身取义。他们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斗胆上书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或诛祸国殃民的好臣后党，力谏“伟大领袖”发动“文化大革命”误国误民之失；或献治国安邦的复兴良策，呈富民强国建设现代化新中国的宏图大略……以拳拳赤子心，竭尽绵薄之力，挽狂澜救天下。

封建王朝为江山社稷，尚以科举制容天下士子做策论纵议天下治平之道。然人民共和国的“文革”时代，天下兴亡之事为中央少数人和“伟大领袖”战略决策的专利，上书直言国策为“大逆不道”，罹不测之祸甚至担杀头的风险。有人说，在中国，真理往往是一首残忍而美丽的诗，唯有鲜血淋漓的灵魂，才能勇敢正视真理；唯有血写的文字，才足以表达真理的内核。又有人说，追求真理比占有真理更为宝贵，前进的事业终将为前进所代替。是真豪杰者，敢为人民苦难浩劫长歌当哭，敢为国家民族命运甘使一腔热血如急雨飘洒，方显出中华儿女壮烈英逸之气概。举国之人，倘皆能如此克尽公民之责，中国当可为共和之国！时势出英雄，英雄造时势。先知先烈的思想为国民大众所认同，历史时势就不可逆转地扼住了“文化大革命”的咽喉；中国社会才摆脱浩劫，走向世界，走向未来，走向现代化，走向共和的人民主权。

收集上书，有幸结识了一批能够引为自豪的上书者为朋友。历史从昨天走来。中国社会如何走向现代化和民主化，

是我们共同关切的主题。现代化最根本的危机在于：现代化与国人失落迷惘情绪的冲突。今天，现代化事业不再是鸦片战争以来百多年间硝烟弥漫的民族战争。民谣传：“十亿人民九亿商，还有一亿跑单帮。”“朝钱看”和“捞一把”日渐冲击和淡化着民族责任意识和使命感。中国文化倡扬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行为模式，随国家、民族责任感淡化而日渐消失，养身发家成为不移之道。人们把现代化只是当做增进家庭天伦之乐的物质手段。现代化，在一些人心中沦落为“彩电、冰箱，高级音响……”；在另一些人心中，则等值于“高级宴会、豪华楼堂馆所、超豪华小汽车……”。这或者将是中华民族失去本世纪末最后一次腾飞机运的现实危机。纵观世界历史，现代化是一个苦难与悲壮共生的历史进程，决不是醉生梦死，燕舞莺歌！现代化与悲壮的民族使命感，注定将是中华民族创业时代的主题。迎接新的科技革命挑战，把握稍纵即逝的历史机遇，中国的未来，现实地握在每个中国人手里。中国的现代化事业，需要“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民族精神，需要社会精英负有使命感和责任感的冲动和创造，需要全民族振作精神，自尊自信，艰苦创业，奋发图强！

中国从“文化大革命”走来。“鉴往知来”，中华民族亟需从对“文革”的深层反思中吸取经验教训，寻找斩断传统社会动荡循环之链，走向现代社会的思路。本集奉献给读者的，是经过精心选择的一批富于思考精神，敢于向中国社会传统命运挑战的志士们的上书原件及相应资料，具有极珍贵的文献价值。在这里，思想勇敢翱翔，为中国和世界寻求更广阔更深沉更自由壮丽的时代。

毋庸讳言，在“文革”时代写就的上书之中，个别篇章

和观念还有一定的时代色彩和局限。但瑕不掩瑜，真理的内核华光千秋！

本集收入的上书，一般都征得了原作者或其亲属的同意；上书大多来自当年案卷原件。为了保持上书的原貌，在选编过程中，对上书从内容到文字均未做变动，相信读者能够理解。

余习广

1989年元月 于颐北

目 录

序言	(1)
萧瑞怡上毛泽东书	(1)
附(一): 通缉令	(19)
附(二): 中共新化县委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办公室的推荐信	(20)
附(三): 我的上书回忆	(22)
附(四): 共产真义说 ——致中共中央、全国政协常委会书	
萧瑞怡	(35)
王蓉芬上毛泽东书	(52)
附: 女政治犯	戴晴 洛格 (52)
伊林·涤西给林彪的一封公开信	(75)
彭德怀致毛泽东最后一封上书	(83)
附: 彭大将军的最后岁月	胡思升 (87)
章士钊上刘少奇书	(100)
附: 父亲章士钊上书纪实	章含之 (103)
姜明亮等上中共中央、毛泽东书	(121)
刘振武的两封上书	(132)
周培源上周恩来书	(167)
附: 周恩来对周培源来信的批语	(170)

李庆霖上毛泽东书·····	(172)
附：毛泽东给李庆霖的回信·····	(177)
王若水上毛泽东书·····	(178)
附（一）：毛泽东关于批林是批极左还是批右的谈话 ·····	(184)
附（二）：从批“左”到批右的转折·····	王若水 (184)
白智清上周恩来书·····	(205)
白智清上李德生书·····	(207)
白智清给江青的信·····	(208)
白智清上叶剑英书·····	(209)
白智清上邓小平书·····	(210)
附（一）：给同志们介绍两篇文章·····	白智清 (216)
附（二）：我爱我的祖国·····	白智清 (218)
附（三）：试问，到底是哪家的“主义”？ ——评张春桥《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 ·····	白智清 (220)
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	
——献给毛主席和四届人大·····	李一哲 (229)
附：广东省召开群众大会为李一哲错案平反·····	(266)
张天民上邓小平书·····	(269)
附（一）：毛泽东关于电影《创业》的批示·····	(273)
附（二）：文化部核心组对《创业》影片的意见·····	(274)
附（三）：影逢乱世：《创业》蒙难纪实·····	乔迈 (278)
献国策	
——致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	李天德 (382)
附：九死一生献国策·····	叶永烈 (400)
朱镕多关于张春桥、江青等人问题上毛泽东书·····	(417)

附：多难之邦忧国难	朱锦多	(420)
刘冰等4人就迟群、谢静宜问题上毛泽东书		(425)
附：毛泽东关于刘冰等人上书的谈话		(440)
对目前形势和新的历史任务的几点看法		
——给毛主席、党中央和全国人民的信		
.....	李洪刚等7人	(441)
附：迎接光辉灿烂的新时代	肖应荣等	(488)
后记		(501)

萧瑞怡上毛泽东书

敬爱的主席：

我是湖南新化一中的学生，本身的地位就已经够谦虚了，但我总想做一件不谦虚的事。我不能让思想永远谦虚下去，永远束缚在牢笼中，而想大胆解放出来，让我积压的思想浩荡奔流。

我想，一个国家也象一个家庭一样，儿子可以向老子提意见，献主张，以便将家庭搞好；同样，作为一个国家的公民，看到国家的弊病，也可以向自己的主席提意见，献主张，以便将国家治好，我的上书就是乘着这一愿望而出发的。

我上书的内容有下面六个方面。自知是冒了天下之大不韪。因为今日是歌功颂德的时代，岂敢上书，指点弊病。但我想，假使世界上的人，特别是青年人，都是些谦虚的人，那么，我们的社会岂不成了少数人的社会，国家岂不成了少数人的国家？！

一 改革土地制度

土地，乃国民衣食所依。什么样的土地制度能够调动农民的积极性，达到多产粮食的目的，是值得我们研究的。

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出发，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生产关系适应了生产力的发展性质状况，则能促进生产力，否则将阻碍甚至破坏生产力。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法。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一对矛盾，两者之间的关系犹如物和秤砣的关系一样。物有三斤重，砣就要放到三斤处，物有两斤重，砣就要放到两斤处。砣的位置随物重的位置变化而变化，使之平衡。生产关系的变革也正是根据生产力的发展状况而实行变革的。生产力决不可迁就于生产关系，正如物决不可迁就于砣一样。

唯心主义者总是强调精神的作用，强调生产关系的作用，自制美好的理想世界，强迫客观世界按他的理想世界转，强迫生产力按他设想的生产关系转。这恰如强迫太阳跟着地球转一样荒谬。

解放快二十年了，为什么我国的农业迟迟不发展？为什么农民终年劳累却不能饱肚？人乃万物之灵，山野中尚且牛马都可生活，为什么人倒为生活着愁？这不能不追究到生产关系的变革不适应生产力的问题上来。

我们来看以下几个阶段的过渡。

从土地改革时期的单干生产形式过渡到互助组，从互助组过渡到低级合作社，再从低级合作社过渡到高级合作社，再从高级合作社过渡到人民公社。生产关系的变革一级高过一级，可生产力并没有多大发展，土地改革单干时期农民用的是锄头犁耙。如果生产关系的变革可以不因为生产力的实际状况而实行变革，那为什么不趁土改之时马上搞集体呢？土地改革单干生产形式又有什么必要呢？

再就生产力中劳动者和生产工具而言，劳动者本身是生

产力中起首要决定作用的因素。劳动者是有灵魂的动物，肩膀挑东西，手拿锄头生产都是由他的思想指导的。要怎样才能把劳动者的智慧和力量全部发挥出来？因此，有必要对这个起首要决定作用的因素来一番探讨。我认为酷爱自由是人的本性。关心自己的切身利益也是人的本能。一个和尚担水呷(吃)，两个和尚抬水呷(吃)，三个和尚没水呷(吃)，这在人们看来，可以作为笑料来谈。可是一个家庭到了一定的程度就要分家，而且这也成为几千年来的历史习惯。为什么一个娘肚子出来的人难以共一个锅吃饭，同一块土地劳动，这究竟是什么道理呢？我们曾经将人理解为圣人，组织大家一块儿到公共食堂吃饭，又一块儿到地里劳动。社会实践的结果，十六元钱一斤的肉，一块钱一个的鸡蛋，人们啼饥号寒，这又说明了什么呢？论人的道德，要不要讲一点物质基础呢？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对工人的慈施，最后自己沦为无产者。共产主义战士雷锋处处为他人着想，事事吃苦在先，世界上有几个呢？我们可不可以拿他们的高尚思想代表全人类的共同思想属性去研究经济领域里的生产力呢？你拿锄头犁耙生产，我也拿锄头犁耙生产，你是喜欢互制条约协作生产，还是喜欢独立自由地生产呢？这些是值得我們多多思索的。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一定历史阶段人的思想都是此阶段经济形态的产物。具体地说，生产工具决定人的思想。为什么原始社会会出现氏族公有制，是因为当时生产力极其低下，一个人拿着木棍和石头无法单独与猛兽和自然界作斗争，因而决定原始人必须集体捕食，共同分配劳动果实。但这个集体的性质范围是极其狭小的，只能是一个女人的子孙。后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当人们可以单独进行生产活动的时候，氏族公有制也就随着瓦解，社会就进入了私有制

——奴隶社会了。可见，原始人搞集体是一种自然的制度。蜜蜂喜欢集体采蜜，集体生活是蜜蜂的自然而然的性质；鸭子喜欢在水里生活，不与鸡犬同道，是鸭子自然而然的生活性质。同胞共乳的兄弟尚且难以共一个锅吃饭，同一块土地劳动，我们却偏偏要将张三、李四、王五等在今天这个锄头犁耙时代组合成集体一起劳动，共同分配，这就违背了人酷爱自由的性质。

为什么土地改革单干生产农民自由舒畅，粮食堆山积海？当时三分钱一个鸡蛋，四角钱一斤猪肉，黑市谷价与国家牌价差不多，农民从内心里喊出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为什么1960年先后两年农民啼饥号寒，以至于为了一点东西两口子分家，父子分家，连起码的人道主义都没有了呢？为什么搞三自一包、借田借土，立刻将灾难的局面拯救过来？为什么过去一个长工耕作一亩田花工不上二十个？为什么现在耕作一亩田花工一百个还不止？为什么过去农民半年辛苦半年闲，而今一年四季，累如牛马，工夫无休无止？为什么现在左斗右斗，千批万批，将农民当作农奴一样箝制在集体，劳动工价总是三角、四角，有的甚至只有一角多，日夜为肚子发愁？查其根源，无非是生产关系与生产力适应不适应的问题，即土地制度是解放劳动力还是束缚劳动力。当今的农民对集体生产制度的看法无非将它认为是束缚自由的桎梏。他不知道土地是谁的，等于是丧失了土地，因而他不知道是为谁在那里生产，吊儿郎当，窝工(浪)费。可是不论是谁，一走进自留地就命都不要了，发挥出了全部智慧和力量，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他意识到此时的劳动是全部属于自己，感到这时的劳动有无穷的劳动乐趣。

本来，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较之资本主

义国家有无比的优越性，那就是生产资料全部属于国有，可以有计划发展国民经济。但是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规律是一切经济形态共有的经济规律。自制美好的社会蓝图，一定要生产力来迁就生产关系，务必造成空想社会主义和贫困的社会主义。按人所设想，农民自留地没有了，资本主义尾巴全部砍掉，等于是破釜沉舟，农民应当安心于集体生产了，可是实践的结果总是事与愿违，恰得其反。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一文中曾经就个体生产转变成集体生产有以下的论述：“当我们掌握了国家机器的时候，我们根本不能设想用强制的办法剥夺小农（有偿或无偿都一样），象我们将不得不如此对待大土地占有者那样。我们对待小农的任务首先在于把他们的私人生产和私人所有权变成合作社的，但不是用强制的办法，而是通过实例和提供社会帮助来达到这一目的。”此处，恩格斯就把私人生产和私人所有权变成合作社时，讲得很明白，提出不要用强制的办法，要通过实例和社会帮助来达到这一目的。所谓实例，就是国家要建设一些国营农场，使之成为高度机械化和高度商品率的社会主义经济的榜样，使人们深信社会主义大经济的巨大优越性。所谓社会帮助，就是要大力发展生产力，发展农业科学技术，为农村提供足够的拖拉机、联合收割机等适应集体化生产的机械设备，没有具备这些物质条件，要使农民自觉自愿走向集体化道路无非是空想，无非是使用压力拼凑，而人为的集体制度也是不能巩固的。我想，农业生产机械设备真的具备了，农民亲眼看到了机械生产效率果真高于手工劳动几倍，相信此时的农民再不会奴隶般依恋他的单干生产，死守他的锄头犁耙不放，而会自觉自愿组

织起来购买机械生产设备集体经营生产的。“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这是一条规律，无所谓“改造小农经济”而言，因为这种单干到集体是自然而然的过渡。资产阶级之所以都把一系列个体生产单位变成社会化的集体协作形式，是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没有纺纱机代替纺车，没有机动织布机代替手工织布机，则个体生产单位不会自然消失。资本主义国家是如此，社会主义国家也是如此。没有发达的生产力，就不会有先进的生产关系。没有母体，就没有婴儿。因此，我们可以断定，没有先进的农业机械设备，就不能有先进的集体生产方式，这是毋庸置疑的真理。

那么，什么样的土地制度才适应目前农业生产力的性质状况呢？我想，借田借土的土地制度最为适宜。

借田借土制度的内容是：在现有人民公社的制度下，以生产队为单位，根据人口的多少，劳动力的强弱，合情合理地借给各户耕种。既然是借，自然土地是属国有，各户只有耕种之权，决无买卖之权。而集体有调整分配土地之权，三年或两年后，根据人口的增减，劳动力的变化，重新调整。集体或国家因为公共事业要占用土地，则可及时调整。国家分配的公粮任务由队领导核算到户，再由各户交出来统一完成。五保户全部由政府负担。至于现在生产队的耕牛、农具之类，应根据各户自愿组合成几个小单位抽签分配，尔后任何人增办的生产工具、耕牛则属私人所有，将来具备了集体生产的机械设备时，各户再自愿组织成集体，但在进集体时，各户的私人生产资料应当按质按量换算成钱兑现到户。

如果这种土地制度一实现，则亿万农民欢天喜地，他喜得可在田里打几个滚，因为他知道这时的劳动是完全属于自

己了。实现了自己的劳动志趣，力量会全部使出来，劳动力达到了真正彻底的解放，自然生产会猛速发展，粮食会巨增，我国将立即进入黄金时代。

不过，借田借土制度也不能一律实行于全国各地，因为各地的主、客观条件是有差异的。有的平原地区已经实现了机械化生产的，那应当搞集体（不过，大单位也要化为中、小单位，以便于经营管理）。有些地方如果搞“三自一包”则搞好“三自一包”。如果其他地方有更好的土地制更适合于本地的条件，就搞他们的土地制度。但总的来讲，根据我国目前的生产力状况，应采取借田借土的制度为主。

可能有人担心，这样多样的土地制度太杂了。我们认为土地制度杂没有关系，因为总的来讲，土地国有是个总纲，杂为的是发展生产，多产粮食。列宁讲过：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既有一般，又有特殊。

可能有人要说，这种单干生产会出现两极分化。我想两极分化是不会的。要求人的生活平等是我们提倡的主义。但是由于各人能力的差别和其他条件的差别，不可能达到绝对的平等，却是一个真理，我们不能单提倡主义而丢掉了真理。不能单考虑平等而置生产力性质不顾。应该明白，借田借土制度是由当今生产力状况所决定的，它是必然的和不可避免的，况且各户田土分配差不多，人人又有双劳动的手，生活差别也不会太大。

也许有人要说，集体力量大，单干力量小。我想，搞农业不是打老虎，打老虎要人多。土地是分散的，死的劳动对象，一个人、一条牛就可以耕作。播种一个小孩即可，农村不象工厂一样，工人由于机器的生产不能不是集体的有机操作形式，而农民用的是锄头、犁耙，它并不需要你拿锄头上

端，我拿锄头下端去挥动锄头生产。当然修塘修坝要搞集体，但我想，这些集体事业只要对各户有益，群众会自愿组织起来干的。两千多年以前私有制那般严重的秦始皇时代不也修出了万里长城！

可能有人会说，借田借土是后退。我认为，退是为了进。俗话说：“为要远跳，必须后退”，我们的后退是为了解放生产力，让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充分发挥出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这种借田借土制度又会自然而然地在历史上消失。

陈永贵同志是全国的一面红旗，我愿做全国的一面黑旗示范于天下。

二 消除人为的阶级斗争

现在对待地富分子，不管他改造得好不好，抓来就斗，拳打脚踢，戴高帽子游团。我们认为，有些地富分子的反抗正是由于我们这样长期严酷的专政而压出来的。这样搞，他们谁不盼望蒋介石来。既然土改时没有消灭他们的肉体，将他们留下来，其目的是为了教育他们，改造他们成为新人，也成为社会主义建设劳动力的一部分。我们相信，大部分地富分子是可以教育改造好的。不要说仁政没有一点好处：人要的不过是一点生活和自由，只要勉强有了这两点，也就无事了。今天的人，大概四十岁以上的人都在旧社会生活了一段时间，今天的贫下中农是几千年私有制社会被剥削的最后一批，而地富分子也是几千年私有制社会剥削者的最后一批，只因为社会主义在我国的胜利才割断了几千年剥削制度的历史。土改时，镇压那些罪恶累累，十恶不赦的地、富、

反革命分子是完全必要的，而留下的地富分子是罪行较轻，民愤不大的人。我们对这些人无疑应当仇恨，但我们要把仇恨主要追究到几千年剥削制度的罪根上，是私有制社会那种为富不仁，剥削有理的思想毒害了他们。他们终究还是人，是有血性可以感化的动物，只要他们真正意识到了自己的罪恶，是愿意接受共产党的教育和改造的。我们之所以要搞阶级斗争，为的不过是最终要消灭阶级斗争。辩证唯物主义者不应当只强调矛盾的对立一面，而应当相信在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里，是可以创造条件，消灭阶级达到统一的。对他们来说，所谓创造条件，就是以教育、团结为政策，除个别剥削阶级思想根深蒂固的花岗岩头脑的人要继续专政外，其他的就要放松对他们的专政，使他们的良心改悔，脱胎换骨，成为新人。

其次，我们对待地、富子弟的政策，应当着重看他们的表现，我们不应当歧视他们，而应当一视同仁对待。现在随便做什么事总要将成份放在前面考虑，使他们背上了沉重的思想包袱，相反，有些出身好的青年就背上了自来红的包袱。现在学校各班排座位也要把出身不好的学生排到教室的两边或后面，以至使他们感到耻辱。我们不要这样只论成份，不要造成他们对社会不满，不要制造他们与我们之间的矛盾，地富子弟有相当一部分人，他们的力量并不少，把他们争取过来只会对我们的事业有益。其实，青年人的思想主要是由社会决定的，青年学生又直接受书本知识的影响，家庭影响与这些比较起来是次要的。社会好，不但出身好的拥护，出身不好的也拥护，社会坏，不但出身不好的反对，出身好的也反对。所以我们应当一样信任他们，允许他们升学、工作，允许他们参加一切政治活动，也允许他们参军作

故。即使有个别地富子弟利用我们政策钻进内部进行破坏，我们也不要怕，我们要大胆些，蒋介石八百万军队也打垮了。况且这几个人呢？

以上是就地富分子及其子弟的政策而谈。现在更为严重的是派性斗争极为严重，武斗遍及全国各地，人们处于恐怖状态。什么观点不观点，都是争权夺利的观点。这也是走资派，那也是走资派，这是牛鬼蛇神，那也是牛鬼蛇神，这也是资本主义，那也是资本主义。试问：世界上还有几个良民？国家这样混乱不堪，又谈何建设？主席讲：国家的团结，全国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因此，国家安全团结是第一等重要的。

以上意见，我不是说不承认阶级斗争，也不是阶级斗争熄灭论，我是说不要搞人为的阶级斗争。至于人为的阶级斗争是应当要熄灭的。比如烧火做饭，泡水，这种火是生活必要的。但是如果满山遍野地放火就会造成灾难。同样，阶级斗争也是如此，是真正的阶级斗争比如投机倒把、贪污盗窃，放把火烧一烧是必要的。但是阶级斗争之火乱点，也势必造成社会的灾难。

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生产资料已属国有，这是大仁、大义的制度。自然比资本主义国家矛盾少得多，阶级和阶级斗争也不会象资本主义国家那样严重。现在我们天天讲阶级，日日讲斗争，其实都是人为地在那里制造矛盾，制造斗争。难道这种所谓阶级斗争不应当消除吗？

三 废除个人崇拜活动 解放人民思想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具体革命实践相结

合的产物。毛泽东思想是指引我国人民和世界革命人民进行反帝反修的光辉灯塔。以主席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使中国人民再不受三座大山的压迫，此大恩、大德，人民是永远服膺不忘的。主席爱人民，人民爱主席，人民将《东方红》的歌献给主席，足见人民敬爱主席之至了。

然而，目前把对主席的热爱却搞成了一种个人崇拜的仪式，造成了极为严重的个人崇拜之风。由此造就了种种罪恶，现列举于下：

1. 有些人大肆吹捧主席，阿谀奉承，把主席地下的东西吹到地上，地上的东西吹到天上。一切功劳都归于主席，凡是反对过主席的都挤倒于泥坑中，凡是吹捧主席的都抬起来，因而造成了个人独裁，两口子独裁，小集团独裁。主席以前是谦虚的，人家引用主席的语录都要划掉，现在到处是语录，却没有讲。主席以前是反对人们向您祝寿的，可是现在天天做五件事，天天搞崇拜仪式，这种天天祝寿却没有制止。这不就说明谦虚到天上去了吗！其实，主席越谦虚，人民就越尊敬，越崇拜，而过度的搞法，人们倒会产生反感。打个比方，我在饥困的时候，你救济了我几升米，我自然是非常感激你的。但你要到处宣扬，说你是怎样大仁大义救了我的命，并且要我天天向你跪拜，报以恩德，我同样也是要产生反感的。现在全国人民，除了主席一个人外，谁没有戴主席的像章或语录牌，连中央一些经常与主席共事的领导，也戴了像章或语录牌，可主席都没有制止，我们实在不好理解。

2. 个人崇拜浪费了人力、物力。现在，全国各地，从上到下，到处都是红红绿绿的语录版。书店甚至商店都陈列着过剩的主席著作和语录本。一块语录版花的油漆并不

少，红底板上加绿漆，到处都写着几条一样的语录。主席像章一匹胜过一匹，到处生产，好的人们将它作装饰品，差的丢了不要。主席画像也是各式各样的，我在一个不大的饭店就看到了七十多个主席像，世界变成了主席像的世界，语录的世界，世界也成了主席一个人的。难道制作这些东西出来，不花很大的人力和物力吗？这种过度的做法是很不好的，出版著作要有份量，书出版少一些，反而使书值钱些，像章少一些，反而显贵些。文化革命初期，我们都风行抄语录，那时，要得到一本主席语录是非常狂喜的。而现在呢？有的同学讲，家里有语录，自己也有语录，人家又送他几本语录，现在五分钱一本都没有人要了。可见，不按群众的需求过多地出版著作、语录，就反而使群众将它们看得平庸了，学语录也不认真了。事情总是这样，一走到了极端就走向了反面。

3. 个人崇拜活动破坏了外交关系。我们认为，为了进行反帝反修斗争，少了几个观点不同的国家，并不要紧，这也是必然的事。但有些亲近我们国家的外交朋友也要学主席语录，他们看到个人崇拜活动还搞到他们头上来了，也是要产生反感的。他们偏偏不信你那一套，我们不应当要人家跟着搞崇拜。要是国家真的强盛了，各方面都超过美帝和苏修，那么一些中国派的国家自然会崇服我们，倒向我们这一边。想自己扯着自己的头发上天是不行的。

4. 办学习班浪费了时间。自主席提出了“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许多问题可以在学习班里得到解决”的指示后，全国上下从工厂到农村，从机关到学校，到处都在举办学习班，而且一期接着二期，一期办起来就是半月、十天、或一个星期。学习过来学习过去，与其说在那里学习，倒不如说

在那里玩、混日子。特别是公社社员，不管生产忙不忙，都规定要抽三天时间专门学习，并规定每户社员都要买一套四卷，有些农民一字不识，把它当作抽烟纸扯掉。所以办学习班虽然可以，但一定要不搞形式，要真正解决问题，要缩短时间，并尽量少办。

5. 个人崇拜活动造成了人的虚伪性。个人崇拜活动是今天政治生活中的潮流，你要生活下去，就要随其流，你要想往上爬，就得扬其波。有些人借着这个政治潮流，做些假好人好事，写上几万字的心得，然后汇报，成了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这里讲，那里讲，把稻草说成金条，都是那几件好人好事，是卖狗皮膏药。我们认为，学习毛主席著作，做点好人好事是应该的，但以这一些好人好事到处炫耀自己，就看出了他内心世界的虚伪性，不过是为了欺世盗名。

6. 减低了教学质量。现在的学生在学校里不是读书，天天是学语录，翻来复去是那几条，口动心不动，好象念经一样，从早到晚，五件事做个不停，甚至课间操、早操也成了语录操，用语录字来代替一、二、三、四，与其说是学堂，倒不如说是教堂。学生要读其他书，就说是只攻业务，不问政治，学生可以骂老师，斗老师，闭卷考试制度也废除了。

我想，学校毕竟是学校，学生是来学知识的，只学语录，岂能掌握前人的知识，又岂能发现未来的科学？这不是象搞愚民政策吗？有的父母亲看到自己的孩子只会念几条语录，算术一点不懂是很反感，又是很痛心。学生打老师，骂老师，老师怎么愿意又怎么敢传授知识？老师在学生面前没有绝对的威信，岂能管任（教）学生？一般地说，中、小学生大多数都没有学习的自觉性，搞闭卷考试可以督促学生学习，并

要通过奖励先进带动落后的，如果学校再继续长此下去，教学质量将不象样子。

7. 个人崇拜活动束缚桎梏了人的思想。当今的中国被个人崇拜空气笼罩着，谁也不敢作声。人们的思想被束缚在牢笼中，说错了一句话，做错了一件事，就说是反毛泽东思想，就要遭到批评和斗争。文艺作品、戏剧、报刊杂志都是个人崇拜的东西，没有哪一个敢自由发表一点见解、一篇作品。《欧阳海之歌》是思想、艺术水平较高的一本小说，以前出版的此书后面有一段写欧阳海知道他的上级错了，而欧阳海没有进行斗争，只让以后的事实说明自己正确，后来批判了驯服工具论，作者便马上将那段内容改掉了。由此，可见作者思想的一斑。

一个观点，一个框框，人民的思想被禁锢得铁紧，这就是当今思想界的实状。我说个人崇拜罪恶累累，但尤以这一条束缚人的思想为最厉害。

现在不管做哪件事情，搞好了就说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生个小孩又能说是谁的胜利？我想，在毛泽东思想没有问世以前，瓦特不也发明了蒸汽机？牛顿不也发明了力学？马克思不也创立了辩证法？这又是谁的胜利？要认识到，群众的智慧和力量是无穷无尽的，任何有本领的英雄人物，其功绩与人民比起来是渺小的。

什么“顶峰”，什么“最高最活”，什么“中国几千年、世界几百年，才发现这么一个天才，”如此阿谀之言，可谓肉麻矣！主席是知道《邹忌讽齐王纳谏》一文的，凡美我者，必有其因，今日如此吹捧者，也必有其谋，主席不可不自警，也不可不警人。这些话要是其他国家听到了，他们会怎样，会不会承认。主席在《实践论》一文中不是这样说

过：“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马列主义是如此，毛泽东思想也应该是如此。社会的发展犹如滚滚的长江大河也是向前发展的，自然科学不是愈到后来内容愈丰富、愈科学吗？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也将会由后人的社会实践增进更丰富、更科学的内容，任何人不会是真理的化身，任何思想也不会是真理的终点。

个人崇拜活动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束缚人们思想的桎梏，都会引起人们的强烈不满和反对，是阻碍社会向前发展的反动力量。要使人们的思想得到解放，推动社会向前发展，个人崇拜就一定要废止，决不能让它再存在下去。而要废除这种活动，任何人没有这个胆量，只有主席亲自出面废除才是唯一办法。

四 严行干部参加劳动的制度

主席早就提出了干部参加劳动的制度，但有些干部并没有严格执行，只是应付一下，并不经常。

我们认为，干部参加劳动应是他的天职，应是生活中同米饭一样不可少的东西。一边工作，一边劳动，既减轻了人民的负担，又锻炼了人的思想，并能经常了解社会实际状况，扫除官僚主义。

主席讲要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并且讲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干部和群众的地位关系，本是仆人和主人的关系一样，这一点，连孟子也曾提过：“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孙中山先生也言：“巧者拙之奴”，都是说明作领导的，应当把自己的位置摆对，作人民的仆人。不

过，千百年来，由于封建官僚主义的影响，当官的无不认为自己高人一等，而民也见官畏惧。这种思想直到今天，仍然根深蒂固，执行干部参加劳动的制度，就是为人民服务，做人民公仆的具体行动体现。通过劳动，可以洗涤自己的思想，与群众打成一片，群众也不会畏官，事实证明，凡是那些忠心耿耿，与人民同甘共苦，全心全意为人民造福谋利的干部，总是受到人民的爱戴和拥护，并且也使自己在为人民服务的伟大事业中变得日益高尚和伟大起来。马克思讲，能使大多数人得到幸福的人，他本身也是最幸福的。相反，如果干部自认高人一等，把自己当作官老爷，吸人民膏血以肥己，则这种干部迟早要为人民所唾弃。

现在有些人只想当官，因为在他们看来，官比民好，做官的政治地位比民高，做官的利比民大，假使干部的政治地位和生活都和普通人一样了，并且还要参加劳动，那么争官当的也就少了。

主席这样年高，尚能畅游长江，说明主席气魄之大，身体之健。倘主席带头生产，则能带动所有大小干部参加劳动，又会激起全体民众掀起翻天覆地的生产巨浪。勾践卧薪尝胆，亲事农桑，竟使亡后的越国再起。汉景帝亲耕籍田，使汉元气复兴，以至粮溢官仓。古人尚且如此，今人又何不为之。

五 法要当 刑要严

我在第二部分提出要消除人为的阶级斗争，本部分是就真正的阶级斗争，即客观存在的阶级斗争又要怎样对待呢？我认为，为了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对真正的坏人要以严

法制裁。

战国末期著名的法家韩非子是主张重刑治国的。他认为，刑重则恶人不敢为恶，而良民因受其利，若行宽惠，则利奸邪而害善人也。法严不严，实与良民无丝毫关系，但他提出，法要当，即制定法律要正确，判罪不要搞错。韩非子的主张并不是没有道理的。秦若不行法治，则何以灭六国乎！今观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赌牌押宝，各地皆有。对其首犯，我认为应当全部诛掉，这些人是最大的利己主义者，看他们是要钱，还是要命。至于行凶闹事，欺压良民者，也要严厉惩办，累犯也要诛掉，以警世人不敢乱为。

当然刑这样重，就一定要刑当，千万不能搞错，执政者一定要使政策、方针正确，造福于人民，造利于社会。1960年左右，因为共产风起，东西奇缺，以至饥荒盗窃四起，人人是贼，难道对这些贼也要诛掉吗？此时的社会灾难，激起一些志士愤懑，因而成立想反政府的组织或集团，难道对这些人也要诛掉吗？不！执政者应当明察社会实况，明察自己的方针、政策是否正确，究竟罪是谁造成的。是社会造成的，则是方针、政策有错，应由执政者负责向人民深刻检讨。该判罪就要判罪，并同样要予以重刑。

所以既提倡重刑，则刑一定要当，刑当则一定要重刑，既警人民，又警执政者的方针、政策的制订。只要这样，则社会有序，天下太平。

六 实行革命的军国主义

鉴于美、苏两国狼狈为奸，扩军备战，各自都想独霸世界，对我国虎视眈眈，侵略之心久矣。我们务必作好充分的

备战工作，一旦战争爆发，我们不可处于被动地位，还要处于主动地位，即不能击敌于国门之外，且能一举打到敌国的老巢去。要有这样的力量，我们就要实行革命的军国主义。

主席讲要全民皆兵，这是完全正确的，我想，凡小孩五岁以上就要习武、学军事，不但男人要习武，妇女、老人一概不可例外，做到真正的全民皆兵，以振奋民族精神，使敌人不敢妄动，特别是我们要发展工业，包括国防工业，发展科学技术，奖励科学家的发明创造，使我国迅速强大起来。我们的人要比他们强，我们的粮要比他们多，工业要比他们发达，科学技术要走在他们之先、武器要比他们厉害，使之闻风丧胆。兵书上曰：十战十胜为下策，不战而胜为上策，只要我国真正富强了，敌人岂敢动我一根毫毛！这就是不战而胜。

以上六点意见，实披肝沥胆，直言不讳，如言有错，敬望主席宽怀以恕。

湖南新化一中49班 萧瑞怡 谨呈

1968年5月~6月

简介 萧瑞怡（1948~ ）男，湖南新化人。出身农家。高中时期，爱读马列经典著作。1968年毕业后留校“复课闹革命”，年仅20岁。他后来回顾说：“因目睹长期搞阶级斗争的弊害，痛感文化大革命派性斗争带来的灾难以及个人崇拜活动给社会造成的严重后果，决定到北京上书毛泽东。”1968年5~6月中旬，他先后三次写《上书》。《上书》约12000字，内容6个方面：1 中国以农立国，首先应“改革土地制度”，实行土地公有，按人口多少、劳力强弱合理借给各户耕种的“借田借土制度”。2。“消除人为的阶级斗争”，施仁政于天下。3。“废除个人崇拜活动，解放

人民思想。”“个人崇拜会造成物极必反的反感情绪”，“浪费人力物力”，“破坏了外交关系”，“造成了中国人的虚伪性”，降低了在校学生的教学质量，“桎梏人的思想，产生专制独裁”。4.“严行干部参加劳动的制度”，减轻人民负担，反对官僚主义。5.“法要当，刑要严”。6.“实行革命的军国主义”。他因《上书》遭通缉，流浪于洞庭湖区。1970年被捕。1978年平反，被安排在社办中学任民办教师。在此期间，他写《共产真义说》，再次上书中共中和全国政协。该《上书》对共产主义概念作了理论阐述，否定了“共产”等于“共食”——大锅饭的错误观念，以及将共产主义理想混同于现实生活的错误做法。在刚刚开始实行联产承包到作业组的政策之时，他大胆地提出，中国社会变革的希望，在于农村分田到户，城市工业责任到人等主张。1985年，他在湖南师院平江分院中文班学习，1986年毕业。现在中共新化县委党校任教。

附（一）：

最高指示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通缉令

肖瑞怡，男性，现年21岁，家庭出生贫农，本人系新化一中学生，家住新化县科头公社桃林大队。

该犯由于忘本变质，走向了反革命道路。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肖犯借“四大”为名，替阶级敌人翻案；勾结保守势力，蒙蔽一部分群众，破坏文化大革命，竟发展到整毛主席的材料，恶毒攻击谩骂伟大领袖毛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江青同志；鼓吹“三自一包”、“四大自由”，为刘少奇大唱赞歌。当被我革命造反派发现揭发后，肖犯竟准备行凶（未就），我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与肖犯展开了猛烈的斗争，肖犯自知站不住脚，于68年6月17日深夜畏罪潜逃。

为了誓死保卫毛主席，保卫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希各地驻军、专政机关、革命造反派大力协助捉拿归案。如拿获，请通知新化一中红代会。

肖犯只有早日自首，才是唯一出路。

湖南新化第一中学红代会

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日

附（二）：

中共新化县委落实知识分子办公室的推荐信

同志：

我们怀着惜才之心，呈上肖瑞怡同志写的《上书本》，并将他死里逃生后的情况作个简介，请审示。

这部《上书本》，是肖瑞怡同志于一九六八年五、六月向毛主席写的“万言书”，可说是一部除弊兴利的治国纲领。当时他是新化一中高49班的优生，毕业后留校“复课闹革命”，年仅20岁。因写这部《上书本》遭到通缉、逮

捕、审讯，从此，身处逆境，游困，批斗，不能升学，不能安排工作，走过了一段漫长的坎坷之路，直到一九七八年才安排在科头中学任民办教师。

在备受折磨的逆境中，他矢志不移，自强不息，“位卑未敢忘忧国”，热衷于哲学、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探求富民强国的改革之路，于一九七九年写了一篇长达四万五千字的《共产真义说》，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大量事实，阐明共产并不是吃大锅饭，提出了农业包田到户，工业责任到人的改革措施，连同《上书本》投寄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获得了研究生准考证。旋因当时的政治背景，以考试成绩太差未予录取，并以“在目前尚无定论”，退回原稿。一九八一年写了《生产关系改革浅见》投寄《光明日报》，主要论述“三自一包”，责任制的生产是裕民之策，富国之乡，“因不适合本报刊用”“故转寄社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下落无音。在深感此路不通时，投入文艺研究，于一九八二年，一九八三年写了一篇五万字的《浑名履历表》，反映我国三十余年的政治经济和思想状况。这些努力，虽然都未奏成就，但至少反映了他勤奋自学，敢于独立思考的顽强精神，表述了立志改革，振兴中华的赤子之心。据科头中学师生反映，肖瑞怡同志为人耿直，好学不倦，且天资聪颖，他过去只学过俄语，未学过英语，但为克服该校英语师资困难，勇于接受任务，边学边教，结果他所教英语班考试成绩在全区中学中名列前茅。

今年八月，我们在接待来信来访中，才看到肖瑞怡同志的《上书本》，立即找当时审讯过他的专案人员进行了调查核实，并访问了他所在学校的师生及所在乡村的干部、群众，对他的过去和现在进行了考核。他本人也向我办写信，陈述

了书写《上书本》的由来和以后的遭遇。（来信附后）九、十月省地检查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工作组和有关报社，电台记者先后来我县看了《上书本》和全部案卷，并找肖瑞怡同志多次谈话，都一致认为，从他的《上书本》和论文中，显示了他青少年时期冒死进谏的赤子之心的卓越的政治见解，他在逆境中表现了坚毅不拔、立志改革的斗争精神，是一个忠心耿耿，胆识兼优的人才。可惜时运不济，报国无门，几遭夭折。值此大兴四化，选贤任能之际，不能再让他蛰居深山，无用武之地，如能重用，参与政务，使之扩大视野，广约博采，舒展运筹，扬其所长，干四化事业是有所作为的。但他不属科技之类的人才，且限于现行的人事制度，破格选用难度较大。为此，特向中央有关领导推荐，是否可取，请批示。

中共新化县委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办公室

一九八四年十月二十日

附（三）：

我的上书回忆

一九六八年五月，我向毛泽东写了一篇上书。那时我是新化一中高49班在校毕业生，年龄二十岁。上书包括六个部分：第一部分，改革土地制度。这是我着重阐述的部分。我根据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这一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原理，摆出了我国农业生产力的实际状况，论证了生产关系的不适应性，从而提出了借田借土制度的主张。第二部分，废除人为的阶级斗争。在这部分里，我就对四类分子的长期专

政和不必要的阶级斗争进行了分析，提出了对四类分子应采取教育争取的看法，一视同仁对待其子弟，停止文革中的派性斗争，以实现安定团结的局面。第三部分，废除个人崇拜活动，解放人们思想。在这部分里，我总结了个人崇拜七大罪状：第一，个人崇拜造成了个人独裁，两口子独裁，小集团独裁；第二，个人崇拜浪费了人力、物力；第三，个人崇拜减低了教学质量；第四，办学习班浪费了时间；第五，个人崇拜造成了人的虚伪性；第六，个人崇拜破坏了外交关系；第七，个人崇拜尤其束缚桎梏了人的思想。接着，我从领袖和群众的关系，从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观点，说明了废除个人崇拜的必要性。第四部分，以严法治国。在这部分里，我提出了韩非子的法治思想，主张法要严、刑要当，除恶助善，国泰民安。第五部分，实行干部参加劳动制度。干部参加劳动，和群众打成一片，可以避免官僚主义。第六部分，实行革命的军国主义。在这部分里，我提出要发展科学技术和人人习武、个个练兵的主张，以实现民族自强，抵御外来侵略的目的，并开创出一个使敌闻风丧胆，不战而胜的强盛国家的局面。

上书计有万字，在当时提出这些观点，特别是前三个部分，哪怕只触及一点，都可定下现行反革命罪。所以当时一位政法工作者说，上书是带纲领性的，性质是极为严重的。

那么，我这样的思想是怎样产生的，上书的经过如何，以后的遭遇怎样，案件如何处理，逆境中我又写了些什么？现一个回忆于下。

一 写上书的思想基础

谁都知道，人的思想意识是由客观存在所决定的，人不可能凭空产生什么思想。要问我为什么会产生那些“反动”思想，简单的回答，那就是社会生活赋予我的。

我出生于一个贫农之家，长期在农村生活。大跃进、共产风造成三年苦日子的严酷生活，给我幼小的心灵留下了一道伤痕。

一九五八年，我十一岁。大跃进、总路线、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正是这年树立起来的。这年出现了两样稀罕事：一是土法炼铁，二是办公共食堂。土法炼铁我帮助大人捡了矿石。那种炼法如何窝工浪费，如何毁坏森林而毫无收益，给我的印象且不说了，只说公共食堂给我的感受。

当时，我们村子里一百多户人家分成两个食堂就餐。到处可以看到这样的标语：“公共食堂好，菜香饭又饱，吃饭不要钱，越吃越香甜；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起初，公共食堂的饭菜虽不怎么香甜，但好歹能吃饱肚子。可时间一长，当田地荒芜，长苗时一半禾一半稗的时候，人们啼饥号寒的日子也就降临了。象我这般年龄的孩子，每天定量只有半斤大米，那时用的十六两一斤的秤，今天的五两即是那时的八两。我早三两，午二两，晚三两，真是饿得慌。菜不是萝卜汤，就是咸萝卜，三百六十五天见不到几个油星子。那时，猪肉十六元一斤，鸡蛋一元一个，年底过年能分到半斤猪肉算是有口福了。为了填饱肚子，我跟随我父亲上山挖蕨根、土茯苓等充饥。我吃了不少糠粃，甚至我把牛栏屋上面人家堆放了几年作燃料用的绿豆壳也拿

来磨成粉吃了。肚子是肉长的，那容得下这些粗糙的食物。咽下去还不太难，屙出来可就真的难了。

以后的日子更是每况愈下。我看到有的夫妇为争一口饭吃打架分了家。此时，盗贼四起，公人家就要烧火煮，烧了火瓦上就冒烟，冒了烟大队干部就可顺藤摸瓜，摸到了“瓜”晚上就开大会斗，不斗得你喊爹喊娘决不放手。斗了还是有人偷，瓦上还是要冒烟。于是乎，干脆来一个釜底抽薪。青年突击队员们扛起锄头挨家挨户将灶砸个一斩平，锅子没收作为废铁上交公社以抵炼铁的指标数。到了这般“绝灭烟火”的地步，饿倒人的严重现象也就发生了。一九五八年，彭德怀回到湘潭坞石，看到“谷撒地、薯叶枯，青壮炼铁去，收禾童与姑”的时候，也仰天长叹“来年日子怎么过”而决心为人民“鼓与呼”了。一九六一年刘少奇回到花明楼，看到自家屋前的梧桐树皮被剥光吃了，一数炭子冲的人有不少不见了的时候，也举鞭抽击自己的灵魂，丢掉了“粮食多了、煮酒熬糖”的想法。此时，倘若毛泽东他老人家也象青年时代一样，夹着雨伞在民间跋山涉水，那么也不会听不进言而主观臆断了。

三年苦日子，招来了人们的怨恨，我也产生了朦朦胧胧的不满情绪。正当国民经济濒于崩溃之际，“三自一包”就象一场甘露雨来到了人间，它拯救了嗷嗷待哺的饥民。短短年余时间，农业得到了复苏，继而粮食巨增，物价猛跌，农民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不过，“三自一包”这一财富之神仅仅在农村一晃即过，代之而行的是那种以生产队为基本生产单位又留给社员适量自留地的集体生产形式，并被长期固定下来。其间佐之以“农业学大寨”的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和批判资本主义的狂风暴雨，使得农业生产象一匹患病的

驴子拖着沉重的车，艰难地向前挪步。

社会犹如一个大实验室，哪种生产形式能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哪种生产形式阻碍甚至破坏农业生产的发展，农民知道得清清楚楚，我亦深有体会。这为我后来思考土地制度的改革打下了深深的思想基础。

进而要说的是，一个人的行为往往与他的理想紧密相关。当一个人步入青年阶段的时候，正是青春的热血与理想交织燃烧的时候，对未来充满憧憬。方志敏烈士在回忆他的青年时代说道：读了《拿破仑》，就想做将军；读了岳武穆，就想驰骋沙场。我呢，的的确确也是如此。那些名传记，诸如《马克思传》、《毛泽东同志的少年时代》、《富兰克林》、《列宁回忆录》、《寇准》、《魏源》、《康有为》等书，于我有极大的吸引力，一本《革命烈士诗抄》更是爱不释手。我力图效仿这些伟人，用“生做泰山，死当河流”作为自己的座右铭，立志做一个社会改革家，造福于人民。我如饥似渴地学习《社会发展史》、《中国哲学史》、《世界通史》、《政治经济学》等社会科学方面的书籍。记得连学校图书室里那纸张霉黄得难闻的《资本论》也读了几天。一个人一旦确立了理想，就必然会为之去奋斗。

一九六六年五月，“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刮来了。此时，我正好高中毕业，准备全面复习，迎接高考。可上头来文说，暂时停止高考，坚持在校复课闹革命。于是，同学们纷纷加入红卫兵，批邓拓，批吴晗，批廖沫沙。继而批学校里的黑帮，揪学校里的走资派。接着又搞大串联，各种组织纷纷揭竿而起。有的加入“湘江风雷”，有的加入“孙大圣”，真枪实弹，武斗迭起。后来，我由衷敬仰的刘少奇、邓小平被打倒了，这不能不使人震惊。阶级斗争之火到处乱

点，更不能不使人认真思索。尤为甚者，主席还健在，有人就要我们搞顶礼膜拜，天天在主席画像前早请示，晚汇报。我想，历代以来，只有当皇帝临朝时，手下的臣子才下跪，呼万岁，如今遍及百姓，这教人怎样去想？那时，我随便走进一家饭店，就发现有七八十个主席画像：夹把伞去安源的，跟红卫兵握手的，披长风外套的，穿中山装的，坐着的，站着的，饭店成了主席像展览的地方。再看书店的主席像章，有大于银元的，有小于扣子的，有圆的，有方的，有菱形的，有长方形的，要有尽有。再到书店，不是《毛泽东选集》，就是《毛主席语录》。至于城市广场，没有哪处不矗立着一个毛主席的巨大塑像。世界成了主席一个人的世界了。

事情发展到一定程度，往往会向相反方向转化的。比方，我在饥困的时候，你救济了我几升米，我自然会感动得眼泪直流，并会将你的大恩大德永记于怀。但倘若你施恩于我，就要我天天向你膜拜，孝之如父母，敬之如菩萨，则我又会对你有另外的看法了。当个人崇拜到了登峰造极的时候，我再忍不下去了。引起我最反感的，也是点燃我思想之火的，就是做语录操。当司令员用“下——定——决——心——不——怕——牺——牲——”等语录来指挥我们做操的时候，我就愤然离开操场。我好似五脏来血，气得真想拔剑斩地：难道我们都是奴才不成？难道芸芸众生都是蚂蚁不成？我恨林彪这个奴才兼野心家，我恨“四人帮”这班恶棍，我叹息毛主席主观、武断、个人专制、忠奸不分。然而在那个红色恐怖的年代里，在人人高呼“最红最红的红太阳”的情况下，我没有别的道路可走。“毛泽东”这个名字的威力犹如上帝，而上帝的错误除非上帝本身意识到才能终

止。于是，我产生了上书的想法，我想要亲自到北京去见主席，如果门卫不让我见，我就将自己全身捆绑求见。酝酿几天后，我定下决心，并把这一想法告诉了我的同窗好友魏书程。

二 写上书的经过

（一）第次一写上书。

一九六八年五月十六日，我开始着手写上书。一写，思潮滚滚而来，犹如长江之水：土地问题，阶级斗争问题，个人崇拜问题，强国安民问题，都想付诸笔端。个人崇拜是最反感的，也是引爆我思想火花的导火线，但与土地问题、阶级斗争问题相比，还处于次要地位。所以，我把“改革土地制”作为第一部分写。其二是“消除人为的阶级斗争”，其三是“废除个人崇拜活动，解放人们思想”，最后写其他强国安民的主张。

我写时是避开人的，或在教室写，或在寝室写，写一张，锁一张，无一人知晓。

前三个部分写好了。这时，我的另一所谓同窗好友叫伍毅群的，见我昼夜秘密写东西，就问我写什么，并要求看看。起先我不想告诉他，后经他反复说，我又考虑他出身不好，平时言谈与我相近，于是我把刚写好的第三部分给他看了。给他看前，我点点张数，共二十一张。谁知他看后还我时只有十九张，少了第二张和第二十张。这两张是内容至关重要的两张，前一张承上概括了集体生产形式的弊端和人为的阶级斗争造成的祸害，后一张总结了个人崇拜的罪恶。因此，一旦这两张失落，那我整个的“反动”思想就将彻底

暴露。事关重大，我立即找到伍毅群，并将他带到偏僻的寝室楼上，询问那两张稿子的事。开始，他抵赖说不知道，后经我再三追逼，他才承认拿了。他说是上面派他来监视我的，是要他来拿的，他说要把稿子交给学校军管小组。我恳求他还给我，我申明我是要光明正大到北京去上书的，不是写匿名信。我说最多半个月我的死活就知道了，请他现在不要泄露。他听不进，口口声声说我是现行反革命。事情既到如此地步，我跟他自然是一场生死搏斗了。其时，快下晚自习了，同学们即将回到寝室。我急得心都快跳到口里，我扑向他，搜他的袋子，没有。左查右看，原来在他手里紧紧握着。我用力抓住了他的手，他拼命反抗。昏暗的灯光下，两个人扭作一团。经过一阵搏斗，我咬破了他的指头，将那两个纸团抢到了手。然后，我匆匆将全部上书稿从我寝室的课桌里取出来，投入资江大码头旁边的一口井里，掉转头往冷水江方向逃奔。后面追兵如火，我跑得更狂。凑巧的是，我刚跑出校门时，天还只下毛毛细雨，可这时候，天哗哗啦啦下起大雨来，越下越猛，犹如瓢泼。老天助我，暴雨把他们拦回去了。我跑到新化锡矿山，托魏书程母亲之福，给了我三十元钱和一些衣服，绕道赶到涟源车站远走高飞了。几天后，通缉令发布新化、邵阳、长沙等地。其实，通缉令仅仅是根据伍毅群的密告和我平时的言论胡乱写成的。

（二）第二次写上书。

从学校逃出后，我来到了湘乡山枣厚丰大队周立桂同志家重写上书。周是魏书程同学的姨父。

花了八天时间，上书六个部分全部脱稿。在这里看了我上书中第一部分的有周立桂，看了全稿的有周的邻居贺松林。贺对我大加赞赏，而周持否定态度。周看到“陈永贵同

志是全国的一面红旗，我愿做全国的一面黑旗示范于天下”这一句时，愤愤地说了一句：“毛主席讲陈永贵好好好，连讲三个好字，而你就说陈永贵不好……”我听后忐忑不安，便匆匆告别他家，搭火车到与涟源接界的萧塔孚家。萧是我初中的相知同学。我去的目的，是想征求他对我上书内容的意见。他一见到我，大为惊喜，并告诉我，到处在通缉我。他看完上书后，说我太鲁莽，并劝我不要去上书。我听后犹豫不决，最后，我在去长沙途中，又毁上书于火车厕所中。

（三）第三次写上书。

上书虽毁了，但我又觉得可惜。我眼前面临绝境，无处可以安身。逃往香港吧，抓着了会弄得个身先死而志未遂。逃往新疆吧，身边的钱所剩无几。想来想去，决定铤而走险；走上书之路。于是我在湖南宾馆找到了一位服务员叫罗顺初的，他是我的同乡，在他家里我又秘密写起上书。这一次只花了五天时间就全部写好了。完工之际，罗要求我给他看看。他看后大为惊恐地说：“怡宝，我不知你的思想落到了这个地步，要是在五七年，你要打个大右派！”我听后，又怕他走漏风声，等他刚出门，我就匆匆离开他家。

我来到湘江岸边，开始冷静地思考：这个世界的确在颠倒走路，与我的思想格格不入，但非一人之力能扭转乾坤。于是我愤然将上书投入邮箱，搭船往洞庭湖逃生去了。

三 流浪洞庭湖

在去洞庭湖过沅江途中，我即改名为萧远江。一则是隐匿名字以利逃生，二则是勉励自己，要象江河一样，虽奔程遥远，曲曲折折，但最终是一定要流入大海的。

那时流浪，不象今日一样那么容易。当时三日查籍，五日戒严，经常抓流窜犯，没一天安宁日子过。尽管如此，但毕竟洞庭湖地域广阔，劳动力少，所以还是聚集有湖南、湖北、河南、山西、安徽、浙江、广东等十几个省的流浪者。这些流浪者中，有多数是为了出来赚口饭吃，也有少数是出于某种原因而来湖区避难的。

我初到洞庭湖，是六月中旬，正是扮禾季节。我找到千山红农场，帮助农场职工扮禾。然而怎奈湖区蚊子多，自己没有蚊帐被窝，晚上只得用稻草遮身，稻草怎挡得住蚊叮。末了，我得了疟疾病。一发高烧，我就卧床，烧一退，我又打禾，疟疾发烧、退烧有周期性，我卧床打禾也行周期性。如此豁出命来干，才赚到了十五元钱。随即我向人家买了一床破蚊帐和一床不上五斤的旧棉絮，这就是自己在外流浪的行李了。

流浪者不能每天找到活干。忙时湖区人请你帮忙；闲时一脚踢开，并且派民兵戒严抓流窜人员，抓到了又把你的钱没收，遣送回家。我为找活干，为躲避戒严不知想了多少办法。也不知吃过多少苦头。回首八百里洞庭湖，哪处没有我的足迹？我抗着酷暑在钱粮湖扮禾，忍着蚊叮在大通湖月夜下开沟，顶着严寒在荣家湾修路，冒着风雪在漉湖柴山里过年。我常常向着湖泊呼啸，望着长堤沉思：浑浊的湖水呀，你何时才有清澈的日子？弯弯曲曲的长堤呀，何处才是你的尽头？无可奈何之际，曾填有《菩萨蛮》一首：洞庭湖泊江风烈，长堤一片伤心色。独自莫凭栏，心情激浪翻。男儿空有志，效国无名字。把酒问苍天，中州何日见？

四 反省交代，案件处理

我在外流浪到了两个年头上，想起家中父母。一九七〇年五月，我偷偷回到新化维山公社我舅舅家里。我想让我舅舅把我父母接来见见面。谁知我的亲戚，包括我舅舅早已被有关部门的人做了思想工作，意即我一回来，就要送交政府，否则就如何如何。我舅舅是大队支书，觉悟更高，所以我一到他家，他就不准我再外出，要把我送交公社，让我去坦白交待。这样，我就被他带到了我家所在地科头公社大院。在群众的检举揭发材料面前，我不得不将上书内容全部交代出来。我做好了坐牢的准备，因为问题的确不轻，为什么甘愿走这条路，实在是因为在外流浪，那风刀霜剑的日子不易过。

根据我的反省交代以及群众的检举揭发材料，公社作出了“关于现行反革命分子萧瑞怡的处理意见”上报区政府，区签署“逮捕法办”四字，且将我的“罪恶”归纳成下面四点：

“一、疯狂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攻击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把全国人民对毛主席的无限热爱说成是个人崇拜。

二、恶毒攻击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

三、大肆攻击社会主义制度，为刘贼歌功颂德，鼓吹‘三自一包’、分田到户，大刮单干妖风。

四、极端仇视无产阶级专政，大唱阶级斗争熄灭论的高调，为阶级敌人鸣冤叫屈，抹杀毛主席的阶级路线。”

随即我被送到了县公安局。据说法院为此案处理争论激

烈。大多认为该判极刑，而法院院长张吉山及军管小组李副部长这两位主要负责人不同意。正在此时，上头来了一个文件，说是知识分子因思想意识方面的问题枪毙的人太多了，以后要从轻处理。这样一来，我才得以死里逃生，他们有了理由，说一则念我是学生；二则考虑出身好最后将我免刑释放，回乡由贫下中农监督改造。记得我从法院出来，李副部长追上我说：“年青人，敢想、敢说、敢做、敢为么……”可见人心！

五 逆境中的探索

在农村我整整改造了八年。八年面向黄土背朝天，我成了地地道道背着“反革命”罪名的贱民。游团示众次次在场，“批斗大会”回回有份。以后莫说本人不能参加升学考试，就连我的弟弟们读书、参军也不可能。一九七八年，形势好转，我开始当民办教师。经要求，给我平了反、但是，八年磨励（砺），使我对“吃大锅饭”的生产形式更加深恶痛绝，也使我更加增强了改革农村经济的决心。一九七八年，我看到了农业学大寨的运动依然有增无减，便大胆向《光明日报》写了一篇《生产关系改革浅见》的论文。在此文里，我以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作为依据，结合农村经济的现状，批判了空想社会主义，肯定了“三自一包”责任制的重大作用。后来该报理论部回复说：“不宜刊登，稿子已转中国社会科学院农业研究所。”

一九七九年，全国农村刚刚开始进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我又斗胆写了《共产真义说》一文，分别寄给了“中共中央、全国政协委员会和中国未来研究会，并以此文作为报考中国

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生论文。这篇论文有近两万字，包括八个部分：（一）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略谈；（二）根源在哪里；（三）建国三十年来农业生产发展状况回顾；（四）论共产的实质；（五）包田到户是体现共产主义的生产形式；（六）解答几个问题；（七）定额生产是解放工业生产力的有力措施；（八）结束语。这篇论文实质上就是原上书中第一部分内容的加深。因为那时候，人为的阶级斗争没有了，个人崇拜也废除了，唯独对农业经济，生产力问题的看法依然如故。所以，我把笔端指向这里，批判吃大锅饭，力图实行生产责任制这一富民之策，强国之方。可是，这篇论文寄出后，如石沉大海，杳无音讯。我常常叹息，自东汉蔡伦发明了造纸术后，废纸满坑满谷，而我用心血写的东西，哪张报纸，哪本杂志敢让出一版使之刊登，中国的言论啊……

六 结束语

我写上书距今已整整二十年了，时至今日，我的宏愿已大多实现。我真不敢相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步子竟迈得这么大，弯转得这么急。十年前，谁喊改革，谁就有可能挨批受斗，甚至坐牢杀头。而今天，谁反对改革，谁也会遭到唾弃。颠倒的世界如今又正过来了，这是我们中华民族之幸，是我们炎黄子孙之幸。尽管今天改革中尚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应当坚信，改革的方向是没错的。只有坚定不移地进行改革、深化改革，我们的国家才能兴旺发达。我认为：私产财富，公出精神；法安天下，民主出自由。我们的国家还有待进步，但今天的方向是正确的。

过去、现在，我一直坚守着“位卑未敢忘忧国”的格言。祖国命运，无时不虑；振兴中华，无日不思。然而政治体制改革远未与经济体制改革匹配，治政方面的人才并非科技人员那么斤两分晓；庸人政治虽说误国误民，然而精英政治不能出台时就只有传统政治扮主角了。想做王安石，未必能做王安石。我把自己比作一个茶壶，虽说“冷落无人顾”但“淡真气自豪”；要问“胸中何所有？——清水作波涛。”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但愿天下一切有志者有才者，共同奋斗，将人类社会这只大船，驶向和平、和谐、自由、民主、繁荣、发达、公正社会的港湾！但愿后来的有志者有才者，能人尽其才、效力于世！

萧瑞怡

1988年5月于冷水江

附（四）：

瑞怡致中共中央、全国政协常委会书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常委会：

十年前，一九六八年五月，我向毛泽东同志写过一次上书。有请求改革土地制度，废除人为的阶级斗阶，废除个人崇拜活动、解放人们思想等六个部分的内容。今天，人为的阶级斗争消失了，个人崇拜活动也没有了，我感到十分高兴。就这两项，我再没什么可说的。现在我要继续论述的，是改革土地制度的大事。我的看法仍与今日的形势不相符合，我始终坚持这样一个想法：集体生产方式不能解放农业

生产力,我国农业迟迟不发展的原因,就是因为生产关系使农民这个生产力中的主要因素没有得到解放。我高中毕业以后,流浪和从事农业生产已越十年。我愈在实践中磨炼,思想也就愈成熟,信念也就愈坚定。拙作就是根据我原来上书中的第一部分内容加上后来的实践经验而写的。它是一篇以实际为依据的论文,力图以自己的亲身感受和体验,阐述什么样的生产方式才能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并附带谈了工业问题。论文中的观点,是我用皮肉熬出来的总结,所列举的事实,也是确凿无误的。今天党一再重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重申广开言路、百家争鸣的方针,故此写出来,呈送给中央委员会参考。如认为文中的观点是错误的,请交给邓小平同志过目,则该怎样处理就怎样处理,就我目前的思想而言,即使坐牢甚至处死我,我也难以改变自己的观点。不过,我相信同志们会理解我——一个普通农民的心情和善意的。

一 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略谈

先从一件小事说起,1975年插早稻时节,我生产队决定宰一头猪以改善社员的生活。宰猪时是这样规定的:预先由生产队补助一百斤稻谷给养猪户,然后社员按国家牌价每斤肉柒角陆分钱向养猪户买。当时,有些社员拿不出钱,并考虑养猪户完成不了一年规定的劳动日,于是,他们私下向养猪户提出一个办法:即拿一个劳动日换一斤肉。养猪户主开始满口答应,可坐下来细细一算,马上反言了:“嘿,你们打的好算盘,一个劳动日工价是叁角伍,工分粮只一斤,这一斤还要花九分五去买,买回这斤工分粮就算黑市价叁角。叁角加工价叁角伍,减去玖分伍,一个劳动日只值伍角陆分”

伍，与肉价比较，要吃壹角玖分五厘钱的亏。”经养猪户主这么一说，社员们只好摇头而去了。

事实上，生产队不预先补助一百斤稻谷给养猪户，他是会以当时市价一元一角一斤的猪肉向社员出售的。那时，一个劳动日换肉仅仅半斤加三钱！

要赚回一个劳动日，首先要在家吃三顿饭，再到生产队干一天活。吃自家的饭，干一天活，换回半斤肉，工价之低，对于不熟悉农村的人来说，也许难以相信，可是对于农民而言，已是司空见惯。

不用说，工价低，社员生活困难可想而知。1977年，笔者全家四口人，从生产队分稻谷760斤，平均每人每天190斤。负担父母一点，猪、鸡等牲畜吃一点，平均每人每天不上半斤稻谷。生活够苦呀，日子难熬呀！一旦锅里没米煮，狡猾的上山偷树卖，老实的外去打零工，不要面子的劝老婆带着孩子去讨米。有个叫萧友朋的社员，既不愿意上山偷树卖，又不愿外出做临工，更不愿意老婆带着孩子去讨米。他倒想出一个好主意：天刚亮，他扛起锄头，拿着簸箕偷偷地走到一块地里，掘起一个大土坑准备活埋自己。待人家赶来相劝时，他还是掘坑不止，口口声声说：“我死不怪大家，我只怪自己命苦！”当然，在大家的劝解下，他想了结贫困到黄泉之下去享乐的想法未能如愿以偿。

无疑，工价低，社员生活困难是农业生产没有搞好造成的。农业生产为甚么搞不上去呢？一般地说，一个生产队是由张三、李四等各姓氏人家组合起来的，一个队多的上了两百人，少的也有几十人。社员中有三部分人：忠直老实的，狡猾懒惰的，“和大堆”混日子的。忠直老实的干集体活和干私人的活一样卖力，狡猾懒惰的想尽一切办法躲懒，“和大堆”混

日子的也是无所目的、无所用心。这三部分人中前两种较少，后种甚多。忠直老实的一见那些狡猾懒惰的干活是尊菩萨样，往往就要指责。一指责就骂架。被指责者说：“你还讲我，你担就担我不赢，插田就插我不快，我没说你，你就不要来欺人了。”本来也是这个情况，忠直老实的大多数是解放前劳动成了习惯的老年人，要懒也不懒不起来，但手脚毕竟慢一些了。狡猾懒惰的人大多是些年轻人，浑身是劲，但就是不使出来。一讲干活比高低，老年人当然就畏惧年轻人了。经他一说，老年人自然只能瞪着眼睛干受气。有时，生产队长为了把大家的积极性发挥出来，就提出定额，而定额又定不好。比如，早晨扯秧插田，队长说：“今早没扯足一百个秧的不准吃早饭！”队长令下，大伙果然卖力扯起来。可不上一阵工夫，就有人报告队长：“一百个秧扯足了。请点数。”队长半信半疑：“这么神速？”走拢去一看，原来个个秧只有一茺葱大。队长吼道：“点个数不行，要过秤。今早没扯一百斤秧的不准吃早饭！”命令一下，大伙又遵旨执行。不上一筒烟久，又有人报告队长：“一百斤秧差不多了，请过秤。”队长又将信将疑：“如此神速？”走拢去一看，原来秧没有洗干净，上面尽是泥巴糊着。两计落空，队长不免灰心丧气：“北京城里倒个金銮殿，占我门下没片瓦，要饿大家一起饿肚子！”

生产队的工夫的确难抓。不定额，你望天，我望滩，你我只盼太阳早点儿下山。一定额，顾了数量没顾质量，顾了质量没顾数量。队长有矛，社员有盾；队长有枪，社员有炮；你有刺杀的一手，我有防御的一着；你有诸葛亮的策略，我有刘伯温的计谋。可以说，八路神仙下凡也难治理好一个生产队。

到了年终结算，你空钱，我少粮，你骂我害了你，我骂你害了我，你骂我懒，我骂你奸，这时，讽世者就编出顺口溜：“你姓牛，我姓羊，牛羊本不同草场。你骂爹，我骂娘，生产队是个斗架场！”

不用说，干活这样“和大堆”，时间虽然花得多，但效益是极低的。笔者所在生产队共有社员168，种田104亩，土六亩，全年花工要上15000个以上，除去一些修塘、修坝、开会等杂工，平均每亩花工至少要上一百个，而总产量哪年都难上55000斤，平均每亩产量不上500斤。笔者问过一老年人，过去做长工一亩田要花多少工。他答道：当紧工只有十二、三个，加上看水、收获等工，也不会上20个工。当然，过去一年只种一季，我们今天种两季，依此计算，两季也只要40个工。可见，现在一亩田花工是过去长工的两倍半。

浪费劳动力的现象是如此严重，而田土又没有生产出应有的产量，因此生产队的活儿天天有干，无休无止，一年四季简直无农闲农忙之分，而社员到头来从队里分到的不是财富，而是贫穷。有位社员说：插田插到立秋，扮禾扮到立冬，吃就吃到立春。这话实实在在道出了当今农业生产和农民的生活状况。

也许有人会说，你举的例子都是你本地方的，你是以点带面。且慢，笔者曾流浪到洞庭湖、湖北、江西，那里的土地面积虽然宽一点，工价略为高一点，农民生活略微好一点，但工价也高不了许多，生活也好不了多少。一逢荒月，也有人卖布票换粮，也有人外出讨米。至于生产队的活儿，农民更是累如牛马。窝工浪费现象一样严重，生产没有达到应有的水平。

河南如何？河北如何？山西如何？想必那里的社员，其

心中也有难言的苦楚。

二 根源在哪里

现在，我们来看另一幅场面，那是任何社员一走进自留地上都会有劳动场面：他挥汗如雨，一锄下去，山谷都被震响了。土挖完之后，他开始细心地修坑整边，然后高高兴兴播种。整个劳动过程，似乎他忘记了世界，忘记了时间，忘记了自身的存在。只有当天黑下来的时候，他才猛然想起该回家了。于是，他带着几分惋惜的心情说：“天慢一点黑下来多好呀，我的工夫还差一点没干完呢！”

只有在自留地上的劳动，他才感到无比的自由和舒畅！只有在自留地上的劳动，才显示出他充分的劳动志趣！只有在自留地上的劳动，才能使他达到忘我的境界！

于是，有人大发议论：这是“私”字作怪，在生产队干活磨洋工，混日子，在自留地上干活拼死拼命，天黑了都不知道回家。”

还有人挺起胸膛说：“这种思想要批，要斗；要割掉他的资本主义尾巴！”

这些话看起来似乎很有道理，但实际上是说不过去的。我们追根寻源，两处劳动两样表现，是在人的思想指导下产生出来的。脑子想要上山，双脚就往山上走，脑子想要下水，两腿就往水中游。如何探究这样的问题？应遵循恩格斯所说的：“……不应当在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该在有关时代的经济学中去寻找。”

我们知道：生产力有三大要素，其中最革命，最活跃的要素是劳动者本身，生产工具的使用和改进全靠劳动者的双

手和智慧。要解放生产力，首先要解放劳动者本身。人没有抽象的人，一定阶段人的思想都是由此阶段的经济条件所决定的，特别直接受着此阶段的生产工具的影响和支配。在原始社会阶段，生产工具极其简陋，一个人拿着木棍和石头无法单独同自然界和猛兽作斗争，氏族人员必须集体干活，一同捕食。而这个集体、其性质范围也是极其狭窄的，氏族公社的人员都是一个女人的子孙。在那样的生产力水平下，决没有谁异想天开说要脱离氏族，独立去干活，独自去捕食。随着生产工具的改进、提高，当人可以单独从事生产活动的时候，氏族公有制也就随之瓦解，人类就进入私有制社会了。个体劳动形式也就开始在历史上出现。生产力再进一步发展，当纺纱机代替了纺车，机动织布机代替了手工织布机以后，个体劳动形式又为集体操作形式所取代。在这样的生产力状况下，决没有谁糊糊涂涂地离开作坊去死死抱住他的纺车和他的手工织布机不放。现阶段，我国农业生产力仍然不十分发达。土地改革时期，农民使用的是锄头犁耙，互助组、合作社农业使用的依然是锄头犁耙，人民公社乃至今天农民使用的仍然是锄头犁耙。难道挖土要一个人拿着锄头尾端，一个人拿着锄头上端，一个人拿着锄头中部才能把土翻起来？你用锄头犁耙生产，我也用锄头犁耙生产，他也用锄头犁耙生产，你是喜欢独立自由地干活还是喜欢三人一起劳动，共同分配呢？难道你我他各扛来一把锄头组合在一起干活就是公，分开劳动就是私吗？怎样看待“私”呢？我想，偷人家的东西是私，谋财害命是私，赌牌押宝是私，投机倒把是私。对这种“私”，就要批，就要斗。一旦经过批斗，其“私”也容易除掉。至于劳动者在可以独立进行劳动的生产力的条件下，你硬要把他们组合起来“和大堆”、以致产

生两种劳动两样心是“私”的话，我则认为那是现阶段劳动者共同的正当的心理要求，是劳动者追求自由的必然愿望。除了白痴和疯子，哪个劳动者都有这种心理要求，都有这种必然愿望。如果你要批它，斗它。那是万万批不垮、斗不倒的。

到此，道理就十分明白了，我国农业不发展，农民生活苦的原因，就是由于“和大堆”的生产形式束缚桎梏着劳动者的思想，阻碍着其积极性发挥出来。一句话，是生产关系阻碍生产力的发展而造成的。

三 建国近三十年我国农业生产关系变革浅见

为了进一步阐述我国农业迟迟不发展的原因，我想就建国近三十年我国农业各发展阶段的生产关系变革浅析一下：

解放初期，即土地改革时期，当时打地主、分田地，广大受剥削受压迫的贫下中农分得了土地，摆脱了他人的剥削压迫，其劳动果实全部属于自己，因而生产力得到了极大的解放，农民爆发出了空前的劳动热情。后来许多老农说：

“那个时期，喊‘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是出自内心的。”这段期间，粮食堆山积海，当时我地市场谷价只有六元多一百斤，与国家牌价相差无几，猪肉四角一斤，鸡蛋三分一个。真是“岁晏有余粮”，家家乐有业。到了后期，由于各种原因，渐渐出现了两级分化，个别困难户开始卖田卖土。当时我们的国家底子十分薄，无力解决农民的困难，我们党便引导农民走互助组、合作化的道路，走共同富裕的道路。这样，消除了两极分化，在一定程度上发展了生产。

但是，在建立合作社的进程中，我们的步子走得太快

了，超越了生产力的发展水平。马克思在讲到人们怎样才能创造一个新社会时说道：“他们在自己的进程中，首先必须创造新社会的物质条件，任何强大的思想或意识力量都不能使他们摆脱这个命运。”在这里，马克思就物质条件的作用强调得非常重要。恩格斯在就个体生产转变成协作社生产时更有一个清楚的论述：“当我们掌握了国家机器的时候，我们根本不能设想用强制的办法剥夺小农……我们对待小农的任务首先在于把他们的私人生产和私人所有权变成协作社的，但不是用强制的办法，而是通过实例和提供社会帮助来达到这一目的。”恩格斯所讲的实例就是国家要在各个地方建立一些高度机械化和高度商品率的国营农场，使人们深信社会主义大经济的优越性。所谓社会帮助，就是要大力发展生产力，发展农业科学技术，为农村提供足够的机械生产设备。可是这两点，我们都是欠缺的。当时农村普遍使用的生产工具还是千百年来惯用的锄头犁耙，抗旱灌水浇田，农民普遍用的是水车和唐朝发明的筒车。既然生产力是这样的水平，合作社的组织形式岂不是跨前了一步？我们知道，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规律是一切经济形态共有的规律。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有许多优越性，但不能违背这条规律。应当说，那时农民思想是纯朴的，党要他们怎么做就怎么做。当时有些农民并不愿意加入合作社，但来一下强制措施又不得不参加。由于那时的农民都是解放前勤勤恳恳的劳动者，并没有养成偷懒“和大堆”的习惯，因而生产还是向前发展了一步，只是速度非常缓慢。

人民公社阶段，继高级合作社后，1958年，农村开始普遍成立人民公社。不久，各村成立公共食堂，家家户户进公共食堂吃饭。那时，到处写着红红绿绿的标语：“吃饭不要

钱，越吃越香甜”，“公共食堂好，菜香饭又饱”。可是严峻的现实证明它是一些不现实的东西。因为管吃，不愿干活，一干活就象一窝蜂一样，效率极低。田里抽出的禾穗就象装在地里的几根香，有的田地甚至荒芜，杂草丛生。一当村里几百张嘴把老底吃光了以后，人们就开始啼饥号寒，继而到饿死人的严重局面。那时物价猛涨：十六块钱一斤的猪肉，一块钱一个的鸡蛋，三块钱一升的米。社会处于瘫痪状态，国民经济踏上了崩溃的边缘。笔者是历史的见证人。当时我的口粮是每天半斤，天天饿得发慌。为了充饥，我吃粗糠粑、土茯苓，市场上有人把牛屎搅在食物里做成粑粑出售，我亦受骗吃过。这是一场大饥荒，时间之久，程度之严重，可说是中国历史上所少有的。对于这场大灾难，有人说是自然灾害的影响，是苏联撕毁条约造成的。我认为这都是避开事物的本质而说的。当然，这两个方面的因素都有，但从本质上说，这完全是由于当时盲目地实行极端的公有制破坏了生产力的发展，严重束缚了劳动者积极性，造成了劳动力空前浪费，粮食减产的结果。

此时，是谁体验到了天下黎民嗷嗷待哺之苦？是谁不顾自己的安福尊荣反对这种极端的公有制？是共产党人中的海瑞——彭德怀，因而不得不总结教训，拆散了公共食堂。继之，是所谓刘邓路线——“三自一包”下了一场甘露雨，个别地方还实行过借田借土制度。因此，生产由瘫痪开始复苏，继而又猛速发展，粮食巨增。一九六三年，一九六四年，我地谷价降到只有十六元一百斤，猪肉八角一斤，国难消失，人们又得温饱。

没过多久，紧箍咒又把农民箍紧了。“文革”十年，农业生产力又受到严重破坏。七十年代掀起了批斗资本主义的

高潮。有的社员上山烧担木炭卖是资本主义要罚钱，有的打几桌豆腐卖是投机倒把要退赔，有的养几只鸭子是资本主义付业要清算，有的屋前屋后种几菀南瓜藤是多清(侵)多占要办学习班。这也是资本主义那也是资本主义。上面发下文件，总结资本主义有二十三种表现。按这二十三种表现衡量，可说世界上没有几个良民了。这也挨批，那也受斗，农民被当作农奴一样紧紧箝制在集体里。然而，农业向前发展了么？没有，不但没有发展，反而日趋衰落。那时候，我地稻谷涨到三十六元一百斤，猪肉涨到一元三角一斤。尽管上面派遣大批干部把守农村阵地，尽管这批干部怎样用手段批斗社员，但社员向往独立自由生产的正端心理要求不但没有消失，反而与日俱增。他们渴望党改变农村政策，犹如大旱之望云霓。

农民的愿望终于盼来了一部分。粉碎“四人帮”后，党在农村实行了一系列良好的方针政策：如减轻农民一些不合理的负担；提高农产品的价格，降低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实行包产到作业组，允许私养耕牛等等。这些都有助于农民生产积极性的发挥，有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以我地而言，这时生产的主杂粮增加了许多，市场谷价由以前的三十元一百斤降到只有十八元一百斤，猪肉由以前的一元三角一斤降到只有一元一角。

社会是一个大实验室，真理和谬误都在实践中受到检验。通过建国近三十年农业生产各阶段的总结，我们就能找出其中的因果规律：凡是生产关系适应了生产力的性质状况，便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凡是生产关系超越了生产力的性质状况，生产就停滞、倒退！

四 论共产实质

现在我们来分析一下，为什么有人一味追求搞大集体，而且这个集体越大越好？为什么他把这也看作资本主义，那也看着资本主义，就象一个人走进了南极圈的顶端，看方向是那么绝对？查其思想，是对“共产”二字理解的差误。无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要实行“共产”的，我们党的名称就取了“共产”二字。但“共产”决不是象原始社会一样，大家一块儿劳动，一块儿分配劳动果实。“共产”，实质上是就社会主义制度对生产资料而言的。社会主义制度要求土地、森林、水流、矿藏、生产建筑物、交通联络工具等等生产资料归全社会公共所有。生产资料的归属决定一种社会制度的性质。土地改革时期，尽管其生产力水平低，农村采取单干的形式，如果没有买田卖土现象的话，它仍然是社会主义。相反，尽管资本主义生产力高度发展，把一系列个体生产单位转变为社会化的集体形式，但由于生产资料归资本家私人占有，因此，它不是社会主义。由此可见，生产形式如何并不决定社会的性质，决定社会制度性质的是生产资料的归属，决定生产形式的是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生产资料的归属与生产形式的确定是两码事。弄清了这一点，就弄清了“共产”的实质，即共产的真义。那种认为“和大堆”、“吃共产大锅饭”就是社会主义，个体生产就是资本主义，其认识未免太简单了。如果我们继续“和大堆”、“吃共产饭”下去，不顾生产力的发展水平，那么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就会越干越穷，越干越破产。“穷过渡”与共产主义根本就不沾边。那时的中国人就让发展起来的国家去看笑话

和施怜悯去吧！

要想把我国建成一个富裕、发达的现代化社会主义国家，当务之急是必须刻不容缓地改革我们的生产关系，使之既体现社会主义性质，又适应当前的生产力水平和各行各业的特点。共产主义，是几个世纪以来人类社会善良人们的一种崇高理想：公平、正义、公道、道德、充满人性和乐安足和富裕发达。但现在我们还是要先着眼于现实，多想一想发展和进化，切勿为道义的理想缚住手足，而付出历史进步的代价。在当今社会生产力水平条件下，我看社会的公义和原则最好是：私产财富，公出精神。历史从这里进足。

五 包田到户是发展农业生产的生产方式

十几年前，部分地方曾实行过“三自一包”。所谓三自一包，即自留地，自负盈亏，自由市场，包产到户。这本是提高农民生产积极性的好办法。后来经过批判，没有继续实施，至今农民还深为留恋。但我对三自一包有这样的一个看法，它还不能把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全部发挥出来。应当说，包产到户，耕者有了责任心，也给予了他自由。但是包产到户所包的产量是要交给集体，按人、劳等比例统一进行分配的，自己的劳动不可能全部属于自己，自然他不可能将自己的全部力量都使用出来。比方说，在遇到严重天灾、虫灾的节骨眼上，他就有可能不全力抢救。他想，所包的产量虽然损失部分，但今后统一分配，还是能够得回一点的。倘若所包的田，其收成全部属于自己，则无论什么大的旱灾，他也一定要全力抢救，即使用肩膀挑水抗旱，他也会乐意去干。所以，要想把农民的积极性发挥出来，那就一定要让他自己意

识到：花一滴血汗能得一滴血汗的成果，花两滴血汗能得两滴血汗的成果。劳动与成果紧密挂起勾来，谁不愿意去流汗，去奋斗呢？马克思这样说过：“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的利益有关。”利益是马克思经典著作家们所极为重视的范畴。利益与人结合得越紧密，则他愈能为实现其利益而奋斗。

为此，根据目前农村生产力的水平，我想提出包产到户的生产方式。其内容是：在现有人民公社的制度下，以生产队为单位，根据人口的多少，劳动力的强弱，进行合情合理的田土分配，包给他耕种。田地的所有权属于国家，集体有调整分配土地之权，至于各户只有耕种之权，决无买卖之权。劳动果实全部归他自己，三年或两年以后，根据人口的增减，重新进行田地分配，集体或国家因为公共事业要占用土地则可及时调整。上交国家的公粮由队核算到户，再由各户交出来统一完成。除此以外，大队一级和公社一级应根据各户的田地面积，抽出百分之几的粮食库存起来，以解决五保户的生活和特殊困难人家的难处，至于现在生产队的生产资料，应根据各户自愿组合，组成几个小单位分成几股抽鉴分配。

当然，今后生产力发展了，科学技术进步了，这种生产方式也将随之改变、完善。但不管怎样，那种“和大堆”的生产形式将永远不能存在。取替它的将是更为精细的科学的经营管理形式。因为我国是人口众多的国家，虽然总的耕地面积仅次于苏联和美国，但人平就非常之少了。仅仅一亩五多一点，而苏联、美国人平有十几亩，加拿大人平有二十几亩。因此，精耕细作是我国农业生产的特点，加之我国山区多，土地是分散、零星的，韩丁的耕作技术未必能用上（于）

山区。因此，农业机械设备的生产不仅要适用平原，而且要能适应山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生产效率的提高，农村会出现劳动力过剩的现象。这是好的现象，到时可以组织劳力发展农村企业，粮食加工业，农业国也将逐渐变为工业国了。

现在“农业学大寨”的热潮依然如故，到处写着“五年建成大寨县”的巨幅标语，“和大堆”已成为一种习惯，“吃大锅饭”的社会主义已在人们头脑中成了一种固定的社会主义模型。我真是无日不忧，无时不虑。“农桑乃立国之本”岂可长期这样下去？尽管现在我们党采取了包产到作业组，提高农产品价格等等措施，但从根本上来说，还不能彻底解决问题。等于一个病久了的人，不从病根入手，则难以治愈他的病。今日唯一拯救农业的良方，那就是包田到户。除此，别无他法。

六 定额生产是解放工业生产力的有力措施

土地是死的，分散的劳动对象，因而可以实行包田到户的生产形式。而工厂是活的，集中工作的地点，很多生产由于机器的运转决定工人的劳动形式不能不是有联系的集体操作形式，这样就只能以记时的办法来表示工人的劳动程度。但是，有不少集体操作的整体，也可以进行集体定额的。至于有些生产可以由单个体去完成的，定额就非常必要了。超额完成工作量的有奖，没有完成的要扣。假使定时而不定量，只要八个小时过去了就有工资拿，那么能保证谁不去混时间呢？文化大革命期间，为什么工业生产日趋下落？就是由于那时工人没干什么活，天天打牌，睡觉。怪不得那时连世界有名的锑都——新化锡矿山在一段期间里竟发不出工

人的工资！笔者曾在那里当脚夫几年，亲眼看到工人们到井下混两、三个钟头就算一个班。这个班他还可以得六角钱的井下补助和一个保健餐。当时，我不禁感叹，工业的损失可说比农业还要大，因为农民怕饿肚子，多少总要干点活，而工人干不干，工资，粮食一文钱一也少他不得。工业前景，岂不可怕？于是我就想起来，工人要为国家真正创造一点财富，也必须跟我们脚夫一样，每天有一个奋斗目标。我多挑一担煤多得一担的运费，多挑一斤就多有一斤的钱，尽管我挑煤多么累，但为了钱，我累值得，并且我干得心情愉快，天天都希望天慢一点黑下来，让我能多挑几担，超额完成我这一天的任务。这样，就在我为目标奋斗的时候，高山上的煤移到了平地，为他方解决了用煤的困难，自己满意，他方亦满意。倘使工人做工也实行定额，我想他也会尽力为之。因为要有钱才能活命，钱越多日子就越过得好。当他在不知疲倦向目标进击的同时，社会财富也被他创造出来了。

此外，我们还应允许工人与工人之间竞争，厂矿与厂矿、企业与企业之间竞争，我们的竞争不会造成生产过剩，因为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能够有计划地发展国民经济，一切生产都是在计划下生产的，同时，由于生产资料公有，个人的劳动所得到的利益与集体，国家的利益是一致的，这样就决定人们的思想道德不致于败坏。正如恩格斯说的，新制度的建立，劳动者不会再“堕落腐化”，因为使他们“堕落腐化”的根源被灭掉了。

总之，任何人的劳动都要和他的利益紧密挂起勾来，农业是如此，工业是如此，其他行业应该如此。当各行各业的工作责任到了人的时候，便是我们的国家开始兴旺发达的时候。

七 结束语

如果从十六世纪初英国莫尔提出的“乌托邦”社会主义算起，到十九世纪四十年代马克思、恩格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其间历经了三个多世纪，加上社会主义实践的历史，人类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达四百多年。四百年来，人们对“共产”的认识还是十分肤浅的，因为社会主义实践的内容太丰富了，社会主义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太复杂了。因此，我们要在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实事求是地去研究社会主义实践中的问题。我们不但要研究我国近三十年的实践史，而且要研究苏联、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匈牙利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史，与此同时，我们还要研究美国、日本等资本主义国家活生生的现实。以便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使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少走弯路。列宁说：“社会主义自成为科学以来，就要求人们把它当作科学去看待，就是说，要求人们去研究它。”让我们遵循列宁的教导，大家一起来研究，找出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规律，为我国建设成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

湖南省新化县科头公社桃林大队社员

萧瑞怡

1978年9月

王容芬上毛泽东书

尊敬的毛泽东主席：

请您以一个共产党员的名义想一想：您在干什么？

请您以党的名义想一想：眼前发生的一切意味着什么？

请您以中国人民的名义想一想：您将把中国引向何处去？

文化大革命不是一场群众运动，是一个人在用枪杆子运动群众。

我郑重声明：从即日起退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致

礼！

北京外国语学院东欧语系
德语专业四年级一班学生

王容芬

1966年9月24日

女 政 治 犯

戴晴 洛恪

有着明确的惩办反革命罪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分则·第一章》是一九七九年颁布的（一九八〇年一月一日起生效）。在这之前，如果不考虑种种临时的规定，比如《公安六条》等等，对“反革命”的判罪的依据就是一九五一年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惩办反革命条例》了。此条例没有细目，统而言之为：

“凡以推翻人民民主政权、破坏人民民主事业为目的的各种反革命罪犯，皆以本条例判罪。”

考虑到汉语象形文字转意上的随意性及单音节字自由运用的特色，“破坏”与“推翻”所能涵蕴的定罪面就很难说了——当然这是个语义学界绝对争不出个所以然的问题，好在自《条例》公布以来的案例尚存，只消作一点属于算术式的分析，就足够了。现在我们享受的是《刑法·第一章》，它下领十三条款，规定得明白多了。

将近十年了。在公众的记忆里，自一九七六年清明的大逮捕之后，如果西单民主墙算一次、卖情报给台湾的那两个半人算一次，一九八五年秋天北大学生与警察有了一点小摩擦之后抓的一个历史系的学生也算一次的话，十年间，尚不见出现过轰动社会的政治犯案。

几乎没有政治犯的十年，在中国，自一八四〇年以来，大概是头一回。如果联想到中国的当权者这百年来对有着不同思想与政治信念的人之残忍与恣意，这十年，竟是平安得可以载入史册了。

政治犯案在中国，与它的文明同样久远。

如果把鲧算作“湊职”的话，最早的载入史册的政治犯，恐怕就是商汤了。“不多德而武伤百姓”的桀，先是把“修德”的汤“召而囚之夏台”，后来掉以轻心，放了。汤东山再起，“率兵以伐夏桀”，弃甲曳兵的桀后悔不迭——

“吾悔不遂杀汤于夏台，使至此。”这里的“修德”与否当然是后人的评价，因为当时并没有公认的、全体民众必须共同遵守的标准。

不但奴隶制的时候，就是到了长达数千年的封建社会，由于“朕即法”，对政治犯的判断也只有一条：“忠”或“不忠”。有名的酷吏如郅都、杜周等，亢直也好、从谏也好，甚至暴挫擅磔、酷比蝮螫，指的其实是他们的手段，并非量刑的标准。著名法家韩非虽然废了贵族的世袭分封，主张无论干部还是军官，都要自基层一级级选拔上来，最基本的政治标准仍是“上之所是，人皆是之；上之所非，人皆非之”；直到公车上书，讲的还是治民之术。“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原则未动摇，人权的观念尚未萌生，政治犯的标准仍然只有一个——犯上。

辛亥之后，民国诞生，《暂行新刑律》不再提“上”，只提“国”。对政治犯罪有了新的规定：内乱、外患、泄露机务；处罚是：徒刑、流刑、遣返；有死刑，但交一笔款即可了事的也有。

对李大钊的审判开始时是合于法律程序的：组成合议庭，并据他“崇信并宣传共产主义”，论以煽惑罪，顶多内乱罪。但“献上”之后，“斥之为失，出，悉改科死刑。”杀与不杀，还是张大帅说了算——绿林出身的张作霖别说懂法，连字都不识几个。

李大钊等人从容就义之后十个月，《中华民国刑法》颁布了。

随着日寇的进犯，中国人能享受到的思想与言论自由越来越少，恰如食物与燃料。《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与《修正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分别于一九三一和一九三七年颁

布，规定“凡是以文字、图画、演说或其他方式宣传抗日、举行游行等，视为扰乱秩序、鼓煽暴动、破坏交通，军警得立即逮捕，并得搜捕嫌疑犯。”

中国现代史上有名的几大政治犯案，依据的全是这套条文。到了一九四七年底，《戡乱时期危害国家紧急治罪法》匆匆颁布。这是二十世纪以来刑罚最严厉的一部，死刑的范围极大。不过话说回来，权贵们何苦费这套文字功夫呢？宋教仁、廖仲凯、史量才、李公仆、闻一多，不都是从暗处噼叭放几枪就解决了吗？

志士们的鲜血，洒遍了中国近代史以来的每一页，妇女们毫无例外。请看下表：

时	代	姓名	生年	卒年	卒时 年龄	罪名	处决方式
清	末	秋瑾	1876	1907	31岁	暴乱	暴尸道路
大	革	陈铁军	1904	1928	24岁	异党	枪决
土	地	杨开慧	1901	1930	29岁	最严重 政治犯	示众枪决
抗	日	赵一曼	1905	1936	31岁	战俘	枪决
解	放	江竹筠	1920	1949	29岁	异党	秘密枪杀
人	民	张志新	1930	1975	45岁	现行反 革	禁声枪决*

可以说，中国妇女，从她们走出家门、进入社会的第一天起，就不曾将自己的聪慧与果敢仅仅局限在教育、保健、福利等“合于妇德”的有数领域。为寻求更加光明与合理的社会，她们不曾因自己身体的柔弱与环绕膝下的娇儿有过片

* 枪决前，以细铁丝勒住下脰，使犯人发不出声音。

刻的犹豫，当权者当然也不曾因这同一理由面对她们施予稍多一点的仁慈。

她们的牺牲都很英勇。而且，都那么年轻。

第一次见到她，是在北京大学研究生会组织的一个系列学术讲座上。那是一九八六年春天，学生的和学者们的心都活泛起来，恰如未名湖那一泓绿水。

她讲的题目是“马克思·韦伯与当今世界”，谁都知道这是个难啃的大块头，恐怕德国人自己都这么想。但她讲得挺漂亮，几句听下来就知道这是个读书而不读死书的人。她用典不少，但并未预先写在纸上，全是讲到兴头的时候随便拉来的。有些见解相当独特，起码除她之外，我还没在别的书上看到过。

北大学生对演讲人之不客气是出了名的，稍觉厌烦，便是一片离席的喇叭声。她语调平平，几乎没有手势，却稳住了那么一大屋子人，包括走廊上和窗台上。

我上前搭话。她很矜持。我称赞她的裙衣漂亮，想借此缓和局面，也收效不大。但她答应了接受采访（即光明日报的《学者问答录》），对我的稿子也十分客气地几乎一字未动。我想，或许她是因为大报将她一下子奉为学者而稍稍受了点惊吓吧？这时候，我才知道，她原来四十岁还不到——我以为她至少五十岁了——而且坐过十三年牢。

按照中国二十多年前通行的政治用语，她是资本家的女儿。她父亲四十年代开了个干鲜果品店，在她还不记事的时候就去世了。她母亲接手经营，虽然在一九五六年公私合营之后交出店铺，当了国家职工（售货员，月薪人民币十三元），资本家的帽子一直戴着。现在，老太太每月还到“单位”领退休金，但股息是绝对不碰的——她以为这样那帽子就与她无干了。

每月十三元钱养活三口人，王容芬小时候过的是苦孩子

的日子。但她的“现反”不是出于对这一政权的仇视，反倒是挚爱，爱到非要用她一茎小草般的生命去改变她认为的“全民族错误的运转”不可。由此可以看出，一九四九年成立的新中国用理想与信仰来造就差不多五代人（其中包括一九一〇至一九五〇年出生的三代青年）是怎样一个了不起的成功。王容芬这样的“犯人”，一九六六年以来曾出现过一大批。以他们的死为世人所知的并不多：遇罗克、张志新、王申酉等等。他们都不是政治家，不但缺乏组织政治活动的最基本的常识，政治见解也浅稚得很——他们受的教育那么简单，读的书那么有限，能发表出什么政见呢？但这批人大都不怎么怕死，对常人孜孜以求的名利、安乐看得很淡。他们奉为神圣的，为之可捐弃一切的，是心中的信条。

释放之后，王容芬曾到西德研究讲学。她差一点就见到了Johanner W lkemau，一位放弃了自己的研究，终生默默收集整理韦伯文稿的老学者。她讲到这里十分动情，听讲的学生们直到一年以后还背得出她的原话。在西德，东道主根据自己的判断，在她名字前边冠上了与她的研究相应的某种称谓。等她知道我准备把这头衔也介绍给读者的时候，急忙来信，请“千万千万”抹去。显然，没过多久，就有闲话传来（甚至过了很久还有）——“她算什么学者？！怎么找上的？！哼，她还曾……”

是的，她还曾——

我的罪名是“现行反革命”，属于政治犯。一九六六年九月逮捕，十年以后，一九七六年一月宣判——无期徒刑。没过三年，一九七九年三月，作为大案要案第一批改正，无

罪释放。什么叫大案要案？凡是刑期二十年以上的都是。其实我这案子就我一个人，连同案犯都没有。我进去的时候十九岁，大学四年级；出来三十三岁。

十岁的时候，我以语文、算术二门课二百分的成绩考进了北京一〇一中。这是北京的一所名牌中学。报到前，我赶了一个暑假的活儿：山里红去籽穿糖葫芦、大蚕豆割口炸开花豆……总之十岁小姑娘揽得上的活儿。挣了钱，我给自己买了一段花布，做了一条长裤衩。这是我记事以来穿过的最好的衣服。

当时我们班里除我以外，档次最低的也是大使的儿子。别的人手帕都不会洗，可我得拆洗一家人的被褥。每个礼拜六我都到六郎庄的泉水边，用大棒捶捶。棉衣棉裤都自己做。学校规定住校，我没住。第一，跟同学没什么可谈的；第二，我也不能住，因为要在家干活。

高中就到外院附中去。这主意是我自己拿的，因为看教学大纲，那里的课和普通中学一样，就是外语量大，这有多好。我高中成绩一直不错，只有一个学期政治课差了一分，没拿到金质奖章。这三年是住校，妈不再让我干活了。

十六岁（一九六二年）保送大学，成绩也不差，就是派头不行。我一直穿哥哥的剩衣服。现在女裤前边开口是摩登，那时候简直不能见人，还好上衣长，能遮住。衣服也是哥哥的，而且还是我给他做的，他穿完我穿。

我就这么穿着哥哥的衣服直到进监狱，直到坐牢。当了囚犯，才有了两件象样衣服，那是妈可怜我才给我做的。

文革开始以后，我家被抄了三次，所谓刨地三尺。我妈主动迎接这场革命，把她认为属于资产阶级的照相机砸了，算是破四旧。没想到反倒惹了事：销毁特工器材。

我没当造反派。刚进大学的时候，我读过沃尔夫的《马门教授》，觉得历史在重演。我们学校就在魏公村附近，平日我常到湖南公墓，在齐白石墓地看书。一天，亚非语系的学生突然扛着铁锹镐头跑进来，把美丽安静的墓地砸得一塌糊涂。我当时就想，这叫“文化革命”？

我们学院党委书记是小红军，十七岁就当县长。他妻子当过我的老师。有一次我病了，就是她把我背到医务室。这样的一个人，完全是基督徒式的共产党员，被斗得……还有陈教授夫妇的自杀，校医室黄医生夫妇的自杀——现在想想他们死了也好，省得受那十年煎熬。我还在街上见到一孕妇被剃光了头，厕所的纸篓扣在她头上，一边抽一边朝她泼浆糊，逼她喊：“我是黑帮……”

直到这时候，我才知道我妈原来还有点钱。我们的日子过得那么苦，她都不肯动这笔钱。她自己没文化，认准了孩子非读书不可。她说过：“你们念到哪步，我供到哪步；念到留学，供到留学。”这回她吓慌了，把钱从银行提出来，藏进面缸、藏到绒线团里，一搜全搜出来了。那天夜里，我们母女躺在已经砸塌了的床上，我求她：“还有什么快交了吧！”她说：“不行啊！”我说：“那就烧！”她说，“烧不了。”原来她把金戒指扳直了缠在腰里。我说，“干脆交了赞助他们革命，看还要干什么？！”这样才保住一条命。

“八·一八”接见，也让我参加了。你知道，我学德文，听过希特勒的讲话录音。我觉得林的讲话和当年的希特勒简直没什么区别。从天安门广场回来，我觉得心沉得很……“这个国家完了！这世界太脏，不能再活下去。”“不忍了，豁出去了，把想说的话说出来！”那几天，脑子里什么都装不进，就这么几句话绕来绕去。鬼使神差似的，我开始动手写信，

给党中央、团中央、团校，还有伟大领袖本人：“请你以中国人民的名义想想，你在干什么，后果又将如何”；“这不是群众运动，这是一个人用枪杆子运动群众！”……我当时认为自己将有一番壮举，郑重地走到天安门广场——我认为那是神圣的地方——向烈士们行注目礼，然后走进当时的棋盘街邮局，从自动售票机买了邮票，贴上，发出，大概一共六、七封。接着走到王府井药店，买了四瓶敌敌畏，把一封同样内容用德文写的信带在身上，出发向东。到了苏联大使馆附近，量好距离，开始一瓶一瓶喝。我当时的想法是，他们会第一个发现尸体；然后，我以死来反抗“文化革命”的事会传遍全世界。我只记得看见窗口有人，好象还听见里边的说笑，接着就什么都不知道了。醒来的时候，已经躺在公安医院里了。

这全是自找的，不是人家要把我怎么样，也不关老师同学的事。你想，我还能参加“八·一八”接见……就这么傻瓜一个，如此而已。

刚醒过来就有人审讯。我那时候还不想活呢，把输液的管子拔掉，把瓶子摔在地下，总觉得我的死不管怎么样也能发挥点作用。

在公安医院躺了三天，就被送进宫德麟模范监狱，收进一号监房。那是个小间，按规定关三个人。后来犯人多了，有时候五个、有时候七个；我去的时候还是三个。房子又阴又湿，全年不开窗，被子上都是绿毛，潮得能拧出水来，一个月放一次风。

进了监狱反倒不想死了。从第一天起我就用冷水冲头。一进厕所，就钻到龙头底下，这么坚持下来一直没什么病。但关节很快肿起来了，肿得老大，站不起来，只能拄着棍子蹭。

我进去的时候，里边已经有二个犯人。后来我才知道，原来也是三个，因为我去挪出去一个——那是个老红军，我下面再讲她的事。二个人，一个是北京远郊区的老太太，刑事犯，可能有人命；还有一个是政治犯，基督徒，这人直到今天我们还有联系，人是那么干净漂亮。她原先是燕京大学的学生，老处女。因为有她在，监里只要来了新犯人，都往这个牢房送，知道在她的安抚下，不会捣乱、不会出事。她家里给她送的东西多，牙膏、牙刷、毛巾，她都白送人；新人来了，她让你脱层皮似的逼你洗。那老太太，居然每天洗两次澡；一杯热水，我看着她洗。

就在这前后，牢里来过一个犯人，从美国回来的，马里兰大学毕业生，也是基督徒。我这位朋友觉得那人最能理解她，给她讲经，嘀咕“主在看着我们”等等，做事也不防她。你问做什么，还有什么了不得的，不过给老太太洗脚，跪在地下给她剪指甲，送给别人衣服什么的。其实她自己也相当困难，她的一条裤子上有九十八个补丁，我数过。她把丝的毛的都给别人，给那有人命案的乡下老太太。别人说“你真好”！她说，“我算什么，如蛆如虫。”别人说“太谢谢了，一辈子忘不了”，她说，“不要谢我，要谢上帝，是主让我这样做的。”结果，这个老太太，再加上那个马里兰的毕业生，全给她揭出来了，上纲上线。

她几乎一辈子都在牢里，她的父母是宗教领袖。她年轻的时候在燕京读西语系，好象没有毕业，就跟着父母到云南山里传教，施医舍药。她的母亲是天津一家医院院长的女儿，父亲原是皮货商，把家产卖光，跑到香山，点个小油灯读圣经，后来就在香山传教，那一带的人都知道他们。

她父亲是被枪毙的，母亲是无期，后来死在牢里了。她

是因为传教而劳教的，你知道，咱们的规定是有宗教信仰的自由，但只可以心里信，有宣传无神论的自由。可她总要宣传她的信仰。劳教的时候也不收敛，还说主如何如何，于是被再一次抓进牢里。

她一天到晚不停地干活：擦地、打水、倒尿；让她拆洗男犯的牢服，连裤裆里的蚤子，全一个一个摘出来。她累得腰间盘突出，手都摸得出来。要我看她比雷锋强。雷锋做了什么都记在日记本上，要不我们怎么知道？她干事生怕别人知道，主知道就行了，主在天上一切都看得见。

这基督徒被他们揭发以后，也戴过背铐和四十斤脚铐，是在北京戴的，苏式狼牙那种。这种上铐的办法原先专门用来制服小偷，让他们交待窝赃的地方。真是铐一百个，一百个灵。不上半个钟头就都跪下，哭爹喊娘。这位基督徒后来特别后悔，因为她向上帝请了一个星期的假：“主，我离开你一个星期，请原谅我，我实在受不了了。”她要求摘下铐，作了检讨。直到今天，还觉得没脸见上帝。她妈骂她：

“你不是盐，是失了味的盐！为什么要请假？！”

你不是问政治犯的事吗？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我进她出的那个老红军，她十几岁就从家里跑出来了，爱人好象是科学院物理所所长。她是有精神病的，“文化革命”前就有，一犯病就喊“打倒××！××坏透了！”文革开始后就不饶她了：“怎么那精神病什么情况下都没事，就在这里出毛病——现行反革命！”剃了光头，抓了进来。

这女红军从我们这个监房出去以后，一天夜里，不知为什么她又喊起来。看守对犯人说：“你们要革命，捂住她的嘴！”她使劲挣扎，看守问，“还喊不喊了？”“不喊了。”“放开吧！”一放又喊。

跟她同牢房的有个会道门的巫婆，刑事犯，通奸杀夫的。那巫婆有一点八米，又高又壮，一屁股坐在她脑袋上。那老太太没挣几下，就给坐死了。那一夜后来不断地输氧、抢救，还是不行了。

一个红军战士，让巫婆坐死……这是我坐牢唯一一件痛心的事——我要不去她也不会迁出，也就不会死了！她叫韩湘，我没见过她的面。

后来我得了肺病，和另一个肺病病人住在一起，她是个新四军战士……我要是一直病着就好了！可是我很快好了，她没好，弄到山西，跟别人一个牢房。

她也是“现反”，跑到王府井去贴林彪的大字报，逐字逐句批《再版前言》。这是个十足的死心眼，即使在牢房，每到“七·一”——我们在狱里过了十几个“七·一”——她就换上一身崭新的蓝制服，头戴蓝帽子，乘出牢房打水的时候高喊：“今天是七月一日，是伟大光荣的中国共产党的生日，我要高呼：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打打叛徒、卖国贼、野心家林彪！”在北京的时候，看守喝斥她几句就算了。我常劝她：“犯得上吗？喊两声能解决什么？那些看守、那些流氓小偷懂什么？！说不定为了立功赎罪反过来治你。”后来她变得明白一点了，只是集体念《再版前言》的时候不出声，看守也没再找她的麻烦。

到山西以后，出事了。那里的规矩，一有运动，每个牢房要选出一个批判重点。她们牢房本来定的是一个老干部的老婆，这女人耍了个滑头，操纵小犯人把火引到这新四军身上。她们抓住她的不出声，逼问她“对副统帅怎么看”。她不肯说违心的话，就死不开口。山西看守把她吊起来打，还逼她在院子里跑圈……那时候她的肺病可能就已经转成癌

了，没过多久就死了。这是后来遇见一个难友告诉我的。她说：“没了，那新四军。”

我的罪名是反林彪，按照“登基、大赦天下”的中国老例，反林的犯人“九大”以前都放出去。我于是送进学习班。我当时以为，没几天就能自由了。

我们这个班，和少年犯关在一起，那是一批非常年轻的中学生犯人，也就是有名的“联动分子”。那帮人，剃了光头，每天早晨天不亮就爬起来，一边跑一边喊：

伟大的 导师○ | 伟大的 领袖○ |

伟大的 统帅○ | 伟大的 舵手○ |

： 万岁万岁 万岁○ | 万岁万岁 万岁○·· |

还演自己编的戏……当时我觉得他们小，我妈送点钱来，都给了他们；星期天军管不在他们就钻铁丝网出去买零食。不料让老师找上了，我只好站出来说，“我让他们去的。”于是发动大家揭批。

批什么？那时候时兴上街游行，欢呼最新最高指示。本来也想让我们上街，后来说就在里边游吧。有一次，可能那指示出乎寻常地新与高，要不就是哪个看守高兴了，把我们都装进敞蓬车，从德外黄寺到马甸屯，拉来拉去。

我欢呼不出来，每到这时候，总是戴起口罩，就是不念。这一个个半夜发出来的最新指示给中国带来多少灾难？几代人毁在里边了！唐山地震不过一座城！不念指示这事这时候也揭出来了，再加上我给他们唱过几支歌，背述过几本小说；还有两个孩子谈恋爱，女孩子跟我不错，我帮她递过纸条……那男孩没骨气，什么都供了，上纲说我“反对伟大

领袖毛主席的全球革命战略，组织反革命集团”承认自己是骨干。此外，说我所宣扬的，是“驴的理论”、“狗的理论”；我的作为，是“资产阶级的大公无私”等等。那女孩上台揭我的时候，腿都哆嗦了。别的人还插我两下，拧我一把，她一直没抬头。这女孩出狱以后在北京以性开放闻名，这次出卖比她的放荡还让她丢人。

批的结果，我的罪名除了“反副统帅”之外又多了一条：“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

这个学习班的人后来陆续都放了。平心而论，我也不是完全没有放的可能。监狱方面曾经找我谈话，希望我有认罪的表现，结果是大吵一场。最后变成我问他们：“你们到底认不认罪？这平白无故地放我算怎么回事？说明白，怎么关的？”就这样，“两罪并罚”，我被押到北京看守所。这已是一九六九年夏天。

到了秋天，以为要打大仗了，元帅们转移，犯人们也向外省疏散：山西、河南、四川等省。那次包了整整一列火车，停在丰台外边的一个小站，三个人铐在一起，两边有刺刀架着。在临汾下车的时候，周围好象有上百架机枪，枪口都朝着站台。犯人不许低头，蹲在那儿，不让坐——我至今不明白为什么这样。

到了临汾又疏散，这回是乘卡车。我们那部车上六名女犯，十二名押解大兵，每人背上都有两把刺刀顶着。说起刺刀，在北京提审的时候，也有两把刺刀架在脖子两旁，一直送进审讯室，出门的时候这两把刀又原样搁在你肩上。

在山西是十年。是在晋城四年，宣判以后到榆次。

山西的审讯员我可不敢恭维，不知哪儿弄来那么一帮子，好象没上过几年学。在他们眼里连看《资本论》都不

行：“《资本论》是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问题的。社会主义社会看这种书反动透顶！”

对我的审讯要点，是转弯抹角的揪后台。按照他们的逻辑，我“作案”的时候十九岁，怎么会没有人在背后指使，那怕揪出个把老师也行。他们让我交待从小到大所认识的人。我先是拒绝，后来干脆写了好几百。他们问：“这里边谁对你影响最大？”我说，“我觉得我对他们影响大。”他们说，我顽抗，日夜轮番审。有一次我脱口而出：“想起来了，那是个外国人。”他们高兴极了，忙说：“哪国的？叫什么？写在黑板上！”我转身写了：俄国、拉赫美托夫”几个字，他们忙问：“现在还在外语学院么？”……

你看我这不是自找么？他们知道受了愚弄，就给我用刑。我因为“捣乱”受过好多次刑。在北京还好，属于比较文明的一种，刑具是从苏联进口的，狼牙铐，中间有三个链。戴上之后，越挣越紧，不过不挣没事，梳头、解手都行。脚镣不同等级不同斤数。还有一种文明的刑具，叫橡皮衣，穿上以后从外边打气，犯人就喘不过气来了，这种刑我没用过。绝食的犯人鼻饲：插个管——不插出血对他们说来可能就不为插管——棒子面粥撒把盐，往里一倒。还有吊、捆。在北京不打，一般也不骂。

到山西以后，我没挨过打，这次受刑用的是铁匠铺打出来的那种小铐，背到身后，就是前面讲的治小偷的那种，吊把大锁。这种铐我上过不止一次，最长的一次差不多戴了半年。那次是因为山西本省的一个派头头，从窑洞走烟的窟窿里给我扔过来一个条子，让我出去以后到中央替他告状。这条我看过就放在身上了，看守翻的时候还没来得及销毁。我见条子被他翻出来了，就一把从他手里抢过来，丢进嘴里。

他一把卡住我的脖子。叫：“吐！吐！”接着又来了三、四个看守，都是男的，压在我身上，使劲卡，想让我张嘴。我咬住牙不放，他们就找来钳子，从嘴两边夹——现在我这两边的牙没了，就是那次夹掉的——我觉得自己已经死过去了，谁知硬让他们把嘴撬开了。嘴一开，进了一口气。就着这口气，我把那条咽下去了。当时满嘴都是血，喷了他们一身一脸。就为这一撬，这条命才缓过来，要不当时就完了——当时已经大小便失禁了。

我觉得他们太野蛮了，缓过劲就骂他们，就这么又上了背铐，还戴了四十斤的镣。

镣究竟是怎么回事，外边的人是不知道的，总以为象李玉和那样，挺着胸走脚底哗啦啦响。其实根本哗啦不起来，两个半环扣在脚腕上，皮肉全磨烂了，根本不能走；可我不敢不走，多疼也得站起来走，那铸铁拖在地面上是丝——嚓——的声音。

戴着背铐，几个月的月经没法料理，全流在身上身下；人家扔过来一个窝窝头，就在地上滚着吃；蚊子也咬、臭虫也咬，痒得受不了了，只能象牲口一样在砖上蹭蹭。后来狱医来验伤，说这人活不了多久了，这条命你们看着办吧……他们就给摘了。摘不下来，锁已经锈住，拿锯锯开的；铐往下撕的时候连着皮肉，扔到炉子上，我还听见油炙在热铁板上吱吱啦啦的声音。你看我这只手现在还抬不起来，那时候已经不是自己的了，根本拿不过来，一个月都过不来。

戴背铐的时候，我有一本《共产党宣言》，用舌头舔开，用脸压平，再由下巴按按，一页一页翻着看。那是一九七五年底、一九七六年初，就象现在这样的深秋。除了《宣言》，我在狱里还读过《毛选四卷》。《新民主主义论》、

《实践论》、《矛盾论》，完全倒背如流。《实践论》说，“任何知识的来源，在于人的肉体感官对客观外界的感觉。”——这和马赫主义是一样的：感官所感觉到的，就是客观存在。那么，如果没有感觉呢？难道就不存在了？这对我启发很大。比如我没有嗅觉，气味这东西就不存在了么？我对气味就不可能认识了么？人的感官只有眼耳鼻舌身，现在又发展了第六感官的理论。就算发展到第七、第八……第一百种功能，要认识世界，缺的还多着呢？这算怎么回事，唯物论还是唯心论？我认为世界既不是唯物的，也不是唯心的，也不是什么什么的，就是形形色色的作用与再作用的交织与组合。

我当时学《毛选》也极有心得。比如这段“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有问题吧？谁胜利了？谁消灭了？说清楚！确实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不过是农民和地主一同取代了奴隶和奴隶主，工人同资本家又一同取代了他们——先进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取代了落伍的。奴隶打倒奴隶主，农民打倒地主，工人打倒资本家，这算什么？！

那时读《资本论》第一卷，就在心里算帐：怎么分配才合理，还列出了公式——资金怎么周转，固定资本怎么折旧，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发明人各应拿多少……没有纸笔，公式就列在脑子里。到山西以后有了土坑，里边抹着白灰，就一点点抠下来在地下划，当然铐起来以后就不行了。

我读《资本论》甚至还替中国人民银行重新设计了钞票：减掉一角，表明上了税；或者印上“通货膨胀百分之十”，只要拿货币交换商品，自然就纳了税，这样商品税、

房地产税都可以免了……满脑子不断闪出这些火花，简直有一种超脱、升华的感觉。我觉得上学还不如坐牢。现在在所里有时候开会开烦了，就想，砸块玻璃，偷点东西，还是回去吧，不用做饭、抹桌椅，真正的思想自由，钻进去就进到了另一个世界，脚镣手铐也不觉得疼了。

和基督徒比，这一世界是我自己得来的，我愿探索到底。一九七六年，终审判决无期，我就放心了。想着：如果哪天杀头，我一定以交待思想为名要笔纸，把它全写出来。如果不杀，我就接着想，直到有了自己的一套对宇宙和世界的看法支持着我活下来。你看，我和前面说的那基督徒那么要好，她的说教打动不了我。我认为她那一套是好东西，起码可以陶冶性情，不必再搞“五、四、三”运动，但那是胡言。我不信上帝能造人。我有我自己对宇宙的看法。

我不信物，也不信神。基督徒的上帝没能让她坚持下来，我却没有请假。人的能力再弱，一根芦苇也好、如虫如蛆也好，只要有了信仰，任何强力奈何不得。我坐监狱真是改造了思想，对历史、社会、经济运转、宇宙，都有了属于我的自己看法——这不容易。这十三年没白活，修炼了一辈子的根底。靠这个支撑，今天干什么都觉得游刃有余。

我是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宣判的，就在周总理去世那天，我听到广播以后哭了，这天我记得很清楚。

所谓宣判，就是由当地看守念判决书，就在他执勤的屋子里，一条铺板，他坐着，我站在他面前。这判决书写得已经很够水平，一连串的“反”：“最最反动、反动透顶、反革命家庭反动出身”……“文革开始时按捺不住反动激愤、进行反革命串联、恶毒攻击伟大领袖”——这时已不提副统帅了——“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猖狂……”“反革命

气焰十分嚣张……重新犯罪……宣传反动理论。组织反革命集团……”顶绝的是他念不通，“嚣张”读成“器张”等等。念到一半，我笑起来，居然怎么也忍不住，笑得象抽疯一样。我当时想，这回该吃枪子儿了。按规定有十天上诉期，得把那些东西赶快写出来。

没想到念到最后——“判以无期徒刑”。不过是个无期而已，我又笑了。看守说：“笑什么笑。你不上诉了？！”我说：“上诉上诉。”我的上诉词不但把罪名全部推翻，还逐字逐句批它的语病。

到了清明，上诉驳回。作为已决犯，被押到榆次劳改队。记得当时并不灰心，因为天安门事件已经发生，我看到了希望。在那儿碰上一个在北京监狱认识的，她也是政治犯，叫何敏，判了十年。何敏问我：“你怎么判得这么重呀？”我说，“在中华民族历史上最黑暗的时刻判我这个，是我的光荣。我是‘形势犯’，形势不好掉脑袋；形势好了，没几天就出去。”

从晋城到榆次，跟我同路的是个犯流氓罪虐待丈夫的妇女干部。走到哪儿，她都紧抓住我的手，让看守知道她是在防我逃跑。我跑不跑跟她有什么关系？！用这么脏的手抓我，真是沾污。她认不得几个字，写供词又来求我了，全是她那些性感受，丑不堪言。求我的同时，还老想着我是无期，又打主意在我身上立功好少蹲一年。最后也没有少蹲，第二次要流氓又进来了。张口闭口“伟大领袖”，我真是怕刑事犯。

在榆次，有四个大队：刚进来的人送预备队，干重活，挖土方什么的；小偷流氓作牙膏；政治犯和即将释放的犯人作洗涤剂；无期死缓的——一般都是通奸杀夫——做衣服。

那里，监狱长和看守都是男人。政委是个好人。有一次在车间，见我是北京犯人就问我多少年。我说无期。他当时就急了：“多大的罪判无期？！岂有此理！”这话就当着我们说。监里买电视机，他坚持这是给犯人买的，不许看守提走。他参加革命很早，就是老提不上去。

有一个时期。通奸杀人的并到我们队里，真受不了。她们和看守调情。我装着看不见，什么都不说——当时我已经很老练，除了不认罪，各方面都挑不出毛病，什么都不评论，什么都不写，日记也不写。那些女犯，看守调戏她们，正中她们的意，受了调戏的，老是受表扬、当积极分子，还减刑。有些犯人怕干活，就要这种花招，讨好看守，半夜半夜地不回来。

刚才说到的何敏，就是那时候碰见的。她判得真冤：文革初，她母亲偷偷把金子藏在她们夫妇箱子里，没对她们讲，两口子都不知道这回事。红卫兵抄出来了，问，他们说得出什么呢？男的当场就打死了，就地挖个坑埋了。她给弄进来。她没太高的文化，性情特别温柔，是个做手工艺品的工人。

我分下队的时候，她已经在洗涤剂车间了。我们做大桶洗涤剂，还作洗衣粉。洗衣粉是烷基苯磺酸钠，先得有硫酸，然后是磺酸，还有火碱，钠就从这里来。还有烷基苯……都是剧腐化学品，没有任何劳保措施。一双新鞋穿到车间，鞋扞子几天就锈了。那阵我跟何敏几乎时时在一起，她登高装料，我在下边供袋。

有一天，她突然说，不好了，恐怕要倒霉，看守抄走了她的日记——后来知道，这日记其实是她最要好的一个女犯（流氓罪）给她交上去的。我问她日记上有什么，她说也没

什么，不过鲁迅语录，“夜不长”之类，就怕断章取义。我安慰她，没关系，讲清了就行了。为了怕影响她，我没敢跟她多说话，不知道她心情那么沉重。她还有半年就服满刑了，一直说出去之后帮我带信给我妈。

就在那天中午，别人都午睡了，我在洗衣服，她走到门口，还朝我笑了笑。这门是不许出的，莫非她有什么事？打算跑？不久听外边喊“何敏死了”！我一惊，赶紧朝外跑。她的组长带着另一个犯人找她，找到一个晃旌，看她吊在绳子上，正踢掉脚下的箱子——我估计她并不想死，要不为什么过了那么久，见有人来了才蹬掉箱子？

就差半年了！死了以后，还开批斗会，那女流氓还上去批……把我也捎带上了。何敏有口无心，我跟她说什么都告诉了那女流氓。他们把何敏装进一条塑料袋——刚到山西的时候，犯人死还有一口薄木棺材，到她已经没有了。

她死了以后我得了一场大病，一直发高烧。可是不许我躺也不许我坐，连退烧药也不给，因为我的案子在那里是最重的。何敏自己去了，丢下了她的老母亲和孩子。她在狱里给弟弟纳了鞋底，还用旧布拼拼凑凑给孩子做了几件衣服，不知有没有人取走。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伟大领袖去世了。劳改队一片悲声，哇哇的。或许真有人悲痛？我看这里边有两种，一种是表现自己；一种是想起了自己的伤心事，平日不许哭，今天借机大嚎一场。也有人笑。还有人做出要庆祝的样子。这批人倒霉了，批、斗、不问原案怎么判的，通通枪毙。我听说王申酋烈士就是那时候处决的，或许全国有一个统一的精神？

但逐渐地，已能听到一点风声。到了允许接见的时候，

我妈来看我，悄悄告诉我，我的案子已经定了，是“错案”，让我谨慎再谨慎，千万别再说什么。

这些年，妈为我可苦了。吴德当权那时候，整个北京箍得紧紧的，一点风都不透。我妈说，我豁出去了，一个老婆子，怕什么？我就整日坐在法院门口，踢我打我就是不走：

“我要我闺女呀！她是反林彪的，她没罪呀！”后来，她得了白内障，两只眼睛全看不见了。那次，她扶着我哥哥的孩子，翻山越岭，到榆次来探视。

我妈的头发全白了。

有一次，哥哥也来了。他说：“好好认罪，靠拢政府、争取从宽。”我一听就火了：“我没罪，你是什么人？给我滚，滚得远远的，我永远不见你！”哥哥很尴尬。看守朝我喊：“不许你这样对待革命群众！”我说：“什么认罪？什么从宽，让他好好给我赔礼道歉！”看守对我妈说：“看看你女儿有多嚣张，对你们都这样，对我们还不知怎么狂哪！你知道她判的什么？无期！什么叫无期，脑袋在肩膀上晃着哪！加刑会加成什么知道吗？”我妈吓得跪下了。我说：“妈，你听听他说的都是什么……”妈说：“他说的不对……”看守又喊起来：“你这老太太怎么也这么反动？”

哥哥从此就再也没来看我，考他的研究生去了。他读完博士留校了，现在在伊利诺斯大学教数学。

一九七九年三月，妈和北京中级人民法院两位审判员一起到了榆次。他们是来给我改正的。释放的时候，读宣判词：“出于对林彪、‘四人帮’的无产阶级义愤……”我立即说：“我没有反‘四人帮’。”

妈把我接回北京。自由了，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我那年已经三十三岁，只想找点书看，想把这十年来想过的东

西清理清理。

但我总得吃饭。我不愿接受补助、接济，法院发给我生活费，外院给我助学金，全都拒绝了。我找了个地方教德文，一小时二点五元。为上户口的事，又和派出所打了一架。不是他不给我上，而是我拒绝上，因为他在“何处迁来”一栏填了“释放”两个字。我的气一下子就上来了。我说：“什么叫释放？我是平反，你知道不知道？”他说：“你这不明明写着无罪释放？怎么不是释放？”我说：“那‘无罪’呢，你怎么不填？”他说：“管你有罪无罪！”我不要户口了，后来法院出面劝我，才又上的。

当时，外院不接受我。我已经三十三岁，还是他们的学生么？哥哥在法院的朋友出面帮我联系工作，就联系他们主管的单位、工厂，那些地方无论多么缺搞德文的，一看档案都不要我。直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社会学所，我报了名，交上去的就是上着铐的时候学《资本论》的心得，凑成一篇挺象样的经济学论文。

你问我德文怎么样了？虽然十三年没摸一本德文书，但在外校、外院养成一种习惯，也就是陈老总说过的“外语环境”——除了刷牙、睡觉，嘴就不许停，无论出操上课，甚至看球赛、逛商店，嘴上老得咕噜着，说梦话、记日记全用德文，整天咕噜，象个疯子，这叫童子功。

刚进监狱，那基督徒和乡下老太太都不爱讲话，我也没办法。忽然一天，远处流氓打架，听得清清楚楚。我特别兴奋，赶快练口语，把他们对骂的话全都翻出来了。看守训话我就边听边在肚子里翻。有了报纸以后，一边看一边翻，整版一字不拉。十三年没断过，连铐背铐的时候，都用德文想事儿。

伊林·涤西给林彪的一封信

敬爱的林彪同志：

近日看到您九月十八日在军事院校的讲话记录，直爽地说，有几个关键地方的提法是非常错误的。

您说：“对毛泽东思想抱什么态度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就是要抓住对毛主席的态度，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问题。”“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太多，读不完，他们离我们又太远，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中我们要99%的学习毛泽东著作。”“毛主席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高得多，现在世界上没有哪个比得上毛主席的水平，有人说：《资本论》是理论的基本阵地。其实，《资本论》只能解决资本主义社会规律问题。我们国家资本主义已经打倒了，现在是社会主义规律问题。”“毛主席这样的天才，全世界几百年，全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重点是我加的）

敬爱的林彪同志，“毛主席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高得多。”的提法是不正确的。

最近翻阅斯大林论“反派”的一些论文，见到论列宁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功绩的一段：

“同志们，必须承认正是列宁而不是别的什么人发现了社会主义可能在一个国家胜利的真理。不能够抹杀理应属于列宁的功绩。不要惧怕真理，要有勇气说出真理，要有勇气

公开地说，在马克思主义者的中间，列宁是用新的方式提出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问题并肯定地解决了这个问题的第一个人。

我这些话绝不是想说明作为理论家的列宁比恩格斯或比马克思高出一等。我这些话只是说明两件事情：

第一，无论恩格斯或马克思是多么有天才的思想家，绝不能要求他们在垄断前的资本主义时期，预见到五十年以后，即在发达的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的无产阶级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中的一切可能性。

第二，列宁做为恩格斯或马克思的天才学生，能够看出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新条件下的无产阶级革命中的一些新的可能性，因而发现了社会主义可能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真理，这是没有什么奇怪的。”（重点是我加的）

斯大林的态度是对的，林彪同志的态度是错误的。“毛主席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高得多”的提法是错误的，理论上是错误的，实践中是有害的，它会给各国修正主义造成攻击中国共产党的口实，毛主席也绝不会答应！

正如您说的：“对毛泽东思想抱什么态度是一个很重大的问题，我们就是要抓住对毛主席的态度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问题。”斯大林正是在怎样对待列宁和列宁主义的问题上和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分开来的。如今，在怎样对待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上，已经开始并将继续进行大分化。在大分化中，那种对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估计不足的倾向，固然是非常错误的（是站不住脚，主要应批评的），但那种估计超出历史发展的倾向同样站不住脚，也容易一头栽入毛泽东思想的邪路。林彪同志，用斯大林当时对待列宁和列宁主义的态度来对待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是唯一正确

的，其它的态度统统都是错误的。

其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太多，读不完，他们离我们又太远，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经典著作中，我们要99%学习毛泽东著作。但您是军事院校中讲的，无论这个99%是指学习时间、精力之比还是指学习毛泽东著作和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之比，都不适用。

第一，“书太多，读不完，他们离我们又太远，”显然不能成为99%的理由。

第二，专门的理论是需要的，而中国的现状是特别需要，毛主席早在二十四年就深刻批评到：

“但是要照中国革命运动的丰富内容来说，理论战线就非常之不相称，二者比较起来，理论方面就显得非常落后。一般地说来，我们的理论还不能够和革命实践相平行，更不去说理论应该跑到实践前面去。我们还没有对革命实践的一切问题，或重大问题加以考察，使之上升到理论阶段。你们看，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我们究竟有多少人创造了可以称为理论的理论，算得上科学形态的周密的而不是粗枝大叶的理论呢？特别是在经济理论方面，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从鸦片战争到现在，已经一百多年了，但还没有产生一本合乎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的真正的科学理论书，象在中国经济方面，能不能说理论水平已经提高了呢？能不能说我们党已经有了象样的理论家呢？实在不能说。”

二十四年前毛主席这个批评，在二十四年后的文化大革命中更加暴露出来了，在我们不但要解决国内问题，更要解决国际问题的时候特别地表现出来了。文化大革命以来，书店的书柜之中看不到什么系统的周密的（哪怕是较系统的、周密的）关于中国和世界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的“可以

称为理论的理论”著作！过去书架上倒是摆过一些厚本、专著，但文化大革命表明，它们的作者不是披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毛泽东思想的外衣反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混蛋，就是钻进书堆里出不来的书呆子或空谈家。

在您的作用下，解放军成为学习毛泽东思想的榜样，全国学习解放军，全国掀起了一个学习毛主席著作空前广泛的运动，就这样一个工农兵广大群众普遍直接掌握理论的伟大时代出现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说的：“给目前范围有限的提高以基础，也是给将来范围以广阔的提高工作准备必要的条件，”已有过之而无不及，提高的问题自然而然突出出来了，大批真正的理论家，现在和将来不久的革命运动很需要！

第三，既然现在很需要在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方面的大批理论人材，那么这些理论家，不管其专长是什么，都起码必须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具备一个较全面的、系统的了解，而毛主席著作只是其中一部分，因而这个99%比例是不正确的，对大专院校不适用。

第四，毛主席著作虽然只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中的一部分，但毛泽东思想是当代最现实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现在我们无疑是在毛泽东思想大道上前进，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战斗。我们不是否认这一点，而是肯定这一点，正是这一点要对毛泽东思想有个彻底的了解，清楚毛泽东思想如何前进，因而就必须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有一个相当的认识，从这里您的“99%”也是不适合您讲话对象。一般讲，用主要精力，大部分时间来学习毛主席著作是正确的。

其次，“有人说《资本论》是理论的基础阵地，其实

《资本论》只能解决资本主义社会规律的问题，我们国家资本主义已经打倒了，现在是社会主义规律问题。”这一点加上上面的，给人以马克思著作似乎已经过时之感。特别是否认《资本论》现在仍是理论的基本阵地这一点。我还没有读过《资本论》，但知道马克思主要著作就是《资本论》，《资本论》中基本理论已经不再是理论的基本岂不是说马克思主义中基本的东西已经过时了，这不是会从“左”的方面同样走到新老修正主义的泥潭中去吗？您的意思，似乎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到毛泽东思想经过了一个从牛顿到爱因斯坦式的飞跃！根本的质的飞跃！但这显然是错误的。

敬爱的林彪同志，请您解释这些。

顺便向您提出一个批评。在天安门上，您已经发表了对当前文化大革命具有决定性指导意义的六次讲话，可是这次运动最主要最精华的部分——学生运动，却没有看见您来亲自参加，如周恩来、陶铸、陈伯达一样来参加我们的辩论会，亲自看大字报，接见学生给我们讲话，我怀疑您的讲话的绝对正确。就拿九月十五日讲话来说，这个讲话过早过分地强调了“一小撮反动的资产阶级分子，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严重性，其实各省市“炮打司令部”火热的大多数是学生，即使提出者之中，大多数也不肯定“炮打司令部”所指就是黑司令部，而是放几炮轰轰看，或炮打其中个别一些人，或“司令部”某些强大的保守措施，可您没讲清“炮打司令部”这方面的意义，您强调“我们国家领导权是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强调专政的正确方面，——不需要改进的方面。却没有敏锐地察觉到文化大革命展开以来突出来的问题，即改善无产阶级专政，革新社会主义制度。党和政府组织形式需极大的改变，十七年

前建立的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陈旧，极需创造出—个适合中国历史特点的、世界上从来没有的 国家机器。这些没有强大火力的摧毁，没有强大炮轰的震撼，没有高温度的熔炼，实现得了吗？恩格斯名言：“公社已不是原来意义的国家了”，看来您理解得不是很深刻，毛主席多次提到公社，您也未必惊醒，眼睛犹很朦胧，看不到官吏机器正在彻底完蛋，代替“中国”的东方公社的光芒已经露射东方的地平线了。因而讲话不但没有引导注意这方面，反而给全面运动—个阻碍，造成—个反复（虽然不大）。把大批群众打成反革命的张平化9.24讲话就是乘机抛出来的。

敬爱的林彪同志，毛主席唯一最亲爱的战友和学生，对于您的六次讲话，很希望您能象毛主席那样“理论应跑到实践前面去。”但说老实话，失我所望，您的六次讲话跑到实践后面去了。比喻，第六次讲话虽然指出：“步行串联好处，可以广泛地接触群众，接触社会的各方面，更深入地了解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但这文之中没有突出出来毛主席学生时代就利用寒暑假进行的“社会调查”，毛泽东式的“社会调查”。而这一点，您的讲话之前，清华大学里的大字报已渴望好几日了。

希望您特别深入运动，不然久而久之，也会有“靠边站的危险”，历史的辩证法是无情的。

敬爱的林彪同志，我们的副统帅，毛主席唯一最亲密的战友和毛主席的接班人。（许多中央首长都这么讲，人民现在已公认您作为毛主席培养的接班人，希望您具有毛主席那样高的理论，那样高的实践，象毛主席那样正确、完整。因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所领导的不是中国—国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事业，而是整个共产主义运动。在这条道路上，斗争异常尖

锐，有差之毫厘，失之千里的危险存在伺伏着，这条道路毛主席走上来了，如果毛主席的接班人不能象毛主席那样，中国党还会面临法西斯党的危险，再说一遍，无情的辩证法将会请您“靠边站”。

为什么要公开呢？就是要促进人民大众进一步取得您所提出的批评监督党和国家各级领导和各级领导人的“大自由”。

有错误就得批判，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地方就要指出，难道您是不可批评意见的吗？（有些首长讲话似乎对您提出批评意见是不可以的。）我看您是不会同意这样做的。

赤胆忠心之言，见之请您斟酌，歪理之处，给以批评指正。

敬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敬礼！

北农大附中学生 伊林·涤西

于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五日

附注：此公开信十一月十五日清晨七点左右用大字报形式公布于清华大学，当日下午被部分同学撕毁，并被骂成“毒草”“反革命”的大字报，还扬言“要批倒、批臭”等等，既然这张大字报已经被你们说成是“毒草”“反革命”的大字报，你们就应该发动广大群众批判之，批倒批臭之，既要让群众都看到原文，又要看到批判文章，然而，你们为什么竟然据其防止流毒更广，而把大字报撕毁了呢？你们到底相信不相信群众呢？显而易见，你们这种包办代替的方法是愚蠢的，是软弱的表现。

在这里，我们奉告你们，你们要真防止流毒更广，真心批判的话，希望你们亲手再把原大字报贴出来，让大家来批判鉴别！

同志们！既然有人不让此公开信公开，那么将转为另一

种方式，印为传单。

· 伊林· 涤西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八日

读者注意：如果有的同志批评我们，指责我们的“靠边站”对个人过分的话，我们是乐于接受这种批评的。

伊林· 涤西

简介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接见全国红卫兵以后，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的狂热达到了高涨。林彪利用“亲密战友”的身份，以其颂言必极、吹捧必奇的一套神化毛泽东的伎俩，把全国民众引向造神运动的狂潮和个人迷信的深渊。同年11月15日，北京农业大学附属中学的两名学生以伊林· 涤西的笔名，在清华大学贴出了《给林彪同志的一封公开信》的大字报，尖锐地批驳了林彪神化毛泽东的一系列讲话，并指出林彪的作为将使中国党面临法西斯党的危险。大字报贴出的当天下午就被当作“毒草”、“反革命”大字报，撕毁。伊林· 涤西于1966年11月18日将《公开信》印成传单四处散发，引起了很大的社会震动。作者为此被捕入狱。《公开信》成为“文革”初期反对林彪的“第一声惊雷”。今天，我们将《公开信》全文公开发表，目的在于：让历史朝向未来。

（编者）

彭德怀致毛泽东最后一封上书

主席：

您命我去三线建委，除任第三副主任外，未担任其他任何工作，辜负了您的期望。12月22日晚在成都被北京航空学院红卫兵抓到该部驻成都分部。23日转北京地院东方红红卫兵。于27日押到京，现被关在中央警卫部队与该红卫兵共同看押。向您最后一次敬礼！祝您万寿无疆！

彭德怀

一九六七年一月一日

简介 彭德怀（1898年～1974年11月），男，原名彭德华，湖南湘潭县人。毛泽东同乡。出生贫寒，少年时代当过矿工、堤工。1916年参加湘军当兵。以救国爱民为宗旨，在士兵中秘密组织救贫会。1922年改名彭德怀，考入湖南陆军军官讲武堂。毕业后回湘军旧部任连长、营长。1926年随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参加北伐战争。在共产党人段德昌影响下接受共产主义思想。1927年10月升任团长。1928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7月与滕代远、黄公略等率所部两千余官兵举行平江起义，组成工农红军第五军，任军长，创建湘鄂赣三省边界根据地。同年12月率红五军主力到井冈山，与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四军会师。1929年红四军主力进军赣南、闽西

后，担负留守井冈山，牵制湘赣进剿敌军的任务。井冈山失守后，率部转战赣南闽西，与红四军再度会师。复回师井冈山，恢复湘赣边区。1930年6月任红三军团总指挥和中央前敌委员会书记。同年7月率部一度攻下长沙。1931年11月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参加中央革命根据地历次反“围剿”战争，战功卓著。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对王明路线“左”倾错误造成的失利痛心疾首，遂置个人安危于不顾，痛斥了主持中央苏区军事全局的最高军事负责人李德的军事战略错误。1934年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被选为候补中央委员。1934年10月参加长征。在遵义会议上拥护毛泽东的正确主张。1935年6月红军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坚决反对张国焘的分裂活动，维护党和红军的团结。后任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即陕甘支队）司令员，同毛泽东等率部进抵陕北。1936年先后任抗日先锋军司令员、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东进山西，西征宁夏、陇东，扩大了红军的势力和影响。在1936年1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增补为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副总指挥、第十八集团军副总司令，与朱德总司令领导华北抗日游击战争，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1940年指挥了著名的百团大战，大规模破袭敌后交通，重创敌伪军，鼓舞了全国军民抗战士气和信心。1942年任中共中央华北局代理书记，统一领导华北敌后党、政、军、民工作。同年与浦安修结婚。1945年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政治局委员，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947年，为打破国民党军队的重点进攻，率部转战陕北，迎战十倍于己的

敌军，先后指挥了青化砭、羊马河、蟠龙、沙店等战役，连战连捷，扭转了西北战局。1949年挥师全部解放西北五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被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并任中央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西北军区司令员，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1950年10月出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挽危局担重任，统帅抗美援朝战争，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1952年4月回国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1954年后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55年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1956年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彭德怀为国为民，无私无畏，光明磊落，坚持真理，耿直刚正，勇于直言，艰苦朴素，与人民共甘苦，关心人民群众疾苦，不考虑个人得失。1959年7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庐山会议）。会议期间（7月14日）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对1958年的大跃进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意见，同时对“全民炼钢铁”、农村公社化中出现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信中批了普遍滋长起来的“浮夸风”、“小资产阶级狂热性”问题。这封信触怒了毛泽东。毛泽东断然改变了会议原定的纠“左”的议程，转而发动对彭德怀以及会议上敢于直言的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的猛烈批判，给他们强加上“右倾机会主义”、“反党”、“反社会主义”等等罪名。并被定性为“彭、黄、张、周反党集团”。同年9月被解除国防部长职。继之，他被送到北京西北郊区的挂甲屯“解甲归田”。三年“苦日子”时期暴露出来的严重社会危机，证明了彭德怀的英明卓越和对人民负责的赤胆忠心。1962年6月16日他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写了一封称为“八万言书”的上书，对自己的历史作了扼

要的回顾，对强加给他的罪名进行了申诉。1962年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为此又给他加上“翻案”的帽子。1965年9月，毛泽东先是请彭真转达他的意见，希望彭德怀去“大三线”工作。遭到彭德怀的断然拒绝。彭德怀后来又写了一封信回毛泽东，表示愿去国营农场当农民。毛泽东接到彭德怀的再次上书后，在中南海召见了她，彭德怀被任命为“大三线”建设副总指挥，赴四川成都工作。“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在姚文元等批判《海瑞罢官》的隆隆炮声中打开缺口的。敢于为民请命的彭德怀被罢官一事，成为“文化大革命”开路炮火的攻击对象。1966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的一次汇报会上再次批判彭德怀的“反党阴谋”。1966年12月27日，彭德怀被从北京专程赶往四川的北京航空学院红卫兵从成都押到北京。次日，林彪、江青下令逮捕彭德怀。1967年1月1日，身陷监禁的彭德怀感觉到自己处境的危险性，给毛泽东写了他一生中的最后一封上书，希望由此能得到毛泽东的救助。但此信毫无结果。1967年6、7月间彭德怀受到中央文革唆使的北航“红旗”红卫兵和其他红卫兵组织的多次轮番批斗，批斗会上彭德怀临暴不屈，遭红卫兵们拳打脚踢，肋骨被打断，以致晕死过去。他受到全国性批判。1970年11月3日，由黄永胜审批，彭德怀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党籍，判处无期徒刑，终身剥夺公民权利”。在长期的批斗和监禁生活中，彭德怀身心遭到残酷的迫害和折磨。1974年11月29日，彭德怀因患直肠癌去逝。临终前曾高呼：“历史会审判他们，也会对我作出正确的评价！”“我没有反对毛主席！我没有里通外国！”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为彭德怀平反昭雪，恢复名誉。这封上书虽然没有直言国事，而在忧国忧民的彭德怀一生写给

毛泽东的信中，这一封上书和1959年7月14日的上书同样具有特殊的历史价值，故收入本集。

(编者)

附：

彭大将军的最后岁月

胡思升

刚刚出版的《彭德怀自述》，是一部对不同的人都有教益的书。彭总不愧是一个有理想、有信念、有气节的共产党人。即使在“文革”期间遭受非人迫害的牢房内，他从不说一句违心的话，从不写一行违背事实的字。“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彭总可以说是身体力行了。

读罢《彭德怀自述》，掩卷而思：在采访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江青等十名主犯时，了解到有关彭总在“文革”前后的种种遭遇，一件件在我眼前闪现。我无权埋没它，应该贡献给一切热爱彭总的人们，使活着的人更加了解这位南征北战几十年的彭大将军，是如何度过他生命路程的最后岁月的。

读了《彭德怀自述》，再听听他在“文革”前后的言行，人们必将怆然涕下而肃然起敬。

成都的一个冬夜

1966年12月，成都的一个冬夜，永兴巷7号的彭德怀住宅，被来自北京的负有特殊使命的红卫兵包围了。

红卫兵们翻墙而进，宣布“中央文革”的指示，要把彭德怀押往北京。

北京，党中央的所在地，没有什么可以畏惧的。身经百战、突破过敌人无数次围困的彭大将军，随红卫兵登上了开往北京的火车。

1966年12月27日，铁骨铮铮、耿然直言的彭大将军被揪回北京。

那个年月的北京，北京的那个年月，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政策和作风，在林彪、江青、康生以及他们操纵的“中央文革”的横扫下，已经受到严重的损害了！

毛主席的一席谈话

彭德怀同志当时所以在成都，是因为他担任了大三线建设副总指挥的职务。这是1965年秋由党中央、毛主席批准任命的。

人所共知，彭德怀自1959年被罢官以后，在北京西郊挂甲屯吴家花园的清王朝庄园里住了六年。这也许是无意的巧合。挂甲屯这个庄名，是杨六郎北征辽邦时在此挂甲休息过，因而得名。1959年秋后，彭德怀被撤销国防部长职务，在此种菜挖泥，也可谓挂甲归田了。

但是，彭总没有被遗忘。象他这样一个在中国革命史上叱咤风云的人物，不可能被人忘却。

1965年9月23日，在任命他为大三线建设副总指挥的时候，毛泽东同志请彭德怀同志到中南海住地，长谈了五个多小时，并共进午餐。

毛泽东同志一见彭总便说：“早在等着，还没有睡咋。

天下午接到你的信，高兴得睡不着。你这个人有个犟脾气，几年也不写信，要写就写八万字。今天还有少奇、小平、彭真同志，等一会就来参加。周总理因为去接西哈努克亲王，不能来，我们一起谈谈吧！”

在谈到派彭总去三线时，毛泽东同志说：“现在要建设大小三线，准备战争。按比例西南投资最多，战略后方也特别重要。你去西南是适当的。将来还可以带一些兵去打仗，以便恢复名誉。”

名誉！彭总的名誉，因为在庐山会议上受到批判，定为右倾机会主义而受到损害。当时，在庐山会议通过有关彭德怀的决议时，毛主席曾询问彭总的想法，彭总向主席讲了三条保证：一、在任何情况下不会做反革命；二、在任何情况下不会自杀；三、今后工作是不好做了，劳动生产，自食其力。

如今，六年过去了，彭总做到了三条保证。在挂甲屯吴家花园，他博大的胸襟，始终关心着人民的冷暖。谁家有困难，彭总就出现在面前。他坚持劳动，种了一分地的试验田，拔草除虫，挖泥积肥，整治菜地；还经常自己用搓衣板洗衣服……

毛主席沉浸在思索中，对彭总说：“你说的三条保证，后面两条我还记得。也许真理在你那边。让历史去做结论吧！”

象是预见到什么，毛主席向周围的中央领导同志说：“彭德怀同志去西南，这是党的政策。我过去反对彭德怀同志是积极的，现在要支持他也是诚心诚意的。让少奇、小平同志召集西南区有关同志开一次会，把问题讲清楚，如果有人不同意，要他来找我谈。”

一个严肃的党，不应该讳避自己的失误。对1958年开始的国内建设方针，彭总上书毛主席，按照党的原则，光明磊落地陈述己见。三年经济困难时期暴露出来的问题和弊病，

恰恰证明谙熟军事的彭总，对人民的疾苦是了解的，这也是他上书直言的出发点。对人民负责，对历史负责，对真理负责，这三者应该是统一的。

1959年秋，彭总从中南海的住地永福堂迁往挂甲屯时，他把自己的元帅服和领受的勋章、奖章全部上交中央。他当时说：“凡是当老百姓用不着的东西，我都不要。”既然解甲归田，元帅服不是成了装饰品了吗？

党的决定，彭总向来是服从的。虽然受命于困难之时，他顾全大局，只身赴川，担任大三线建设副总指挥。他全身心地投入新的工作，1966年上半年，他跑了20多个县市、15个厂矿企业、走遍从金沙江到贵阳之间的广大地区，视察了边远地区的工厂、矿山、水电站。他一天也闲不住啊！这位军事统帅，想安下心来在经济建设上钻进去……

彭总被“揪”到北京

树欲静而风不止。“文革”的“横扫”之风平地而起。

林彪挖空心思，甚至在姓名上做文章，说：“你们知道彭德怀的原名是什么？叫彭得华。他从小就有野心，想得中华。”

1966年下半年的一天，在江青指使下，戚本禹提出把彭德怀从四川“揪回”北京。康生马上附议；王力、关锋一哄而起。

有后台撑腰，戚本禹亲自给当时北京名噪一时的“五大学生领袖”之一的韩爱晶打电话，说：现在文化大革命深入，你们可以到四川把“海瑞”揪回北京。

在那个无法无天的冬天，区区戚本禹的一句话，就可以随意剥夺闻名于世的一位军事家和政治家的人身自由！

这是有案可查的。戚本禹1979年底在押期间写的笔供承认：“彭德怀在三线，是我叫去四川串连的学生把他带回北京的。江青当时是力主此议的。康生也是这个主张。”

红卫兵把彭德怀从成都押到北京火车站，立即向戚本禹报到。当时，戚本禹作为“中央文革”成员正在人民大会堂开“碰头会”，他眉飞色舞地向会议通报：“海瑞”由红卫兵押送，已经到达北京车站。

周恩来总理站了起来，说：这件事，由我来处理，由我派人去接。周总理随后离开会议室，亲自作了安置。

虽然是错综复杂的处境，周总理为了保护党和国家的栋梁，尽着自己可能尽的努力。

彭总被监护后，于1967年元旦给毛泽东同志写了一封亲笔信。这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上书毛主席。

因此，从1966年底到1967年上半年，彭德怀虽然暂时被监护起来，还没有受到后来的那种非人道的折磨和摧残。

但是，江青、康生之流正在窥伺方向，戚本禹、关锋了解主子的意图，也正在想方设法要把威震敌胆的元帅整倒、搞垮。

小爬虫在爬

说戚本禹、关锋是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的小爬虫，是贴切的。在陷害彭德怀的丑剧中，戚本禹、关锋张牙舞爪，爬在前头。

1966年6月16日，“文革”刚揭幕，戚本禹、关锋就写信向江青、康生、陈伯达三人献策。这封信说：

“我们觉得，分配给彭德怀做这个工作（指大三线

建设副总指挥)是不恰当的。据我们了解,彭德怀到三线以后,还在积极进行不正常的活动。因此,我们再一次提出意见,希望中央考虑撤销他的三线副总指挥的职务。

从这次文化大革命揭发的许多事实看,彭德怀到现在还是修正主义的一面黑旗为了在广大群众中揭穿他的丑恶面目,为了彻底清除这个隐患,我们希望中央能够考虑在适当时机在群众中公布彭德怀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活动。

由于这场夺权斗争,是革命和反革命的斗争,是我们推翻一个地方的、部门的反动政权的斗争。因此,必须当机立断,采取断然手段,和平过渡,是不行的。”

多么难得的一份反面教材啊!

彭德怀的存在,他的活动,他的品德,使窃国作乱之徒如感芒刺在背,坐卧不安。在广大群众中,彭德怀仍是一面耀眼的旗帜,真理的旗帜,用他们的话来说是“修正主义的一面黑旗”。因此,要进行他们的“夺权斗争”,必须使用野蛮的法西斯手段,而且事不宜迟,这就是所谓“当机立断,采取断然手段,和平过渡,是不行的”。

1967年初,戚本禹还单独用密件给他们的“旗手”江青写信一封,内称:“红卫兵从西南带给我的一件关于修正主义分子彭德怀的材料,送上,请参阅”,“彭德怀的这个两面派谈话,欺骗了一些幼稚的学生(彭德怀在谈话中公然露骨地为朱德、邓小平吹嘘)。彭德怀现在已经被红卫兵抓住,……北京的学生已经做了斗争的准备”。

尽管恶言相加,人们仍然可以从戚本禹的这封密信中感

到，彭德怀言行中渗透的“开门见山、直截了当、不转弯抹角的作风”（美国记者斯诺在《西行漫记》中的评语）仍然深受群众的尊敬，特别是在“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之毒雾弥漫中华的时刻，他的坚毅冷峻的面容，刚直不阿的品格，使得小丑、侏儒们恨得牙痒痒，非要置他于死地、踏上几只脚，才能放心。

难熬的酷暑

1967年夏天，是一个难熬的酷暑。

7月12日，康生、陈伯达、戚本禹在人大大会堂接见韩爱晶等人，下达了折磨彭德怀的信号。

戚本禹口沫横飞：“你们要彭德怀交待反毛主席的罪行，应当要他低头认罪。他要是不老实，得对他厉害点，对他不能客气。”

7月18日，戚本禹对彭德怀专案组恶狠狠地训话：“毒蛇僵了，但没有死。纸老虎彭德怀杀人不眨眼。彭德怀是军阀。不要看他装可怜相，如壁虎一样，装死。实际没有死，是本能的反映。动物、昆虫都有保护自己的本能，何况这些吃人的野兽。要打翻在地，踏上几只脚。”

彭德怀“没有死”，他们绝不甘心。

他们非要把彭德怀“打翻在地”，才善罢甘休。

就在康生、陈伯达支持戚本禹讲话几天之后，1967年7月19日，韩爱晶有恃无恐，在北航开会揪斗彭德怀；年近七旬的彭总，被“打翻在地”7次，遍体鳞伤，惨不忍睹。

当时在场的北京卫戍区警卫战士于次日向“中央文革”作了一个报告。不需要任何修饰和添加，让14年前的原始记

录来控诉吧！

“昨天北航开了三、四十人的小会斗彭德怀。会上打了彭德怀，打倒7次。前额打破了，肺部有些内伤。明天还要斗。

问韩爱晶为什么武斗，他说中央文革小组讲‘不要武斗，但对群众不要限制过多（意不大武斗即可）’，并说总理的‘五不’指示是过时的，中央文革是最新指示。”

7月22日，卫戍区又向上反映，彭德怀被殴打后，“胸部疼痛、呼吸困难，痰吐不出来，不吃饭，不起床。据医生初步检查（未透视），可能有些内伤。”

这个“革命”，哪里有一丝一毫“文化”的气味呢？什么“触及灵魂”！彭德怀同志的头部、胸部何止被“触及”，他的肋骨被打断了两根。

请看一份《关于彭德怀1967年7月19日至22日监护情况》的记录吧！

“自19日参加斗争会后，食宿大大减少，精神很苦闷……进室后就躺在床上休息，胸部疼痛，呼吸困难，不断发出哎哟、哎哟的声音，当晚未吃饭，不能吐痰。让他写材料时说：‘我现在不能写。’我们说，那不行。他又说：‘写不了，要不杀头算了。’到22日精神稍好，起来后有点发牢骚，不断出长气……而又躺在床上，但一夜未睡好。20日说：“今天胸部疼的面积扩大，而且又重了些，从床上起很疼，也非常困难，起时需要哨兵拉我一下，不然的话就起不来。”经医生检查胸部左右两侧第五根和第十根肋骨骨折，脉搏和血压都有增加。

一片忧国忧民心

可是，尽管处境危难，没有人身自由，彭德怀的忧国忧民之心，仍然没有放下。

1967年4月18日的《人民日报》，引起他的注意。这天报纸登载了一条消息，讲到国际市场上销售镁的情况。

彭德怀浮想联翩，欣然命笔：

“总理：

前日阅《人民日报》……因而记起去年四月到石棉矿厂（安顺场下游20公里）考察时，该厂矿渣很好，堆积大渡河两岸，未曾利用，已流失不少。此种矿渣中含大量的钙镁，其次是磷，还有其他矿物质。加工后即成钙镁磷肥，用于农作物的底肥是很好的。石棉矿渣（矿余）占95%，年可产四、五十万吨，设备简单，成本当然是很低的，……此事可能被搁置。小事情本不应打扰您，但我不知应告何人，希原谅，顺祝您永远健康。

石穿 1967年4月20日晚”

石穿，彭德怀的号，他是青年时从石洞中滴水穿石得到启示而自取的。这种精神，本来会感动上帝（如果有的话）。但是，在横扫“牛鬼蛇神”的年月，生产农肥，是难以提上日程的。

“批斗会”上的回敬

浊浪排空，方显出英雄本色。

在批斗时，彭德怀经常昂着头，有时露出轻蔑的冷笑。

“抗日战争时你干了什么坏事？”批斗会上有人责问。

“打死了几万日本兵。”彭总回答。

“为什么打百团大战？”

“打敌人嘛！”

“你为什么在庐山会议上写信？”

“我在那封信上只是讲比例失调的问题。”

“你为什么反对毛主席？”

“我没有反对毛主席。我只是无话不谈。”

姚文元发表颠倒黑白的《论反革命两面派周扬》，要彭总写认罪的读后感。彭总说：“姚文元发表文章是他的自由，我写不写也是我的自由。”不久，他提笔给姚文元写信：“姚：读三日人民日报《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的大作后，红卫兵要我表态。……如果照这样宣传有益，就这样宣传吧。如果需要更实事求是一些，我可以供给一些材料。”

多么辛辣的讽刺！多么有力的回敬！

近半个世纪以来，彭总率领千军万马，南征北战，国内国外，什么敌人没有见过？从1928年领导平江起义到长征路上的三军团总指挥，以及抗日战争时期的八路军副总司令和解放战争岁月的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和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还有朝鲜战场上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蒋匪、日寇、美帝，都不在话下，何况这些魑魅魍魉。

林彪、江青一伙狂怒了。

他们利用黄永胜控制彭德怀专案组的权力，不惜要把这位“一生戎马无假日”的元帅置于死地。

在黄永胜指使下，“彭德怀专案组”于1970年9月17日写了一个所谓《关于反党头目、里通外国分子彭德怀罪行的

审查综合报告》，说什么“彭德怀一贯反党反毛主席，里通外国，罪行累累，证据确凿。在被审查期间，态度不老实，时常出尔反尔。我们建议：撤销彭德怀党内外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党籍，判处无期徒刑，终身剥夺公民权利。”此件在开头写道：“永胜同志：遵照您对彭德怀结案材料可以上报的批示，现整好呈上。请审示。”11月8日，黄永胜大笔一挥：“同意”。

满纸的谎言啊！一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彭大将军的业绩不是墨写的谎言所能掩盖的！

狠毒的迫害啊！从1928年中国革命处于低潮时刻加入党、领导了永留史册的平江起义，以及在往后的漫长岁月里参与领导了一系列震惊中外的战役和战斗的彭总，是不可能从人民的心上被“开除”掉、被“剥夺”掉的！

天低云暗的最后岁月

1973年春末，彭总大量便血，最后诊断为直肠癌。

精神和肉体的摧残，长时期的冤屈得不到申诉，怎能不导致绝症呢！

在死亡的威胁面前，他还在想为人民尽一点义务。他打了腹稿，准备总结军事思想，把他经历的军事生涯加以提炼、概括。

他关心国防科研，一再惦念：“我们的国防科研不搞上去，要挨帝国主义打。”

他坚持学习与思考，在读过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上作了眉批：“也只有实践才能证明自己思想的正确性。”

他对亲属说：“我这个病，治不好，可以作为医学解

剖，研究癌症，最后为人民尽一点力。”

1974年夏，彭总病危，癌细胞扩散到肺部、脑部，引起剧烈的痛楚，但是，没有人给他打止痛针。

在生命垂危的时刻，彭总还体贴着别人。他唯恐经常来狱中探望的他的侄女受到不应有的株连，用颤抖的手，写下他一生中最后的字迹，说明彭梅魁所以在他看押期间送来粮票、衬衣、鞋袜，是因为仓促押来北京，“成都和北京气候不大相同，我穿着单薄，到京时已感冒，到1967年1月下旬皮肤炎大发，痒疼异常，已成溃疡，后经军医注射治愈，换洗衣服和其他日用必需品也无”，才向侄女求援的。彭总还特别说明1962年6月他写给毛主席和党中央的那封长信，“她没有看过，她也不知道有此信。”

他珍惜自己作为一个共产党人的荣誉，甚于自己的生命，说：“我从来不怕死，现在问题没有搞清楚；我要活下去，我要见毛主席。”

他一再发出内心的呼喊：“历史是最无情的。历史将会审判他们，也会对我作出正确的评价。”

他深知有奸臣、坏蛋潜伏在党和国家的领导层，提出“现在有人利用革命口号向党进攻”，并一再用隐晦的语句对他的侄女彭钢、彭梅魁说：“你们要记住啊！我是被特务害死的！”

1974年11月29日下午3时35分，彭德怀同志含恨去世，终年76岁。

在近半个世纪的斗争中，在枪林弹雨的战场上，连敌人的子弹也长着眼睛，没敢动他一根毫毛，但今天却被自封为“无产阶级左派”的凶犯们迫害致死。

他们惧怕彭德怀的名字，盖在他遗体上的白单上写着

“王川”。

他们惧怕彭德怀的一切，连他在狱中、病榻上读过、批注过的62本书，包括《反杜林论》，都被付之一炬。

彭总的遗体被秘密焚化后，骨灰偷偷运到四川，编号327，谎称年龄32岁、成都市人。押运者奉命告诉当时四川省委的某两个负责人，只许他们两人知道这是彭总的骨灰，不准告诉第三个人。

令人凄然泪下的是，连火化遗体的费用，也从彭德怀少得可怜的狱中生活费中支付。

这风雨如磐、天低云暗的岁月，人们不应该忘却。

尾 声

彭德怀同志生前要求而无法实现的实事求是的结论和公正的审判，在他去世之后四年多和五年多，终于作出了。

1978年11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彭德怀同志恢复了名誉。作为我们党、国家和军队的杰出领导人，作为对中国革命事业有卓越贡献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作为热爱人民，耿直刚正、从不考虑个人得失的共产主义战士，彭德怀同志将永垂史册。

石穿！石穿！彭德怀一生怀抱着的穿石的恒心，终于滴水而石穿了。经过十多年的漫长岁月，人民终于打穿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顽石，公审了这一伙罪犯。

一生横刀立马的彭大将军，你可以安息了！

1982年春

章士钊上刘少奇书

少公主席座右

緬維六四年春节元日润公开教育会议于上海，公与钊均列席时，润公缕述北大积弊，心长语重，响彻殿廊。未意言者谆谆听者藐藐，不三、四年，教育体系全体鱼烂而亡，致有今日。回忆前尘，应共扼腕。文化大革命爆发以来，时不过六七月，暴力所至，摧枯拉朽，几于无远不屈，无高不达。驯至近日集中力量与公为难。顾细绎润公历次工作会议谈话意旨类无不于少公优加顾惜，有增无已。如曰少奇同志有责任，我亦有责任；又曰对少奇同志不能一笔抹煞；又曰错了，说明白，改过来就行，我无意推翻任何人。如此等等，都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之公心亮质，与天下人以共见。尝论人之欲善，谁不如我；宇宙之大，又何所不容。昔苏子瞻与程正辅游香积寺，诗云灵苗与毒草，疑似在毫发。钊观近日广众宣布公之十大罪状，若而无产阶级路线，若而资本主义路线，疑似之间易滑而进者往往易滑而退，二者殆不难东西忽而换位，黑白骤尔变色。尤可怪者，公所著《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曾说到有人不懂马列主义而特装模作样，自封为领袖以家长式在党内发号施令云云。此一望而知为指摘陈独秀一流人，然读者谓是漫骂润公。夫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斯殆别有用心，应置之不论不议之列。窃以

共产党起家不易，由草创以至统一全国，前后四十余年之久。两公皆始终其事，相与戮力拼命以底于成，此何等珍贵友谊，岂可等闲视之。以钊揣知公于润公微论学术即以里闾与年事；论风义原是师友相兼。加以亲随有年，不断耳提面命，即自安部曲而有所尊奉，亦属谊所当然。今外间之所齟齬公者，姑不论是非虚实如何，而公应执持百鸟不噪空窝之确信，取法廉颇向藺相如肉袒负荆之诚意，亲诣润公之门，长跪谢罪，举一切讟言毁语自矢。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向后在润公统一指挥之下，共同施行无产阶级路线，期于一流而无间，倾怀自誓毫无保留。须知人非圣贤，孰不有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钊敢言，润公乐于公之有此一举。立以公之诚恳转达群众，于是约期开一恳亲大会，两公同时出席，相与化豺狼于玉帛，易戟指为交心；由是自公而下层累蔓延之各项纠纷均相次而得到解决，岂不大快，岂不大快！虽曰今之无产与资产两条路线之剧争不比于赵国之两虎共斗，有妨国家之急，独美帝与各国反动派正悻悻同以中国为敌，而共产党解放世界之大任复以各被压迫民族兴起缓慢，吾囿于一服八之艰苦形势难于一鼓骤成，实不宜于国内延长动扰，阻吾进路。曩朱时元与彭宠书凡事毋为亲爱者所痛而见仇者所快。吾为此惧深有感于斯言。窃惟润公之用心无过犯错误者皆得所改正，仍依岗位而各有功于国，以符合于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之大团结，以康而国，以崇而民已耳。此由表面窥测兴甚难，由间道楔入则甚易。语云解铃还是系铃人，此一易于反掌之转移形象，两公实在握焉。惟公先图，利之国家。幸甚。

专肃顺致

政绥

章士钊谨启

简介 章士钊(1882~1973年),男,湖南长沙县人。1903年5月在上海任《苏报》主笔,宣传反清思想。同年冬参与组织华兴会。1905年赴日本留学。1908年赴英国爱丁堡大学学习。辛亥革命后,曾任北京大学教授,广东军政府秘书长,南北议和南方代表等职。1924年任段祺瑞执政府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对造成镇压学生爱国运动的三·一八惨案负有责任。他主持的《甲寅周刊》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大唱对台戏。1928年北伐军到北京后被通缉,遂潜赴欧洲游历。九·一八事变后在上海任政法学院院长。抗日战争期间,任国民参政员。抗战胜利后在上海任律师。曾参加上海和平代表团进入解放区。1949年4月作为南京国民党政府代表团成员,参加北平和平谈判,谈判破裂后留北平。同年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常委,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他关心国家建设和祖国的富强。“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动乱使他忧心似焚,1967年3月之际给毛泽东和刘少奇各上书一封,希望中共团结,毛、刘握手言和,以民族利益为重,以国家兴盛为念,停止“文化大革命”的暴力动荡,致力于富强中华的建设大业。他的上书在当时被毛泽东婉言驳回。章士钊晚年还致力于国家和民族统一大业,1973年7月1日在赴香港探亲期间病逝,临终前仍念念不忘祖国的统一和强盛。

附：

父亲章士钊上书纪实

章含之

1957年，父亲诚恳的发言……

1957年的“反右”斗争意想不到地使我和父亲有了第一次共同的感受。整风运动开始时，在政协征求民主党派意见的座谈会上，父亲诚恳地发言说，希望中国共产党永远保持廉洁奉公、不谋私利的优良传统。他引用了古语“物必自腐而后虫生”这句话。他说譬如个一水果，表皮坏一些不甚要紧，削去一些，无损果子味道。唯果子自核心处腐烂生虫，虽表面光泽尚存，但从里往外逐渐腐蚀，最终此果不能食。父亲说共产党乃国家兴旺之柱石，犹如果实之核心。社会其他方面有些毛病较易纠正，唯共产党核心之健全最重要。本来，这是一位数十年与共产党保持挚友关系的七旬老人的肺腑之言，没想到竟引起了轩然大波。“反右”开始时，政协一部分人猛烈批判父亲这番话，指责说这是攻击党和社会主义的反党言论。父亲被迫写检讨。看当时的汹涌来势，很可能政协内定父亲是章（伯钧）罗（隆基）联盟一样的“大右派”。我那时正在外语学院的毕业班，原来是个团支部书记，又在1957年1月刚刚加入共产党成为候补党员。但是因为整风开始的那头几天中参加了年级的争鸣委员会，鼓励支部的团员给党提意见而被批评为“严重右倾”，我也不不得不在年级内和党支部内做检讨（最后对我虽无处分却在党内决定延长候补期一年，以观我“改正错误”的表现）。我的心

情十分沉重，对有些现象也很不理解。眼看同级中不少平时的好友纷纷被批判，有的最终成为“右派分子”，有的因“严重右倾”被取消出国留学资格。我十分迷惑，不知怎么回事，顷刻间，四年同窗学友竟分出了一批“敌人”。但因为自己有“错误”，也不得不慷慨激昂地去批右，去检讨。周末回家又见到父亲伏案苦思，经常在不大的会客室中紧蹙双眉来回踱步，不知如何书写检讨。那时，我觉得解放近十年，我第一次在一个大的政治运动中与父亲同样感到茫然不解。有一种莫名的伤感打动着我的心，我劝解父亲注意身体，把那些批判看淡一些。父亲对我长叹，说他一片赤诚，万想不到遭来这般攻击。

后来父亲的检讨总通不过，批判的调子越来越高，终于有一天晚上我正在家时，父亲拍案而起，大声地说：“这么搞不对头，我要给毛泽东写信！”我听了吓一大跳，劝他千万别写，也许再写一遍检讨可以通过。父亲主意已定，不听我的劝说，挥毫疾书，立即写成一信送呈主席，陈述他给党提意见的初衷及如此批判他之不公。我真为他捏一把汗，深怕这封信给他惹出大祸。但毛主席毕竟了解父亲，也念旧情。接到信后毛主席立即批示政协，大意说章行严虽在座谈会上用了一些过激言词，然用意是好的，不要再批评他了。有了这个指示，父亲自然就“过关”了。我说再写封信感谢主席吧，父亲却说：“不必了！”我看得出他虽然自己无事了，却对那么多人被定为“右派”深感不安。

毛主席“还债十年”

毛主席还对我讲起过父亲与他最初交往的一件颇有意义

的事情。这次谈话竟引出了毛主席向父亲“还债十年”的趣事：

1963年初，主席读完英文之后，要我陪他在寒风中散步。主席身体极健，不戴围巾、帽子；我却“全副武装”还觉得冷。散步时，主席突然问我：“行老有没有告诉过你，我还欠了他一笔债没有还呢？”我以为主席在开玩笑，我说父亲没有讲过，要是主席欠债，父亲是必定不会催债的。主席却很认真地说：“也许行老忘了。这笔债我见到你，想起来了，早该还了！”于是，毛主席告诉我，1920年，毛主席为筹备党的成立、湖南的革命运动以及一部分同志去欧洲勤工俭学，急需一笔数量较大的银款。主席去上海找到父亲，当然没有告诉父亲要成立共产党，只是说为一批有志青年筹款去欧洲勤工俭学，请父亲帮忙。父亲立即答应，随后发动了社会各界名流捐款。由于父亲的影响和努力，最后一共筹集了两万银元，全部交给了毛主席。主席笑着对我说：“行老那里晓得他募捐来的这笔钱帮了共产党的大忙。当时，一部份钱确实供一批同志去欧洲。另一部份我们回湖南用去造反闹革命了！”毛主席说：“你回去告诉行老，我从现在开始要还他这笔欠了近50年的债，一年还两千元，十年还完两万。”我回家告诉父亲，父亲哈哈大笑说：“确有其事，主席竟还记得！”父亲和我都未想到几天之后，毛主席果真派徐秘书送上第一个两千元，并说今后每年春节送上两千元。这倒使父亲十分不安，他要我转告主席不能收此厚赠，当时的银元是募集来的，他自己也拿不出这笔巨款。主席听了我的传话微笑着说：“你也不懂我这是用我的稿费给行老一点生活补助啊？他给我们共产党的帮助哪里是我能用人民币偿还的呢？你们那位老人家我知道一生无钱，又爱管

闲事，散钱去帮助那许多人。他写给我的信多半是替别人解决问题。有的事政府解决不了，他自己掏腰包帮助了。我要是明说给他补助，他这位老先生的脾气我知道，是不会收的。所以我说还债。你就告诉他，我毛泽东说的，欠的账是无论如何要还的。这个钱是从我的稿酬中付的。”

自此，每年春节初二这天，毛主席必定派徐秘书送来两千元，一直到1972年送满累计两万元。1973年的春节过后不久，毛主席问我送给父亲的钱送去没有。我说：“今年没有送。”主席问为什么。我说：“主席忘了，当初说定十年分期偿还，还足两万。去年已是最后一笔，主席当年借的两万已还清了。”主席笑了，并说：“怪我没说清，这个钱是给你们那位老人家的补助，那里能真的十年就停！我告诉他们马上补送。”我说父亲不会肯收，他当初说那就只收十年。主席说：“你回去告诉行老，从今年开始还利息。五十年的利息我也算不清应该多少。就这样还下去，行老只要健在，这个利息是要还下去的。”接着主席认真地对我说：“这个钱一直送到行老不在为止。他去世了，就停了。你们这一代要靠自己，不要靠父亲的遗产。”

荒唐岁月的荒唐事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在学校受到冲击，大字报贴满了我宿舍房门口，学校的大字报区里也有不少，骂我是“黑帮爪子、亲信”、“修正主义苗子”。我被揪出来几次后就被踢出“革命群众”的队伍。当时我惶恐之极，我虽然经历过几次政治活动，却从未见过红卫兵在“扫四旧”的口号下用皮鞭抽打他们所定的“反革命”，对过去的党的领导

干部、教授学者施以种种虐待、凌辱的恐怖景象。那时一有机会我就骑车跑回家。30年来我第一次感到家庭给我的安全感。父亲出奇地镇静。尽管附近的红卫兵也不时把大门敲得震天响，进来检查有没有“四旧”，领袖像是否挂在应挂的地方，父亲却毫无惊恐之感。他给了我极大的支持力量，他说他不相信这种混乱会延持太久。后来我的自行车被英语系教师中的“革命造反派”“征用”了，当时社会一片混乱，公共汽车也无法正常行驶，我不敢天天回家，怕被“造反派”发现后禁止我离开学校。在那疯狂的日日夜夜中，我特别地想家。因为我是“黑帮爪牙”，学校里没有人理睬我，同我说话，除非是开我的批斗会，要我“交待”同黑帮的关系。我象是落入一个黑暗的深渊，多么想念温暖的家，想念我的女儿和老双亲！

1966年8月19日的夜里，厄运终于也降临到父亲的头上，而且命运的安排偏偏是在我偷跑回家的那个晚上。

这天晚上，学校大操场开大型批斗会。斗争对象是班禅。我们这些同“黑帮”有牵联的人是不准排在革命队伍中的。我们只准在革命群众入场之后，自己拎个小板凳坐在操场边缘“受教育”。我坐了个把钟头后，想家的情绪强烈得难以抑制。我担心家中两老一小在这乱哄哄的日子中会不会遭意外。随着台上斗争形式越来越残酷，我心中的恐怖感也越来越强烈。最后我竟不顾一切地离开操场奔出了校门，一直走到白石桥，搭上11路无轨电车，擅自跑回家了。父亲见我脸色苍白，神情惊慌，忙问我出什么事了？我说：“我担心你们，怕你们出事。”说完就瘫坐在沙发里。父亲安慰我，要我放心，说他是老朽了，红卫兵犯不上来找麻烦。只有年仅五岁的姐姐对外面世界正在发生的这场毁灭性的灾

难浑然不知，依然安安静静地熟睡在她的小床上编织她美丽的梦。

我和父亲、母亲默然对坐着。此刻我的心是宁静的，真希望这院子能成为我们一家人永久的庇护所。

但是，这小小的庇护所就在这天夜晚遭到了无情的扫荡。大约十点半钟，我和两老还在说话，大门突然被撞得象要马上坍塌下来一般。紧接着一阵狂呼乱吼，大约二、三十名戴着“新北大红卫兵”臂章，穿着没有领章帽徽的旧军服的青年男女洪水般冲进院来。我搀扶着年迈的父亲站起来“迎接”这批不速之客，心跳得剧烈极了，象是马上要跳出喉咙；血往脑子里涌上去，而脑子却是一片空白，恐惧已被一种麻木代替。胸口却又象被愤怒填满。

红卫兵冲进客厅，当然一眼就认出了父亲。他们中一个人野蛮地抽出腰上的皮带（还是个女孩子！）冲着父亲扬起，却又落下，厉声地命令父亲到院子里去。我挡在前面，尽量平静地对他们说父亲年纪大了，晚上院中有风，是不是就在屋里说。几个红卫兵上来猛然把我推开，抓起父亲就往院中拉。母亲吓得瘫在沙发里不能动弹，红卫兵喝令她站起来，说：“臭老太婆还想坐沙发！滚开！”不知为什么这批如狼似虎的“革命造反派”竟没有问我是谁，也没有理会我。我猜他们大概知道我在外语学院也正挨斗，不会有此自由回家来。妞妞在东屋里被吵醒了，保姆搂住他，叫她别出声。我不知应当到哪里去，是到院中照看父亲的安危；还是陪着母亲免她受过多的惊吓。犹疑片刻后我轻轻对母亲说：“你别害怕，他们不会拿你怎么样！我去爹爹那里！”我跑出屋子，一群红卫兵挥着皮带在父亲面前大喊大叫，他们用最粗野的语言凌辱父亲，说他是鲁迅笔下的落水狗，说他是老混。

蛋，等等，等等。今日想来，仍为在那混乱岁月中文明被践踏到如此地步而心颤。他们叫父亲低头，父亲不低头，默然不语。他们上前按他的头，父亲打个踉跄。我想冲上去，但红卫兵挡住我，把我推进屋。那时我一点不想哭，只想喊！我拚命控制自己不失去理智。红卫兵冲着父亲念了点什么东西，宣布他的“罪状”，声言他们来造他的反，要他表态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父亲仍不说话。然后他们命令父亲原地站着不动，而他们则一窝蜂似地拥向客厅，开始了他们的“革命行动”。他们索要去家里箱笼的钥匙，到处乱窜，翻箱倒柜，把大批珍贵古籍线装书扔在地上。他们甚至还钻进天花板里不知搜寻什么。这批“革命派”就这样造了大约两个小时的反，父亲一直站在当院。初秋深夜的微风已带有冷意，可怜的父亲显然站不住了，那时他已86岁高龄，我被扣在屋内，不许出去，隔着窗子看着父亲抖索的身躯，此时我才哭了起来。

红卫兵造完反，带了大批的“战利品”（书籍、信件为主）撤退了，临走前到处贴封条，书架、书橱、书桌，连沙发上也恶作剧地横贴了好几张封条，并且警告我们这些“反动分子”如果坐沙发，封条就断了，他们就回来批斗我们。这一切闹腾结束了，他们涌出院子，上卡车回去了。第二天早晨，我们才发现“造反派”在我们大门外贴了又长又宽的辱骂父亲的对联和横幅，并且贴了一张大字报警告我们不许撕去对联、横幅。

北大红卫兵走了后，我赶快扶父亲走进卧室，让他躺下。此时我满腔的愤怒、心酸、委屈再也忍耐不住了，不知为何我扑通跪在父亲床前，把头埋在他手臂中痛哭起来。父亲轻轻拍着我的头，细声地说，“不要难过，他们迟早会来

的！”后来，父亲说他累了，要歇一会儿。

每次，我晚上偷跑回家总是搭末班车回学校，怕外语学院的“革命派”发现我溜了。这一天当然不可能了，我也顾不得明天回校后的处境，呆坐在乱七八糟的客厅里，为今后父亲的处境担心得要命。

给毛主席写信

半小时左右过去了。父亲自己颤悠悠地从卧室出来。我急忙过去，问他要什么，我替他拿。他摇摇手似乎无力回答我。他端坐在写字台前，说：“拿纸笔来。”我不知父亲要干什么，我说：“休息吧，明天再写！”父亲不动声色地说：“不，现在写，给毛主席写信！”

第二天（8月30日）早晨，信送出了，父亲在信中告诉主席北大红卫兵如何来抄他的家并斗争了他。当时我以为这封信是不会有回音了，没想到，信送出的第二天，总理办公室就来了电话，说主席已把章老的信批转给总理落实办了，北大红卫兵已受严厉批评，命令他们立即送回被抄物品。抄家后那几天晚上，我对家里很不放心，常常偷跑回家。我那时住在两人一间的教师集体宿舍，同房间和隔壁的同志暗中对我都很好，所以我偷跑回家他们并不去报告。8月31日晚上，当我回家听到总理的指示时，我激动得眼泪流个不停。母亲还告诉我，总理指示从第二天起派两名便衣警卫在我家里值班，不准任何人闯入。自这场“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我第一次感到痛痛快快地吐了一口气。

更没想到的是9月1日，父亲收到了毛主席的亲笔复信，信的内容如下：

“行严先生：来信收到，甚为系念。已请总理予以布置，勿念为盼！顺祝健康 毛泽东九月一日”

同一天，总理指示三〇一医院接收父亲以及程潜、傅作义、蔡廷锴、李宗仁等人住院保护。后来我得知，主席把父亲的信转给总理时作了批示：“送总理酌处，应当予以保护。”总理不仅立即对父亲的安全采取了周密的措施，而且乘毛主席作此批示之际，亲自拟定了以下一批应受保护的民主党派人士及干部名单：宋庆龄、郭沫若、章士钊、程潜、何香凝、傅作义、张治中、邵力子、蒋光鼐、蔡廷锴、沙千里、张奚若。

- (1) 副委员长、人大常委、副主席
- (2) 部长、副部长
- (3) 政副（政协副主席）
- (4) 国副（国务院副总理）
- (5) 各民主党派负责人
- (6) 两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李宗仁

（以上见《周恩来选集》下卷第450页）

三个月后，父亲从三〇一医院回家，红卫兵打砸抢、抄家、打人的狂潮此时已平静了一些，大概是该抄的家抄完了，该打的人打过之后都赶回老家了或进“牛棚”了或屈死在棍棒下了。父亲受到毛主席的保护可以在他的住所闭门读书写字，对天下事不闻不问，平安地过日子。然而，父亲回家后听到“文化大革命”不仅没有收敛反而急剧地在往“深化”方向发展，斗争矛头已十分明确地指向“刘邓司令部”时，心情十分沉重。我们家过了一个寂静的元旦和春节后，

反击“二月逆流”和“打倒刘少奇”的口号已遍布全国各地。父亲要我买回许多红卫兵小报，整日看这些充满火药味的宣传品，对国家前途充满忧虑。

“这个运动再搞下去，国家要完了。不能打倒刘少奇！”

终于，在1967年3月初，他对我说：“这个运动再搞下去，国家要完了。不能打倒刘少奇。这些家伙（指江青一伙）要把中国毁掉。”他毅然决然地宣布说：“我要给毛主席写信，请制止打倒刘少奇。毛刘分裂就会使国家分裂。”我当时在学校的处境已有所好转，外院的“造反派”已卷入外事口围绕对待陈毅同志的态度的斗争，学校里的“当权派”被关进牛棚，我们这些“爪牙”无人过问了，因而我在家里陪伴父亲的时候也比较多了。当我听父亲说要给毛主席写信建议不要打倒刘少奇时，我吓了一跳。我深知，这一不幸的趋势已无可挽回，刘少奇同志实际上已被打倒多时了。我劝父亲不要写了，因为他的意见是无济于事的。江青的“中央文革”怎么会听取一个本来也属打倒之列的老朽民主人士的意见呢？我对父亲说，他好不容易闯过险关，多亏毛主席保护。千万不要写这种信，万一使主席生气，把信交给“中央文革”处理，可能招来杀身之祸。我求他不要管了，安安静静地过日子吧。但父亲义愤填膺地说：“我非写不可！我不能看这国家这样毁掉！”

父亲终于送出了给毛主席的信。他在信中说自新中国成立之后，国家兴旺发达，全都仰仗共产党之英明领导。而毛、刘团结乃共产党领导核心坚强的保证。他说假若刘少奇同志确实犯了错误，望毛、刘两位领导能赤诚相待，好好谈谈，刘可做检讨，但切不可打倒刘少奇等等

送出给毛主席的信之后，我替父亲捏了一把汗，生怕此

信带来不测。想不到呈毛主席的信刚送出，父亲竟又写了一封长信给刘少奇同志，大意说他不信外面对刘少奇的诬陷不实之词，但为大局计，建议少奇同志做些检讨。无论我如何劝说，父亲不肯相信一个堂堂的国家主席当时实际上已经沦为阶下囚了。我猜想父亲的这封信送到中南海后根本就没有到达刘少奇同志的手里而是被中南海中的造反派“缴获”了。

父亲给毛主席的信送出后大约只有三四天，毛主席在三月十日又一次亲笔写了回信，全信内容如下：

“行严先生：惠书敬悉。为大局计，彼此心同。个别人情况复杂，一时尚难肯定，尊计似宜缓行。敬问安吉！毛泽东三月十日”

我读着毛主席的复信深深地松了一口气，但父亲却长长地叹了一口气，他知道他所能尽的力已到尽头，局势的发展已无可挽回。不过他认为是“中央文革”的坏人编造了少奇同志的“罪状”欺骗了主席。父亲给刘少奇同志的信自然是不会有答复的。

我现在手头的这份父亲亲笔底稿没有日期，但大致是在1967年3月初他给毛主席信件的同时。父亲并不清楚当时党内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但他忧国忧民之心溢于字里行间；他对共产党的诚挚关怀也是情真意切。他在信中说：“共产党起家不易，由草创以至统一全国，前后四十年之久。两公（指毛主席与少奇同志）皆始终其事，相与戮力拚命以底于成，此何等珍贵友谊……”父亲对当时的形势充满忧虑，他在信中说：“……实不宜于国内延长动乱，阻吾进路……”

“……凡事毋为亲爱者所痛而见仇者所快。吾为此惧深有感于斯言……”父亲衷心希望党内恢复团结，国家停止动乱。他期待：“……犯错误者皆得所改正，仍依岗位而各有贡于

国，以符合于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之大团结……”。父亲对当时江青一伙陷害少奇同志十分愤懑。他说：“……钊观近日广众宣布公之十大罪状……东西忽而换位，黑白骤而变色……夫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斯殆别有用心应置之不论不议之列。……”父亲出自肺腑，希望见到党内恢复团结，毛主席同刘少奇同志重新握手，领导全国。父亲欢呼说，如能达到此目的，“岂不大快，岂不大快！”

可惜父亲的一片真情实乃无能为力。1967年的3月，继毛主席给父亲亲笔复信之后，主席又派人把当时中央整理的有关刘少奇同志的材料送给父亲阅读。来说这些文件尚未公布，系党内机密。因为行老关心刘少奇问题，主席特别指示破例送给他看。父亲看过之后接连数日、情绪低沉。他对我说，对少奇同志的这些“罪状”，纯系蓄意致他于死地。父亲长叹说：“国家要遭难，我老了，我的意见也无用了，我只是为国家担心啊！”

许多年后，人们才知道在那风雨如晦的年代里，曾经有过张志新这样的勇士冒着生命危险对那场是非颠倒的“革命运动”发出过抗议的呐喊。我没有调查过在当时有多少像父亲这样地位的爱国民主人士曾经像他那样置个人安危于不顾，为了国家、民族的命运如此坦诚地向毛主席进过言。对我来说，经过了近30年对父亲的疏远、陌生、误解、偏见、伤害之后，我终于在那迷茫、徬徨的动荡岁月中看到了父亲闪光的心灵！

《柳文指要》出版的前前后后

父亲上书毛主席，力图劝说主席挽回“文化大革命”的

形势的努力无效之后，他知道他已无能为力制止这场灾难。此后他仍是关心着外面的形势，读各种各样小报，但不再写信给毛主席提意见了。他几乎把自己全部精力投入了修改他晚年的最后一部作品——《柳文指要》。父亲酷爱柳宗元的文章，解放后他空闲时间多了，从1960年开始着手撰写《柳文指要》，到1965年，上下两部近百万字已完成初稿。

父亲写柳文从一开始就得到了毛主席的支持。主席说他也爱柳文，因此，要父亲将书稿送他先读。主席不仅读，还逐字逐句研究，提出修改意见，并亲自改了若干处。本来这部书在1966年就预计可以发排了，因为在1965年下半年毛主席已看完上、下两部并同意出版。为这部著作，父亲同毛主席有过多次切磋。1965年7月，主席读了书稿下部之后给父亲写了以下信件：

“行严先生：各信及指要（注：指《柳文指要》）下部都已收到，已经读过一遍，还想读一遍。上部也还想再读一遍。另有友人（注：指康生，他一直反对出版父亲的《柳文指要》）也想读。大问题是唯物史观问题，即主要是阶级斗争问题。但此事不能求之于世界观已经固定之老先生们，故不必改动。嗣后历史学者可能批评你这一点，请你要有精神准备，不怕批评。……（注：下半部份信中主要谈郭沫若同志同高二适先生关于《兰亭序》真伪问题的争议，主席同意发表高文。此处略。）柳文上部盼即寄来。敬颂

康吉

毛泽东

一九六五年七月十八日”

由于康生从中作难，父亲的《柳文指要》几度修改。1965年8月再次将修改稿送毛主席。主席于1966年1月12日

回信说：“……大著《柳文指要》康生同志已读完交来，兹送上。有若干字句方面的意见，是否妥当，请酌定。……”在同一信中，主席加了附注说：“附件两纸，另康生同志来信一件，均附上。又及。”原来，主席知道康生反对出版柳文，特意在1965年底亲自写信给康生说了他同意出版该书的意见，并附上父亲的书稿。康生看了主席去信不得不改变初衷，佯作同意出版。他在信中说他读了全部《柳文指要》，“觉得主席八月五日信中对此书的评价是十分中肯完全正确的。”但康生仍在信中说，“此书也有缺点，如著者不能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去解释柳文，对柳宗元这个历史人物缺乏阶级分析，对社会进化，以为‘承新仍返诸旧’，‘新旧如环，因成进化必然之理’等等。”他学着毛主席的笔调说，“对于一个没有研究马列主义的人，这是可以理解的。”

从康生复信中，父亲知道了，毛主席7月18日信中要求父亲将柳文上部也寄去是为把上、下两部送给康生去看。从康生信中可以看到，毛主席在把柳文送给康生时附了信，对《柳文指要》作了肯定的评价，康生在给主席的上述复信中不得不表示赞同，他说：“……八十五岁的老先生尚有精力作此百万巨著，实非易事。我读完之后，觉得主席八月五日信中对此书的评价是十分中肯完全正确的。此书翻永贞政变之案，申二王八司马之冤，扬柳子厚‘以民为主’的思想，斥韩退之‘以民为仇’的谬论，确有新鲜引人入胜之处。”主席把康生的信原封不动连带信封一起转给父亲，信封原是康生写给主席的，上书：“请交主席，康生寄。”毛主席把“主席”二字勾去，亲笔在旁边写上“章行严先生阅”，这必是康生始所未料的。父亲看了康生的信完全明了这部他

的心血之作迟迟不能付印是被学霸康生压下来了。

本来，到此一切问题算解决了，《柳文指要》终于可以问世了。但刚刚送到中华书局，“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在那摧毁一切旧文化的混乱年月里，当然《柳文》的出版是完全无望了。父亲十分伤心，他花费了近10年的时间在年近90的时候完成这一巨著，最后不得不把书稿闲置起来。

父亲是个锲而不舍的人。当“文化大革命”的狂暴逐渐减弱，转为“斗、批、改”的时候，父亲又重新提出了《柳文指要》的出版问题。此时大约是1970年。本来毛主席已批准同意出版，中华书局也已排版，但此时的康生已窃取“中央文革”要位，见《柳文指要》最后要出版了，他专断地提出要父亲改变观点，将全书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重新修改一遍，才能出版。他一反1965年12月给毛主席信中的动听言语，杀气腾腾地对老父亲的心爱作品举起大棒。父亲得知康生意见后，极为愤怒，写了一封措辞激烈的长信给毛主席并康生，断然拒绝按康生意见修改全书。可惜这封信已找不到，我手头只有残存半截草稿，从草稿中可见父亲当时心情十分激动，要改处墨迹极淡，显然是墨未研就就下笔了。父亲在信的草稿中说：“根据康生的意见，看来原作不加改动断不可，即为社会必须扫除的秽浊物，哪里还谈得上出版。”又嘲讽地说：“夫唯物主义无他，只不过求则得之不求则不得之高贵读物。”还说，“我未信人类有不可变更的观点，亦未闻天下有走不通的道路。为此请求主席恕我违抗指挥之罪（父亲旁注：指不改变原稿），并赐我三年期限补习必不可不读的马列著作以及全部毛选，如果天假之年能达九十六阙比时，谅已通将《指要》残本重新订正准即要求版行公之大众，不望无暇，庶乎少过。我之此一请求出于十

分真诚。临纸无任惶恐。待命之至，未肃顺致崇祺。康生副委员长均此未另。”

这一节外生枝大约发生在我去湖北沙洋干校期间。如果我在北京，我必要想法劝阻父亲不要用这种口气写这封信的。不过，幸而毛主席深知父亲，并未怪罪于他。这封信不仅没有惹来杀身之祸，反倒促成了书的最终于1971年出版。

《柳文指要》的出版对年过90的父亲真是天大的喜事。这是他一生最长、最完整的巨著，完成于85岁高龄，问世于90岁之天年，怎不令老父亲欣喜万分！我记得新书拿来时父亲激动得手都发颤了。他捧着新书来回抚摸着，还拉着妞妞的手叫她也摸着书的封面，对她说：“这是爷爷写的，你将来要好好读。”妞妞天真地说：“我读不懂，爷爷你给我讲。”父亲凄然一笑说，“那时候爷爷不在了，你妈妈也看不懂，就怕没有人给你讲了。”我听着这一老一小的对话，心里非常难过。这时我真恨自己蹉跎岁月，一点没有继承父亲那无比丰富的知识宝库。

父亲自己花钱买了上百册《柳文指要》，又叫秘书买来红纸，裁成小条。他要亲笔题字，送给他的朋友们，当然首先是送给毛主席、周总理。父亲写好红纸条，我们大家帮他贴在扉页上。当时我已进外交部工作。父亲说外交部送两位，一位是当时的代部长姬鹏飞同志，一位是乔冠华。父亲与姬鹏飞同志并不熟悉，但因他是外交部主要领导，出于尊重，父亲亲送一册《柳文指要》。父亲对乔冠华则印象较深。他对我说，他在1949年和谈失败后去香港，在那里见到了冠华，他很赞赏冠华的才华，所以一定要赠他一册。没有想到后来父亲的这部赠书留下了冠华第一次对我的未曾见面的印象。

父亲把送姬部长和冠华的两部书交给我，嘱咐我上班时带去亲自交给姬、乔两位。我当时答应了，但后来我把书带到办公室后不觉犹豫起来。那时我刚从外语学院调至外交部不久，对部里的一切很不习惯。我深感外交部的环境、气氛与外语学院大不相同。部里等级观念和差异十分鲜明。甚至司里的一些老科员对新来的“外行”也不放在眼里。那里的人还喜欢议论他人，评头品足。我当时直觉地感到假若我把这两部《柳文指要》按父亲嘱托亲自送到姬、乔两位领导的办公室，事情传出来，人们一定会说我拿父亲的著作做进见礼，去攀上部长们的关系。考虑再三，我暂时把这两部书放进了身边的柜子里，想寻找个合适途径，不必要我亲自送去。

谁知我还没找到这个途径，有一天上午我突然接到冠华当时的秘书的电话。他说，“乔部长昨天去北京医院看望张奚老（张奚若同志，当时任外交学会会长），听说章行老（我父亲）也在住院，就去看望了他。章行老说他的一部新著《柳文指要》，他自己题了字请你带交乔部长，但是乔部长从来没有收到。刚才一上班就叫我去查问，很不高兴，说是不是你交给我，在我这里压下了。可是我根本没有收到过。他问我交给谁了。我说谁也没交，在我办公室柜子里。程秘书颇有点不以为然，在外交部，该送部长们的材料、文件如果延误了那是大不应该的。他立即到四楼找我把两部书都拿走了。临离开我办公室时对我说：“章含之同志，以后有给部领导的任何东西，请你不要压下来。乔部长怪我怎么早不告诉他章行老的女儿调到外交部来了。乔部长说在医院里你父亲说他的女儿在外交部，乔部长还一无所知。”我说：“我在亚洲司，小科员一个，又不属乔部长领导，所以

也没有去拜见！”此后我也仍然没有去拜见这位“乔部长”。

这年11月，联合国通过了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席位之后，冠华任中国代表团团长，我是代表团翻译之一。第一次召集全体会议是在外交部六楼东侧的大会议室，还有不少配合代表团工作的同志参加。我到晚了一点，搬个凳子坐在门口外。冠华问人到齐之后就点名。大部份人他都认识，叫到我时，他问：“那一位是章含之同志？”我只好众目睽睽之下站起来说我就是。冠华看着我说：“你就是章行老的女儿？”我说：“是。”后来，冠华说那次《柳文指要》的事给他留下了一个印象，因此看到去联大的代表团名单中有我名字时，他有意要看看章行老的这个傲气十足的女儿是什么样的。我们当然谁都不会料到当初在六楼会议室的这短暂对视之后的十余年中，我和他竟会成为一对历经坎坷、相依为命的患难夫妻！

周总理对于《柳文指要》终于出版这件事特别高兴。那时我每周差不多都要见到周总理，他非常关心父亲，收到《柳文指要》后要我传话给父亲致谢。后来总理又想起稿酬的事，对我说：“文化大革命把稿酬制度废除了，不过总不能让行老辛苦十年一点没有报酬啊！我说父亲只为书能出版，他想都未想过稿酬的事。总理说他知道父亲一生散财，从不爱财，不过作为政府不能不考虑到。最后总理指示不以稿酬名义，只说是酬谢父亲的艰苦创作，送了他一万元。父亲深深体会总理的苦心，这笔钱他始终未曾动用。我去联合国开会，父亲说能不能换成美元给毛主席、周总理买点营养品。我说不行，父亲很感遗憾。

姜明亮等上中共中央、毛泽东书

敬爱的党中央、毛主席：

随着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不断深入，许多问题使我们越来越想不通，作为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二号人物林彪的许多错误思想和理论越来越发展，许多荒唐的错误行动蔓延全国，令人痛心疾首，长此下去，国将不国，民将不民，为了国家的利益、民族的前途，我们忧心如焚，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能丢，我们不得不直言：

一、林彪关于“老三篇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灵魂的灵魂，核心的核心”。这一论断是荒谬的，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我们认为马列主义的核心是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列宁说过，马克思主义的灵魂在于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林彪这样提并在实践中把它推向极端，恰恰是扼杀了马列主义的核心和灵魂，把全国轰轰烈烈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的运动引向歧途。老三篇所列举的事例，是历代统治阶级都可以接受的，过分的宣传会导致奴隶主义。林彪的做法和孔孟之道如出一辙，即“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实际上林彪是在搞“愚民哲学”。因为只有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才是人们正确认识客观世界和社会历史的锐利的思想武器，这和敬爱的周总理大力倡导的“两论起家”形成何等鲜明的对照。

以下将要列举的林彪一系列形而上学、大搞愚忠的作法

和说法，都散发着“愚民哲学”的味道，哪有丝毫共产党人的气味。

二、林彪说：“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不但在实践中是错误的，在理论上也是荒谬的。他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绝对化、神化了。难道说伟大领袖毛主席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几十年来说的都是真理？为什么毛主席只主张出选集而不主张出全集呢？既然句句是真理为什么不可以出？马克思主义认为：凡真理都是相对的，随着时间、历史、社会环境的变迁或科学上的重大发现，真理大致上会出现二种变化：一是在新的条件下将被新的真理取代或包含，从而向前发展了。二是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认为一个人说的话句句是真理，只有在封建社会皇帝被神化后，才出现所谓金口玉言之说，但这早已被马克思主义否定了。至于一句顶一万句，在现时都有铁的事实证明林彪说错了。在“十六条”中，伟大领袖毛主席就强调指出“要文斗，不要武斗”，全国人民都认为是真理，至少在口头上是如此，全国数亿人，人人学习，最近红旗杂志连发了三期社论，强调《要文斗，不要武斗》，全国成千上万只喇叭何止广播了几亿句，为什么在对当权派的武斗愈演愈烈之后，现在又发生了各派组织之间大搞武斗，甚至动用了机枪、大炮，西安都动了坦克，也是愈演愈烈，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到空前的严重损失，为什么毛主席的话在此就不顶用了呢？数亿句也不顶用了呢？屁用不顶，现在是各取所需！这究竟是为为什么？为什么陈伯达走一路，一路发生武斗，这在林彪、陈伯达、江青等人操纵下的文革能出现如此怪事，究竟是谁反对毛泽东思想，不值得人们深思吗？

三、林彪提出“政治可以冲击其它”岂止是可以冲击其

它呢？实际上是冲击一切，在这种错误思想的指导下，突出政治走向了极端，真理和谬误往往只差一步之遥，真理被推向极端就适得其反，走向反面。现在全国工人不做工，干部不工作，学生不学习（至少在西安是如此），幸亏农民不拿工资，否则，全国人民将喝西北风。难道这不是严峻的现实吗？真可谓国将不国，民将不民，长此下去，国家前途堪忧。

四、林彪说“对毛主席的话，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试问：不理解的怎么去执行？不理解的在实际中如何能执行好？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凡事都要问一个为什么，想一想它是否有道理。可见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盲从，正如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的：盲目的表面上的毫无疑问的去执行上级的指示，实际上是消极怠工最好的办法。可见林彪是公然提倡盲从，走向极端就是大搞奴隶主义，难道这不是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吗？可以想象得到，到一定的时候，有人会利用人们的朴素的阶级感情，利用人们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崇拜，假借最高指示而以售其奸。杨成武事件的出现，难道不值得我们吸取教训吗？

五、林彪关于“毛主席比马恩列斯高得多，是最高最活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列主义的顶峰”的论断是错误的，不但在理论上不通，在对外宣传上更是不利。我们认为：马恩列斯和伟大领袖毛主席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领袖，他们分别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分别建立了在马列主义发展史上的里程碑。但是，后人成果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去完成的，没有马恩列斯，也不会有毛泽东，他们同样都是无产阶级革命领袖，不能说谁比谁高得多。

“顶峰”论更是理论上的错误，是违反辩证唯物主义认

识论的，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真理是相对的，有条件的，更是不断发展的，是不可穷尽的，绝对化就否定了真理，也否定了毛泽东思想本身。这种王婆卖瓜，自卖自夸的做法，在国际上效果很差，对我们不利。因为在当代国际共运中，马克思和列宁的威望仍然是最高的，林彪这样说，这样做，明是抬高别人，实质是抬高自己。

六、现在，轰轰烈烈的学习毛主席著作运动已被引向歧途，形而上学猖獗，唯心主义盛行，已经被庸俗化了。“天天读雷打不动”实际上是形式主义，“早请示晚汇报”实际上是逼着人们说假话，甚至解放军站岗都只拿“红宝书”而不拿枪了，如果真的遇到了阶级敌人破坏，用什么去抵抗，不用说当“原子弹”用了，连当切菜刀用都不行，何以对付敌人，多么可笑，多么愚蠢的事啊（至少在西安是如此）。

七、提倡愚忠，大搞封建迷信，现在到处出现的三忠于、四无限活动，忠字舞，大像章，都是从部队开始，传遍全国。连封建王朝也不曾有过的事竟然发生了，特别是不论干什么都要三呼万岁，再三呼万寿无疆，这在封建王朝只有大臣上朝拜见皇帝才有的最高仪式，而现在在共产党人领导的中国，则人人皆搞，事事皆搞。远远超过了封建社会，令人震惊，我们在大街上经常看到解放军战士胸前挂个或缝上个大“忠”字，只差背后有个“勇”字了，否则，和清朝的小卒有何本质上的不同。更有甚者，毛主席的书叫宝书，像叫宝像，明明是“买”，却偏偏说“请”，联系到封建社会人们去庙上请愿的事，真叫人啼笑皆非，既是唯心主义的；又散发着封建迷信的味儿，这难道都是共产党人所能提倡的吗？还有，现在风行全国的在12月26日吃寿桃，搞祝寿，不是公然违背了延安整风的决议吗？

八、现在到处都在搞万岁宫，大塑像、大像章，用掉了多少亿的财富和原料，难怪群众中流传着还我飞机，还我工厂的呼声，这从根本上是违背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历来主张的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这一宗旨的，拿这些财富多建设一些工厂、学校，那该有多好啊！我们认为只有这样才符合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本意。更有甚者，在广大农村，农民每天劳动所得可怜只有几角钱，却村村有宝堂，家家有宝书台，人人有宝书，而不问是否有文化，使农民每天一角钱的油盐酱醋都成了问题，这样做的效果实在堪虑！综上所述，纵观中国历史，风侈、政繁、大兴土木、劳民伤财、有虚无实，内部纷争蜂起，难道不是国家将要衰亡的象征吗？

九、林彪最近提出了关于革命接班人的三条标准为“高举不高举，干劲大不大，看大节，偷鸡摸狗是小节”。直接和伟大领袖毛主席提出的“五条”唱反调，实际上是强调对他林彪紧跟不紧跟，所谓大节论，实在是为了结党营私的需要，看看邱会作的例子不就不言自明了吗？

十、贺龙同志在创建红色根据地时就对党忠心耿耿，在艰难困苦中，蒋介石出高位、重金而不被收买，何等高尚的革命气节，可贺龙元帅从延安起就转向搞体育，建国后不抓军权了。成为周总理的得力助手，是他向伟大领袖毛主席推荐了徐寅生的讲话，在全党全国人民中推广了唯物辩证法，何以忽然成为“不看书、不读报、什么学问也没有的大军阀、大党阀、大野心家”了呢？不主持军委工作，仅靠少数体育运动员何以搞“兵变”，联系到最近西安钟楼的“反革命事件”，竟把全国人民人人皆知的敬爱的朱德总司令也说成是大军阀、大野心家，那么多元老、元帅忽然都成了大军阀、大野心家，此理不通！林彪等人究竟在干什么？！相反邱

会作却成了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难道不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吗！还有，我们在对领导人的评价上是违背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还不如联共（布）党史，（如对普列汉诺夫的评价），比如对刘少奇的评价，似乎从娘胎里一出来就是封建脑瓜，自参加革命以来没做一件好事，光干出卖的事，投降的事和坏事，却为什么能当上国家主席？能说得通吗？那么多的叛徒出现，岂不是否定了延安整风吗？

十一、现在到处都在喊“林副统帅永远健康”！永远健康和万寿无疆本质上有什么两样，用封建的正统观点来看，可以说是欺君罔上，这意味着什么？

十二、伟大领袖毛主席最近在杨成武事件中指出了“大树特树”的实质是“名曰树别人，实则树自己”，真是一语切中要害，但是叶群在军委一次讲话中却一口气讲了林副统帅一贯注意四个大树特树，道破了天机！叶群是林彪夫人，又是林办主任，讲的肯定是真话，叶群总不致于去陷害林彪吧，那么林彪的野心不是昭然若揭了吗？

十三、林彪在5.18讲话中一口气讲了古今中外的几十个政变经，我们怀疑是“此地无银三百两”！

十四、我们认为林彪委托江青搞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是他们正式勾结、相互利用的开始。这次会使江青走上了政治舞台，而林彪则利用江青为伟大领袖毛主席夫人的特殊地位和影响去达到他自己的目的。

十五、江青、张春桥等在上海大搞群众专政，并发表群众专政好的社论，进而砸烂公检法，对全国影响很大，我们认为这是在搞无政府主义，在群众专政口号下，可以随心所欲整人，无法无天。

十六、江青在接见河南“二·七”公社代表时，肯定和

提倡“文攻武卫”，一时间全国的武斗风盛行，且都打着“文攻武卫”的旗号去打人，在全国，动用枪炮子弹的残酷武斗，无形中被合法化了，难道这一切江青不知道？作为中央文革的主要成员，全国耳目众多，肯定知道（参见江青接见新华社代表时的讲话）。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共产党人是主观愿望和客观效果的统一论者。她的话使武斗合法化，造成了全国性的大武斗，大破坏，又不及时制止，任其发展，不是挑动武斗的祸首又是什么？

现在林彪和江青打得火热，在传达杨成武事件的中央领导人讲话中，林彪对江青的“作用”大加无原则、无内容的吹捧，大喊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甚至连敬爱的周总理都要喊（周总理根本不需要向江青学习），这肯定是违心的，这种不正常的状况只能说明他们大有“挟天子以令诸侯”之势。敬爱的党中央，敬爱的毛主席，这一切不能不令我们怀疑，林彪才是党内的“定时炸弹”，且他们互相勾结，互相利用，有野心。而林彪所要搞的只能是封建王朝。毛主席啊毛主席，只要您老人家允许我们当面陈诉，即使我们错了，死而无怨！

西北工业大学 姜明亮等

一九六八年四月

简介 姜明亮（1942年2月～ ）男，安徽人，为人忠厚，性格耿直，思想求实。1958年姜明亮考入三河中学，任初一（一）班劳动委员。时值“大跃进”，打擂台他只保证小麦亩产600斤，但高中班却保证30万斤，同时由于他对“大炼钢铁”不积极，曾被插过资产阶级白旗。从9岁起，因其

母多病，弟妹幼小，家庭贫困，他就承担了生活的重压，做家务，捡煤碴，钓鱼捕虾，做临时工兼学校电工等，以维持学业。中学期间，由于其学习勤奋，成绩优良，多次被评为“三好学生”、“优秀学生”，曾于全地区组织的作文竞赛中获一等奖，1960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从高小到中学毕业的九年间他阅读了大量的中外文学名著和中国历史小说、“传记”，知识面较宽。

1964年8月，姜明亮考入西北工业大学水中兵器系，攻读水声专业，曾任六四级大班文娱委员，被列为建党对象。由于贺龙元帅向全党推荐了著名的徐寅生讲话，他开始对哲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并阅读了大量的马恩列斯和毛泽东的经典著作，以及有关的“传记”和“回忆录”。

十年浩劫开始后，他通过观察和冷静的思考，认识到林彪、江青搞的那一套根本不符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从1967年下半年至1968年初，他与他的三位同窗好友闻福众、吴小林、胡清亮运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对林彪、江青一伙进行系统的批判，从痛苦和彷徨中觉醒。他写了长达万言的材料，上书中央。并于1968年4月写成长达35页的批判林彪、江青的大字报贴到校园，公开揭露林彪、江青的反党阴谋。当天，姜明亮即被打成“十恶不赦的现行反革命”，惨遭毒打，倍受折磨，关进牛棚，强迫劳动。与此同时，“工宣队”通知姜明亮父母说：“姜明亮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接班人林副统帅”。家庭被迫与其断绝关系中断了生活费的供给。姜明亮每月仅以学校发的9元助学金维持生活，因为年青，加上劳动强度大，饥饿难忍，只好利用打扫食堂的机会，收集残羹剩饭充饥。一年后，其女朋友也被迫和他断绝关系，使

其在精神上进一步受到沉重打击。然而，在此困境之中，姜明亮仍未忘忧国忧民，愤然写下：“身陷牢笼不可悲，忧国忧民壮心随；但悲国运衰落时，举国假话满天飞”的诗句。

1970年秋，姜明亮背着沉重的政治包袱，下放到安徽省蒙城县广播站当工人，当时蒙城县所在的阜阳地区号称安徽的“西伯利亚”，而蒙城历史上以贫穷落后出名。面对艰苦的环境和专业不对口的工作，姜明亮没有因此而消沉。他十二年如一日埋头苦干，自强不息，为蒙城的广播事业做出了贡献，蒙城县广播站成为全地区、全省的先进单位，他也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1973年被吸收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随着“林彪反党集团”和“四人帮”的垮台，西北工大于1972年和1977年两次为其平反。多年政治上、思想上、工作上的压力没有改变姜明亮的读书爱好，他研读了大量的专业书籍和自然科学书籍，他对无线电技术精益求精，成为县城内小有名气的技术权威，1981年秋他被提任为蒙城县广播局业务股长，评定为助理工程师。

1981年12月在中共蒙城县第四届党代会上，姜明亮作为一名普通党员于会外当选为中共蒙城县委常委、县委常委。1982年3月调任县工业局副局长，7月调任县化肥厂党总支书记，经过一年的艰苦努力，使这个建厂以来连续十年亏损，累计亏损额达1000多万元的全地区著名的“老大难”企业，一举扭亏为盈。

1983年11月，年仅41岁的姜明亮出任蒙城县委副书记、代理县长，并于1984年4月蒙城县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上正式当选为县长。姜明亮走上领导岗位后，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锐意改革，大胆创新，开拓前进，他的诗“莫畏人言乱纷纷，莫道责任重千斤，鞠躬尽瘁干四化，天下谁人不识

君”成为他工作的生动写照。经过努力，原来因讨米要饭者众而与凤阳齐名的蒙城县发生巨变，1984年蒙城县的整个经济工作在全地区夺魁，从而打开了新局面，他于1985年初受到地委表彰，地委书记陈复东亲自为姜明亮披红挂彩，表示祝贺。由于姜明亮在畜牧业上的贡献，1986年受到农牧渔业部国家畜牧局的表彰。几年来，蒙城的经济发生了巨大变化，1987年蒙城县工农业总产值达67362万元，比1980年翻了两番多；财政收入达3214.4万元，比1980年翻两番，增长率位全省第二；农民人均收入456元，比1980年增长7.6倍，县内80%的农户盖了新瓦房，户均3.6间。蒙城县粮食连年丰收，被定为全国小麦商品粮基地县，优质棉和低芥酸油菜的生产基地县；牛猪羊生产水平超过全国、全省平均水平，被国家和省定为肉牛生产、山羊板皮和瘦肉型猪基地县。蒙城的工业、农业、畜牧业、乡镇企业、物资、商贸流通、财政、城市建设等分别成为阜阳地区、安徽省的先进单位，受到省委、省政府的重视，姜明亮被省新闻界誉为“明星县长”。

姜明亮在工作中敢于顶官僚主义，敢于保护人才，保护农民利益，坚决支持改革者、企业家，不怕来自上面的和传统观念的压力，被文艺界称为蒙城的“李向南”。1984年春，农田林网化的热潮在阜阳地区掀起，一时树苗奇缺，有些县为落实上级指标，从群众中筹资二三百万元到外地买苗。姜明亮根据实际情况，指出外地苗不适应当地土壤气候，成活率低，劳民伤财。在常委会上提出：“不图形式，不抢先进，今年育苗，明年赶上”的意见，表示宁可自己受处分，不给群众造损失。全县1984年育乡土树苗2.5万亩，1985年即解决了全县植树用苗，群众又向外地出售树苗收入

三百多万元。1986年三秋季节，农民急需化肥，在县化肥厂门前排队多日却很难买到，可有些人拿着各种“批条”把大量的化肥运走，农民又焦急又气愤。姜明亮得知这一情况后，不顾来自各方面的压力，挺身而出，亮出大名，在化肥厂门前贴出“县长的告示”：不管任何单位或领导批化肥的条子概不供货，农户凭粮食交售卡定量供应……。告示贴出后，老条无效，再无新条，许多农民买到了化肥，无不称颂县长为民着想。《农民日报》在头版头条上称赞：蒙城县县长姜明亮，打掉“小纸条”的威风。

姜明亮在几年的工作实践中，注重学习理论，并结合实际，撰写了《发展县级经济要注重决策》、《利用资源优势，发展系列加工业》、《兴办地方工业，发展县级经济》、《努力搞好横向联合，大力振兴蒙城经济》、《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促进农村经济的全面发展》、《从实际出发，为群众办实事》等几十万字的文章，部分发表在省级刊物上。1985年姜明亮参加了全国农业系统工程第七期培训班，组织蒙城县60多名科技人员，在深入调整研究的基础上，运用系统工程理论、方法和生态农业的原理，对种植业、养殖业、林业、工副业、商贸、科教等系统进行科学分析和综合论证，制定出全县社会经济发展的近、中、远期总体规划。此举受到著名农业专家沈亨理、杨挺秀等人的肯定和赞扬。1986年姜明亮曾被邀去四川省办的第一期农业系统工程培训班上介绍经验。

1986年11月姜明亮被任命为中共蒙城县委书记，并于1987年12月中共蒙城县第六届党代会上当选。上任伊始，他成功地发动和领导了全县的反对红白喜事大操大办活动，向愚昧落后的封建习俗作斗争，在全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刘振武的两封上书

中国人民解放军

玉林军分区政治部、司令部：

由中国人民的优良儿子所组成的“中国人民保党反派委员会”在党的重要领导同志主持之下，最近在两广边境地区的秘密地点，举行了第一次会议，会议已经通过“宣言”和“对当前全国各地两派争端的意见”等两个极为重要的文件。由于我们的条件特别困难，现在把这两个文件寄给你们。请求你们协助立即刊印和散发到全国各地去，送到一切有战争，有争论的地方的两派群众手里去，以便于正确地解决两派争端，找到共同的语言。

由于这两个文件，对解决两派争端，具有巨大的指导意义，你们在刊印的时候，务请由主要领导同志亲自检查校对，不要有任何只字标点符号的差错，以免给我们的事业，带来不应有的损失。

会议还在继续举行，将要通过的有“论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的团结”等三个极为重要的文件，以及会议的新闻公报等。这些文件，都需你们协助刊印散发，通过以后，将陆续寄给你们，请做一些必要的物质准备。

在新闻公报上，我们将公开我们的组织，及其主要的组织成员，以便同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一道，为克服我党当前

所面临的严重困难，作出自己的贡献。此致

革命敬礼

中国人民保党反派委员会

1968.7.21.

中国人民保党反“派”委员会

第一号文件

宣 言

当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遇到了空前未有的困难的严重的关键时刻，由中国人民的优秀儿子所组成的“中国人民保党反派委员会”，胜利诞生了。这个委员会的任务，就是要同我们伟大的党，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伟大的七亿中国人民一道，为克服我党当前面临的严重困难；为挽救我们党所领导的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不被彻底破坏；为挽救祖国人民免除分裂、内战的疾苦；而开展伟大的保党反“派”的正义斗争。并争取这个斗争，取得最后的完全的胜利，以实现祖国的重新统一与团结和平。

(一)

我们所需要保的党，就是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三座大山，打倒了反动的蒋介石王朝，取得了中国革命胜利，接着又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国共产党。

我们所需要保的党，就是1956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第八届中央委员会，这届中央委员会，集中了中国无产阶级的最优秀的儿子，他们是我们党的，七亿中国人民的最宝贵的共同财富，他们是在人民群众中享有崇高威望的，最能联系群众的，最能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最富于领导才能和指挥才能的，最有经验的天才的领导集团。只有这样一个领导集团，才能对全党、全军、全国人民进行完全正确的领导。

但是，使我们万分沉痛的是，这样一个优秀的领导集团，近两三年来，受到了空前未有的大破坏。以这个集团为主体的党的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的全部权力被窃据，因而，使我党、我军、我国人民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失去了完全正确的领导。使我们的党完全瘫痪，完全瓦解，完全失去了战斗能力和领导能力。使我们的国家处于群龙无首的，全国性的无组织无纪律的，空前未有的无政府状态。我们的刚刚从经济困难中恢复起来的，整个国民经济建设事业，又一次遭到了空前未有的大破坏。使我国又一次面临从来未有的严重困难。所以，保证恢复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对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实行正确领导的全部权力，是摆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面前的，最迫切的头等重要的政治任务。不是这样，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就将丧失了社会主义的前途，伟大的七亿中国人民就将失去了一切。如果，不是从这个角度上来看问题，那我们就要犯极大的错误，而变成历史的不可饶恕的罪人。

(二)

我们所需要坚决反对的“派”，是什么东西呢？就是挟

持领袖，从正确的党的八届中央分裂出去的，彻底地破坏了党的“个人服从组织”和“少数服从多数”的钢铁纪律的，自搞小组织，自封“党中央”的，由极少数的几个人组成的“派”，及其自封的“派”性中央。

这个“派”性中央，已经篡夺了党，篡夺了军队，篡夺了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这个“派”性中央，已经推翻了正确的党的八届中央的正确领导，全部地篡夺了她的职权。并且利用八届中央在人民群众中所享有的崇高威望，骑在八届中央的头上，发号施令，作威作福，不可一世。

这个“派”性中央，近几年来，一直以个人的恩怨为标准，系统推行了一条“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亦即“反对我的，就是反革命”的，“任人唯亲”的张国焘式的派别路线，彻底地摧毁了我党的干部路线和组织路线，肆无忌惮地，根本推翻了党纲党章的具体规定，打击了许许多多的，党的、国家的、军队的、企业事业单位的极为重要的领导同志。空前未有地糟蹋了作为我们的党、国家和军队所赖以生存、赖以发展、赖以建设的领导队伍和干部队伍，使我们的党和国家变成了一条软骨蛇。

这个“派”性中央，专门生产政治帽子，诸如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中国赫鲁晓夫、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反革命黑线、黑帮……等等，辱己辱人的产品，全力推销。但是，却从未过问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从不关心整个国计民生，从不体贴人民群众的生活疾苦。

这个“派”性中央，根据自己复辟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需要，破费国家的无可计数的巨大财富，巧立各种名堂，从社会上搜罗一些不明真象的人，蒙蔽和欺骗他们去支持他

们自己。凡是上了大当，盲目支持他们的派别路线和派别政策的人，就一律被封为所谓“造反”派；凡是不支持他们的错误政策的人，都一律被贬为什么“保守”派，甚至是“反革命”。系统地实行了支一派、压一派的派性政策。公开策动政变性的遍及全国各地的大内战和大分裂。

这个“派”性中央，亲手把枪枝、弹药以及“打倒”、“推翻”、“消灭”、“砸烂公检法”等等完全是对敌才能使用的武器，散发给上了他们的大当，受了他们蒙蔽的人。这样，就导致了全国性的，从来未有的大破坏、大屠杀、大流血、大混战。所谓挑起武斗的黑手、黑后台、黑指挥等等，恰恰正是这个“派”性中央。这个“派”性中央，已经完全毒化了我们党的团结、军队的团结、干部的团结、人民群众的团结和军民之间的团结。已经把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引进了分裂内战、经济萧条、人民苦难的死胡同。

(三)

这个“派”性中央，很狡猾、很阴险、很毒辣。它通过各种乔装，披着各种画皮，偷偷地躲在我们的敬爱的领袖身边。我们万分沉痛地看到，直至现在，我们的领袖，都还没有发现这个“派”性中央的原形和本质。直至现在都还没有知道，这个“派”性中央给我们的党、我们的军队、我们的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整个工农业生产，所造成的建国以来，从来未有的大破坏和从来未有的大损失。

这个“派”性中央，挟持领袖，使用“愚君害主”的种种阴谋手段，贩运复辟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私货，明目张胆地公开发售。几年以来，这个“派”性中央，所说的，所

做的，无不充满着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色彩。

这个“派”性中央，有一条要人们尽忠的所谓“革命路线”，这条“革命路线”，到底是什么样的货色呢？这就是“反对我的，就是反革命；打倒你的，就是革命”。这条“革命路线”，是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提出，到1966年的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才完善化系统化的。这条路线的实质，就是张国焘式的“任人唯亲”的派别路线。提出这条路线的人，从根本上推翻了无产阶级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马列主义的革命原理；以资产阶级的个人独裁的灵魂，偷换了无产阶级政党的民主集中制。因此，它是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原则的，是反对社会主义的根本的政治制度的。这个“派”性中央，亲手把这条反马列主义的所谓“革命路线”，传给上了他们的大当，盲目支持他们的“造反”派，并且要这个“派”身体力行。而被贬为“保守”派的人，则为了保卫自己的需要，也从“派”性中央手里，夺过这条所谓“革命路线”，从而就形成了全国性的两派的对立。你要吃掉我，我也要吃掉你，形势十分尖锐。由此，即产生了遍及整个祖国国土的流血内战，“派”性中央，号召人们忠于这样的“革命路线”，实质上就是号召人们忠于流血、忠于死亡、忠于内战，同忠于祖国和无产阶级的最后分裂，“其用心何其毒也”。

这个“派”性中央，有一套“四个伟大”的圣人论。这一套“四个伟大”的圣人论，如果不是封建社会的“愚君害主”的黑手理论，就是资产阶级的反动的唯心论，都是反对马列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最伟大的马列主义大师，全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从来都没有说过，世界上会有“完整无缺，始终如一”的圣人。1958年以后，几年的经济困难，最近两三年来，国家一系列重大问题，没有得到

任何正确的解决，这就更加证明“四个伟大”的圣人论，没有任何客观的依据。提出“四个伟大”的圣人论的人，无非是要在世界上，模拟出一个“完整无缺，始终如一”的圣人，强迫人们去盲目崇拜，以掩盖自己的篡党、篡国、篡军、实行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复辟的罪恶事实。“其用心又何其毒也”。

这个“派”性中央，利用曾经有过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正确思想作掩护。系统地实行“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的，也就是封建主义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愚兵的反动哲学；这个“派”性中央，也象无产阶级的大叛徒张国焘一样，利用人民群众不知道无产阶级政党的，“个人必须服从组织”和“少数必须服从多数”的钢铁纪律的弱点，系统地实行“做个人好战士”、“个人高于一切”和“个人决定一切”的，也就是资产阶级的私国、私党、私军的窃国政策；系统地实行“三忠于个人”的封建主义的役党、役国、役军、役民的奴化政策；为了配合上述政策的需要，又系统地实行一本书、一出戏、一首歌的文化教育政策。所有这一切，作为无产阶级的革命家，如果不是背叛无产阶级，复辟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话，那是绝对不会这样干的。人们应该好好想一想，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怎么会去推翻无产阶级的“党高于一切”的最根本的党性原则呢？怎么会去推翻无产阶级政党的“个人服从组织”和“少数服从多数”的钢铁纪律呢？怎么会去推翻民主集中制，这个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原则和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呢？怎么会去推翻无产阶级的“党委领导一切”、“党委集体领导制”和“集体领袖制”呢？可见，实行一系列的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愚民愚

兵政策、奴化政策、窃国政策的“派”性中央，其复辟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野心，已经昭然若揭了。

(四)

这个“派”性中央，以宏篇大论，咒骂“修养”背叛无产阶级专政。可是，就是这个“派”性中央，公开号召砸烂作为无产阶级专政工具的公安政法部门。并且公开说：“公检法一垮台，我就高兴。”，同志们应该想一想，这些话，如果不是对无产阶级专政怀有刻骨仇恨的人，究竟怎么能够说得出口呢？

这个“派”性中央，有一个特别的性格，这就是昨天还称这个同志是“亲密的战友”，后天则突然宣布这个同志为“反革命修正主义”；昨天亲手提拔起来的干部，今天则突然下令撤职，一脚踢开。对这种神昏颠倒的行为，我们一言以蔽之，曰：反复无常，法无定见。

这个“派”性中央，还有一个性格，就是发动大串连的是他，下令禁止串连的也是他；叫喊“两个阶级大搏斗”的是他，说“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的也是他；大喊“支持左派”的是他，下令“不支派”的也是他。对这种特殊性格，我们又一言以蔽之，曰：朝令夕改，早话晚忘。

这个“派”性中央，大喊立新功的是他，天天卖旧货的也是他；带头在党的八届中央搞分裂的是他，大喊两派实现大联合的也是他；从根本上拒绝了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是他，大教别人要“各自多做自我批评”的也是他。对于这种奇怪的言行，我们称之为：言行不一，文过饰非。

这个“派”性中央的感情很反常。当1957年，我们的社

会主义经济刚刚建立基础的时候，他又要“跃进”了。当出现了三年的严重的经济困难，水肿病人成堆的时候，他却高呼“胜利”了。当我们全党、全民举国上下，一致努力，克服了经济困难，刚刚过得日子的时候，他却又发怒了，又要“革命”了，当整个城乡的生产，受到空前的破坏的时候，他却又欢呼“永远健康”了。甚至在连布票都发不出去的严重情况下，他竟闭着眼说：损失“最小最小最小”，同志们应该想一想，当这种情况发展到“最大最大最大”的时候，那么，七亿中国人民还会有半条裤子么？

请问：一个“派”性中央，本来就实行着派别路线，贯彻着派性政策；本来就专门靠撒播仇恨种子为职业，那么，怎么能够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正确地解决遍及全国各地的两派争端，从而实现真正的两派革命的大联合呢？

请问：一个“派”性中央，本来就是目无党纪国法的，破坏党纲党章，破坏国家宪法的，一个无组织无纪律的“派”，那么，怎么能够有效地克服遍及全国各地的，无组织无纪律的无政府状态呢？怎么会能够领导出一个有组织、有纪律、有民主、有自由的社会主义的中国社会呢？

请问：一个“派”性中央，本来就是靠“永远健康”过日子。专门贩卖政治帽子为职业，那么，怎么会晓得人民群众是靠穿衣吃饭过日子，从而过问社会主义工农业生产，过问国民生计，关心人民疾苦呢？

请问：一个“派”性中央，本来就是反复无常、法无定见的人；本来就是朝令夕改，早话晚忘的人；本来就是言行不一，文过饰非的人；本来就是“把一切功劳归于自己，把一切错误归于别人；把一切成功归于自己，把一切失败归于别人。”的，实行私党、私国政策的最自私、最自利的人，

那么，依靠这样的人，怎么能在七亿人民的思想中，树立起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大公无私的思想呢？怎么能统一七亿人民的意志，并且给他们指出正确的前进方向呢？

请问：一个“派”性中央，已经打击了许许多多的领导干部，已经把我们党的领导队伍和干部队伍糟踏得不成样子，并且把许许多多的人，打成“保守”派，那么，依靠这样一个“派”性中央，怎么能团结干部的绝大多数，并且通过他们去团结全国人民，以建设我们的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呢？

请问：一个“派”性中央。本来就是靠卖旧货、论前功过日子，并且早已被“伟大前功”的沉重包袱，压得连气都透不过来，那么，这样一个“派”性中央，怎么会有半点力量，领导七亿中国人民，去开辟新的前途，创造新的业绩，建立新的功勋呢？

请问：在一个“派”性中央面前，在我们的党里、政府里、军队里、文化教育卫生部门里，已经混进了那么多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已经混进了那么多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已经混进了那么多的反革命黑帮、黑线；已经混进了那么多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了那么多的叛徒、特务、土匪绿林；那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土地上，怎么会出现一个，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完整无缺的圣人呢？

(五)

受了“派”性中央的圣人论的蒙蔽和欺骗的青年人，出于对党的“个人服从组织”和“少数服从多数”的钢铁纪律的无知，出于对党中央的爱戴和拥护的善良愿望，听说要保卫党中央就一哄而起，一拥而上。这种精神，本来是可嘉

的。但是，这种可贵的革命精神，却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来保了从党的八届中央分裂出来的一个“派”，并且错误地保了这个“派”篡党、篡国、篡军的“贼脏”。同志们，应该想一想，难道八届中央的绝对多数的成员，会起来反对党中央，从而自己反对自己么？头脑简单，缺乏政治生活经验的青年人，显然你们已经上了大当啦！

这个“派”性中央，自吹开辟了什么“革命航道”，号召青年人要跟着游上去。这到底是那么一回事呢？原来这一条所谓“革命航道”，早已被一排又一排，一列又一列，一层又一层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中国赫鲁晓夫、反革命黑帮、黑线、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大大小小的和不大不小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牛鬼蛇神、叛徒、土匪……等等，严严实实地、密密麻麻地、结结当地把这条所谓“革命航道”堵死了。你们永远永远都不可能游得过去，爬得过去，跟得上去了。人家在这条“革命航道”上游了几十年，跟了一辈子，到头来还落得是一个“反革命黑帮”、“反革命修正主义”……，难道你们在几十年以后的今天，才迟迟跟上，会运气好一些，而能够捞到半点油水么？还是鲁迅先生说得对，“问什么荆棘塞途的老路，寻什么乌烟瘴气的鸟导师？”鲁迅先生反说，“路本来是没有的，人行多了便成了路”。上了大当的青年人，还是回过头来吧！自己走自己的路，可能会稳当些，安心地多读些书，可能会得益多些。

我们诚恳地劝告那些盲目地跟在“派”性中央身边的，唯唯诺诺，唯命是从的那些人，在一系列严酷的事实面前，你们到底有什么理由，敢保证自己不是“黑帮、黑线、黑后台”呢？你们到底有什么理由，敢保证自己不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呢？你们到底有什么理由，敢不提防“背后一刀”

呢？你们到底有什么理由，敢不怕同那些以前功饰后过的，完全脱离了群众的人一起，终归被人民群众所唾弃，而被送进历史的垃圾堆呢？

近十年来，我们从这个“派”性中央手里，除了得到破坏、贫困、仇恨、分裂、内战之外，别的东西，则一样也没有得到。从党的利益出发，从无产阶级及其所领导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利益出发，从七亿中国人民的切身利益出发，我们联合起来，团结起来，彻底地清算这个“派”性中央的严重错误，已经是逼在眉睫的严重时刻了。否则，我们大家都将成为对党、对无产阶级、对祖国不忠的历史罪人。

当前，帮助党的八届中央，克服“派”性中央的分裂破坏活动，促进八届中央的全体成员，在党的、无产阶级的、祖国的、社会主义的、伟大的七亿人民的共同利益面前，重新实现大团结；坚决地、全力以赴地、把被人们“打倒”了，“推翻”了，“砸烂”了党的第八届中央委员会，重新扶起来，并坚决地支持她实现其对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正确领导，这就是全中国人民的头等重要的政治任务，也是全中国人民的共同希望和共同前途。

（六）

我们郑重地向全党、全军、全中国人民严正宣告：

一、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人民的国家；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部队和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人民的子弟兵部队；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无产阶级和七亿中国人民的共同的事业。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土地上，如果有人把我们的国家和军队当成某一个人的私有财产；把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当成

某一个人复辟封建主义的御用工具；把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当成某一个人的私人事业，那是绝对不能容许的，是绝对通不过的，是完全枉费心机的，是绝对徒劳的。

二、我们不承认任何个人，有权篡夺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最高权力，任意“打倒”和“推翻”由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任何一个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

我们不承认任何个人，有权篡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最高权力，任意“打倒”和“推翻”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和任命的任何一个国家领导人。

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土地上的任何一个共产党员，都必须在党纲党章的制约之下活动。如果，有人破坏党的“个人服从组织”和“少数服从多数”的钢铁纪律，自搞小组织，自封“党中央”，这就叫做反党。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必须立即对这种反党案件，进行检查。并且向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提出报告。由大会作出相应的结论。我们希望中共中央监委，绝对不要无视我们的意见。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土地上的任何一个公民，都必须遵守国家宪法。如果，有人篡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最高权力，任意推翻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和任命的国家领导人，这就叫做篡国政变。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就必须立即对这种篡国政变案件进行检察，并且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报告。由大会作出相应的结论。我们希望最高人民检察院，绝对不要无视我们的意见。

四、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保卫党的最高权力机关的部队；是保卫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部队；是保卫社会主义建设不被破坏的部队；是保卫祖国国防不被侵犯的部队。因此，中国人民解放军是党的军队、国家的军队、人民的军队。我

们绝对不能承认，吃人民的饭，穿人民的衣，拿人民的钱的人民子弟兵，被骗去充当什么“个人的好战士”。

因此，我们坚决要求，中国人民解放军必须立即把保卫党的最高权力机关——党的八届中央委员会的权力不被篡夺的责任担负起来，并保证每一个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能够顺利地行使党所赋予他的神圣职权。

我们坚决要求，中国人民解放军必须立即把保卫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的权力不被篡夺的责任担负起来，并保证每一个国家领导人，能够顺利地行使全国人民所赋予他的神圣职权。

如果，中国人民解放军，竟然置党的利益、国家的利益、人民的利益、社会主义建设的利益於不顾，竟然放弃自己保卫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的神圣天职，把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变成别人篡党、篡国，实行封建主义复辟政变的御用工具，而继续去充当什么“个人的好战士”，那末，其主要军事领导人，必须承担叛党、叛国的罪责，并接受军事法庭的审判。我们希望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总参谋部、北京市卫戍区司令部，都绝对不要无视我们的意见。

五、中国人民保党反“派”委员会，坚定不移地相信，以自己无限忠于党、无限忠于伟大的无产阶级及其所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无限忠于祖国人民的模范行动，能够有足够的力量，同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一道，果敢、坚定地去纠正任何伟大人物的错误。正如我们党的历史上，多次纠正领导的错误一样。现在，如果还有人怀疑这一点，那就只能证明他没有半点的政治远见。

六、我们真诚地、赤胆忠肝地衷心希望那些犯了严重错误的同志，能够以党的利益为重，能够以人民的利益为重，能

够以祖国及其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利益为重，从完全错误的道路上回过头来。我们感到你们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太远了。我们感到你们在张国焘的旧路上走得太远了。

这些犯了错误的同志，在几十年来，对缔造我们伟大的党、缔造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缔造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缔造中国革命的伟大的成果，都作出了极为杰出的贡献。对中国人民立下了伟大的功劳，对革命前辈著下的丰功伟绩，我们总是当做最珍贵的财富，来备加爱护的。我们正是从保卫这些同志的光荣的、伟大的革命历史出发，才去批评同志的错误的。我们希望通过批评错误的事，去教育犯了错误的人，从而使这些同志认识错误，改正错误。显然我们是对事不对人的。

我们充分意识到，帮助自己的同志认识错误，改正错误，是自己对党、对同志尽忠的表现。而犯了错误的同志，能够认识，能够改正，则是我们全党的幸运，全中国人民的幸运，也是改正了错误的同志的最大的光荣。因此，我们衷心希望犯了错误的同志，能够放弃一切个人的恩怨成见，认真珍重一切改正错误的良好时机。

七、“造反”派组织和“保守”派组织，都是“派”性中央手里的各有用处的两件工具，都是为“派”性中央的“两个阶级大搏斗”的错误理论服务的。因此，参加两个派别组织的人，都是受蒙蔽的，上了大当的。所以，各地驻军、人民武装部门、公安政法机关，都必须切实负起自己的责任，认真采取一切有效的措施，保障一切受蒙蔽、受欺骗而上了大当的革命知识分子、革命青年学生、革命教职员工、革命干部（包括领导干部）、革命工农群众的人身安全。切实帮助受蒙蔽、受欺骗的同志，提高政治思想觉悟，

鼓励他们反戈一击，起义归队，是我们的党、我们的军队、人民群众和整个无产阶级队伍，重新实现真正的革命大团结的根本利益所在。而保障他们的人身安全，又是唯一正确的政治措施。因此，绝对不能有任何对受蒙蔽、受欺骗的人，实行打击报复，伤害人身安全的错误事件发生。各地驻军、人民武装部门、公安政法机关，都要切实保障每一个公民，能够顺利度过由于“派”性中央的错误政策，而造成的暂时困难。并率领他们团结一致地、参加到伟大的保党反“派”的正义斗争的队伍中来。

同志们：联合起来，团结起来吧！

光荣的、伟大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一九六八年七月十五日通过

中国人民保党反“派”委员会

第二号文件

对当前全国各地两派争端的意见

现在全国各地的两派争端，都没有得到正确的解决。互相仇恨的情绪，还很严重。有的地方，流血内战正在激烈地进行；有的地方，正在酝酿着更大规模的流血战争。对这种破坏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破坏城乡工农业生产，给人民群众带来无穷无尽的苦难的流血大内战，我们全党、全军、七亿中国人民，都感到无比的关切。停止内战，恢复和平，已经成为全国人民的最迫切的共同要求。我们认为，站在无

产阶级的即党的立场上，采取正确的方针，通过两派协商，妥善地解决两派争端；争取整个无产阶级队伍，重新实现真正的大团结；争取整个祖国国土，重新实现真正的和平，是我国人民当前面临的最严重最迫切的政治任务。

我们认为，两派都是错误的。但是，他们的错误性质又是有原则性的区别的。具体说来，“造反”派的错误是严重的。但他们又是受蒙蔽的。受蒙蔽是无罪的。“保守”派是有错误的，但又恰恰是我们所需要坚决地加以保护的。

(一)

为什么说，两派都是错误的呢？

一、两派都在错误的立场上，帮助“派”性中央，推翻了全国人民所衷心拥护的党的第八届中央委员会；推翻了无产阶级政党的最根本的组织原则——民主集中制。帮助了“派”性中央，篡夺了党的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为“派”性中央，复辟封建主义的“君主治国”的制度，鸣锣开道，使我国人民丧失了一个完全正确的领导核心——党的第八届中央委员会。

二、两派的斗争大方向都是错误的。两派都错误地把“派”性中央，根据他们分裂党的八届中央的需要所制定的，“反对我的，就是反革命；打倒你的，就是革命”的派性路线，当作是什么“革命路线”来贯彻实行。结果，两派都把自己当成是唯一的革命者，都要把同自己对立的一派打成“反革命”。从而导致了全国性的大分裂、大流血、大内战。使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遭到了空前未有的大破坏。如果，我们把“派”性中央比做一块大石头的话，两派都

是被压在这块石头底下的两条大黄瓜。不过一条被压在上面，一条被压在底下。在上面的一条，既感到石压瓜，又感到下面的瓜顶瓜，其所受的压力就特别重。在下面的一条瓜，没有直接感到石头的压力，仅仅感到瓜的压力，因而，反抗也就特别强烈。正是因为这样，就出现了瓜压瓜，瓜顶瓜的矛盾和争端。这就是两派争端的性质。这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群众斗群众，学生斗学生。如果不揭开“派”性中央的错误路线，不把“派”性中央这块大石头搬开，那就势必两瓜都将压扁在这块大石头的底下，谁也战胜不了谁。这一简单的道理，可惜至今两派都还不知道。

三、两派都使用了民兵枪枝，都破费了国家的大量财富，只不过是有多少的不同而已。两派都没有坚决地把党的利益、人民的利益、社会主义的利益，置于一切派别的利益之上。两派都没有把党的团结，军队的团结，人民群众的团结，当做我国人民的最高利益来看待。

此外，当然还有别的错误，我们就不一一列举了。

(二)

为什么说，“造反”派的错误是严重的呢？

受“派”性中央的直接支持，帮助从党的八届中央分裂出来的一个“派”性中央，实行封建主义的“君主治国”的制度，推翻了无产阶级政党的最根本的组织原则——民主集中制，并篡夺了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帮助了“派”性中央，以资产阶级的“个人高于一切”的武器，推翻了无产阶级的“党高于一切”的最根本的党性原则；帮助“派”性中央，以资产阶级的“个人领导一切”的武器，推翻了无产阶

级的“党委领导一切”的根本制度；帮助“派”性中央，以资产阶级的“个人决定一切”的武器，推翻了无产阶级的“个人服从组织”和“少数服从多数”的钢铁纪律；帮助“派”性中央，推行国民党的“以我代党，一个领袖”的那一套，推翻了无产阶级的党委集体领导制和集体领袖制；运用“派”性中央散发下来的“砸烂公检法”的武器，冲击和削弱作为无产阶级专政工具的公安司法部门；帮助“派”性中央，在“做个人好战士”的幌子下，以资产阶级的“枪指挥党”的制度，推翻了无产阶级的“党指挥枪”的制度，并且取代了各级党委的权力和地位。总之，帮助“派”性中央，以革命之名，行复辟封建主义之实。所有这一切，怎么能算不错呢？不仅是错，而且就其性质来说，是十分严重的。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社会内部这样做，只能被认为是复辟封建主义的政变暴乱。但是，这种暴乱，是“派”性中央挟持领袖，公开发动的。因而，直至今天，都还没有人认真研究其性质，还有更多的人，只是敢怒而不敢言罢了。

“造反”派的错误，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错误，是联系在一起。他们的错误根源也只有一个。这就都是受了“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要执行”的，封建主义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哲学的毒害而引起的；都是受了“做个人好战士”和“三忠于个人”的封建主义的役党、役国、役兵、役民的奴化政策的欺骗而造成的。因此，他们是受蒙蔽的。受蒙蔽是无罪的。

所有受蒙蔽的人，大多数都是我们无产阶级队伍的人，他们都是我党、我军和人民群众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建设社会主义的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他们当中的年轻人还是我们

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因此，我们对待受了蒙蔽的人，绝对不能采取镇压的措施和仇恨的态度。因为，当他们发现自己受了蒙蔽、上了大当的时候，他们是会痛苦的。在我们的百般热情的鼓舞和帮助之下，相信他们是会觉悟过来的。因此，如果我们不愿意从反面来帮助“派”性中央，加强其在群众中的阵地，认真珍重无产阶级队伍的重新团结的话，采取正确的政治措施，欢迎受了蒙蔽的同志，回到无产阶级的队伍中来，是完全必要的。

受了蒙蔽的同志，当他们发现自己头上的“党中央”，只不过是八届中央的正确多数中，分裂出来的一个“派”的时候，在大批党的、国家的、军队的优秀领导干部被撤职、被推翻；大批解放军指战员倒在内战战场的血泊里；青年学生应该分配工作的，分配不出去，应该升学的，无学可升；国家破坏，内战不息，人民困难等等严重的事实面前，相信他们会发现受损失的，恰恰正是他们自己。受损失的正是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人民群众和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在铁案如山的事实面前，相信他们是会把受损失的总的根源检查出来的。因而，他们就有可能会很快出现一个政治思想上的大觉悟、大进步、大提高的飞跃过程。如果，我们不预见到这一点，就不是有远见的革命者。

(三)

至于被“派”性中央贬为“保守”派的，为什么恰恰是我们所需要坚决加以保护的？

因为，他们往往是我们的各级干部的大多数，是我们党的、国家的、军队的、企业事业单位的、文化教育卫生部门

重要的领导力量。是我们党所领导的干部队伍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他们在几十年或十几年来，国家对党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都作出了自己的极为宝贵的贡献。他们为克服三年的经济困难，都尽到了自己的最大的努力。公安政法部门，他们为保卫社会主义建设顺利进行，为维护社会主义的社会治安，都作出了最杰出的贡献。他们富于领导才能和组织才能。他们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和建设过程中，同广大的人民群众，有过极为密切的联系。正是因为这样，他们是我们党的、国家的极为重要的宝贵财富。如果，我们不去认真地保护他们，那就要犯极大的错误。不难设想，目前的“造反”派，能够有力量担负得起他们的繁重的任务，能够取代得了他们的地位吗？显然是不可能的。不难想见，我们这样大的党、这样大的国家、这样多的人民、这样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离开了他们，是能够设想的吗？如果我们不打算彻底地毁灭整个国家的话，那末，正确地对待他们，则是完全必要的。

不能否认，“保守”派是有错误的，甚至某些错误还是十分严重的。但是，他们的错误，同人民解放军的错误，“造反”派的错误一样，都是由于上头的“派”性中央的错误领导，所一手造成的。因此，片面地责怪他们，无论如何，都是不正确的。

最近两三年来，由于上头的“派”性中央的错误领导，为挟持领袖，举行复辟政变制造舆论的需要，无限度地破费人民用血汗换来的大量的国家财富，去接待自己的客人。所有这些，所谓“保守”派的同志是看在眼里，想在心上的。他们对这种情况是早就心怀不满的，他们的这种正当的不满，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也是应该原谅的。

当“派”性中央为了支持自己的需要，而封出了所谓

“造反”派以后，上头的“派”性中央即通过“造反”派，把一大堆完全是敌对性的口号，诸如“打倒”、“消灭”、“推翻”、“砸烂公检法”等等，直至枪枝、弹药来对待他们。此外，“派”性中央还直接公开出面，把一块又一块的大石头，压在他们的头上。在这样严重的情况下，尽管他们对受蒙蔽的人开枪是不对的。但是，他们在敌对性的行动面前，采取敌对手段，予以还击，这在逻辑上是完全说得过去的。所以，这些错误的罪责，应由“派”性中央直接承担。如果，片面地推在“保守”派的身上，显然是不公道的，也是不应该的。

有人说，“保守”派是群众反对的，“造反”派是受群众欢迎的。我们认为，对这个问题，也应该做具体的分析。

近几年来，由于上头的“派”性中央，一直忙于搞封建主义的复辟政变，根本就无心过问国计民生、人民疾苦。这种情况，群众是不完全了解的。由于群众的生产生活上的困难，得不到合理的解决。因而，错怪下面的所谓“保守”派，这是难以避免的。加上他们自己身上存在某些缺点错误，引起群众的不满，这是可以理解的。当一旦恢复了党的八届中央的正确领导，把国计民生的重大责任担负起来，逐步地改善群众的生产生活状况，相信他们是会重新得到群众的拥护的。群众支持“造反”派，是要向他们要饭吃的。如果他们也跟“派”性中央一样，不过问国计民生，不关心人民疾苦，那末，群众也是会很快地就抛弃他们的。因此，如果我们不是科学地、有分析地而是片面地看待问题，那我们就一定要犯特大的错误。

我们这样客观地、有分析地评价“保守”派，绝对不能成为“保守”派镇压或排挤“造反”派的理由，和同中国人

民解放军闹分裂、闹对立的理由，而“保守”派、“造反”派、中国人民解放军应该互相紧密合作，团结一致地去揭发“派”性中央的一系列的严重错误，是克服我党当前所面临的严重困难，找到共同的语言。

应该指出，“保守”派有的错误，是应该立即纠正的。比如，有的地方的“保守”派，竟杀人、放火、放毒、甚至颠倒是非，嫁罪于人等等，都有所出现。有的地方，则殴斗不同观点的干部，开除不同观点的职工等等。所有这些，都是脱离群众的，是不得人心的。这些错误做法，既帮助了“派”性中央加强其在群众中的阵地，又帮助了“派”性中央找到了压迫自己和支持“造反”派的理由，从而加深了分裂。因此，它是害人的，又是害己的。是十分愚蠢的。所以，我们郑重地希望，犯有这类错误的同志，应该以党的利益为重，坚决地彻底地改正过来。

(四)

其实，犯了错误的，并不仅仅是这一派或那一派。我们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各派群众，都犯了一个普遍性的共同的特大错误。这就是，以一个能够对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实行正确领导的，为全国人民所衷心拥护的党的八届中央，换得了一个对谁都没有利益的，复辟封建主义的龙袍加身的“派”性中央；以能够领导人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生产建设的各级党委，换得了一个对谁都没有用处的，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的“××委员会”。尽管全国人民都费尽了力气、付出了无穷无尽的“永远健康”的巨大代价，所换来的仍然是仇恨、分裂、流血、内战。工人无工做，学生无书读，知

识青年分配不了工作，病人无药可医，农民没有化肥种田，干部被斗殴受伤、死亡，解放军战士流血牺牲，戏院关门，影院倒闭，商店的布匹、煤油、火柴及其他日用品相继断市。总之，城市破坏，乡村萧条。全国七亿人民的心头，都蒙上了一层又一层乌云，看不到自己的半点的光明的前途出路。全国人民都犯了这样一个大错误，真是“史无前例”的啊！

所以，现在摆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面前的严重任务，并不是互相争吵，互相仇恨，互相攻击，互相吃掉，互相残杀。而恰恰相反，正是要重新团结起来，以友谊代替仇恨，以团结代替分裂，手挽手、肩并肩地，毅然、决然、勇敢、果断地，立即开展全民性的对“派”性中央的错误路线和错误政策的大揭发、大批判。坚定不移地把以“永远健康”为代表的一小撮，挟持领袖，分裂中央，实行篡党、篡军、篡国的复辟封建主义的原形和本质，彻底地暴露在全国人民面前。坚定不移地捍卫党的第八届中央委员会，重新行使党的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所赋予她的神圣职权。并全力以赴地保证其实现对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正确领导。只有这样，才能保卫我们伟大的党及其所领导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只有这样，才会有七亿人民的幸福及其光明远大的前途。

（五）

“派”性中央的那些东西，必须立即展开大批判呢？

“反对我的，就是反革命；打倒你的，就是革命。”这是一条张国焘式的分裂党、分裂人民的叛党的派别路线。这是“派”性中央，从根本上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革命原理而提出来的；是根据他们分裂八届中

央，实行篡党、篡国、篡军，复辟封建主义的需要而提出来的。这条派别路线，已经完全毒化了我国的政治气氛。现在全国各地两派所执行的，都是这样一条派别路线。你要吃掉我，我也要吃掉你，互相进攻，各不退让。如果，不彻底地批判这条派别路线，就不可能彻底刷清“派”性中央，所强加给“保守”派身上的种种政治侮辱，及其在群众中所造成的恶劣影响；就不可能有效地帮助受蒙蔽的“造反”派，提高觉悟，起义归队。总之，一句话，绝对不可能正确地解决两派的争端问题。而军队战军队，干部战干部，群众战群众，这是七亿中国人民看不到尽头的苦难啊！

“政治第一”论，实质上就是“个人第一”、“个人高于一切”、“个人决定一切”的，封建主义的“君主治国”的理论。它是从根本上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这一最根本的哲学原理的。是从根本上反对无产阶级的“党高于一切”、“党委领导一切”的革命原理的。如果，不开展对“政治第一”论的批判，就不可能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这面光焰无际的伟大红旗，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就可能完全变质，伟大的祖国前途，就有可能向封建社会倒退。

“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是封建王朝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哲学的翻版。是“派”性中央，为复辟封建主义的需要而提出来的。这一套愚民愚兵的哲学，已经把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蒙蔽过去了。很多军事领导干部被撤职，很多战士流血牺牲，至今都还不知道是为了什么。这套愚民哲学，已经把伟大的七亿中国人民的心窍堵死了，至今都还没有人知道祖国分裂内战的根源。如果，不对这套封建主义的愚民哲学，开展大批判，就不可能有七亿中国人民的政治思想的大解放、大觉悟、大进步、大

提高；就不可能把七亿中国人民的智慧挖掘出来，并把它引导到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上；“派”性中央，复辟封建主义的企图，就可能得逞；伟大的祖国，就没有社会主义前途。

“做个人好战士”、“三忠于个人”，是封建主义的役党、役国、役军、役民的奴化政策。所有这一切，都是“派”性中央，实现其窃国阴谋，复辟封建主义的需要而提出来的。如果，我们不敢毅然、决然地开展对所有封建主义的一切的大批判，就不可能捍卫无产阶级的“党高于一切”的最根本的党性原则，就不可能捍卫无产阶级政党的最根本的组织原则——民主集中制。伟大的七亿中国人民，就有可能在新的社会条件下，重新置于“封建皇君”的统治之下，革命先烈和革命前辈流血牺牲所换来的革命成果，就有彻底失掉的危险。

“四个伟大”、“万寿无疆”，是封建王朝的“奸臣宰相”的“愚君害主，弄权祸国”的黑手理论。在无产阶级内部端出这样的理论的人，无非是把无产阶级的领袖，蒙蔽过去，腐蚀过去，以便于自己偷偷地披着“永远健康”的龙袍，登上“万寿无疆”的宝殿上去，全面地复辟封建主义。如果，我们不敢对所有这一切封建主义的陈腔，开展批判，就不可能最充分地发扬我国七亿人民的国家主人翁的革命精神，勤劳勇敢地建设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一本书、一出戏、一首歌的文化教育政策，是“派”性中央的愚民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派”性中央篡党、篡国、篡军的重要的阴谋手段。因此，也必须开展坚决的批判。如果我们不敢开展对复辟封建主义的愚民性的一本书、一出戏、一首歌的文化教育政策的批判，就不可能有百花齐放的，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祖国的文化，就不可能满足七亿

人民的广泛的文化生活的精神要求。

亲爱的同志们，现在是我们对“派”性中央的错误路线和错误政策，以及一切复辟封建主义的理论和政策，开展大揭发、大批判的时候了。如果，我们放松了对“派”性中央的完全错误的一切的批判，而再争下去，再打下去，再战下去，那末，我们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就要完蛋了。而这，仅仅只能使美国帝国主义者高兴。亲爱的同志们，清醒过来吧！

(六)

我们呼吁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必须立即在各军种、各兵种的班排里，开展对“派”性中央的一切复辟封建主义的路线、理论和政策的大揭发、大批判。最有效、最迅速、最彻底地肃清“派”性中央所强加给广大指战员的蒙蔽和思想毒害。切切实实地，把保卫党的最高权力不被篡夺，保卫国家的最高权力不被篡夺的责任担负起来，把保卫党中央的全部成员和全部国家领导人员顺利行使职权的责任担负起来。我们坚决不能承认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土地上的任何个人，有任意推翻党和国家的领导干部的特权。中国人民解放军吃人民的饭，穿人民的衣，绝对不能容许去充当窃国者的什么“个人好战士”。如果，你们是封建皇朝的皇家兵，那不管你是做谁家的好战士，我们是管不着的，也是无权过问的，因此，中国人民解放军，必须首先回到重新团结的党的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的周围。以自己的模范的行动，号召全国人民从各个地方、各个角落、迅速地回到党的八届中央的周围，回到以我党为伟大旗手的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红旗之

下，以便于实现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重新大团结，顺利地建设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因此，中国人民解放军，当前绝对不能片面地支持这一派或那一派，而应该以自己受蒙蔽、受欺骗的活生生的事实；教育两派群众和干部，提高他们的政治思想觉悟，引导他们立即参加对“派”性中央开展大批判的伟大斗争；参加保卫党的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的伟大斗争。及时地把两派完全错误的斗争矛头，扭转到正确的方面来。

(七)

我们呼吁正在互相交火、互相争吵的两派同志，应该立即停止永远没有完结、没有前途、没有胜利希望的，自相残杀的战斗。立即主动地把自己的武器封存起来。（待到两派实现了真正的大联合和大团结以后，再由军事领导机关，同时把两派武器收回国防仓库）。必须认识，坚决地批判从八届中央分裂出来的“派”性中央的完全错误的一切；坚决地保卫党的八届中央重新实现其对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正确领导，才是两派的共同利益，才是七亿人民的共同希望和共同前途。

因此，我们建议两派同志，立即把被自己“打倒”了的领导同志，不问其观点和派别如何，一律送回到原来的领导岗位上去。因为，他们都是“派”性中央的错误政策的受害者。因此，我们就有责任保护他们，并支持他们做好自己的工作。如果，个别确实有错误的，也应该由上一级党委的监察机关去处理，绝对不能由个人或派性组织去处理。此外，两派必须立即把被自己一方关入监狱的对方同志，无条件地

释放出来；把被自己一方斗毆成伤的对方同志，加以切实的医治，迅速恢复其健康；把被自己一方赶走了的对方同志，一律欢迎他们回到原来的岗位上。双方都要撤销对对方实行经济封锁的错误措施。以畅通城乡经济和物资交流。两派都要放弃自己的派别利益和派性立场。从完全错误的组织里面，回到无产阶级的队伍中来，总之，双方都要主动采取一切正确有效措施，来消除两派之间的分歧，互相尊重对方的政治权利和政治地位。以友谊代替仇恨，以团结代替分裂。保证两派在伟大的保党反“派”斗争中，重新团结起来。

必须认识，“造反”派组织和“保守”派组织，都是“派”性中央手里的各有用的两件宝贝。两派组织都是为“派”性中央的“两个阶级大搏斗”的完全错误的理论服务的。因此，两派组织都是分裂我党的无产阶级队伍的极为有害的毒剂。在批判“派”性中央的错误的同时，放弃和取消这些组织是完全必要的。

必须明白，我们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是中国共产党。无产阶级的群众组织是在党的直接领导下的工会、共青团、妇代会、农民协会、学生会等等。离开无产阶级的这一系列的阶级组织，去另起炉灶，成立别的组织，都被认为是分裂无产阶级队伍的派别组织，必须开展批判。因此，我们呼吁两派同志同时放弃自己的派性组织，是完全正确的。这一点，我们希望得到两派同志的热烈赞同。

(八)

我国面临“两条道路，两个阶级大搏斗”的事实是存在的。不过，不是在下面，而恰恰正是存在于党的第八届中央

委员会内部。这就是八届中央的正确多数，同挟持领袖，自搞小组织，自封“党中央”的“派”性少数的斗争；是无产阶级的“党高于一切”，同资产阶级的“个人高于一切”的斗争；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民主集中制，同资产阶级的个人独裁制的斗争；是无产阶级的“党指挥枪”的原则，同资产阶级的“枪指挥党”的斗争；是封建主义的役党、役国、役军、役民的“三忠于个人”的奴化政策，同无产阶级的忠于党、忠于无产阶级、忠于祖国及其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的“三忠于革命”的“驯服工具”论的斗争；是复辟封建主义同反复辟的斗争。这就是当前我国两条道路，两个阶级大搏斗的实质内容。但是，这场斗争，正确的东西被压制，而完全错误的东西，却又占了上峰。因而，也就形成了极为曲折，极为复杂的局面。

在这场极为复杂的斗争中，我们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都要表明自己的政治态度和阶级立场。到底是应该支持八届中央的正确多数，还是支持“派”性中央的错误少数？到底是应该支持无产阶级的“党高于一切”的党性原则，还是支持资产阶级的“个人高于一切”的谬论？到底是应该支持无产阶级政党的民主集中制，还是支持资产阶级的个人独裁制？到底是应该支持“三忠于革命”的“驯服工具”论，还是支持封建主义的“三忠于个人”的奴化政策？等等，等等。所有这一切都要求人们作出丝毫不苟的明确的答案，为克服我党当前所遇到的空前未有的严重困难，作出自己的贡献。因此，我们希望一切坚持原理、坚持原则、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立场的同志，在保党反“派”的伟大旗帜之下，联合起来。

(九)

此外，我们必须再次提起同志们的注意。对一时受蒙蔽而误入歧途的青年，是我们的革命后代，是我们的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我们只能采取百般爱护的方针，热情地教育他们，帮助他们提高政治思想觉悟，使他们迅速地回到无产阶级的队伍中来。而绝对不能对他们采取打击报复和镇压的错误措施。绝对不能采取“党同伐异，排除异己”的错误手段对待他们。在分配工作、升学就业、征兵入队等方面，应该一视同仁地，切实保障他们的政治地位和一切合法权利。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全国人民在党的八届中央的正确领导下，重新团结起来。

在全国完全实现了全面和平以后，建议中央在适当的时机，对牺牲在两派战争的战场上的解放军指战员、两派群众和干部、青年学生，全面进行抚恤，安慰他们的家属，以便牢固地实现全国人民的真正大团结，更有效地建设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同志们，团结起来吧！伟大的保党反“派”的斗争，是正义的。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因而胜利是一定属于我们的。

伟大的七亿中国人民重新大团结万岁！

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万岁！

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日通过

简介 刘振武（1926年～1968年9月20日），男，广西博

白县新田乡亭子村人。高中文化。1948年12月参加革命，次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后，曾任区民政助理、组织干事、县民政科副科长、博白县凤山中学总务主任、文地中学校长兼党支部书记。刘振武是一位忧国忧民、无私无畏的共产党员。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他凭着较高的政治觉悟和理论水平，从党和国家的利益出发，秉笔直书，愤怒揭露林彪、“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阴谋，批判极左路线，遭到残酷的政治迫害，不幸含冤病逝。

1968年，“文化大革命”的悲剧愈演愈烈，广西各地不断出现乱斗人、乱打人、乱杀人的现象。面对险恶的局势，刘振武关心的不是个人的安危，而是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他以一个共产党员的高度责任感，决心向党申明自己经过深思熟虑的政治观点。1968年7月21日，与全国各地蜂涌而上的各级“革命委员会”形式相对立，刘振武以“中国人民保党反派委员会”的名义，给广西玉林军分区政治部、司令部寄去题为《宣言》和《对当前全国各地两派争端的意见》两篇文章。他在《宣言》中指出：“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们的党“受到空前未有的大破坏。……党的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的全部权力被窃据，因而，使我党、我军、我国人民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失去了完全正确的领导”。他一针见血地揭露林彪、江青集团“是挟持领袖，从正确的党的八届中央委员会分裂出去的”、“由极为少数的几个人所组成的‘派’”。“这个‘派’性中央，很狡猾、很阴险、很毒辣。它通过各种乔装，披着各种画皮，偷偷地躲在我们的敬爱的领袖身边。我们万分沉痛地看到，直至现在，我们的领袖都还没有发现这个‘派’性中央的原形和本质。”“这个‘派’性中央，近几年来，一直以个人的恩怨为标准，系统

地推行了一条‘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亦即‘反对我的，就是反革命’的，‘任人唯亲’的张国焘式的派别路线，彻底地摧毁了我党的干部路线和组织路线，肆无忌惮地、根本地推翻了党纲党章的具体规定，打倒了许许多多的、党的、国家的、军队的、企业事业单位的极为重要的领导同志。”

“这个‘派’性中央，专门生产政治帽子，诸如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中国赫鲁晓夫、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反革命黑线、黑帮……等等。但是，却从未过问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从不关心整个国计民生，从不体贴人民群众的生活疾苦。”“这个‘派’性中央，有一套‘四个伟大’的圣人论。这套‘四个伟大’的圣人论，如果不是封建社会的‘愚君害主’的黑手理论，就是资产阶级的反动的唯心论，都是反对马列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这个‘派’性中央，系统地实行‘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的，也就是封建主义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愚兵的反动哲学”；

“系统地实行‘做个人好战士’、‘个人高于一切’和‘个人决定一切’的，也就是资产阶级的私国、私党、私军的窃国政策；系统地实行‘三忠于个人’的封建主义的役党、役国、役军、役民的奴化政策”。刘振武在《对当前全国各地两派争端的意见》中指出：“两派都是错误的”“两派都站在错误的立场上，帮助‘派’性中央推翻了为全国人民所衷心拥护的党的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导致了全国性的大分裂、大流血、大内战”。“现在，摆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面前的严重任务，并不是互相争吵，互相仇恨，互相攻击，互相吃掉，自相残杀。而恰恰相反，正是要重新团结起来，以友谊代替仇恨，以团结代替分裂，手挽手、肩并肩地，毅然、决然、勇敢、果断地立即开展全民性的对‘派’性中央

的错误路线和错误政策的大揭发、大批判。坚定不移地把以‘永远健康’（林彪）为代表的一小撮，挟持领袖，分裂中央，实行篡党、篡军、篡国的复辟封建主义的原形和本质，彻底地暴露在全国人民面前”刘振武强调指出：“‘四个伟大’、‘万寿无疆’是封建王朝的‘奸臣宰相’的‘愚君害主、弄权祸国’的黑手理论。在无产阶级内部端出这样的理论的人，无非是要把无产阶级的领袖蒙蔽过去，腐蚀过去，以便于自己偷偷地披着‘永远健康’的龙袍，登上‘万寿无疆’的宝殿上去，全面地复辟封建主义。如果我们不敢对所有这一切封建主义的陈腔开展批判，就不可能最充分地发扬我国七亿人民的国家主人翁的革命精神，勤劳勇敢地建设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8月11日，刘振武被捕。在审讯中，刘振武直言不讳地说：“1959年处理彭德怀，我认为不妥。‘文化大革命’中，突然把中国‘赫鲁晓夫’等一大批党内当权派打倒了我认为不妥。大串连，坐车不要钱，吃饭不要钱，不妥，不如拿这些钱来搞生产。一系列问题我考虑了很久，因此，写了这么多东西。”“我考虑毛主席也有很多错误的东西。”“中国如果复辟，就是复辟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在中国还没有发展完成。”刘振武还说：“我还准备写三篇文章。一篇是《论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的团结》，中心思想‘八大’路线不应改变，八届中央委员不应该打倒。另一篇写关于工农业生产，恢复奖励制度，实行按劳分配的问题。第三篇写对将要召开的党的‘九大’的看法。可惜这三篇文章来不及写，我就被捕了。”刘振武患有胃溃疡病，狱中恶劣的环境和轮番不断的逼供审讯，使他的病情急剧恶化，不幸于1968年9月20日含冤病逝在狱中。三天以后，博白县公检法军管会竟然还定他为“现行反革命

分子”，并作出所谓的“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判决，从而造成了严重的政治冤案。

1983年秋，中共博白县委根据广大党员和干部群众的要求，对“刘振武案件”进行了复查，于1983年11月11日作出了《关于刘振武同志的平反决定》，自治区人民政府于1984年3月3日追认刘振武为革命烈士。刘振武的冤案终于得到平反昭雪。

(李鸣)

周培源上周恩来书

总理：

关于我国基础科学现在这样落后，我认为有下列一些原因：

一、文化大革命前基础科学研究工作，缺乏具体领导。在一九五六年制定的科学规划的第五十六项任务“自然科学中的重大基础理论问题”（这是您指示我们制订的）和“基础科学规划”，由于没有具体单位去抓，基本上都没有落实。一九六三年的十年科学规划中，国家科委只抓了三十二个“国重”（国家重点项目），也没做，更没有抓比较全面的规划，经过文化大革命，这三十二个“国重”大致都垮了。

二、科学院的研究所应该注意基础科学研究，在文化大革命前大部分的力量花在任务上，接受单位的试验性工作，做完就完了，没有能够做到预计的那样“任务带学科”，把学科带动起来。这种情况在其研究所可能也有。

三、在学校中科研工作的反复性很大，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没有能够坚持几年的艰苦工作，做些成绩出来。来一次运动首先受冲击的是基础理论研究。似乎科学院也有类似的情况。

以北京大学为例，现在老中教师普遍的思想情况是不愿

搞也怕搞基本理论研究。怕在短期搞不出成绩，怕挨“理论脱离实际”的批评。教师中对基础理论的重要性，还没有建立起正确的认识。

在您七月十四日晚对北大的指示向北大党委常委传达后，理科教师都很激动，感到党中央对我们的亲切关怀，都表示要做好工作。理科的教改组对过去的科学研究工作曾作过一些调研，今拟进一步总结经验。

我感到，要使我国基础科学赶上去，关键在于领导。是否可让中国科学院统一领导全国基础科学研究工作，其中包括综合性大学的理论研究工作。

其次，要发动科学界的广大群众，统一对基础科学工作重要性的认识，把大家的积极性调动起来。

周培源

一九七二年七月二十日

简介 周培源（1902年～ ）男，江苏宜兴人，物理学家。1924年清华大学毕业，曾留学美国，研究理论物理。1929年归国后，曾经任清华大学教授、西南联合大学教授、清华大学教务长。1950年后历任清华大学物理学部部长，兼副校长，北京大学教务长，中国物理学会理事长，中国科协副主席、主席，九三学社副主席，北京大学副校长，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第三届、第五届委员，全国五届政协副主席，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科协主席。他1971年出任北京大学革委会副主任，1972年7月在他任此职期间，就中国基础科学落后一事上书周恩来总理。

1971年林彪事件爆发后，毛泽东决定由周恩来主持党中央的日常工作，把党政军的重要权力交给周恩来等人。周恩来把握历史契机，发动和领导了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力争在可能的条件下和范围内，努力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减少其破坏恶果，逐步恢复党和国家的正常秩序；力争国民经济在相对稳定的局势下摆脱困境，以求发展；安排好人民的生活；促进教育界和科技界的秩序向正常轨道转变。从1971年10月开始，周恩来着手进行努力，做了大量的工作。1972年7月14日，周恩来在对周培源的谈话中提出，要把综合大学的理科办好，提高基础理论水平，并强调要认真清理教育科研工作中的极左思潮，“有什么障碍要消除，有什么钉子要拔掉”。7月20日周培源上书周恩来，分析了造成中国基础科学落后的三方面原因，真实地反映了在当时环境下，广大知识分子欲罢不忍，欲教不成的思想状态。7月23日，周恩来就此信对国务院科教组和中科院负责人作重要批示。此后，周恩来对北大、清华草拟的关于在教育和科研中加强基础理论的初步意见作出批示，督促尽快加以落实。10月6日，根据周恩来一系列指示精神，周培源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文章《对综合大学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提出：“工和理、应用和理论都必须受到重视，不能偏废”；“要批判‘理论无用’的错误思想”、“充分认识到科学实验和自然科学理论的重大意义”；“在学校中，基础课的教学工作一定要做好，综合大学理科要对基本理论的研究给予足够的重视。”这表达出当时在“两个估计”禁锢下备受压抑的广大知识分子的心声。与此同时，《人民日报》社王若水根据周恩来关于极左思潮要批透的多次讲话精神，于10月10日发表了一版批无政府主义的文章。随后又发生王若水上书毛

泽东事件（详见王若水上毛泽东书）。在毛泽东亲自干预下，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一伙决心下大力量刹住“1972年下半年出现的修正主义回潮”。12月17日，毛泽东在游泳池对张春桥、姚文元的谈话中明确表示反对批极左思潮，并批了王若水信中的观点，认为当前应当批林彪的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的“极右”。毛泽东不能容忍批林彪的极左思潮而导致从根本上推翻自己的左倾理论与实践，担心批极左导致否定“文革”。至1973年下半年，江青一伙从教育界开刀，连续制造了张铁生白卷事件、批《园丁之歌》、批“师道尊严”、突袭考教授、马振抚公社中学事件等等，在全国掀起批“修正主义回潮”、“复辟的恶浪”。批极左思潮的斗争遂告结束。1973年8月中共十大以后，依仗江青集团政治势力的上升，迟群一伙在清华大学发动了反击“反攻倒算”的“三个月运动”，迫害和打击知识分子。这场运动，严重影响到北京和外省市的许多院校，周培源上书一事也被作为“复辟”而受诘难。

（编者）

附：

周恩来对周培源来信的批语*

（一九七二年七月二十三日）

把周培源同志来信和我的批件及你们批注的意见都退给

* 这是周恩来写给当时国务院科教组和中国科学院负责人的批语。

你们好作根据，在教科组和科学院好好议一下，并要认真实施，不要如浮云一样，过了就忘了。

李庆霖上毛泽东书

尊敬的毛主席：

首先，我向您老人家问好。

我是个农村小学教员，家住福建省莆田县城关镇。家庭成份是贫民。我的教员生涯已有二十多个寒暑了。

我有个孩子叫李良模，是个一九六八年的初中毕业生。一九六九年，他听从您老人家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教导，毅然报名下乡。经政府分配在莆田山区——荻芦公社水办大队插队落户务农。

在孩子上山下乡的头十一个月里，他的口粮是由国家供应的（每个月定量三十七斤），生活费是由国家发给的（每个月八块钱），除了医药费和日常生活中下饭需要的菜金是由知青家长掏腰包外，这个生活待遇在当时，对维持个人在山区的最低限度的生活费用，是可以过得去的。

当国家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口粮供应和生活费发给断绝，孩子在山区劳动，和贫下中农一起分粮后，一连串的困难问题便产生了：

首先是分得的口粮年年不够吃，每一个年头里都要有半年或更多一些要跑回家吃黑市粮过日子。在最好的年景里，一年早晚两季总共能分到湿杂稻谷两百来斤，外加两三百斤

鲜地瓜和十斤左右的小麦，除此之外，就别无他粮了。那两百来斤的湿杂稻谷，经晒干扬净后，只能有一百多斤。这么少的口粮要孩子在重体力劳动中细水长流地过日子，无论如何是无法办到的。况且孩子在年轻力壮时候，更是会吃饭的。

在山区，孩子终年参加农业劳动，不但口粮不够吃，而且从来不见分红，没有一分钱的劳动收入。下饭的菜吃光了，没有钱去再买；衣裤在劳动中磨破了，也没有钱去添制新的；病倒了，连个钱请医生看病都没有。其他如日常生活需用的开销，更是没钱支付。从一九六九年直迄于今，孩子在山区务农以来，他生活中的一切花费都得依靠家里支持。说来见笑，他风里来，雨里去辛勤种地，头发长了，连个理发的钱都挣不到。此外，他上山下乡的第一天起，直到现在，一直没有房子住宿，一直是借住当地贫下中农的房子。目前，房东正准备给自己的孩子办喜事，早已露出口音，要借房住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另找住所。看来，孩子在山区，不仅生活上困难成问题，而且连个歇息的地方也成问题。

毛主席：您老人家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我完全拥护；叫我把孩子送到山区去务农，我没意见。可是，当孩子上山下乡后的口粮问题，住房问题，生活中的吃油用菜问题，穿衣问题，疾病问题，住房问题，学习问题以及一切日常生活问题，党和国家应当给予一定的照顾，好让孩子在山区得以安心务农。

现在，如上述的许多实际困难问题，有关单位都不去过问，完全置之不理，都要由我这当家长的自行解决，这怎么能行呀？有朝一日，当我见阎王去，孩子失去家庭支持后，那他将要如何活下去？我真耽心！

今年冬,我的又一个孩子又将在初中毕业了,如果过不了明春的升学关,是否再打发他去上山下乡呢?前车可鉴,我真不敢去想它!

在我们这里已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中,一部分人并不好好劳动,并不认真磨炼自己,并不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却倚仗他们的亲友在社会上的政治势力,拉关系,走后门,都先后被招工、招生、招干去了,完成了货真价实的下乡镀金的历史过程。有不少在我们地方上执掌大权的革命干部的子女和亲友,纵然是地富家庭出身,他们赶时髦上山下乡才没几天,就被“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需要”调用出去,说是革命干部的子女优先安排工作,国家早有明文规定。这么一来,单剩下我这号农村小学教员的子女,在政治舞台上没有靠山,又完全举目无亲,就自然得不到“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而加以调用了。唯一的资格是在农村滚一身泥巴,干一辈子革命而已。

面对我们这里当今社会走后门成风,任人唯亲的现实,我并不怨天,也不尤人,只怪我自己不争气。我认为:我的孩子走上山下乡务农的道路是走对了。我们小城镇的孩子,平常少和农村社会接触,长大了让其到农村去经风雨和见世面,以增长做人的才干,是很有必要的。但是,当孩子在务农实践中碰到的许多个人能力解决不了的实际困难问题,我要求国家能尽快地给予应有的合理解决,让孩子能有一条自食其力的路子可走,我想,该不至于无理取闹和苛刻要求吧。

毛主席:我深知您老人家的工作是够忙的,是没有时间来处理我所说的话。可是,我在呼天不应,叫地不灵的艰难窘境中,只好大胆地冒昧写信来北京“告御状”了,真是不该

之至！
大安！

谨此敬颂

福建省莆田县城郊公社下林村小学

李庆霖 敬上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二十日

简介 李庆霖，男，福建省莆田县城郊公社下林村小学教师。他原是莆田县一所中学的校长，1957年反右运动中因给领导干部和就社会问题提意见，被打成“右派”，受到降职降薪处分，后又下到成郊公社小学任教。1969年，李庆霖的儿子李良模高中毕业，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他只能与千千万万和他同样家境出身的青年一起走“上山下乡”的道路，在莆田贫穷落后的一个山区乡村插队落户务农。当年中国农村社会的广大农民难得温饱，贫穷的山区更是缺衣少食，离乡背井、举目无亲的上山下乡插队落户知识青年的生活就成了大问题，同时，他们还因农村宗法关系、插队落户寄居寄食关系等，其前途和命运完全由农村人民公社各级干部或负责知青工作的干部一手操纵，时而饱受人格或肉体的凌辱。（编者当年上山下乡多年，颇有切肤感受）。李庆霖的孩子在农村的生活只有靠家里支持，一年劳动到头，甚至连理发钱也挣不到手。致使李庆霖的家境贫困难以为继。而有权有势有后台的却拉关系、“走后门”，招工、招生、招干，纷纷远走高飞了。无权无势的平民百姓子弟就只有“扎根农村一辈子”，“滚一身泥巴流一身汗”的份了。

1973年初，李庆霖冒着不测风险，斗胆上书毛泽东，如实反映了知识青年的生活困境和自己家庭的处境，以及干部

子女“走后门”招工、招生、招干的不正之风。毛泽东收到这份难得的反映民众疾苦的上书，亲自复信李庆霖，答复他要在全国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问题加以“统筹解决”；并寄上人民币300元，“聊补无米之炊”。毛泽东的复信引起了全党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中的严重问题的重视。中共中央为此下达文件，与毛泽东的复信一道发至全国，并在城乡各级广泛组织群众学习讨论，以体现“党对人民群众的关怀”。继之，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制定了对当时已经上山下乡的800万知识青年和关于今后知青工作“统筹解决”的6条原则，提出县级以上党委，都要建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领导班子，由第一书记挂帅；要解决知青的口粮、住房、医疗等实际困难；对已下乡插队生活困难的知青，国家要给以必要的补助；适当增加安置经费；对以法西斯手段残酷迫害知识青年和强奸女知青的犯罪分子，要依法惩办，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要举行公判，坚决杀掉（编者及几个下乡朋友们各自所在的县城都杀了几个人，以平民愤和应付、“贯彻”中央精神。然此类迫害知青的事件仍不时多有发生，只是由公开转隐蔽罢了）；严禁逼婚；今后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由落户变成主要以下几种形式：1、插队，要适当集中，建知青点；2、单独建立青年队；3、单独建立知青为主的集体所有制农场；4、到生产建设兵团和国营农、林、牧、渔场。以后就招工、招生、招干又发了几个文件，要求杜绝领导干部子女“走后门”的特权现象和不正之风。800万知识青年和此后下乡的知识青年，生活条件由此有了一些改善。李庆霖也因此成为社会民众钦佩的敢于为民请命的一代英雄。后来，“四人帮”一伙利用李庆霖的社会影响，把他捧为“反潮流”的勇士，福建的帮

派头子也极力拉他入伙以壮声势。李庆霖本人对此受宠若惊，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投靠“四人帮”，成为他们“反右”、反对周恩来的一个工具。李庆霖被提拔为全国人大常委、福建省莆田县教育局副组长。“四人帮”倒台后，1977年1月14日李庆霖被捕入狱。尽管如此，李庆霖的上书曾客观反映了几百万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和千千万万个家庭的共同心声，对改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生活甚至命运起了很大的作用，在当时的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反响。经反复商榷，我们决定尊重历史，将李庆霖的上书收入本集。记述历史，并不在于褒扬该上书者的一生；历史不能因人而废。

（编者）

附：

毛泽东给李庆霖的回信

李庆霖同志：

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统筹解决。

毛泽东

1973年4月25日

王若水上毛泽东书

毛主席：

现在报纸宣传面临一个困惑的问题，就是反“左”还是反右，我想向您汇报并请示。

总理在八月一日的讲话中，说到极左思潮没有批透，并指出，“‘左’的不批透，右的还会来。”这个指示很重要。虽然总理说的是外交部、人民日报、新华社等单位的内部工作，可是我觉得也完全适用于宣传。

在总理讲话一周之后，八月八日，春桥、文元同志对报社领导小组讲话。在谈到宣传上批“左”的问题时，春桥同志说：“林彪的一套，是在我们批判刘少奇的过程中搞出来的。……由于林彪利用批判刘少奇，搞出了一套形‘左’实右和过了头的东西，流毒很广。因此，批林要动脑筋，划清界限，不要过头，不要重复过去批刘的错误。”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到底批“左”是批过了头，还是没有批透？

我觉得总理的指示是正确的。对春桥、文元同志的讲话，我有些想不通。批“左”刚刚开始，就提出不要过头，这是给批“左”泼了冷水。春桥同志为了说明批“左”中出现的过头问题，举了批“精神万能论”和批“唯意志论”的例子，说主席说过“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说“林彪是唯武器论，不是唯意志论。”我不懂为什么因为主席讲过“人

是要有点精神的”，就不能批“精神万能论”；我认为这是两回事。我还认为，林彪既有唯意志论又有唯武器论；这两个东西可以在一个人身上兼而有之，如蒋介石和希特勒就是这样。文元同志说，林彪反对党的领导，这是右。我想，就其表现形式来说，反对党的领导可以从右的方面来反，也可以从“左”的方面来反。一九五七年右派进攻是从右的方面反对党的领导；林彪煽动无政府主义是从“左”的方面反对党的领导。《红旗》第十一期上有一篇文章，说了这样的话：“刘少奇一类骗子散布无政府主义，是妄图从‘左’的方面来否定党的正确路线。”文元同志的话，把这篇文章的正确观点也否定了。

由于这两个讲话精神不一致，在报社编辑部已造成了思想混乱。我在十月十四日编发了一整版批“左”的文章，主要的一篇是龙岩（黑龙江省委写作组）写的批判无政府主义和极“左”思潮的文章。十一月四日，《文汇报情况》第312期登出了上海工人座谈会的意见，这些意见是一面倒的，而且很尖锐。这是从批判《海瑞罢官》以来，文汇报第一次在内部情况上批评人民日报，而文元同志又特别嘱咐我们讨论，所以我觉得不同寻常，值得严肃地深思了。

对这份情况，我们感到很难讨论，因为是工人意见。就在我们讨论期间，文汇报陆续出现了一些新的提法。十一月六日的一篇评论说：要反对刘少奇一类骗子推行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过了几天，又有一篇文章说：刘少奇一类骗子一贯是右的，只是在“有的时候，有的问题”上，搞了一点形“左”实右的东西。十一月二十四日，《文汇报情况》（第335期）再次批评了人民日报。这一期的内容是人民日报反对无政府主义文章对各地报纸的影响，其中包括某些地方报纸

提出的有关论点。《文汇报情况》没有直接批评这些论点，但实际上是把它们作为反面论点拿出来示众的。其中有一条是“刘少奇一类骗子是煽动无政府主义的罪魁祸首”，还有一条是“反对无政府主义是批修整风的一项内容”。我想，如果这样的观点都错了，那就不是龙岩这一篇文章的问题，而是无政府主义和极左思潮能不能批的问题了，不是龙岩的文章有什么缺点的问题，而是人民日报是不是又犯方向性错误的问题了。

这些天，我反复思索了这个问题。我想，刘少奇和林彪的实质都是极右，这是没有问题的。但就表现形式说，刘少奇有右的表现也有“左”的表现，主要表现为“左”。林彪在实际工作中的主要流毒也是“左”。根据报社记者汇报的情况和来稿的情况看，在实际工作中，“左”的干扰和右的干扰都有，但“左”的干扰是主要的。将来在适当时候，可能需要强调反右，但目前还是需要强调反“左”。只有克服了“左”的倾向以后才能有力地反对右的偏向。林彪煽动极“左”思潮，流毒很广，批林就要批极“左”思潮。中央所批发的好几个省的批林整风文件中，也是强调无政府主义，无政府主义就是极左。因此，我认为批左是中央的精神。但是，文汇报的观点是不是有什么“来头”呢？如果不是中央精神，文汇报怎么会有那么大的胆子？反过来说，如果是中央精神，为什么人民日报不知道？

我不相信文汇报的观点是来自主席，因为我想，主席如果有什么新的指示的话，是不会不向人民日报传达的。正因为这样，我才向主席写这封信，希望能得到您的指示。

敬祝

万寿无疆

王若水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四日

〔附记〕这封信闯了大祸。由于后来追查得很紧，我没敢保留底稿。原信现在可能保留在某个中央机关的档案柜内，但是我无法查到，只能根据当时交代材料和回忆复述如上。将来如找到原信，当然要以原信为准。读者会看到，这封信反映了我当时的思想，其中就有“左”的影响，尽管我主张批“左”。信中所说“刘少奇一类骗子”指林彪；当时报上尚未公开点林彪的名字，就用这个代称。

王若水

一九八九年一月

简介 王若水，男，1926年10月生于上海，童年在湖南度过，抗战期间在四川避难。1946年毕业于长沙雅礼中学，同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在北大，他参加了学生运动，是学生社团“呐喊社”的积极分子。他们以壁报为武器，反抗国民党的专制统治。1948年5月，王若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11月，在国民党大逮捕中，奉组织命令赴冀中解放区。

1949年春，他随解放大军进入北京城，在中共北京市委政策研究室工作。

1950年底，王若水到《人民日报》理论组当编辑。当时邓拓是《人民日报》社总编辑兼理论组组长。在理论组期间，王若水主持过“图书评论”专栏，参加了对胡适的批判，撰写过批评梁漱溟封建思想的文章，起草过宣传“双百”方针

的重要社论，并受到毛泽东的注意和好评。

1958年，他下放到湖北枣阳农村一年。

从1960初开始，他站在艾思奇一边，和杨献珍一派就“思维和存在性的同一性问题”展开了长期的争论。1961年和1962年又先后发表了《辩证法的命运》和《唯物论和辩证法理应共命运》。

1962年，王若水发表《桌子的哲学》一文，引起了较大的反响。王若水又一次受到毛泽东的赞扬。

“文革”前夕，王若水担任了《人民日报》评论组组长，“文革”中被打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受到冲击、抄家。

1972年，《人民日报》遵照周恩来指示，成立了一个“看大样”的班子，王若水是其中一员。当时，对于如何批判林彪的路线，党内有分歧。周恩来提出要批判极左思潮，而张春桥和姚文元却唱反调。这年10月，王若水组织了一个版的文章，批判林彪煽动的无政府主义和极左思潮。于是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四人帮”把持下的上海《文汇报》内参上登上了“上海工人阶级”的反应，说《人民日报》这一版文章否定“文化大革命”，姚文元要《人民日报》讨论。

在此情况下，王若水上书毛泽东，认为周恩来提出反“左”是正确的，张春桥和姚文元的讲话是错误的。他没想到，张春桥的话其实正是毛泽东的意思。这当然引起了毛泽东的不悦。毛说王若水主张批极左思潮“并不高明”。这表面上是批评王水，实际上也是批评周恩来。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借此机会，在《人民日报》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斗争，批判以王若水、胡绩伟为代表的“一股邪气、一股力量”。

1974年，王若水被赶到干校劳动改造，以后又被送到北

京市郊劳动改造。直到粉碎“四人帮”后才回到报社，获得平反。

1977年底，王若水被任命为《人民日报》副总编辑。他积极支持和参加了批判“两个凡是”的思想解放运动。在1979年的理论务虚会上，他率先批评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错误。

1980年，人民出版社结集出版了王若水的文集《在哲学战线上》。

1980年，王若水发表了关于“异化”问题的文章，指出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政治异化、经济异化和思想异化的现象。他还提出，应该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把人当做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他多次为人道主义辩护……1983年，在“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中王若水因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受到批判并被免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职务。1987年8月，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过程中，因“宣传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社会主义异化论”以及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等被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开除党籍。

1985年，王若水发表了《智慧的痛苦》和《关于“革命人道主义”》等文；1986年发表了《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人的哲学》等文。

1986年，三联书店出版了王若水的文集《为人道主义辩护》，成为畅销书。

附(一):

毛泽东关于批林是批极左还是批右的谈话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十七日, 游泳池)

批极左, 还是批右? 有人写信给我, 此人叫王若水。我认识此人, 不很高明。也读过一点马克思, 参加过合二而一、一分为二, 桌子的哲学……

极左思潮少批一点吧。

王若水那封信我看不对。是极左? 是极右。修正主义, 分裂, 阴谋诡计, 叛党叛国。

附(二):

从批“左”到批右的转折

王若水

一九七二年, 在批判林彪的过程中, 周恩来同志正确地提出批判极左思潮的意见, ……毛泽东同志却错误地认为当时的任务仍然是反对“极右”。——《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文化大革命”后期, 人民日报社开展了一场所谓“批邪”的运动, 从一九七二年底一直持续到一九七四年底。其时间之长, 声势之大, 超过报社历史上任何一次批判运动。

今天回过头来审视一下这次事件，是很有意义的。

这次运动的直接矛头是对着以胡绩伟、王若水为代表的报社“一股邪气、一股势力”（张春桥语），而其目的却远不止此。它实质上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策划的一场扭转批林大方向，反对周恩来，夺取人民日报控制权的斗争。

筹建人民日报领导班子的风波

事情的原委要追溯到一九七一年。林彪在九·一三事件中机毁人亡后，原来已经解决的接班人问题重新突出起来，成为一个紧迫问题。周恩来的地位上升了。毛泽东对周恩来显得很信任，让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还委托他代管人民日报。从一九七二年开始，姚文元虽还继续管一些人民日报的事情，但上面不能不受周恩来的牵制。对于这件事，江、张、姚当然是怀恨在心。他们不能容忍周恩来做接班人，当然也不能容忍周恩来对人民日报这样一个重要宣传阵地的领导。

当时报社没有正式领导班子，只有一个管业务的“宣传小组”，召集人是鲁瑛。张春桥、姚文元在报社唯一的依靠对象，也是鲁瑛。鲁瑛能力很弱，即使仅从能力考虑，也不能胜任负责人民日报的工作。不过这一点对张、姚并不十分重要，他们有他们的“政治标准”。那个时期，周恩来的担子不能再重了，可是张、姚毫无协助之意，反而是事无巨细，都往周恩来身上推。我们在下面的人都为周恩来的身体担忧。有些文理不通的稿子，也直接送到周恩来那里去了。有一次周恩来一面改稿子，一面摇头对鲁瑛说：“你们以后不要

我替你们当小学教员好不好？”

一九七二年二月，周恩来提出，人民日报在建立正式领导班子之前，“要组织一个班子看大样，实行集体领导，统管全局”。周恩来还说：“干部还是老中青，老的都靠边站，都是年轻的，不行”。几天之后，周恩来来电话催要名单。鲁瑛回答说因病未办。周恩来严厉地说：“你病重了，怎么办？你死了，人民日报就不办了？”显示了对鲁瑛的不悦。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报社成立了临时“看大样”小组，成员有七人：鲁瑛、吴冷西、王揖、陈浚、潘非、崔奇、王若水。

根据预定计划，报社党的核心小组要在一九七二年内成立。张春桥、姚文元觉得，需要采取步骤来保住鲁瑛了。八月八日，他们召集了报社七个人（从军宣队、看大样小组中指定），作了讲话。在谈到领导班子时，张春桥装模作样地说：“鲁瑛同志作为报社的领导，我说他弱得很。在解放日报，他也不是最强的。文化大革命初期调来北京，不是要他来当领导的。”接着话锋一转：“现在成了这个局面，目前只能如此。”“在目前的情况下，对鲁瑛同志要支持。”

张、姚讲话在编辑部传达后，大家情绪上抵触很大。十一月间，在讨论建立党的核心小组时，同志们纷纷提出：鲁瑛不能当第一把手。有人说：“报社有很多老干部、好干部都没有使用，但鲁瑛这样的人却当了主要负责人。鲁瑛这样的水平，放在领导岗位上，与其说是爱护他，不如说是坑害他。这对党不利，对他也不利。”有的同志说，这“不是任人唯贤，而是任人唯亲”。还有的同志说：“鲁瑛的水平低。中央是不是了解鲁瑛的情况？他的情况应该很好向上反

映。”当时编辑部的同志拥护谁出来主持工作呢？吴冷西的呼声最高，其次是胡绩伟。这就是后来所谓的“捧吴贬鲁”、“贬鲁捧胡”。

在这种情况下，同志们纷纷写信给中央提意见。还有不少同志强烈要求把讨论情况出简报送中央。报社形势颇为动荡。

批“左”还是批右？

争夺人民日报控制权的斗争，还伴随着批林方针上的分歧。

批林开始是批《“五七一”工程纪要》。《纪要》属于林彪的阴谋，主要是揭发声讨，理论上没有什么好批的。接着又批辽沈战役中林彪的错误，那属于历史，和现实没什么联系。以后批什么呢？不清楚了。一九七二年的报纸上，批林批不下去，冷冷清清，同“文革”初期批刘那种狂热劲头形成尖锐的对比，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怪事。从当时报纸本身说，是想结合实际搞好批林的，但具体批什么，中央没有明确指示。那时人民日报上反“左”反右的提法都有，各地报纸的提法也不一致。姚文元对如此批林也很少讲话，只是强调不要忙于联系实际。

八月一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我国驻外使节时，批评了外交部、人民日报、新华社（这几个单位都是周恩来主管的）。他说，你们对极左思潮没有批透，“左”的不批透，右的还会来。这个精神传到报社。大家很兴奋，觉得这个指示非常正确，应该很好地讨论和贯彻。

但一周以后，也就是八月八日，张、姚在接见报社七人

时，谈到批林问题，却强调说：“林彪的一套，是在我们批判刘少奇的过程中搞出来的。……林彪利用批刘，搞出一套形‘左’实右和过了头的东西。流毒很广，因此在批林时要动脑筋。划清界限，不要过头，不要重犯过去批刘时的错误。”这话是张春桥说的。此外，他还表示不赞成批“精神万能论”，理由是毛泽东说过“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他不同意批“唯意志论”，硬说林彪是“唯武器论”。他认为这些都是“过头”的例子。

“精神万能论”和“唯意志论”，都是“左”的东西，是林彪大肆宣扬过的。批林刚开始，还没有怎么批起来，张、姚就说批“左”不要过头，这不能批，那不能批，而其实他们认为不能批的都是应该批的。这当然是给批极左思潮浇了一盆冷水，和周恩来的观点形成对立。这种不一致，编辑部的许多同志都感觉到了，并对张、姚的说法很不满意。

九月，周恩来再次说：“极左思潮不批透，你们就没有勇气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一篇文章引起的反响

十月十四日的一篇文章，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出来的。这篇文章的来由是：一九七二年三月二十一日，国务院业务组的华国锋、李先念、余秋里接见黑龙江的同志，在听取黑龙江的同志汇报到哈尔滨的三个“老大难”工厂的问题时，指示他们要反对无政府主义。后来，省委写作组写了这篇文章，署名龙岩，交给人民日报理论部。当时胡绩伟是理论部党支部书记，他看过后又交给我。我作了很大修改，改题为《无政府主义是假马克思主义骗子的反革命工具》，又加了两篇文

章（一篇是《坚持无产阶级铁的纪律》，一篇是介绍《巴枯宁》的书评），组成一整版。当时，张春桥和姚文元都不在北京，我抓住这个机会，就把这一整版反“左”的文章发出去了。

这块版马上受到各方面的注意。法新社记者当天就发了一条电讯，说这篇文章是为老干部讲话的，是批评红卫兵的。与此同时，上海方面来了电话，是市委常委、张、姚的红人朱永嘉打给鲁瑛的，询问这篇文章的作者是谁，谁组织的，是否送给什么人看过，等等；还说了一句：“上海工人对这篇文章反应强烈”。

十天以后，文汇报的内参《文汇情况》三一二期（十一月四日）登了一篇上海工人座谈这篇文章的报道。的确是反应“强烈”，说这篇文章是否定“文化大革命”，是批到了群众头上，等等，一大堆罪名。奇怪的是，文汇报过去也曾大力批判过无政府主义和极左思潮，这次却来个大大转变，而所有发言人的观点都是一面倒的。

编辑部的困惑

姚文元从上海打电话叫新华社把法新社的电讯稿送来，叫我们看一看；接着又把十一月四日的《文汇情况》转给我们，要看大样小组和理论部讨论，说“同意不同意都可以”。他自己却不表示态度，推说对那篇文章还没有看。

玩这种拙劣的把戏，是没有几个人愿意上当的。理论部首先公开拒绝讨论。胡绩伟说，要讨论也要由看大样小组先讨论。他私下对我说，“怎么讨论啊？你说同意吧，它是错误的；你说不同意吧，它又是工人意见。对工人意见，我们怎么好

反驳？”他的这个话表达了许多同志的共同想法。那时是工人领导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是“臭老九”。因此，我们面临的是一个两难局面。姚文元说：“同意不同意都可以”，其实是同意不同意都不可以。

看大样小组先后讨论了四次，也没有什么结果。第一次开会就讨论不起来，看来多数同志心里不服，嘴上不敢说，怕又是“引蛇出洞”。鲁瑛虽积极，却讲不出什么道理。打从朱永嘉来电话后，他就慌了神，见到报纸大样上有“左”的字样就删。那个时期，稿子上“极左思潮”“‘左’的干扰”一类字样是不少的，所以这样一来，每天都要删了。我对这种做法很不以为然，曾问过鲁瑛：“你们这样删有根据没有？中央有没有讲过不能反‘左’？”鲁瑛也承认没有根据。

姚文元看到我们讨论不积极，又要我们好好学习中央文件。这一次我倒是认真学了。不学也罢，越学越觉得自己有理。毛泽东亲自批发的关于批林整风的中央文件，多次提到反对无政府主义。一九七二年以前的且不说，单说一九七二年，当年就有二十六号文件、三十一号文件、三十八号文件、四十二号文件，都提到反对无政府主义。最后这个文件是十一月一日印发的，时间还在十月十四日我编发的一块版之后。即使是姚文元主持的《红旗》杂志第十一期（十一月出版），也还有批无政府主义的内容。其中说：“刘少奇一类骗子”（指林彪——引者）散布无政府主义，是妄图从“左”的方面来否定党的正确路线。我还可以补充一条：十月十四日那篇反无政府主义的文章，曾经列入理论部拟定的“批林整风选题计划”，并送姚文元审阅过的。姚文元没有表示不同意。为什么出尔反尔呢？

文汇报的“新精神”

事情的变化，看来是发生在张春桥、姚文元去上海前后。我知道，张、姚每次去上海，下车伊始，就要找文汇报和解放日报的负责人去，滔滔不绝讲一通。不久，“新精神”就从这两家报纸上透露出来了。“文革”前夕在批《海瑞罢官》问题上，文汇报曾和人民日报唱对台戏。从那时以来，这是文汇报第一次点人民日报，这显然是不寻常的。那么无政府主义和极左思潮还能不能批？王揖和我多次催促鲁瑛，要他向姚文元请示，姚文元就是避而不答。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得从文汇报上去找“新精神”。

“新精神”果然出来了。十一月六日，文汇报的一篇评论说：“要反对刘少奇一类骗子所推行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过了几天，又有一篇文章说，“刘少奇一类骗子一贯是右的，只是在“有的时候，有的问题上”搞一点形“左”实右的东西。这些提法引起报社一些同志议论纷纷，因为中央文件不曾有过。王揖为了摸底，想了一个办法，建议鲁瑛请示姚文元，把文汇报这篇评论和文章加以转载，看看姚文元是什么态度。但是，姚文元不同意转载。

理论部同志的抵触情绪也很大，不知道张、姚要通过文汇报搞什么名堂。胡绩伟找了一个机会，对我说：“现在有些理论性的问题搞不清楚，不知道主席是怎么看的。你是搞理论的，主席又知道你，是不是你写一封信向主席请示一下？”我本来也在考虑这件事，便答应说：“我准备考虑。”我也对他谈了自己的看法，就是《文汇情况》的批评顶多是反映了张春桥、姚文元的个人意见，不会是中央的精

神。

十一月中旬，当我正在考虑如何写信给中央的时候，《文汇报》第三三五期再次批评了人民日报。这一期是十一月二十四日出版的，当我看到时，已是月底了。这一期的内容是人民日报反对无政府主义文章对各地报纸的影响，说全国有九个省市报纸转载了，有八家报纸“虽未转载，但也发表了批判无政府主义的报道、文章或评论员文章。”意思就是流毒全国。它还举出了报纸上提出的若干论点，包括“刘少奇一类骗子是煽动无政府主义的罪魁祸首。”“反对无政府主义是批修整风的一项内容”（“批修”即“批林”，当时报纸上还没有公开点林彪的名字）等。虽然《文汇报》并没有对这些论点加以直接评论，但明眼人一看便知，它是把这些作为反面观点拿出来示众的。我看了很激动，心想：难道这也错了？难道林彪没有煽动无政府主义？难道批林整风不能包括反无政府主义？这已经不是一篇文章或几篇文章的问题，是批林的方针问题，是要不要和能不能反“左”的问题。

十二月六日，张春桥、姚文元有一次谈话。姚文元说：“主席说，林彪在历史上一贯是右的。”“林彪在教育问题上 是右的。林彪的理论和实践都是右的。”张春桥说：“大乱是不是无政府主义？文化革命初期，大乱是主席号召红卫兵造反。……当时乱有些损失，如铁路，没什么了不起。……停止党的组织生活，这是主席决定的，不是无政府主义。文化革命刚刚过来，怎能忘掉？没有大乱，哪有大治？人民日报的同志要到工农群众中去，听听工农意见。到上海去听听，上海工人硬是敢提意见，”“生产搞得不好，主要是阶级斗争，班子不团结，不是群众的无政府主义。”“只讲

极左思潮说服不了我。林彪也有个发展过程，只讲极左怎么行？最后投靠苏修是极右”。

听了这些，我仍然不为所动。因为我怎么也不相信，毛泽东会在当时那样的时刻，把反右作为重点。一九五九年的庐山会议把反“左”变为反右，给当时“左”的东西火上加油，接着就是三年困难。毛泽东怎么可能不接受这个惨重教训呢？

我的一封信

我给毛泽东的信是在十二月五日发出的。这封信的底稿我没有保存，因为后来追查得很紧，我烧掉了，但信的主要内容，后来曾多次“交代”。现在复述如下：

开始我说，现在人民日报陷入宣传上的混乱，主要是批林方针问题。总理在八月一日说，批“左”还没有批透，但张春桥、姚文元在八月八日却说批“左”不要过头。这就产生一个问题：到底批“左”是没有批透呢，还是过了头？我认为周总理讲的是对的。他虽然指的是几个单位的运动，但我认为也适应于报纸宣传。

我报告了《文汇报》对人民日报的批评和文汇报对林彪路线性质的提法。我说这种情况有些象批《海瑞罢官》的局面。到底文汇报讲的是不是中央精神？如果不是，文汇报为什么有那么大的胆子？但如果是，人民日报为什么不知道？我说，我不相信文汇报的提法是中央精神，因为如果中央有什么新精神，不会不向人民日报传达。中央文件刚刚说批林整风中要注意反对无政府主义，无政府主义就是极“左”。中央精神要变也不能这样快。

我在信里表示不同意文汇报说的林彪推行的是右倾机会主义，只是在“有的时候，有的问题上”搞一点形“左”实右的东西。我说，刘少奇有右的表现也有“左”的表现，主要是右；林彪有“左”的表现也有右的表现，主要是“左”。当前实际工作中主要的干扰也是“左”。因此，批林就要批极左思潮。

我在信中还引了张春桥、姚文元的话，表示了不同的意见（我想，在写给党中央主席的信中，我用不着隐瞒自己的观点）。姚文元说：林彪反对党的领导，这是右。我说：就其表现形式来说，反对党的领导可以从右的方面来反，也可以从“左”的方面来反。一九五七年右派进攻是从右的方面反对党的领导；林彪煽动无政府主义是从“左”的方面反对党的领导。我还摘引《红旗》第十一期上的话：“刘少奇一类骗子散布无政府主义，是妄图从“左”的方面来否定党的正确路线”，说姚文元的话和《红旗》杂志上的话不一致。张春桥不同意批“精神万能论”和“唯意志论”。我说：我不懂为什么因为毛主席讲了“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就不能批“精神万能论”，我认为这是两回事。林彪既是唯武器论也是唯意志论，这两个东西可以在一个人身上兼而有之，如蒋介石和希特勒就是这样。

以上是我写给毛泽东的信的主要内容。我估计，我这样一封信，由于涉及到高层领导人，毛泽东不大可能会有直接的反应。我想，他知道就行了。不过这是重要的情况和问题毛泽东即使不批示，也会放在心上的。我也考虑到，这封信是冒风险的，为了避免连累别人，我没有给任何人看，写好后就发出去了。没有想到，这封信闯了那样大的大祸。

周恩来的讲话

十二月十九日晚，我还在北京军区大院开会。一个电话把我叫回报社。随后，鲁瑛、崔金耀（军宣队负责人）吴冷西和我坐着一辆小卧车，直奔人大会堂，谁也不知道有什么事。

到了人大会堂，汪东兴先招呼我们在江西厅坐下等待。原定八点开会，推迟了。到八点半，周恩来和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从隔壁房间走出来了。看样子是他们刚刚商量完毕。握手时，周恩来是很亲切从容的样子，江、张、姚却面带愠色。汪东兴不时跑出跑进，作些照料，自始至终很少说话。

沙发摆成一圈。我坐在周恩来旁边。正式开会前，周恩来问我是从那个大学出来的，什么时候参加革命，有没有去解放区，去那个解放区，等等。我虽是第一次和这样一个我所敬仰的伟人谈话，却毫无紧张之感。他面色红润，看来很健康。我当时还不知道，这时他已身患癌症了。

会议开始。周恩来作为主持人，第一个讲话。他说：收到你的信，主席批给我们办，还有陈浚的、理论部的，都联系到你所提的问题，就是‘左’和右的问题。”

这时我才注意到，江青前面的茶几上放着一叠信，我仿佛看到我的那封信就摊开在那里，张春桥、姚文元也拿着几封信翻来翻去。我确实没有料到，我的信会落到他们手里！

接着周恩来讲话，主要内容是：

王若水同志听到八月一日我的讲话。我讲极左思潮要批透，是指外交政策，还有工作上的一些问题，不是讲林彪

的整个路线。林彪叛党叛国，那是极右了。中央报刊上曾经指出过极左思潮，《红旗》十一期也提过，但是我们没有定性为“左”。至于表现形式，也有形“左”实右。说林彪是“左”，在原则上是错误的。这是中央务虚不够，不能完全责备报社的同志。当然群众有极左思潮，他来利用，到后期就右得很。党报和党刊应该一致。这次是美国记者，说北京的官方报刊走着不同的道路，指的是人民日报批判无政府主义这篇文章。我看了一遍，是王若水的信来了以后才看的，觉得文章是错误的，因为理论上没有说清楚，联系实际也不恰当。把林彪说成是无政府主义的代表也是不对的。林彪也是有他自己的政府嘛！当然在有些文章中有这样的提法，我们没有注意，中央有一定的责任。如有些地方说批林就是批极左思潮，这就批错了，批到群众头上了。现在批林是批林彪的反革命，揭露他，这是我们批判的主要矛头。当然我们个别文章也有毛病，各省的更多。中央对这方面的理论工作，没有好好研究，务虚不够，这是有缺点的。

《红旗》和人民日报相互之间，交换意见，互相切磋勉励，只有好处。

现在人民日报好象有几个对垒似的。国际部、理论部，都给我写信。又不是原则争论，都集中力量攻鲁瑛同志，我们觉得不妥当。如说鲁瑛同志弱一些，可以这样说，但还是好同志嘛。人民日报遭遇也复杂。现在要建立一个领导小组，议论很多，表现有些争权。

兄弟报纸要互相帮助。文汇报提点意见，是在内部情况嘛！文汇报反映情况是应该的。彼此应该互相切磋，双方可以交换意见。

以上是周恩来讲活的主要内容。我摘的都是他的原话，

只是略去了不重要的或没有直接关系的部分。五十年代我曾有机会直接听到周恩来作报告，当时他的讲话的逻辑力量和有魅力的风度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就在一九七二年二月，尼克松访华和周恩来作了长时间的会谈。后来尼克松回忆到周恩来时作了很高的评价，说他“讲话逻辑性强，并且热切和具有说服力。”（尼克松：《领导人》）然而，这一次我对周恩来的讲话却没有这种印象。他讲得很长，至少一个钟头，内容有些散乱。我想，他可能是有意铺得很开，冲淡主题。我还感觉有时句子还不完整，有时语气不连贯。刚刚批评龙岩文章是错误的，接下去又说“理论上没有说清楚，联系实际也不恰当”，这又似乎说这篇文章只是有缺点而不是有错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我可以理解，总理是在说违心的话。他不能不批评，但他仍想保护我。他说中央务虚不够，不能完全责备报社的同志，这是主动承担了责任。其实，他没有任何责任，因为他本来是正确的，如果有责任的话，也决不是他一个人的。毛泽东说过要反“左”，中央文件说过要反“左”，即使张春桥、姚文元在“八八讲话”中也说，“不能把批林、批陈同批极左思潮和抓‘五·一六’对立起来”，“批林批够了，极左思潮也解决了。”然而江、张、姚自始至终没有说过一句自我批评的话，反而装出一幅“一贯正确”的样子。

江青放炮

周恩来讲完，说，“我开个头，你们三位讲吧。”江、张、姚三个人都不讲，张春桥要报社的人先讲。我们几人都讲了。

接着江青讲话，她一开口，就放炮了：

“你组织的这篇文章的矛头是对着群众。人民日报这篇文章鬼标题可长了。我也勉强看完了。（下面她提高了嗓门）这不是对着林彪，是对着群众！我对人民日报的事情不太清楚。我有一个感觉，这封信不管动机如何，客观上对中央起着挑拨作用，我看了以后很不高兴。拿着总理在某一场合某一个问题上话来利用。林彪的路线，右到叛国了。至于他在某一个时间、某些事情上，利用极‘左’思潮，实质上也是极右。你这封信，好象春桥、文元同志跟总理闹别扭，我认为太过分了。全篇不是很讲理的。还提到现在形势好象‘海瑞罢官’，会是‘海瑞罢官’那种形势吗！”

“我今天还收到一封信，是理论部部分党员写的。都在中央工作，怎么可以把两个政治局委员和一个常委对立起来呢？我还突然收到了几个口袋，都是对鲁瑛进行人身攻击。我当然不是说你这个同志（指鲁瑛）没有缺点。我也有官僚主义，没有看。”

姚文元插话：“有些信那样写，把一个人的缺点收罗在一起，简直少有，只有黄色小报才那样写。我有次在主席面前说过，论战可以，但这种手法我不欣赏。”

这时，周恩来也作了插话。由于我再次提到《红旗》十一期的文章，他叫秘书把《红旗》拿来翻阅了一下，说：“无政府主义那篇文章，矛头不是对着林彪的本质问题。《红旗》十一期有篇文章，提到刘少奇提倡奴隶主义，林彪煽动无政府主义，那样说可以。当然不一定这样分类，好象一个代表‘左’，一个代表右，但总的观点是对的。”这里周恩来作了一点巧妙的反击。他引用了姚文元主管的《红旗》上说的林彪煽动无政府主义的话，然后肯定这样说是可以

的，这就使姚文元无话可说。

然而我观察到，江青这番话，显然使周恩来感到意外。周恩来讲调子是温和的，江青却是提高了嗓门。周恩来把我的错误说成是认识问题，而江青认为我心怀叵测。江青说那篇文章是矛头对着群众，说我挑拨两个政治局委员和一个常委的关系，说理论部同志的信对鲁瑛进行人身攻击，这些都是周恩来没有提到的。本来，这次接见怎样对我们谈，在接见我们之前的小会上应该是商量好了的，统一了口径的。江青这样一讲，气氛突然紧张起来了，她批评我把中央领导人对立起来，可是她又用自己的发言显示了和周恩来的不一致。在以后的谈话中，周恩来为了掩盖这种分歧，就多次用插话来弥补这一点，把调子提上去了。然而如果加以注意，就会发现其间仍然有微妙的区别。

张、姚的表演

江青讲完，张春桥、姚文元就好办了。他们都表示：“同意总理意见，同意江青同志意见。”

姚文元讲了一些话，都是即兴式的。他把身子埋在沙发里，一只腿翘得高高的，显出一副胜利者的得意神情，不时在别人讲话的空隙中插上自己的一段话。张春桥则接过江青的话加以发挥（我认为实际上江青说的也是张春桥的意思）。他的语调很严厉：“怎么能设想工农兵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呢？上海工人对这篇文章意见大了，觉得受了侮辱。我为了维护党中央机关报的威信，一句话都不敢说。一方面说，无政府主义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一方面怎么能说群众搞无政府主义？我说非要反面教员教育不成。叫敌人抓住了！怎么

能说千千万万工农群众是无政府主义？怎么能说他们是林彪的反革命工具？这是极右的思想！”

龙岩文章并没有说工农群众是林彪的反革命工具，而是说无政府主义是这样的工具。张春桥说被“敌人”抓住了，指的是外电。他是把外国记者都当成敌人的。这种事本来是常有的，不足为奇。即使要追究，也不能怪人民日报，而应该怪张、姚自己。人民日报的文报章发表于前，《红旗》的文章发表于后。张、姚对人民日报文章有不同意见，完全可以明说，叫人民日报再发一篇文章，进行纠正就是了。他们不这样做，却通过《红旗》来唱对台戏，这才被“敌人”抓住的。周恩来说党报和党刊要通气，正是指这一点。

由于我在汇报中提到一九七二年第三十一号中央文件（关于四川的批林整风）中的一句话：“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总头子是林彪，煽动极左思潮的总头子还是林彪”，张春桥这样回答：“四川文件主要是纠正梁兴初批极左，转移大方向。为了照顾批极左的同志，才说了那样几句。如同你在总理、文元同志找空子是不行的一样，在中央文件中找也是不行的。你这个人真有意思，从中央文件找根据，从总理找根据。”

在周恩来讲话时，我已经意识到，我在信中引周恩来的话，是捅娄子了。因此，我在汇报时，就多次引中央文件。我没有想到，张春桥会说出这样的话。从总理身上找根据不行；从中央文件找根据也不行吗？批“左”还是批右，这既然是大方向问题，也就是原则问题；原则问题能够“照顾”吗？中央文件能够为了“照顾”一些人而牺牲原则吗？况且，我怎么知道那几句话是“照顾”性的呢？既然可以照顾别人，那么为什么对我又如此不能容忍呢？……后来我才悟

到，张春桥是有一个权威比周恩来和中央文件还要大得多的根据的。和这个最高权威相比，中央文件也算不得什么了。

这一点可以从张春桥以下的话得到证明。他说：“我跟冷西、鲁瑛有次交换意见，说批精神万能论值得研究。我是当作一个问题提出来的。还有唯意志论，是苏联骂我们的，我们为什么用这个词？空头政治也值得研究，‘五七一’工程是反革命政治嘛！用什么概括，值得研究。我在政治局也提过。王若水同志的信，引了我的一些话，好象我反对批极左。其实那些话也不完全是我的意思。”

这时我的心里打鼓了：张春桥说八月八日的讲话不完全是他的意思，那么还能是什么人的意思呢？！

姚文元接着说：“主席说，旧的心理学分知、情、意，其实是一个东西。我觉得主席庐山会议上讲的唯心论的先验论，最能抓住问题的本质。苏修骂我们唯意志论，为何要用敌人的语言？主席还说，坐在这里讲话，难道我们只有思想，没有意志感情？”

我以为我是批评张、姚和文汇报，实际上是批评到谁头上去了呢？我感到闯了大祸了，自己倒霉是小事，还连累了总理。张、姚早就知道了毛泽东的意图，而周恩来看来事先不知道。这就是张、姚把事情弄得如此神秘的原故。

下面还有不少谈话，但比较零碎，限于篇幅，就从略了。

会议的结果

批“左”还是批右的问题，就这样解决了。至于人民日报正式领导班子问题，会上决定暂缓成立。江青说，“要发现

新的力量，要让他们讲话，不要怕。”张春桥说，“就在批林问题上分清是非。经过这一场，领导班子可能出来。”还说对人民日报的“一股邪气，一股势力”要解决。江青说，“要从这篇文章入手，从这块版入手，从理论部入手。”

会议足足开了五个半钟头。从十九日晚八点半开始，到结束时已是次日凌晨二时了。

会议结束时，照例一一握手。我紧握周恩来的手，努力要从他的脸上看出点表示，然而我发现，他的脸孔变得没有任何表情。

这次会议给我提供一个难得的机会，使我能够从近处观察这几个高层领导人和他们之间的关系。在这以前，我是把江青同张、姚分开的，只觉得张、姚不好，而江青大概是受他们包围。我还以为，毛泽东和周恩来之间是完全一致的。从这次会后，我才知道我想错了。

这次会议“端正”了人民日报的斗争大方向：不批林，批“一股邪气”。一场暴风雨到来了。……

几点反思

本来已经很“左”了，应当反“左”，却仍要反右，这样的事情从建国后发生过多多次了。从大的说，这次事件以前有批彭德怀的例子。在这次事件以后有“批邓”的例子。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想，因为批“左”会产生一连串问题：如果林彪是极左，那么有没有一条与之对立的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呢？这两条路线是如何斗争的呢？“九大”是哪条路线的胜利呢？这样一来，不仅会批到江、张、姚头上，甚至难免会有损毛泽东这

面旗帜，会否定“文化大革命”，而这是江、张、姚决不能容忍的，也是毛泽东决不能容忍的。即使主张批“左”的人（如我们）主观上丝毫没有这种企图，但是事情的发展会有它本身的逻辑，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比如批“精神万能论”、“唯意志论”、“空头政治”，这些错误难道只属于林彪吗？张春桥说“大乱”、“红卫兵造反”、“停止党的组织生活”，这些都是毛泽东号召的，是毛主席决定的，不是无政府主义。他要这样辩护，正因为他害怕有人会说这是无政府主义；而他之所以害怕，正因为这些事情确实是无政府主义。这种话究竟是他向毛泽东的进言，还是毛泽东对他的示意，我们无从得知，但毛泽东会有这样的担忧，却是不奇怪的。一九七五年的“批邓”其实也是出于这样的动机。然而，历史是公正的。一九八一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终于作出了正确的结论。

一九七二年的事情还表明，“四人帮”尽管满口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整起人来却如此不择手段。明明自己不批林，要批周，却反过来说你转移斗争大方向；明明是自己搞分裂，却反过来说你挑拨关系。“欲加之罪，何患无词。”自己做过的事说过的话则对不起，忘了。张春桥有一句名言：“工作由他们做，责任由他们负，辫子由我们来抓。”内政外交的担子都压在周总理头上，压在国务院少数领导同志的身上，他们这几个秀才就专门来找岔子，搞破坏，然后加罪于人。事情竟荒唐到如此地步：搞无政府主义不算什么，反无政府主义倒是罪大恶极；极左思潮不是问题，反极左思潮才是严重问题；反对无政府主义和极左思潮就是右，因此要反右。这样搞下去，当然是非把经济搞垮不可，而那时他们又

要出来抓对方的辫子，叫对方下台了。

过去的经验还向我们的新闻学理论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党报要接受党的领导，执行中央的指示，这是毫无疑义的，可是，党内并不是永远没有分歧的。一个中央领导人这样指示，另一个中央领导人那样指示，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听谁的？是见风使舵，还是以对人民负责的态度动动脑筋？错误路线的代表或野心家企图控制党报的事情，也是会发生的。是当驯服工具，还是进行抵制？

历史在这里沉思……

一九八八年三月三日周恩来九十诞辰前夕脱稿

白智清上周恩来书

敬爱的总理：

我含着激动的泪花，给您写封信来。我深知讲这几句人
人意中所有的话，代价是我的生命，但是在国家和民族生死
存亡的关头，我的生命又算得了什么。

五十年代初新中国犹如东升的旭日，蒸蒸日上，欣欣向
荣，建设突飞猛进，生活日新月异，最叫人激动的是您的
政府工作报告。人民回首成功的过去，展望着辉灿的未来，
那个时候，生产上升的指数，大大超过人口增长的指数，有
谁为自己的前途担忧，又有谁为自己的饭碗发愁。那个时候
青年人怀着伟大的理想，老年人越活越年青……社会上有几
个扒手，有几个流氓，有几个小偷……为什么现在反而成了
这个样子。……敬爱的总理，人民深深知道您不会不痛心，
更不会忘了37年的教训，民族的奇耻大辱……在您和一切
爱国的老干部的努力之下，国家又在复苏……广大的人民
又有了希望……可是皇帝娘娘的×疯发了，又整成这个样
子……

总理啊！总理！如果继续这样下去，列强的瓜分，民族
的屈辱又会重新出现，在中华民族的面前，您难道愿做一个
民族的罪人么？难道您真的相信在帝国主义的实力面前，
“思想”会比鸦片战争时期的“天朝圣威”有用么？

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的力量要用物质的力量来打倒，鸟尽弓藏，兔死狗烹，千古如是。这些人锋芒毕露，矛头所向之处，总理您应当是非常明白。

现在而今，它们还没有这样大的力量，当前只能有短暂的平衡，到手足具削之时，便悔之晚矣……

敬爱的总理，不要以为它们有多大的力量，您应该清楚，党内党外，军内军外，上上下下就连造反派中的百分之九十九都恨不能食江皇后之肉，喝王洪文之血……人民在爱国的一边。……

“庆父不死，鲁难未已”，敬爱的总理，为了国家的富强，为了民族的昌盛，切勿手软啊！

当断不断，反招其乱！该决不决，自寻其灭！

是决定的时候了！！

心赤客

一九七四年四月十六日

白智清上李德生书

李德生同志：

图穷匕首现，当前斗争发展到此时此刻，我想你是非常明白的了，是要周总理，还是要王洪文，江皇后……

是助纣为虐，与虎谋皮，苟且偷安，还是大义凛然，当机立断，为民讨贼，对您将是一场残酷的考验！

仔细想想，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前车之鉴，后车之覆，此时此刻切勿执迷不悟！！！！

拯救民族和国家的重担，已经落到您的身上，当断不断，反遭其乱，该决不决，自寻其灭……如果到了“后党”形成，大权旁落……最后到了国破家亡的地步便悔之晚矣……

心赤客

一九七四年

白智清给江清的信

江皇后：

春风吹得百花盛开，寒风吹得万物萧索，你的屁疯又发了，又把大好河山整成这个样子。

但凡害国家，误民族，远远超过杨贵妃、赵飞燕。不管你头上戴了多少顶堂皇的桂冠，也不管你现在是如何的不可一世，末日就在眼前。人民，全中国人民和海外华侨将活活处死你这个民族的罪人。那无情的历史，将永远把你和那一群狗打入十九层地狱。

不要再卖弄风骚了吧，乌鸦不管怎样用孔雀的羽毛来打扮自己，乌鸦仍旧是乌鸦，永远不可能成为孔雀。

爱国者

心赤客

一九七四年

白智清上叶剑英书

敬爱的叶帅：

我们深深知道，您非常爱国家，非常爱人民，难道您未看见在那群恶狗的践踏下，中国落到了国亡无日的田地？他们把矛头对准总理和所有的老干部，稍有一点爱国心的人，有哪一个不想吃这群恶狗的肉，喝这群恶狗的血啊！军内军外，党内党外，上上下下，人们的眼睛都快要冒火了。

叶帅，敬爱的叶帅，为了拯救国家，拯救民族，因势利导，担负起这个沉重又伟大的担子吧，我想第一步，告诉军队，没有总理、你、小平的名字，不管谁都调不动!!! 我们相信军队是听你们话的。第二步，对林彪系统的将士，只能安抚，不能压服，以免搞出问题，不要逼上梁山。我想他们其中绝大多数人都是恨这群狗和爱国的，还是听你们的话的。

叶帅，农夫惜蛇被蛇咬，放虎归山虎伤人。是干的时候了。

为了祖国的富强
敬礼！

心赤客敬上

一九七四年六月一日

白智清上邓小平书

敬爱的邓副总理：

作为您的同乡和一个中国人，我给您抄来几句可能您早已熟知的蜀相“诸葛亮”的语录。

现抄录如下：

赏罚之政，谓赏善罚恶也，赏以兴功，罚以禁奸，赏不可不平，罚不可不均。

赏不可虚施，罚不可妄加，虚施则劳臣怨，妄罚则直士恨。

赏赐不避怨仇……诛罚不避亲戚，赏罚不正，则忠臣死于非罪，而邪臣起于非功。（赏罚第十）

纳言之政，谓之谏诤，所以采众之下谋也。

夫人君拒谏，则忠臣不敢进某谋，而邪臣专其政，此亡国之害也。

是以屋漏在下，止之在上，上漏不止，下不可居矣。

（纳言第四）

喜怒之政，谓不应喜无喜之物，怒不应怒无怒之物。怒不犯无罪之人，喜不从可戮之士。（喜怒第十一）

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之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之所以倾颓也。（前出师表）

将写即帝室之胄，议义著于四海……百姓敢不箪壶浆以

迎将写者乎？

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隆中对）

好了，就抄录于此吧！

敬爱的邓副总理，您有何感触呢？思古抚今，能不肝胆俱裂么？国家落到这步田地。难道不是“赏罚不明，忠臣死于非命，邪臣起于非功”么！难道不是不纳忠言，忠臣不敢进其谏，而邪臣专其政么？

难道不是喜怒无常，怒犯无罪之人，喜从可戮之士吗？

难道不是，亲小人，远贤臣，使国家所以倾颓么！

邓副总理，希望您别忘了您是炎黄的子孙啊！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何况你是堂堂副总理。

难道您忘了，您们远离故土，出国寻救国救民的真理时，难道您和您的战友，为了国家和民族的昌盛，在战场上出生入死的时候！

我想对拿破仑您一定不会陌生的。拿破仑第一次退位后，在1815年3月1日开始的第二次政变。从厄尔巴岛发动时只有为数极少的一千人，再返巴黎，不用一枪一弹，便推翻了掌握整个法国和几十万军队的波旁王朝。

这并非神话，结论只有一个，他代表着法国的民族的利益……得人心者得天下。

现在而今，全国人民的心，全军队的心，全民族的心，又向着谁？

事实，严酷的事实教育了人民，是谁，使锦绣河山赤地万里，饿尸遍地；是谁，带着人家死里逃生，渡过非常时期；是谁，使国家蒸蒸日上，欣欣向荣；是谁又使国家落到这步田地。谁是人民的儿子，谁又是民族的罪人，人民都看清楚了。

当你任总长的消息传达后，全国，特别是军队，掌声雷

动，经久不息，多少人感动得热泪长流。

而对另一个，根本就没有什么声响，有的是仰天叹息。

不甘心民族重遭奴役，国家重受破碎的中国人，都把希望寄托在您和您们身上。

邓总长，北有苏修，南有印度，你何以对敌。一旦战争爆发，唉！

自强才是根基，拉东打西，哪是长久之计。

庆父不死，鲁难不已。要想自强，不除四贼，终归妄想。

将军仁义著于四海……，我们深信，你能拯救中国，救民族，也救自己。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为了祖国和中华民族，敬礼！

心赤客

一九七五年三月二十日

简介 白智清，男，1945年出生，四川成都市人。1965年从成都一机校毕业，分配到重庆钢铁公司机修厂当技术员。他是在五、六十年代的理想主义和爱国主义教育下成长的，一心盼望着国家富强、中华振兴，为此，甘愿献出自己的鲜血和生命。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这位二十多岁的热血青年和当时绝大多数人一样，被卷入了这场由毛泽东亲自发动的“大革命”之中，但就是在“文化大革命”之初的“革命大批判”中，白智清读到了彭德怀元帅1959年写的“万言书”，这使他开始对“文化大革命”作冷静思考，并逐渐认清了“文

化大革命”的本质。

在“十年浩劫”的前八年，白智清只是默默地为无数老干部、为无数无辜的民众受迫害而愤愤不平，为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担忧。在实际的斗争中，白智清认识到，是江青、张春桥等“三男一女”，搞得全国不得安宁，是他们要打倒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而祸国殃民。

1974年，当“四人帮”一伙丧心病狂地迫害周总理时，白智清以“心赤客”为笔名，发出数封鞭挞“文化大革命”和“四人帮”的信件，被公安部列为“心赤客反革命案件”而受到处理追查。

白智清满怀一腔怒火在给江青的一封信中痛骂她：“你的疯母狗病又发了，又把祖国的大好河山搞成这个样子！但是，不管你头上戴了多少顶堂皇的桂冠，也不管你现在的如何的不可一世，末日就在眼前。人民，全中国人民将狠狠处死你这个民族的罪人，那无情的历史将永远把你和那一群狗打入十八层地狱！”

白智清出于对祖国的前途和命运的担忧，又给敬爱的总理和叶帅，还有其他一些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写信，他在信中说：“当前斗争发展到此时此刻，锋芒所向之处已经是非常清楚的了……拯救民族和国家的重担，已经落在你们身上。当断不断，反遭其乱，该决不决，自寻其灭，是时候了……如果到了‘后党’形成，大权在握——最后到国破家亡便悔之晚矣!!!”

他还给邓小平写了信，希望他能尽快搞出个社会主义的法典来，拯救中国社会。

1976年，动荡的岁月。白智清懂得，要反对江青、张春桥，不仅要靠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更主要的要靠广大

的人民群众。他暗暗下定决心，要到人民中去点火。

1976年2月7日夜，白智清奋笔疾书，以“祖国忠诚的儿子，重钢职工白智清”的真实姓名，写下《我爱我的祖国》这张震撼山城的大字报。

第二天，白智清把它工工整整地贴在解放碑前人来人往最多的地方——交电大楼的墙壁上。人们很快就注意到这张不同凡响的大字报，一传十，十传百，有的竖起大拇指称赞，也有的刷出大标语，谩骂：“白智清把矛头指向党中央绝无好下场！”“揪出白智清的黑后台！”

紧接着，白智清的第二张大字报也写好了。他调好浆糊装在饭盒里，准备了一把浆糊刷子，带上大字报，要到他的老家成都去把火也点起来。

3月2日晚上11点多钟，白智清登上开往成都方向的列车。次日清晨，他一到成都，没有回家，在一个旅馆登记了住宿，就匆忙上街，他要为自己的第二张大字报找好战斗的地方。

3月4日清晨8点半钟，白智清来到昨天选好的“点火场”——成都最热闹的地方——盐市口，从胸前的衣襟下掏出写好的大字报，从容地从第一张贴到第十二张。

赫然的标题，使人们的心都猛然一惊：《试问，到底是哪家的“主义”？——评张春桥的〈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

这是当时全国的许多大字报中，第一张用自己的真名实姓，直指张春桥的大字报。揭露得如此深刻、犀利，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大字报出来，把整个蓉城都轰动了。他说出了四川人民久久压抑在心里想说又不敢说的话。成千上万的人挤到盐市口仔细观看，坚决支持这张大字报，以致在3月5日当

“四人帮”的走卒用大标语覆盖白智清的大字报时，遭到怒不可遏的冲击，从而引发了震动全国的“成都三·五事件”。

蓉城的火点起来了，白智清冒着随时都有被抓起来的危险，抢时间完成手头还有一张未完成的大字报。

白智清机智地转移到一个僻静县城的一家旅馆，开始了他的《二评张春桥的〈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要马列主义，不要修正主义》的大字报。准备把它贴到西安和郑州去。

就在3月4日夜，“四人帮”去成都的黑干将邓兴图等人把在盐市口所发生的一切向“四人帮”作了报告。在王洪文的授意下，公安部的一张捉拿白智清的通缉令飞遍全国。

1976年6月32日中午12点多钟，白智清就在广汉县的那个旅馆里被捕了，随后被关押在成都的一所监狱。

在监狱里，白智清时刻不忘自己的使命，利用一切能够说话的机会，向人民呐喊，他向上当受骗审讯他的公安人员揭露张春桥等人的罪恶，表达自己对祖国的一颗赤子之心，使在场的审讯人员都为之动容。重庆的一位公安人员悄悄地对自己的老首长说：“这个同志真了不起，白智清是个英雄！”

在“天安门事件”后不久，白智清以“天安门事件”的同伙的罪名，被押往成都、重庆等地批斗。他对批斗会上强加给他的一切诬蔑之词，报以轻蔑的一笑。

王洪文办公室催着要把白智清处以死刑，但在省委的抵制下，“四人帮”的阴谋未能得逞。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后，在广大人民群众的强大要求下，白智清终于在1978年7月31日被释放。

1978年11月24日，中共四川省委常委会议决议：1976年

3月4日，重庆钢铁公司技术员白智清同志，在成都盐市口贴出一张揭发、批判张春桥的大字报……这是出于对“四人帮”祸国殃民滔天罪行的无比痛恨，完全是革命行动，充分反映了白智清的高度政治觉悟和革命精神。省委决定：对于在这个事件中受到迫害的白智清同志，应彻底平反，恢复名誉，并向全省公布。

白智清回到重庆钢铁公司后，努力工作，积极投入到改革的洪流中去。1979年6月，他提出了一项可提高工效八倍，一年可节约资金上万元的技术革新建议，受到公司的奖励。1982年，他再次上书中共中央有关负责人，对乡镇企业的发展提出了自己的见解。白智清这颗精忠报国的赤子之心和忧国忧民，为国家和民族利益奋斗不息的精神，在中华民族的振兴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杨建立）

附(一)：

给同志们介绍两篇文章

信奉马列而不信神的同志：

我给你们介绍两篇文章，万望你们对照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和列宁的《国家与革命》来读一读，想一想吧！

一篇是刊登在五八年上海《解放》半月刊第六期上，张春桥写的《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的文章，又在《人民日报》同年十月十三日转载。

在这篇文章里你将会看到，张春桥是怎样用他的“彻底破除了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的“共产主义的供给制”，代

替了马列主义的“不劳动者不得食”这个社会主义的原则，“按等量劳动领取等量产品”这个社会主义的原则的。

另一篇文章里，你将会看到，它是怎样为张春桥叫好的。

同志们，不妨翻遍五八年各地的报刊吧！看：当年除了张春桥以外，有谁喊出了“彻底恢复和发扬共产主义供给制”，又有谁在张春桥前喊出了“彻底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的口号。

如果说“三自一包”、“四大自由”，是从右边修正马列的修正主义。试问，那个给国家给民族给人民造成了巨大的危害、巨大灾难的，从极左边反对马列原则的张春桥的“吃饭不要钱”的“共产主义供给制”就不是修正主义吗？！

为什么他不把那个“彻底破除了资产阶级法权的共产主义供给制”原封不动又抬出来呢？就在他改头换面地抬出原有货色的时候，还装模作样的骂几句“共产风”呢！

我不得不大声提醒那个骂畜牲的“人”回过头来看：自己摇着的尾巴。

同志们，眼前有两条路：

一条是，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们所带领我们走的马克思的“科学共产主义”；

一条是，张春桥的把天下良田变成草原的“原始共产主义”。

让张春桥的“原始共产主义”见鬼去吧！

我们社会主义祖国，我们中华民族要繁荣富强，不要落后贫穷。

要马列主义，不要脑袋！

重钢 白智清

一九七六年二月六日

附(二):

我爱我的祖国

在边境上百万重兵压境的现在，在“不能争取三年、争取两年也好”的日子里，在国家和民族处在生死危亡的的关头，……作为七十年代的青年的我们，虽然未曾经过亡国的苦难，但是，六九年惨死在苏修疯狂的战车下的那些手拿语录牌的渔民同胞的鲜血啊！却是实实在在地淌在我们的眼前（见实况纪录片《新沙皇的罪行》）。

我们这些当年的造反派战士，以后的“批清”受害者，在总理骨灰未冷的而今，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我们只有一句话：“我们是中国人，我们热爱自己的祖国。”

我们不信神，也不相信“天朝圣威可以慑服洋人”这一类狂妄无知、自欺欺人的精神万能论的变种。我们知道，战争是物质的运动。我们深信恩格斯指出的：“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都是经济的条件和资源帮助‘暴力’，取得胜利”的真理，更没有忘记毛主席关于战前多流汗，战时少流血的教导。

我们多么希望边境上多几门大炮，战士多几样武器，海上多几艘军舰，天上多几架飞机，……多么希望……而这一切都需要钢，需要时间，需要……

当七四年钢铁生产大幅度下降的时候，当七四年弄出了解放二十几年来第一个财政赤字的时候，……看着多少个烟囱停止冒烟，看着多少部机器停止转动，看着多少辆火车停

止运行，看着……的时候，……多少个关心自己国家前途、忧愁自己民族命运的中国人心急如焚，肝胆俱裂啊！

作为国家钢铁战线上的战士的我们，作为还没有完全丧尽民族天良的中国人，每当看到我们国家历年来钢产量数字的时候，就不得不引起我们对那些丧尽民族天良的修正主义者，对那些置民族危亡于不顾的畜牲们的切齿愤恨。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胜利结束的五七年，我国的钢产量是五百三十五万吨，大跃进的五八年，我们国家的钢产量达到一千一百万吨，比五七年多六百万吨。五九年超过了十年后的六九年，我国的钢产量只有一千一百万吨……自一九六九年的社会生产稳定到七三年这四个年头里，我国的钢产量都是从以平均每年净增三百万吨的速度上升的，七三年达到了二千三百多万吨。本来七四年我国的钢产量可达二千六百万吨，七五年越过三千万吨是毫无疑问的了。在七三年，生产上、科学上、文化教育上都有一点上升跃进的雏形。当时的不少人都盼望着一个大跃进的局面的到来。

然而，七四年却是生产大幅度下降的一年。七四年啊！钢产量还不足二千一百万吨。七四年啊！也是国家民族时刻都有挨打的可能的一年！

七五年，大家都知道是国民经济、人民生活全面恢复上升的一年。七五年我国的钢产量大幅度上升到二千四百五十万吨。七五年的钢产量是十年来净增最多、上升最快的一年。

如果按照七五年的步伐，今年我国的钢产量至少该是八千万吨了。如果按照五八年大跃进的速度，我国早超过苏修的一亿三千万吨了。即使就按六九年后上升的步伐，今年我国的钢产量也接近四千万吨了。但是……是谁，到底是谁，

葬送了国家的高度工业化，葬送了国家的富强、民族的昌盛、人民的幸福！并且连国家和民族赖以生存、反侵略战争赖以依托的“经济条件”也不放过……

我们实在控制不住了，我们只有高呼：我们是中国人，我们热爱自己的祖国！

回首过去的日子，年华虚度，岁月枉过。祖国啊，我没有为您作出多大贡献。

今天啊，今天在您生死存亡的日子里，祖国啊！请您收下我一腔为您奔流的热血吧！

祖国忠诚的儿子、重钢职工

白智清

一九七六年二月七日

附(三):

试问，到底是哪家的“主义”？

——评张春桥《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

写在前面

毛主席语录

我们现在思想战线上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开展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

最近，有人迫不及待的在上海街头公开刷出了“要马列主义的理论家张春桥作总理”的大幅标语。对于这种明目张胆地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反对华代总理、反对人民的

反革命行动，我们不能再沉默了。

事实告诉了大家，张春桥不是马列主义者，而是打着共产主义旗号，偷换杜林修正主义的黑货，给国家、给革命、给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修正主义分子。看看吧，当年反马列的赃证俱在，是赖不掉，包不住的。

我们这些还没有完全丧尽民族天良的中国人，深深的记得毛主席“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的教导。

为了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和民族的繁荣和昌盛，为了祖国能够走马克思和列宁的科学社会主义和科学共产主义道路，为了捍卫马列主义的原则，我们，愿意献出鲜血和生命来。

历史的“功绩”不容推脱

翻开十九年前（五八年）的上海《解放》半月刊第六期，上面有一篇张春桥写的《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的文章。在这篇文章里，人们看到，张春桥对马列主义原则的“创新”和“发展”。即用张春桥的“共产主义供给制”代替或部分代替马列主义的“不劳动者不得食”这个社会主义的原则，代替“按等量劳动领取等量产品”这个社会主义的原则。

张春桥在他的文章里是这样讲的，他是这样的介绍他的“共产主义供给制”的：

“凡是略为知道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历史的人，都会知道：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军队和革命根据地内部，从工农红军到后来的八路军、新四军、人民解放军，从井冈山根据地到后来广大的解放区，在那里，从来就是以军

民平等、官兵平等、上下平等作为处理人民内部相互关系的根本原则的。……大家过着共产主义性质的供给制生活……”

“大家还记得解放战争时期大兵团作战的情景吗？为了支援人民解放军，成千成万的民兵跟随大军南下，他们同军队一样地过着军事共产主义生活，一不为升官，二不为发财，甚至也没有想到要发工资，更没有想到要实行什么‘计件工资制’……。”

“正是这种军事共产主义生活，标志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作风，毛泽东思想的作风，在亿万人民中已经扎了根，开了花，结了果。”

“在全国解放以后，这种以‘供给制’为特点的一套军事共产主义生活，还是很吃香的。……一些革命青年刚刚参加工作，也希望是‘供给制’。……原来过惯了供给制生活的同志，也并不羡慕什么薪金的，人们喜爱这种表现一种平等的相互关系的生活制度。……”

他是这样列举“共产主义的供给制”受到“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攻击和破坏的：

“但是，没有多久，这种生活制度受到了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攻击。……在坚持这种思想的人们看来，供给制的一套，实在毫无可取。他们轻蔑地说它是‘农村作风’，‘游击习气’。……共产主义的供给制，保证了中国革命胜利的供给制，被某些人攻击得好象犯了大罪，非判处死刑不可。”

“人们攻击供给制的最根本的理由，就是供给制不能刺激生产积极性。他们的理论根据就是经济学家们所强调的‘物质利益的原则’。据说，由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还保

存着不少旧的分工的残余，即脑力劳动同体力劳动之间、工人劳动同农民劳动之间，熟练劳动同简单劳动之间的差别，因此，‘工作者从物质利益上关心劳动结果和生产发展的原则，就被说得神乎其神。什么‘等级工资制’、‘计件工资制’可以刺激工人‘对自己的劳动成果表现最大的关心’呀，可以刺激‘社会主义竞赛的发展，因为劳动生产率高，工资也高’呀，这种制度是‘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杠杆’呀，道理多极了。不过，说穿了，说得通俗一些，还是那句老话：‘钱能通神’。只要用高工资‘刺激’，就象花钱买糖果一样，什么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都能够立刻买到手的。”

他是这样为“共产主义供给制”伸张的：“在‘供给制’的情况下，千千万万的人进行了几十年的武装斗争，爬雪山，过草地，两万五千里长征，有谁发过工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难道也是靠工资刺激出来的吗？”

“不是别人，正是那些被经济学家认为最关心自己工资高低的工人们，说出了同经济学家根本相反的意见。上海的工人们，经过大鸣大放大辩论，尖锐地指出了这种理论和办法是‘钞票挂帅’。……”

“经过几年来的实践，证明了对‘供给制’、对‘农村作风’、‘游击习气’的攻击，实际上是资产阶级为了保护不平等的资产阶级的法权，为了打击无产阶级的革命传统，而对正确处理劳动人民内部相互关系的共产主义原则的攻击。……攻击供给制不能刺激生产积极性的人们，实际上就是要用资产阶级制度的礼、法来代替无产阶级的平等关系。”

张春桥是这样“号召”“彻底恢复和发扬”张春桥的

“共产主义供给制”、彻底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

“因为党的传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是在我们党的干部和人民群众中扎下根的，它虽然遭受到某种破坏，恢复起来并不太困难。”

“既然大跃进的形势迫切地要求我们在调整相互关系方面跃进、再跃进，一切忠实于共产主义事业的同志们，一定能够站在运动的前头，把我们党的这种光荣传统，在新的条件下，彻底恢复和发扬起来，彻底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

正是这“彻底恢复和发扬”，正是这“彻底破除……”五八年全国绝大部分农村才实行了“包吃、包穿、包住、包教、包治病、包死葬、包理发、包看戏、包烤火费和结婚费……”的张春桥的“共产主义供给制”。大部分城市比农村晚一步，因此还没有尝到这个“共产主义供给制”的“甜头”。

工人同志们，贫下中农同志们，解放军同志们，不妨翻一翻五八年各地的每一张报纸，每一本刊物吧！便会发现，在张春桥以前，从来没有任何一个人提出过“要彻底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从来没有任何一个人提起过“要彻底恢复和发扬共产主义供给制”的。……没有张春桥的文章，没有“彻底恢复和发扬……”、“彻底破除”之类，就肯定不会有五八年农村的“共产主义供给制”。

历史；那无法更改的铁的历史，那白纸上写下的黑字是无法抹掉的。张春桥为国家，为人民，为民族立下的“丰功伟绩”已经载入了史册。这历史的“功绩”，要推是推不脱的。

每一个尝到过那“包吃、包穿……”张春桥的“共产主

义供给制”的甜头的人们，千万不要忘了张春桥的“大恩大德”啊！

我想，如果没有人起劲地反对张春桥的“共产主义供给制”精神，可能早就要全面实行了！……岁数还不很大的我，还没有真正尝到过“一顿饭一两二钱水泡高粱”的张春桥的“共产主义供给制”的味道，我时刻地“等待着”这一天的到来。

我深信，在天安门广场上，那千千万万给总理守灵的人们，那千千万万自动为总理戴上青纱的朋友，那希望国家富强、希望民族昌盛、希望人民幸福的每一个中华儿女，还没有完全丧尽民族天良的任何一个中华儿女，还没有完全丧尽民族天良的任何一个中国人，也肯定和我是同样的心情。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个“重大贡献”

一切信奉马列而不信神的人们，翻开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吧！看看为全世界共产主义者所公认的科学名言——“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

在名言的前面马克思是这样说的：

“我们这里所说的是这样的共产主义社会，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所以，每一个生产者，在作了各项扣除之后，从社会方面正好领回他所给予社会的一切。他所给予社会的，就是他个人的劳动量。”

“……在这里平等的权利按照原则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法

权……”

“……生产者的权利是和他们提供的劳动成比例的；平等就在于以同一的尺度——劳动——来计量。”

“在劳动成果相同、从而由社会消费品中分得的份额相同的条件下，某一个人事实上所得到的比另一个人多些，也就比另一人富些，如此等等。要避免所有这些弊病，权利就不应当是平等的，而应当是不平等的。”

“但是这些弊病，在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在它经过长久的阵痛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里产生出来的形态中，是不可避免的。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

马克思又紧接着告诉人们：

”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上，在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以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以上这些，既是科学的客观规律，又是必须依从的自然法则。

但是，在解放仅仅第九个年头时，明明还存在着人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明明存在着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对立的情形（还存在着城乡、工农、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对立的情形），明明个人还没有得到全面发展，生产力也相当低下，而集体的财富根本谈不上充分涌流……。

而所有这一切，在张春桥的文章里却认为是“据说”。

那体现马列主义的“按等量劳动领取等量产品”这个社会主义原则的“等级工资制”、“计件工资制”，在张春桥的文章里一一被斥之为“钱能通神”。

而他却硬要在生产资料都还没有全部为社会所有的历史阶段上，塞进他的“彻底破除了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共产主义供给制”。

如果说他文化低下的程度连马克思的名言——“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的字句都不认识，那未免太笑话他了，肯定是另有原因的。

.....

好就好在，“马列主义、马赫主义都姓马”。利用人民对共产主义的向往，利用极左的口号来反马列主义，还曾一度蒙蔽了不少同志。

但是，马列主义是科学，谁反对它，谁就会失败。

这就是张春桥那个“马赫主义的供给制”，那个给国民经济造成巨大危害的“供给制”，那个给全国人民造成空前灾难的“供给制”，……那个造成成千成万人死亡的“供给制”，被历史判了死刑的原因。

而当年杜林写在纸上的错误东西，若干年后被张春桥变为错误的现实行动。……给中华民族造成了巨大灾难的事实——不能不认为，这不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一个惨痛的教训吧！

最后，让我们高呼：

要国家富强，不要生命！要马列主义，不要脑袋！

祖国忠诚的儿子、重钢职工 白智清

写在后面

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特别是当你要离开它的时候，更感到生命的可贵。

但是，当百万重兵压境，国家和民族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那些一天不卖国，就一天无法生活的民族败类们，还在一个劲地破坏生产，破坏战备，破坏……的时候，难道生命比马列主义的原则，比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可贵吗！

在过去的日子里，我们的先辈为了拯救国家、民族危亡，为祖国、民族的繁荣昌盛，献出了多少生命，洒下了多少鲜血啊！

今天，当那些打着共产主义旗号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次又一次的向马列主义原则进攻的时候，在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为了拯救危亡中的可爱的祖国、民族，我们哪有任何理由吝惜自己的鲜血和生命！

我深深知道，在祖国繁荣昌盛的大花园中，没有足够的鲜血，是浇不开映山红的。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祖国忠诚的儿子、重钢职工 白智清

一九七六年二月

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

献给毛主席和四届人大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张贴序言

- (一) 社会主义的新问题
- (二)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教训
- (三) 关于林彪体系
- (四) 关于批林以来的形势
- (五) 谈反潮流
- (六) 对四届人大的希望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张贴序言

去年八月以后，人们以为很快就会召开的四届人大至今终于还没有召开，但是我们献给它的这篇文章，却被认为是我们的“体系”了。

我们在这篇文章里初步批判了林彪体系，后来的文章进行了批判，殊不料，我们的一些朋友却把“体系”作为一种吓人的东西赠给了我们，也许我们在这一批判中涉及领域之广阔，自我暴露之全面，真的够得上一个“体系”了。但是，这种体系——即使我们也可承认我们具有某种体系的话，也决不是异端于马克思主义体系之外的东西，我们只不

过是企图以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武器去对林彪体系影响、祸害所及的范围作一番认真的清理罢了。实际上我们还远没有做到这一点。

林彪体系的新暴露与我们一年前对它的评论没有发生多少矛盾，相反，使我们惊奇的倒是在许多方面得到了证实。这次街头张贴的（第三稿）前五部分只作了少量修改，对于第六部分——即关于对人大的希望和对法制的建设，随着一年来形势发展，我们不满意原来的写法了，认为有必要作深入一些的阐述，所以重新写了，而更多的是去年只简略提及，有待发挥和新牵连进来的问题，我们想在这篇序言里说一说。

*

*

*

我们的“体系”之所以使某些人感到吓人，首先是我们讨论的这个题目本身。

据说，稍微有一点马列主义常识的人是不会讨论什么“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的。我们算是连一点马列主义常识也没有的，但是，我们却知道六十年代以来世界上的几件事情：一是多数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覆辟了，一百多个共产党大多数不信马列了；二是在我们中国出现了曾经并且至今还为许多人很不理解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三是毛泽东同志总结了半个世纪社会主义实践的经验提出了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我们必须全文抄录在这里：“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覆辟的危险性。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提高警惕。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要正确理解和处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

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不然的话，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走向反面，就会出现覆辟。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

于是，我们知道，社会主义制度是要改善的，它并非尽善尽美，它在那么多国家打不过新资产阶级，出现资本主义覆辟和在中国必须进行“第二次革命”的事实就是明证。无产阶级必须在今后这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中，进行多次文化大革命，使社会主义制度日臻完善。

以上几点，不算马列主义常识。然而，我们却可以据此断言，社会主义各方面的问题，其中也包括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的问题，完全可以而且应该讨论的。“异端邪说”有什么可怕？真理是同谬论作斗争中发展起来的。

列宁说得好：“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作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恰恰相反，我们相信，它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社会主义者如果不愿落后于实际生活，就应该在各个方面把这个科学向前推进。”（引自列宁全集第四卷一八七页）

我们的“体系”之所以叫某些人感到害怕，第二是因为我们在一年以前的这篇文章里根据残酷的阶级斗争事实和基本路线的所示，提出了新生的资产阶级，新的资产阶级占有方式以及同他们作斗争的问题。

正当我们的文章对于走资派和野心家的社会基础的阐述遭到一些朋友的批评的时候，一个处于享有各种特权的阶层中的青年以贾宝玉所不可能有的勇气叛逆了出来。虽然钟志民学生退伍的行动不过是李庆霖愤怒的呼喊，在特权阶层中引起的微弱的回声，但是在人民群众中这个回声却引起连锁

般的震动了。这一叛逆行动吓坏了一些人，鼓舞了一些人，有人切齿痛恨，有人衷心欢迎。这些互不相同的反应，不正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阶级关系的变动和新的阶级矛盾状况吗？

新的资产阶级占有方式本质就是在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条件下，“化公为私”，当国家或事业的领导人将无产阶级的财产和权力按照资产阶级的面貌实行再分配的时候，他便在实际上对这部分财产和权力实行了新的资产阶级私人占有。

这种按照资产阶级的面貌实行财产和权利再分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常见的是某些领导者将党和人民给予的必要特殊照顾膨胀起来，变为政治和经济的特权，并无限地触及到家族、亲友乃至实行特权的交换，通过“走后门”之类的渠道完成其子弟在政治、经济上实际的世袭地位，并且围绕着他们的私利，改变事业的社会主义方向，实行宗派主义的组织路线，扶植起一批特殊于人民利益并与人民利益相对立的“新贵”集团和势力来。

更重要的是，他们为了维护已得的特权和争取更多的特权，他们必须要打倒坚持原则的正直的革命同志，镇压起来反对他们特权的人民群众，非法地剥削这些同志和群众的政治权利和经济利益。

这样他们便完成了“人民公仆”向“人民的主人”的质的转变，成为我们称之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人们了。我们在本文里提的“党内走资派和野心家的基础是从特权中孵化出来的新生产资产阶级”就是这个意思。

按照基本路线所警告我们的，在今后几百年内，新的资

产阶级分子必然一代一代地产生，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承认不承认这个新资产阶级（以党内走资派为代表）是资本主义覆辟的主要危险，这点，乃是当前无产阶级革命派与保守派之间的分水岭，是肯定或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理论问题。你今天不承认，可以，因为有钱守维、黄国忠们帮忙，还有蒋匪军经常派人来。二年不承认。也许可以，勉强维持到五十年，一百年以后又怎么辩呢？总归还是要承认的。

我们的“体系”之所以吓人，第三，是我们断言：“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并没有完成无产阶级的文化大革命的任务，因为它并没有使人民群众牢牢掌握广泛的人民民主的武器”。这岂不是否定文化大革命吗？这样的断言有什么根据呢？

当我们再次面对这篇文章的时候，广东的革命群众运动又一次兴起半年之久了，很有意思的是，作为它的序幕和武汉几乎一样，撕大字报和贴大字报的斗争。

在外国人眼里看来，中国是完全不应该有这样的斗争的。当埃塞俄比亚皇宫前面出现贴在墙上用大字写成的传单时，西方通讯社毫不犹豫地把它称之为“中国式的大字报”。

可是，“中国式的大字报”在中国却遭到了灾难，前几年不说，今年五月，广州市委组织的“政治市容清扫队”已经装配好水龙头和扫把，随时可以把任何大街小巷出现的大字报清除干净。如果说他们终于没有清除干净，这只是因为前仆后继的大字报的不断涌现罢了。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是还在继续吗？谁曾经宣布过大字报使命的完结呢？毛主席在“介绍一个合作社”一文里对于大字报“应当永远使用下去”的那段论述不也是“最高指

示，应当“坚决执行”、“坚决照办”的吗？可是当被镇压下去的革命群众从地下爬起来，企图继续运用这个武器去批判林彪路线，并为自己的政治经济利益而斗争的时候，他们却首先要为自己本来已有的民主权利本身作一番苦战哩！正当广州街头贴——撕——贴大字报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十八号文件下来了，毛主席又一次地为大字报表了态，在林彪路线淫威下，万马齐喑几年之后，大字报重新被宣布为合法，十八号文件的深远意义，至今还没有完全向人们展示出来，但人们要是看不到这一点将是一个最大的错误。社会主义社会人民的权利最根本的是人民对国家和社会的管理权，而十八号文件正是为这种人民的管理权和批评权开辟了一个广阔的天地。即使人们对这场革命群众运动再次兴起原来所抱的期望绝大部分没有达到，他们获得了十八号文件本身便是一个伟大的胜利。如果说，我们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第七年的下半年得出它“没有完成任务”的结论为时过早，我们是乐于承认的，因为现在在大革命第八个年头结束的时候，人民群众绝对的无条件的使用大字报这个广泛的人民民主的武器的权利，毕竟由历史性的十八号文件确立了。但是一年以前，有多少人承认文化大革命进入了第八年呢？即使在今天，如果不是毛主席说了话，也是没有人承认的，这其中不是包含了复杂的内容吗？

我们的“体系”之所以吓人，第四是因为我们提出了“林彪体系”，并指出了它在文化大革命中曾经确立的事实。什么是“体系”？就是事物有联属关系的全体——全部系统。林彪体系就是林彪那一套包括理论、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办法、党风、学风、文风、作风，在政治、法律、军事、经济、文化教育各个领域对抗党中央、毛主席，

祸害人民，流毒全国的东西。六年前，林彪那一整套“体系”的确立，无疑破坏了甚至取代了毛主席的那一套。到“九·一三”事件（它是林彪那一套与中国人民的矛盾激化到绝对不可调和的表现）以后，才开始显著地逐步破坏、抛企林彪那一套，历史事实难道不是这样么？

我们不妨回忆一下林彪体系“鼎盛”时期的情景吧！

我们没有忘记代替一切，奖懒罚勤的突出（空头）政治，念经式的“天天读”，越搞越虚伪的“讲用”，越闹越荒谬的“灵魂深处爆发革命”鼓励政治投机的“表忠”。不伦不类的“忠字舞”，不胜烦琐的忠孝礼仪——早祈祷、晚赎罪、集合、集队、上下交接班、买卖东西、写信、打电话，甚至吃饭等等，都涂上、罩上激烈的宗教色彩和气氛。总之，让忠字占领百分之百的时间，百分之百的空间，而这个“好”那个“好”的运动，则是“左！左！左！”的比赛，“最……最……最……”的竞争，不计其数“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实际上是假、恶、丑行径的博览，“一本万利”的赌场。

我们也没有忘记那损害工农群众基本利益的“共产风”“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党风，鼓吹“有用就是真理”、“立竿见影”的学风，提倡讲假话的“新八股文风”，“小节无害”论所鼓励的腐败恶棍的作风，以及“当今社会走后门成风”……”。

我们更没有忘记那些公式化的阶级斗争“说教”、“渣滓洞”式的牛栏比之历史上的“三·一八”、“四·一二”“五卅”、“六·二三”等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屠杀——仅广东省一省被杀害的革命群众、干部就近四万人，被关、管、斗的革命干部群众上百万人。

然而，有人却闭眼不承认林彪体系曾经确立的这个有八亿人见证的事实，厚着脸皮硬说“时时处处”都是毛主席革命路线占统治地位，这岂不是等于说，血腥的屠杀，长期不能翻的案都是“革命路线”决定的么？

如果不曾有林彪体系确立，为什么落实政策的号召发出五年多，经过三十次、五十次令，才落实到贺龙同志那里呢？

如果不曾有林彪体系的确立为什么发生“庐山大笑话呢坚持林彪体系的顽固派发誓不让被他们打下去的共产党人再从地上爬起来。为此，他们找到诀窍，就是以“莫须有”的罪名把对他们危害（威胁）较大的革命同志打成“反革命大黑手”、“反革命大头头”、“五·一六”、“现行反革命分子”、“叛徒”等等，长期监禁、肆意虐待。到什么也打不成的时候，就把本来很清楚的问题，弄得似乎永远也搞不清楚，以此藉口，长期挂着，等待时机，卷土重来，难道大量的事实不正是这样么？

林彪体系的产生，乃是中国社会的历史条件决定的。

我们中国是直接从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脱胎进入到社会主义的，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使它的意识形态根深蒂固，不仅在旧民主主义时期，而且在新民主主义时期，都没有给予摧毁性的打击。封建时代独裁专断的恶习深中于群众乃至一般共产党员的头脑之中，难道不是这种情况才提供了林彪体系以风靡一时的条件，以至把毛主席“逼上梁山”的么？难道不是这种情况，使林彪党徒在其势力所及之处，以镇压人民民主来宣告“全面胜利”的么？

我们说林彪体系，我们同时还指出“天才史观则是其理论纲领”是思想上的纲领。为什么呢？几百、几千年出现了一个“天才”，无限崇拜“天才”，绝对忠于“天才”，一

切照“天才”意志办事，谁反对“天才”就打倒谁，这不是一条极其完整的思想政治路线么？不准思想、不准研究、不准探索、不准任何一个问题“问一个为什么”，“天才史观”简直取消了八亿个大脑。

现在，人们看得很清楚了，他们从天才史观出发，搞了那么一套“体系”，这是一套现代的“礼”。他们就是拿了这一套“礼”来“治”党、“治”国、“治”军的，这就必然把我们的党“治”成君臣父子党，把我们的国家“治”成封建性的社会法西斯专制的国家，把我们军队“治”成袁世凯北洋军阀那样的军队。可不是么？林彪在北京有他的冯、段，在地方也有他的督军，那些“大将”、“督军”除了没有来得及带兵打到北京以外，别的几乎样样他们都干出来了。

人们会问：既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没有完成其自身任务反而曾经确立了林彪体系而且至今未被清算”，那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还有什么积极成果可言呢？

我们回答说：不！我们说林彪体系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曾经得到了确立，但这并不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绝对地被它所取代。我们说那时候似乎是出现了一种暂时的二元状态（这是两个司令部的存在决定的），就象董仲舒确立了儒家的地位并没有马上停止了汉武帝的法家路线一样。而且，在我们断言林彪体系曾经确立了的同时，已经指出：“但这只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方面是它造成了它的反面，即造成了一个新兴的社会力量”。在这里，我们想引用马克思的一段耐人寻味的话：

“革命向前进展并为自己开拓道路，不是由于它获得了悲剧式的胜利反而由于它产生了一个团结和坚强的大革命，由于它产生了一个敌人，而主张变革的党只有在和这个

敌人斗争中，来发展成了真正的革命党。”（《1818~1850法兰西阶级斗争》）。

这就不用我们啰嗦了。

在林彪体系统治十分严密，显得似乎会永世长存的那些日子里，忠于马克思的共产党人就是根据马克思指示冷静地视察着这个历史现象，知道它是暂时的，他们满怀着必胜的信念进行着不屈的战争。

现在我们看到了，从1968年以来，我们党和林彪体系这个新式的敌人之间进行的这场空前激烈、复杂的斗争，对于党内的今后的发展何等重要啊！没有空前强大的敌人，就没有空前的激烈斗争，就不会造成空前强大的革命力量，也就不会完成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空前艰巨的革命任务。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

我们的“体系”之所以叫人害怕，第五是我们涉及了林彪路线是右还是“左”的问题。

“九·一三”事件后，全党、全国人民根据他们的切身经验和毛主席批判林彪一伙的一系列指示，批了林彪这个“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的“左”派朋友。他们批了林彪“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宗派路线，批了“政治冲击一切”，批了“公产主义”，批了“顶峰论”和“绝对论”，这一批，批到了林彪体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那些人头上了。于是有人出来说，不许批了，“批了群众了”。

群众整整挨了三年批，挨了三年斗，没有人出来说一句话，保护一下。现在突然有人说，不许批极“左”了，群众一下子有了保护了，真是受宠若惊！这里，我们倒确是很想和这些保护群众不挨批的理论家们讨论讨论。

理论家们问，“林彪路线的实际是‘左’还是右呢？”

这一问真是荒唐得郑重，党内机会主义路线无论其表现形式是“左”是右，其实际都是右，因为它们结果都必然导致革命的损失甚至失败，这里是没有“左”和右的区别的，难道我们的理论家们真的连这点常识都没有？

可是，历史上哪个党内的机会主义者没有表现过“左”时右呢？

理论家们，林彪不是宣扬孔孟之道么？怎么说极“左”呢？可是从1960年到1971年的报纸和文件上，我们怎样才能查到“最高、最高”的林副主席号召我们学习孔孟之道的指示呢？他们要使人们学董仲舒，也要人们将毛泽东思想当作宗教来礼拜哩！我们认识林彪的封建性，难道不正是以新的礼教原则——谁反对毛泽东思想就打倒谁来表现的么？作为刘少奇、周扬一类非常仇恨毛泽东思想的人的对立面，林彪不是“左”得很么？

这是把“延安”和“西安”放在一锅煮，越煮越糊涂。“五七一工程纪要”只能说明林彪集团是反革命匪帮，怎么说明他在党内的机会主义路线。

必须把反革命两面派在党内的机会主义路线与他的反革命阴谋活动区别开来，斯大林对托洛茨基作过这样的区别，毛主席对张国焘作过这样的区别，为什么对林彪却可以不作这样的区别呢？

这是明目张胆的偷换概念，混淆两类矛盾，这本身就体现了林彪在党内的形“左”实右路线。

现在我们看到了那些参与了“五七一”计划阴谋，响应政变的死党，以所谓的“路线错误”逍遥法外，而不少仅仅在某些方面执行了刘少奇、林彪在党内贯彻的错误路线的好干部却继续被当做敌人加以无情打击。这样的事实难道还不

足以发人深省么？

马克思说：“如果说现象形态和事物的实际是直结合而为一的，一切科学就都成为多余的了。”（资本论）

我们的理论家们，你们为什么对林彪成为党内机会主义路线总头子时期（1966～1971）推行的实右而形极左路线那个形左的问题讳莫如深呢？我们能学出一百个、一千个现象形态来说明林彪的“左”，而你们能学出多少林彪作为机会主义路线头子时期在党内表现的现象形态的右呢？

“黑格尔在一处说过：一切巨大的世界历史事实 and 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他忘记补充一点：第一次是以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以笑剧出现……”（马克思“路易波拿巴雾月十八日”）。

如果王明反对李立三的“左倾”是第一次的话，现在谁又高兴来扮演第二次出现的王明呢？

我们的“体系”之所以令人望而生畏，第六是我们对“反复辟”，“反回潮”口号的评论。但是，我们去年在评论中所作的判断已经被证实了。

什么时候发生了“复辟”，什么时候发生了“回潮”呢？今年以来某些大人物和权威性的文章（例如“评湘剧园丁之歌”）告诉你们，“复辟”和“回潮”发生在一九七二年。今年三月，《广州日报》头版头条大吹特吹的市一医院的那张所谓“反潮流”大字报里甚至把一九七一年说成是“热血沸腾”，“火红的年代”，而一九七二年后便几乎是进入了“复辟的年代”了。

林彪垮台是在那一年？一九七一年秋。可是，为什么林彪不垮台到处都是好好的“一片红”了，“全面胜利”了，林彪一垮台就是“复辟”了，那里也是“回潮”了，年代也

不火红了，热血也不沸腾了。这倒是咄咄怪事！

难道第十次路线斗争中，一九七一年秋的伟大胜利导致的直接结果，不是人民的进一步解放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巩固，相反的倒是为“复辟”和“回潮”开辟了道路吗？这是对第十次路线斗争的嘲弄。

毫无疑问，人民群众是反复辟的，但是他们亲眼看到的鲜血淋漓的杀气腾腾的复辟行动是开始于一九六八年下半年，并以一九六九年法定林彪为接班人达到高潮。（这便是某些人“热血沸腾”的东西）经过一九七〇年八月至一九七一年八至九月的决战，随着林彪垮台，这种复辟行动恰恰是到一九七二年才大致上全面停止下来，从而开始人民群众的反攻。某些人正是把这种人民的反抗说成是“复辟”，因此，他们的“反复辟”，实际上是反反复辟。显然，高呼“反复辟”的口号有两种人，也是截然相反的内容。但是，“反复辟”这个口号的实际效果比我们原来预料要好，因为人民的革命不会对革命的口号容易发生怀疑的，他们一般没有对一九七二年开始“复辟”、“回潮”这种提法发生大多数的敏感，于是，尽管鱼龙混杂，纠缠不清，但一九七四年的批林批孔运动，“反复辟”毕竟还是成了人民群众向林彪及其党人作斗争的旗帜了。

现在需要研究一下的是，为什么那些坚持林彪体系的顽固派在林彪垮台后，在“礼崩乐坏”的形式下要高喊“反复辟”“反回潮”呢？

很清楚，他们现在的地位，是随着林彪的体系的确立而确立的，动摇了林彪的体系无疑是动摇了他们的地位。他们叫喊“反复辟”，乃是他们对一九六九年“全面胜利”的规定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深入发展的现实矛盾尖锐化的反

映。

他们十分留恋林彪体系达到顶点时的那些“光荣的日子——成千上万的人民人头落地的日子”他们在“全面胜利”中得到的一切——地位、特权……乃至驱打奴隶的鞭子，全都是闪着圣光的宝贝，不容许奴隶有一点亵渎，那时候中国的社会是他们的“天堂”，天堂里的社会关系丝毫不可改变，如果林彪不允许“右派势力抬头”，那么他们也不允许。

因此，一九七二年后，当宝贝的圣光越来越暗淡，奴隶们的态度越来越放肆，“天堂’里的社会关系越来越不稳，念“紧箍咒”也越来越不灵（“金箍”在“全面胜利”时套在奴隶们头上）的时候，他们急了。于是，他们口中念念有词，祭起了非常革命的的法宝，叫做“反复辟”！

在坚持林彪体系的顽固派看来，九届二中全会后，特别是“九·一三”后，是一年不如一年。正是他们开历史倒车，先是想开回七〇年八月以前，后来想开到七一年九月以前，现在无可奈何开到七四年三月以前。当然，他们是绝不甘心放弃倒退四年的目的的。可笑的是他们却指斥人民为“复辟派”、“回潮派’。这里，我们倒要问问他们：难道被林彪一伙破坏了的党的、军队的、工人阶级内部的团结不要恢复吗？难道被林彪一伙破坏，抛弃了的‘三大作风’，我军的优良传统“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要恢复吗？被林彪一伙歪曲得面目全非的党史、军史要不要恢复其本来面目呢？被林彪一伙用压、抓、打、杀代替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与“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要不要恢复？被林彪一伙“从客观到主观”的模式篡改“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文艺创作方针要不要恢复

呢？被林彪一伙“政治冲击一切”代替了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要不要恢复呢？被林彪一伙破坏践踏了党的一系列政策如依靠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的政策、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上山下乡政策、华侨政策、各项经济政策……要不要恢复呢？被林彪一伙天才观压抑下去了的“五敢精神”要不要恢复呢？难道林彪一伙炮制的从中央到地方成千上万的假案翻不得，平不得反吗？难道大批虽然犯过这样或那样错误但经过长期考验证明是对党忠诚的老干部就不应该再使用了？邓小平、赵紫阳这些同志根本就不应进入中央委员会是不是呢？即使给他们出路也要把帽子拿在“群众”手里，随时准备给他们再戴上是不是呢？

在坚持林彪体系的顽固派看来，我们在这里以老大不敬的态度提出一连串“挑战性”问题本身就是“复辟”、“翻案”的证据，更不用说这整篇序言和本文以及“广东怎么辨？”、“星火燎原馆的始末”……，还有什么“革命死了，革命万岁！”篇篇都是“大毒草”，都够得上“反革命宣言”的资格了。如果是在三年前，早就打成“反革命”了，于是他们哀叹：回到三年前有多好啊！

三年以来，中国人民确实确实看到了一些“仿佛是向陈旧东西的回答”（列宁）的东西，可是，那又有什么办法呢？事物按照其自身的规律（包括否定之否定规律）向前发展的，历史车轮不可抗拒，它是不会照顾什么人的面子的。“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我们奉劝那些狂热追随林彪而至今还保有“高官厚禄”的大人物，不妨把这对联徘徊吟咏，深入领略其中的意味吧！

那么，是不是一九七二年就没有任何“回潮”呢？我们说存在着各种修正主义路线的各种表现，但决不能说是“回

潮”。因为“回潮”这种提法本身就是美化林彪体系确立的时期，把它说成是没有修正主义的“无差别境界”。“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当然也决定教育路线和文艺路线。林彪一伙的思想、政治路线是反动的，他们的教育路线、文艺路线也不会是革命的。如果说张玉勤事件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的表现，不如说是林彪路线在教育战线的反映。难道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是以死人为基本特徵的吗？被林彪路线整死的人何止万千，年过半百，久经风霜的老革命干部尚且被逼死，何况十五岁的女孩子？黄帅的老师整黄帅的那一套，是从修正主义教育路线那里继承来的，还是更多的从林彪路线那里来的？后来，“黄帅”对革命同志王亚卓的不同意见那样无限上纲，气势汹汹，把他骂成“复辟势力”，又是从哪里来的呢？难道谁反对我就给人家扣个帽子然后加以“打倒”的霸王作风是一个十来岁的女孩子身上固有的吗？

谈到教育路线“反潮流”的问题，我们提到过张铁生，张铁生反的是什么潮流呢？据说是所谓“智育第一，分数挂帅”回潮的潮流。说实话我们从他的答卷除了能够找到他向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妥协的证据外，是找不出挑战的证据的。而且他的白卷本身就迎合了一股“空头政治冲击一切”在教育战线的表现的潮流，虽然这个潮流走向反面也出现了一些“智育第一，分数挂帅”，但它还远远没有形成潮流呢！于是张铁生之所以成了幸运儿，不过是某些人为了可以利用来作为一九七二年后“复辟”“回潮”的话证据罢了。

我们的“体系”颇吓住了一些人，第七还因为我们对于秦始皇不表尊敬态度。但现在看来这没有什么可怕了。儒法斗争史的批判正在深入展开，对秦王朝封建的肯定已经开始变

得有原则了起来。“文汇报”刚刚开展着很有意义的讨论。毫无疑问，法家先生者们对中国社会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所引起的历史作用是伟大的。然而，奴隶制代替原始公社的建立又何尝不是人类历史上的一大进步？欧洲近代革命史上的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不是也会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吗？既然我们那样无情地批判了资产阶级——从克伦威尔到罗伯斯庇尔，从“百科全书派”到别，车，从贝多芬到斯坦尼拉夫斯基，为什么对地主阶级的秦皇朝却要看得那样光明呢？恢复被儒家歪曲了的历史本来面目，肯定秦始皇和他建立的一统天下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是很有必要的，但是这种肯定必须遵守严格的界限，以便以后对他进行无情的批判——这是我们这个从半封建半殖民地脱胎出来的社会主义社会仍然面临着反封建任务所决定的。

很可以令人感兴趣的是，我们发现一九六五年末到一九六六年初我们的报刊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与现在我们的报刊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存在着多么巨大的矛盾啊！“一切反动派和机会主义头子都是尊儒反法的”，可是无论是吴晗笔下的海瑞还是田汉笔下的武则天那个不是法家呢？然而对他们的批判确实变成了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直接导火线。

我们认为，今天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比一九六五年和一九六六年对历史人物的评价确实有了更多的历史唯物主义精神，这是革命深入的结果。但是，既然吴晗说海瑞是“爱护人民的”，曾经遭到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第一篇文章的批判，那么，现在又有人说，“法家是爱护人民的”，而且是一个吓死人的“回潮”么？海瑞无疑是个法家，而且是一个历史上难得的少数民族出身的法家。现在有人从秦始皇到孙中山，罗列了一大堆“落实政策”的名单，可是为什么对

海瑞却要刻薄妒恨，拒不“落实政策”，最近还要在报上臭骂几句呢？这说明骂法家的人还是有的。何况我们对秦始皇还没有骂哩！

我们不明白的是研究儒法斗争，为什么有人总要在“爱国”还是“卖国”这些历史上很不秘密的概念圈子里打主意呢？他们到底想把火往那里烧？为什么不可以联系一下林彪一伙多年来无法无天，横行杀人，抢男霸女，根本不要法制的实际呢？古代的革新派——法家尚且反对世袭世禄，反对任人唯亲，反对枉法徇私，反对走后门，反对刑不上大夫，我们现代的革新派怎么就不可以拿来联系一下这些实际呢？难道今天这等事还少么？联系一下这些，对于获得人民的拥护，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不是很有实际意义么？不联系林彪祸害的实际，侈谈儒法斗争史，于民何益？

在我们看来，既然封建的社会法西斯专制是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危险，反封建依然是我们继续革命的一个重要内容，那么批林批孔问题除了应当研究我国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社会大变动时期的思想政治上的路线斗争实际的历史经验教训以外，应当着重地批判经过董仲舒改造了的封建专制的思想体系。如果“五四运动”的“打倒孔家店”是提出了彻底的反封建口号，那么我们今天的批孔运动就应该是在思想政治战线上彻底的实现反封建的任务了。我们不应当如某些人那样，在批判地主阶级保守派的同时，却全力歌唱地主阶级的所谓革新派，他们根本忘记了秦、汉以后的所谓儒法两家都是地主阶级的意识形态，它们的斗争实际都是维护封建专制这一基本事实。而忘记了这一点，他们不也就忘记了我们今天应当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批孔的根本任务了么？

我们的“体系”之所以吓人，最后还因为据说它抬起了

一九五七年右派的余唾。

是的，“民主”、“法制”的口号是右派分子高呼过的。可是自从一九六六年以来，革命造反派和人民群众所呼喊的右派呼喊过的口号难道还少么？“炮轰黑省委”、“反迫害、反镇压”不是至今还使那些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反对派们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视为“右派翻天”么？李庆霖信件的“右派言论”比一九五七年的右派是大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我们的一些朋友完全不去想一想，为什么“民主”“自由”的口号在一九五六年布达佩斯曾经集合起来了反革命，而同样的口号在一九七〇年的波罗的海岸却成了波兰工人阶级战斗的旗帜了呢？为什么一九五五年苏联出兵匈牙利曾遭到了我国右派分子的反对，而一九六八年苏联出兵捷克斯洛伐克却遭到了中国人民的抗议了呢！

批评我们的朋友完全没有根据基本路线对六十年代以来国际和中国的社会阶级关系的变动作一番分析，他们不明白五十年代后期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危险是从旧社会包下来的资产阶级右派，而六十年代初期以后，这个主要危险则是党内走资派了。似乎同样的口号，反对的却是不同的内容。一九五七年右派在民主的口号下反对的是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而一九六六年以后人民群众在民主的口号下反对的则是党内走资派的资产阶级路线，特别是反对林彪所推行的那种面目极“左”而实质极右的封建专制的社会法西斯路线，他们的目的则是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这个道理应当是不难懂得的。

*

*

*

关于重写的第六部分，我们不打算多讲了，留给人们评判吧，作为对“四届人大”的希望，无论它们能否得到充分

的实现，重要的是，林彪体系的冰山正在溶化，思想开始解放，问题已经提出在愿意研究社会主义的人们面前了，可以补充的一点是：我们希望参加“四届人大”的代表（尽管我们不知道这些代表是怎样选出来的），不要忘记了一九七一年庐山大笑话的沉痛教训。

*

*

*

对我们这篇冗长的序言，如果读者们竟能够看得下去，不觉得索然无味，我们只能感到高兴，现在再写几句就可以结束了。

我们是所谓“不畏虎”的年轻人，但也并非不知道虎的凶残，甚至可以说，我们是被那种动物吞噬过一回，但终于咬不住，吞不下去的余生者，脸上留着爪痕，不是漂亮人物。

显然，我们读马列很少，主要是受了严酷现实的教育，懂得一点，说几句坦率的话。我们在这里，只不过是对于“全国人民——我们还总算其中一分子——的代表大会”及其以后的革命发展表示我们的希望和信心，也是试一试违了报上的“禁”，犯了刊上的“忌”，冒犯了大人物，究竟会怎么样？也算是以身试“礼”吧！如果我们因此而得到某些理论权威的特别关照，我们只能认为是好事，必定会从他们那里得到更多的教益，虽然我们并不怎样期望他们。

然而，我们把受教益的期望更多地寄托在街头读者身上，衷心希望同志们给我们提出批评指正意见，特别希望街头理论家、政治家、法律家、哲学家、批评家、观察家们不吝赐教。我们希望越来越多的同志公开讨论这些问题。

我们深信：在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烈士的鲜血浇灌的土地上，应该是生长鲜花的时候了。

正文

人们都在关心着四届人大的召开，尤其关心着与每个中国人命运密切相关的国家法制。

人们为什么这样关心呢？二十多年来的革命活动，发生了些什么新的问题使得人们必须关心新的国家法制这个四届人大的产儿呢？

（一）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问题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已经进行了两次大斗争：一次是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与刘少奇集团的斗争，一次是与林彪集团的斗争。

斗争的实质是要解决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搞资产阶级专政还是搞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

过去的反右和社教运动也进行了这样的斗争，所要解决的也是这个问题。那么新的问题又是什么呢？

新的问题就是刘少奇集团特别是林彪集团要搞的不是一般的资产阶级专政，而是要搞封建性社会法西斯专制。

党内走资派和野心家的社会基础是从特权孵化出来的，新生资产阶级在现代中国的社会条件下，他们只可能搞封建性的社会法西斯专制，而不可能与被打倒的老地主、老买办们平分既得利益。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集团的反革命演变的得逞不能使白俄恢复他们的贵族世袭就是证明。

早在六十年代初期，毛主席就向全党全国人民警告了社会法西斯主义的危险。他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这样的国家发

生复辟，那就不只是一般的资产阶级专政。“而且会是反动的，法西斯式的专政”。他说：“这是一个十分值得警惕的问题，希望同志们好好想一想。”

十年过去了，中国人民整整想了十年，难道不是林彪路线给人民带来的祸害才帮助人们真正开始理解毛主席的警告了吗？

既然社会主义革命到今天的特点是混入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企图是搞封建性的社会法西斯专制，那么革命人民应当拿起什么武器去反对他们呢？

（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教训

在对当前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关系的深刻研究中，毛主席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形式上说，实际是一个最广泛的人民的革命大民主，它是“公开地、全面地、由上而下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是防止和反对社会法西斯主义的武器。

从战略的观点来看，与其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要解决的首要任务是揭露和摧毁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不如说是为了锻炼人民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革命民主精神。“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还有什么能比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精神振奋，意气风发的议论国家大事，批评错误路线更能成为生产力解放的标志呢？

上了宪法的人民群众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结社自由以及未上宪法的串连自由都在这场大革命中真正实行起来，并得到了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支持，这是

中国人民数千年来没有过的，生气勃勃的，这是革命的奇功。

但是，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并没有完成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任务，因为它并没有使人民群众牢牢掌握住广泛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武器。

一九六八年夏季，社会主义的法制“突然不灵了”“政权就是镇压之权”灵了起来。在范围广大地区内，到处在抓人，到处在镇压，到处是冤狱。社会主义法制跑到哪里去了呢？据说，它没有用了，这是旧人大的宪法，而新人大还没开，现在是无法无天了！

这是我国推行的一场社会法西斯主义的演习，演习的总指挥是林彪。

“对广大人民群众是保证还是镇压”？毛主席愤慨地发出了这样的质问。

林彪为什么要镇压人民的民主呢！他们不是还鼓吹过“天然合理”的无政府主义思潮么？

把林彪体系当作正统的毛泽东思想来崇拜，这是中国人民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不可避免的历史错误。

林彪及其党徒把人民的革命运动当作他实行篡权覆辟的“借用力量”于是对待“天才”的态度这个准则代替了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个准则。“共诛之”“共讨之”和“谁反对就打倒谁”的原则向法制挑战，成了保卫对“天才”绝对崇拜的上方宝剑。当他的地位一经确立并由党刊宣布以他的地位的确立作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标志时，他便要建立“新秩序”了，就要“正名”了。在这方面，他还有他的董仲舒哩！

什么“新秩序”就是“最后胜利论”、“四大过时论”

“政权即镇压论”、“军党论”，总之，就是把我党我军搞成“君臣父子，不得犯上”的关系的社会法西斯论。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告诉我们，人民的大民主不能离开正确的路线；否则，革命非但不能完成其自身的任务，相反将会为资产阶级野心家所利用，而人民群众获得的只是新的枷锁。

（三）关于林彪体系

什么是林彪体系？这是指林彪已成为党内机会主义路线总头子的时期，他在党内推行了那一整套对抗毛主席，流毒全党、全国的东西。这就是哲学领域的唯意志论、历史领域的天才史观，政治领域的政权即镇压论，经济领域的“公产”论和对外关系的大国沙文主义等等，天才史观则是其纲领。

毛主席一开始就和林彪体系发生了矛盾，当林彪体系尚未确立时，毛主席给江青同志的信便是这一矛盾的表现，而林彪体系一旦确立，并使中国革命乃至世界革命面临巨大危险时，这个矛盾便不可避免地尖锐起来。

如果我们不去懂得毛主席对林彪法西斯主义镇压人民民主的深恶痛绝，我们又怎么能够懂得毛主席为什么在庐山提出了“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的问题呢？我们又怎么能够懂得庐山的大斗争所反映的整个中国社会的深刻危机呢？我们又怎么能够懂得庐山的大笑话所应当给予我们的教训呢？

“路线斗争不可知”的说法和“路线斗争不过是中央内部的权力之争”的说法之所以是错误的，是因为它站在唯心

史观的基础上，否认了一切错误路线，无论是“左”还是右的，给人民群众的利益都带来了直接损害。人民群众为了维护和争取自身的利益，它要以各种形式（甚至包括消极或“反动”的形式）去进行抵制和反抗。中央的斗争无非是社会斗争的集中表现罢了。

（四）关于批林以来的形势

林彪体系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达到了顶点。但这只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它造成了它自己的反动，即造成了一个新兴的社会力量，他们是在这场大革命中，在毛主席的启发下逐步懂得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人们。林彪垮台以来民主精神普遍高涨，更形成了他们的群众基础；他们大多数是林彪体系的受害者，他们对林彪体系有着切齿之恨，他们要求继续革命，要求人民的革命大民主，要求恢复社会主义法制。

这一次，人民的要求又披着历史的外衣出场了，哲学家作了政治变革的前导，这个人就是杨荣国。

当“反革命黑手”的牌子在脖子上的伤痕尚未消失，杨荣国和它的助手们甚至是在“牛队”里就开始了他们批林和批孔新研究。这位白发苍苍的教授是一个真正的造反派，他首先揭破了“礼治”的秘密，“他们的意志就是法律”，杨荣国同志控诉说：“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压迫和剥削奴隶，甚至加以屠杀。奴隶们只得绝对服从，不许反抗，这就是所谓“礼治”了。

杨荣国反复地控诉“礼治”，反复地控诉孔子杀少正卯，少正卯有什么罪？他无非是“联络人民自由集会结

社，乱批评当局”罢了，这样就该杀了么？！

毛主席支持了杨荣国派要革命要民主的呼声，给李庆霖那封到处谓之“反动告状书”的复信，是多么大的鼓舞了人民群众啊！真的，一九六八年以来，没有见过人民群众这样的兴高采烈”，“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这是把多少人民群众压抑在心里头的对林彪法西斯主义的仇恨的呼声喊出来啊！

但是，舆论很快就过去了，伴随而来的是对李庆霖式的信件大肆封锁、恐吓和镇压李庆霖的遭遇引起了广大群众的同情和耽心。他们在说：“幸亏信让毛主席收到了”，他们在想，是什么压制着他们的民主权利呢？

林彪的垮台，并不等于他的体系的完结。林彪体系确立的过程造成了一个文人既得利益的势力，他们害怕汹涌起来的人民群众。清算林彪体系的浪潮摧毁了他们既得利益的基础，他们耍了一个诡辩，歪曲主席的思想，把林彪体系实质的极右说成是什么“右倾”，或者回避林彪在成为机会主义的路线总头子时期，他所推行的那一套对抗毛主席流毒全国的东西，用林彪那些见不得人的反动言论来掩盖林彪那见不得人的蛊惑言论。他们站在要求批判林彪体系的人民反面，把一派热气腾腾的批林局面打了下去。他们骂人民群众是“复辟派”“回潮派”，他们打的旗号是“反复辟”、“反回潮”，好像他们就是革命，动他们不得。

可笑的是他们也来批孔，他们千方百计地掩盖被杨荣国揭发出来的“礼治”的秘密，把血淋淋的“礼治”说成是一种假仁假义。肯定焚书坑儒的革命作用使他们自以为有了可乘之机，他们无原则地吹捧秦王朝的封建专制，非历史主义地鼓吹要从肉体上消灭一切反动派，这实际上是在为社会法

西斯主义作舆论，以完成林彪未竟的事业。他们不敢触及秦王朝面临的两个的否定：即来自六国旧贵族的反动否定和来自大泽乡农民的革命的否定。农民为什么要反对秦王朝？秦灭六国时，农民“莫不虚心而仰上”，不都是维护它的么？因为秦王朝终于损害了农民。人民群众为什么要反对林彪体系？当年横扫一切的红卫兵运动不是高喊着林彪“谁反对就打倒谁”的口号去作英勇的战斗的吗？也因为林彪体系终于损害了人民群众，几千年来凡是损害了人民的利益的人，终究是要被人民打倒的，这就叫做奴隶们创造历史。

那些“既得利益者”骂所谓“复辟派”“回潮派”要复旧，是的，人民群众中也许有不少人在林彪体系面前产生了一种怀旧情绪，但这只是因为当前林彪体系直接损害了他们，他们客观上要求进步，主观上却不懂得进步而已。这几乎是一个历史规律。被毛主席称为天才的陈胜、吴广不都是自命扶苏，自号楚王，在反革命复辟的旗号下，举行了他们的革命起义么？既然我们无产者对这样打着反革命旗号的农民起义都要给予他们以历史上崇高的地位，为什么今天广大人民群众在批林斗争中有了一些错误的怀旧情绪，就非大兴问罪之师不可呢？更何况否定之否定“仿佛是向旧的事物的回复”，不也是列宁的辩证法么？革命的道路要笔直而笔直是王明的形而上学，对革命作辩证的否定不是历史的退步而是历史的前进。

当然，如果真正的反革命复辟派孔鮒之流可以混进从大泽乡出发的革命队伍，今天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面临的反攻倒算和辩证否定，便更可鱼龙混杂。我也必须反对反攻倒算派，以捍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然而，当前批林的主要危险，是在“反复旧”的旗号下维护林彪体系的错误潮

流。

总之，批林以来的形势，纵横观之，斗争是激烈的，批林整风仍是首要任务。第十次路线斗争尚在继续深入，也许在这种深入之中，它还孕育着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哩！

（五）谈反潮流

“十大”废除了林彪塞进“九大”的“共讨之”的原则，而代之以反潮流的原则。这是“十大”的一个大功绩。

然而，现在情况是一个口号响亮了，人人都来喊：反潮流！

今年（七三）年八月，不是有个张铁生的也出来“反潮流”了么？结果一没有杀头，二没有坐牢，三也好像没有老婆要离婚，反倒是扶摇直上，据说到什么学府深造“反潮流”的奥秘去了。可是，那些为反对林彪体系作了真正战斗的革命者，不少的情况是杀了头的，头还杀是了，坐了牢的，仍旧坐着，罢了官的，照样罢着，他们那有那么优哉游哉？

“你们是为被打倒的牛鬼蛇神翻案”、“你们是‘571’”。不对，林彪的“571”不过是企图把受他的体系损害的人民群众，当作一种“借用力量”去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罢了。

“借B52打B52”本身何罪之有？甚至“571”自己也明白那些被损害的人民群众是毛主席的力量，而不是它的力量呢！

人民群众不是阿斗，他们深知所受的根源，它们攻击的锋芒是向着林彪体系，他们谁也没有表现出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的憎恨，相反，他们憎恨那些歪曲和阻挠这个路线和政策的林彪及其体系的既得利益者。他们要求民主、要

求社会主义法制、要求保障人民群众的革命权利和人身权利。“什么？你们要民主？你们是反动派！因为你们是反动派，所以不能给你们民主。”他们振振有词，喜欢引用毛主席关于人民民主专政的一段话。

但是反动派的头上是没有“反动派”三个字的。“只给人民以民主”，很对。可是，你们还为林彪体系大喊大叫时，又给了反对这个体系的人民群众那怕一点民主没有呢？给他们的只是残酷的斗争和拘押呢！“不给反动派以民主”，应该这样。但不要忘了林彪体系风靡一时，甚至庐山成百个中央委员跟着跑，不就是为反动派服务的民主么？这个民主不用给他也有，一他有权，二他有革命旗号；你不给人民群众，他就没有，一他没权，二他有时也打不出革命的旗号。

历史教训我们，即使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革命派有时会被认为是反动派而没有民主，反动派有时会被认为是革命派而有民主，甚至出现了革命派遭到镇压，反动派青云直上的反常局面。我们必须对谁是革命派，谁是假革命派，谁是反动派，谁是被打成的“反动派”作认真的分析。分析的标准只能是看谁的社会实践代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而不是对待所谓“天才”的态度。

世界上没有超阶级的民主。马克思主义的大师们对阶级的民主作过许多论述，他们是把整个的革命阶级和反革命阶级来加以对立的考察的。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人民内部的派别斗争所反映的阶级斗争的经验，把派别的民主突出地推到了愿意研究新问题的马克思主义者的面前，因为这个阶级斗争的双方都应当有民主的权利。一派压一派是不灵的。这种后遗症至今难

道还少么？于是，它使我们懂得，若不把革命队伍内部现在可称之为“潮流派”和“反潮流派”之间，过去那种压制与被压制，甚至镇压与被镇压的关系，改变成基于团结的批评与反批评的关系，阶级的民主是不会存在的。人民民主专政将变成人民派别专政，这个专政派别若是“正确”，它不能团结广大人民群众，它若是错误的，便将是社会法西斯的开始。

王洪文同志报告号召人们发扬“五不怕”去反潮流。但是，现在的情况，没有“大人物”或中央报刊的认可和宣传，任何思潮都不能形成潮流，尤其是不能形成涌来之势的潮流。古今往来，中国总会有人为了说话而不怕杀头的。鲁迅自然是不怕杀头的一个。但是鲁迅尚且可以到日本朋友那里去发表文章，今天“五不怕”的人们又能到那里发表他们的文章呢？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幽灵，时常在他们身边徘徊，他们不止一次地想到了恢复革命大字报的权威。但是，林彪体系压迫着他们，“忠”字化的森严礼仪在束缚着他们，镣铐、铁窗、皮鞭和子弹在等待着他们。一九六八年以来的中国现实就这样严酷地向人们提出了这么一个问题：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死”了吗？

（六）对四届人大的希望

革命无疑是天下最有权威的东西。曾经使全世界在它的面前目瞪口呆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它所给予中国社会的深刻震动和深远意义，必将影响我们今后的社会主义整个历史阶段。

即将召开的“四届人大”，它将怎样反映被人们称之为

中国的“第二次革命”的文化大革命呢？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表现。那么，它所要制定的国家根本大法——新宪法里，它将怎样表现经过文化大革命的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群众的意志呢？

现在人民群众在想些什么？要求什么呢？他们对“全国人民”的代表大会抱着怎样的希望？

1. 要法制，不要“礼制”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以“造资反线的反”“夺走资派的权”为其基本内容的。但是可以说，镇压（人民民主）与反（资反线），镇压贯串了整个文化大革命的全过程，而且，一九六八年以后的多次运动，也总是要打击文化大革命中起来造反的人们，简直把他们非打下十八层地狱不可。正是把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镇压下去之后，林彪体系才得以确立，他们才能把封建宗法性的字句塞进一九七〇年的“新宪法”（草案）中。

这个基本事实说明了封建性的社会法西斯专制是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危险。

我国是从半殖民地社会脱胎进入社会主义的，几千年的封建专制所形成的传统，顽强地盘踞在思想、文化、教育以及法律等上层建筑各个领域。

刘少奇，特别是林彪身上所表现出来的强烈的封建性和宗法性，难道还不足以证明，反封建依然是我们继续革命的一个重要内容吗？

还有什么能比“谁反对毛泽东思想就打倒谁”的原则更能成为维护林彪体系“礼治”的神圣支柱呢？名为树人，实为树己。如果林彪能够名正言顺地上台的话，岂不是谁反对林彪就打倒谁了（实际上他是已经实行了）吗？而且何任一

个大人物只要他宣布自己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化身，他便从此成为神圣不可侵犯的了，而“那一小撮”竟敢冒犯了他的尊严的革命群众，便决不能成为法律的保护对象了！

如果我们不去反对这种封建性的“君臣父子，不得犯上”的礼治原则，我们能把无产阶级专政的“镇压敌人，保护人民”的法治真正实行起来吗？

这是一个极大的矛盾，一方面党的一元化领导决不可动摇，一方面“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派”，而这些走资派恰恰是他们把持的地方和部门的一元化领导的具体体现者。

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应当怎样保护人民群众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对党内走资派和错误路线斗争的权利呢？这是摆在“四届人大”面前的一个大课题。

不用说党的领导应当细心倾听群众的意见，也不用说人民群众对党的各级领导实行革命监督的权利，更不用说对走资派造反有理了，即使群众的意见是错误的，过火的，或者对党的政策某些方面不了解而发生不满，难道就可以“说不服就压，压不服就抓”么？而且，香花与毒草、正确与错误、革命与反革命，又常常是不那么容易鉴别的，要有一个过程，要经历时间的考验，因此，我们不当怕光明正大的反对派，界限是服从纪律不要搞阴谋诡计。

“四届人大”应当明文规定，除了杀人、放火、流氓、盗窃等刑事犯和挑动武斗、组织阴谋集团分子必须实行专政外，应当保护人民群众的一切应有的民主权利。

2. 限制特权

承认不承认中国正在出现一个如苏联那样的特权阶层（刘少奇、林彪等不过是他们政治上的代理人罢了）；这是肯定还是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理论问题。

必须首先指出，我们的党员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但是，这个特权阶层是客观存在的，是我国社会经济条件下所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而产生的。

“当今社会走后门成风”的现实从哪里来？对社会的产物肆意挥霍，高级的惊人享受，是从哪里来的？相当部分的高干子弟理所当然有财产权力的变相世袭从哪里来的？新资产阶级占有方式和维护这种占有方式的政治手段凭借的又是什么呢？文艺、教育、“五·七干校”、上山下乡、吐故纳新、上大学、培养接班人等等，几乎每个被人们称之为“新生事物”的地方，都可以成为特权显圣的场所。难道我们不可说苏联的演变是从苏联的高级干部实行了高薪制而向资产阶级专家看齐的么？在我们中国，对据说为革命流了很多血汗的老干部实行某种特殊的照顾，即使是传统所允许的，老百姓也没有表示多大的异议的话，但是我们能够轻视对政权的腐化作用和对新的社会关系带来的影响么？我们能够对正在产生和形成的新贵族、新的资产阶级熟视无睹吗？

我们不是空想社会主义者，我们承认我们社会现阶段存在着种种差别，它并不是一个法令所能完全消灭的。但是，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的自身发展的规律，不是要扩大这些差别而是消灭这些差别，更不允许这些差别扩大为经济上和政治上的特权。特权本身是和老百姓的利益根本对立的。为什么我们要那么回避对于特权的批判呢？为什么要用所谓“好人”“坏人”的问题去偷换“走后门”反映在路线上的大是大非呢？

四届人大应当明文规定限制特权的条文。

3. 保证人民对国家和社会的管理权

一九六九年的“新党章”、一九七〇年的“新宪法”

（草案），把林彪这样一个法西斯魔王法定为接班人的事实，使中国人民看到了一个极其可怕的阴影。同时，也给人民提出了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我们应当怎样保证我们党和国家的政权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呢？无产阶级事业接班人应当怎样才能“千千万万”地涌现出来呢？

使“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青年成了勇敢的闯将”的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使毛主席和广大群众非常反感的是那些充满宗教情绪的“活学活用”（即投机取巧）的积极分子代表大会。

毛主席提出了接班人的五条，但林彪也提出了他的三条。在林彪体系得到了确定的那几个年头，干部的选拔和培养，主要地是用了林彪的三条。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是从天才家族的根苗中挑选的，还是在大风大浪中成长，在阶级斗争中涌现的呢？这个问题直到如今理论和实际还是多么矛盾啊？

“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人民给的。我们的干部不应是做官当老爷，而是人民的勤务员。但是权力是最可能腐蚀人的。一个人的地位改变了，是最能考验他为大多数人谋利呢，还是为少数人谋利？能否保持为人民服务的精神，除了他自己的努力之外，最主要的是人民群众的革命监督。而群众运动是一个革命者保持革命精神的最丰富的源泉。

应当怎样规定人民群众对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的革命监督权利呢？并且应当怎样明白规定，当某些干部（特别是中央机关的高级干部）失去了广大人民群众信任的时候，人民“可以随时撤换他们”呢？

“四届人大”应当回答这些问题。

4. 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制裁反动派

我们的宪法、党章以及中央文件不是写上了人民的民主权利吗？是的，写了，不但写了，而且还规定了“保障人民民主”，“不准打击报复”，“严禁逼、供、信”。可是事实上都是经常不能保障，却是经常“准”对革命干部和群众实行法西斯专制，关的关，杀的杀，制造假案，甚至大兴野蛮的肉刑就是“严禁”不了！

中国人民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根本任务，在正确路线指引下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可是无产阶级专政这个革命纲领，在反动派的手里就变成为对群众的革命意图的讽刺，从而成为不共戴天的敌人手中最厉害的杀人武器。

不惩办一些坚持反革命路线、变无产阶级专政为法西斯专政、血腥镇压和屠杀革命群众的民愤极大的蒋匪帮，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是确立不起来的，无产阶级专政是不能巩固的。必须对镇压人民者实行镇压。“四届人大”应当明文规定，制裁那些知法犯法，执法犯法，制造假案，公报私仇，私立专案，私设监狱，大兴肉刑，草菅人命，罪恶极大的“大夫”们的条例。

5. 落实政策

一九六九年“九大”就已经提出“当前的主要任务，是落实（政策）”，至今五年了，林彪垮台也已经三年了，为什么许多重要的党的无产阶级政策落实不了？

同时近年来，政策的多变，甚至“朝令夕改”（有认识上的原因但主要是反映了路线斗争的激烈）加上土政策层出不穷，造成了人们思想的混乱，甚至对党怀疑。我们认为“四届人大”应重申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那些经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应长期实行的政策，并应通过法的适当形式体现出来。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对于那些严重破坏党的政策

的人应当严肃处理。

6. 各尽所能按劳分配

一九八六年夏季以后，由于政治上的民主权利的压制，特别是林彪的法西斯的组织路线，他们任人唯亲和对逆己势力采取惩罚主义的人事调动，搞大换班，使得“各尽所能”、任人唯贤的原则受到了破坏，人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受到了摧残。

我们在看到特权膨胀的同时，同样清楚地看到了工农劳动群众在所谓“共产主义”的口号下，他们许多合理的经济利益遭到了剥夺。工人多年没有提高工资了，而且还取消了曾作为他们工资一部分的合理奖金；而农民群众在无偿的“忠”字粮、高征购以及“割私有制尾巴”的运动中，遭到了更大的损害。这个林彪的极“左”路线所带来的危险性，现在越来越充分地显现出来了。

列宁不是欢呼“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为“伟大的创举”吗？中国的劳动人民在革命战争时期，在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潮中，在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中，不是也涌现了无数富于自我牺牲精神大公无私的革命英雄吗？这正是极为宝贵的人民群众的历史主动性。但是，能不能由此而绝对化，认为精神可以代替一切了，可以代替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了？显然这是极其荒谬的，它必然受到历史规律的惩罚，它也已经遭到了惩罚。

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反对了高工资、高奖金、高报酬，但是，我们应当绝对地否定奖金的作用么？一个比较积极、认真负责、超额完成任务或者有所证明创造的工人，为什么不可以比他的同级工资多得些适当的奖励？一个业余从事写作或者对某一专业有新发现、新发明的工人、农民、革命知

识分子，为什么不可以得到适当的物质鼓励呢？空头政治的原则是奖懒罚勤的原则。无产阶级政治挂帅的“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是调动和保证人民群众社会主义积极性的原则，而且认真实行这个原则，也是对特权的最有效的限制措施呢！

“四届人大”应当明文规定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条文。我们对“四届人大”抱有很大的希望。我们希望能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一个胜利的大会，开成一个反映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广大人民群众统一意志和愿望的大会。但是，毛主席在与林彪反党集团激战的开头引吭高唱悲壮的国际歌，已经深深地震动了广大人民群众。他们知道，新宪法的规定只是再次给了我们一个武器，要真正实行还必须靠广大人民自己的斗争。

一九五四年的宪法不是也规定过人民的民主权利么？毛主席不是还多次说到：“没有广泛的人民民主，无产阶级专政就不能巩固”么？但是，一方面存在着林彪为代表的镇压人民的反民主努力，另一方面也由于人民群众自己对这个民主权利运用得太少了（这是由于中国封建传统的根深蒂固，也由于我国生产还比较落后，人民的文化水平还不高，因而比较缺乏民主精神的缘故），毛主席提出多年的“造成一个生动活泼政治局面”的目标，还远远没有达到。

正如一个南方水乡的客人来到沙漠中才觉得水的可惜一样，文化大革命中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也是在遭到剥夺的时候，才更感到民主权利的珍贵。尽管一九六八年把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革命造反派群众）残酷地镇压下去了，但是，“现在的世界潮流，反民主的反动派只是一股逆流。”一个彻底摧垮林彪体系的群众运动在不久的将来必定会到来，他们必

将重新恢复和发展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切精神。

李一哲

一九七三年九月十三日初稿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十二日二稿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七日定稿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十日起在广州街头张贴

附：

广东省召开群众大会为李一哲错案平反

中共广东省委最近召开群众大会，为被打成反革命集团的李一哲案件平反；同时宣布，因李一哲问题受牵连、被审查的其他人的问题也要实事求是地予以解决。

李一哲案件是广东省人民关注的一个案件。一九七四的十一月，李正天、陈一阳、王希哲三位青年，署名李一哲，在广州街头贴出了一张题为《关于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大字报。这篇大字报针对林彪反党集团猖狂破坏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大搞封建法西斯专政的暴行，指出：林彪反党集团赖以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是延续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林彪反革命路线的表现形式是极左。大字报还未点名地指出了江青的许多罪行，并且联系这些现象，分析了我们国家在上层建筑领域中存在的某些缺陷。

这张大字报贴出之后，在群众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和争论。在当时十分复杂的斗争情况下，广东省委误把这张大字

报定成了“反动大字报”，以后又错误地宣布李一哲为反革命集团。

近半年来，广东省委对李一哲案件进行了多次研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省委本着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决定彻底解决这个问题，不拖泥带水。省委主要负责同志还多次同李正天等三位青年座谈，听取意见，对他们和他们的大字报的正确的地方，加以肯定；对有缺陷的地方，耐心地指了出来。

在为李一哲案件平反的群众大会上，广东省负责同志代表省委作了自我批评，对这一案件的错误处理承担了责任。省委负责同志说，通过对李一哲案件的处理，省委认为，有的经验值得很好总结。首先，一定要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省委决定在干部和群众中继续开展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鼓励大家进一步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不管是谁说的，不管是什么本本，只要是不符合实际的，不符合人民利益的，都不能照搬，做错了的，都要纠正。其次，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我们应当允许人民讲话，鼓励人民关心国家大事。只要有利于社会主义事业，有利于加强党的领导，顺耳的话、逆耳的话都应该听，只有这样，才能集思广益，人民的精神生活才能热气腾腾。同时，我们也要积极引导群众正确地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加强法制和纪律教育，使我们的民主生活健康地、有秩序地发展起来。第三，一定要学会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人民中间有了问题，应该用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这一条一定要说到做到，把它当作人人必须遵守的国家大法来坚决执行。

李一哲的代表李正天、王希哲和因李一哲案而受牵连的

群众的代表胡喜凤在大会上发了言，他们都表示，一定要朝前看，要顾大局，要使自己的一切言行适应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这一伟大的转折，同心同德地搞好工作，为实现祖国的四个现代化贡献力量。

1978年2月14日 《人民日报》

张天民上邓小平书

邓副总理：

我是长春电影制片厂一名年青的创作人员，故事影片《创业》的执笔。这部影片上映后，广大石油工人和其它战线的工农兵观众，反映强烈，感到受到鼓舞。但在同时，也受到了领导上的严肃批评，指出影片存在着严重问题。直至今日，问题没有解决，认识没有统一。

《创业》是由有大庆工人参加的三结合创作组创作的。为了在银幕上塑造我国石油工人的英雄形象，我和其他同志遵照《讲话》指引的方向，深入到石油工人中间去，与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用了七个多月的时间，进行调查研究，走访了四个油田和铁人王进喜同志的家乡，阅读了几百万字的材料，先后与一百多位石油工人和干部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了解石油工人成长的历史，中国石油工业发展史，石油战线两条路线斗争史。在此以前，我还在一个石油钻井队搞过七个月的四清，石油工人的英雄事迹，使我们受到很深的教育，鼓励着我们充满激情去写作。摄制组的同志们，在党支部的领导下，以石油工人为榜样，顶严寒、抗酷暑，用比较快的速度拍成了影片。

影片经过大庆各条战线模范人物代表的审查，给了我们许多支持和鼓励，又经文化组负责同志多次审查，也给了肯

定的评价。吴德同志、于会泳同志以及创办的其它领导同志都认为是一部比较好的影片。中共吉林省委负责同志也表示满意。文化组向中央写了报告，经王副主席批准，于七五年春节上映。但就在上映的第二天，有关领导做出几项决定：不继续印制拷贝；报纸上不发表评介文章；不出国；电视电台停止广播。并通知了全国各地。不久，北影负责人传达了中央负责同志的指示，指出影片在政治上、艺术上都有严重错误，政治上美化刘少奇，艺术上写真人真事，公式化概念化。要求查一查背景，并写批评性的评论文章。这使文艺界受到了极大的震动，思想上比较混乱，我本人也感到压力很大。直到四月八日，文化部核心组“经过仔细认真地讨论”，提出了十条批评意见。（见附件）并建议吉林省委、长影党委和创作人员做了检查，指示我们写一篇自我批评文章准备在报上发表。调查了创作过程，指出“不论涉及任何人和事都没有关系。”

我和文艺界不少同志对十条意见有不同看法，但谁也不公开讲。我想写信给毛主席，又耽心会受到有关方面的责难。考虑再三，我觉得这不仅是一部影片的问题，而是关系到今后创作怎样搞的问题，是广大文艺干部所共同关心的问题。因此决定给毛主席写信，并同时给您写这封信，（两信内容相同）希望得到您的批评。

一、毛主席教导我们判断一个作品要看实践，要看效果。这部影片受到工农兵的欢迎，文化部、报社、制片厂都接到许多观众来信，在许多工矿企业中出现了学习剧中英雄人物的动人事例，这说明它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团结人民、教育人民的作用，对工业学大庆的群众运动是有好处的。（这首先是石油工人的英雄业绩感染着人们，而不是作者的功劳。）

我反复考虑，认为它有利于巩固党的领导，有利于社会主义事业，按六条标准衡量，它不是毒草。

二、影片多次写到毛主席、党中央对石油会战和石油工人的关怀，其中有的地方写到党中央给石油工人送主席著作，中央给工人调来帐篷，中央首长和全国人民期望着我们等等。目的是想体现党在政治上、生活上、生产上都关心着石油工人，这个党中央指的是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是指无产阶级司令部，限于所写的年代是一九六〇年，不便使用无产阶级司令部这个词，在我们的心目中，刘少奇是不能代表党中央的。这种写法如有不妥，我们愿意改正，也是不难改正的。怎么能说凡这样提党中央就是指刘少奇呢？从我们主观意图到广大观众的客观感受，它都未起到“给刘少奇、薄一波之流涂脂抹粉的作用”。

三、我们根据大量的生活素材，经过艺术概括塑造了党的干部华程这个形象。其主要的故事情节是虚构的。这个形象的塑造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绝不是真人的传记，不是要为某领导同志树碑立传。十条意见认为我们“着力地宣扬了活着的人”，“明显地写活着的真人真事”，主要根据有二，一是语言，二是某些情节。剧中是使用了一些某领导同志讲过的语言，但这些话有的是从群众中来的，又是直至今天还为广大石油工人所共同使用着的，这些话我们用在了华程身上，也用在了周挺杉身上，甚至阶级敌人冯超也讲了。怎么能认为用这些话就是要宣扬某领导同志呢；剧中有的情节可以看出生活原型，就是十条意见本身也承认那不是一个人的原型，也承认这些情节与生活中的真事只是“类似”或“相似”。这就证明是经过概括，经过了加工的，问题是加工提炼得好不好，够不够，而不是写真人真事。十条意见批评影片写

真人真事，又处处以写真人真事的报告文学要求影片，要求“按报告文学来搞”（刘庆棠同志讲话）也是不好理解的。这个问题已经在创作人员中造成混乱，有人总结《创业》的教训就认为不能写重大题材，不能写重大历史事件，不能写出名的人和事，只有写小题材、小人物、小故事才保险。

四、周挺杉形象塑造得还不够高大完美，但认为他对苏修卡我们脖子表示愤怒的动作是鲁莽汉子似乎不妥。

五、不能因为使用了主席语录、国际歌歌词而说影片语言概念化。

我是一个在党教育下成长的文艺干部，在政治上、艺术创作上都是十分幼稚的。由于我学习马列著作、毛主席著作不好，世界观改造不好，文艺黑线流毒没有完全肃清，在创作工作中常常发生错误。但我并不因此而不去竭尽全力去歌颂我们伟大的党，伟大的人民，《创业》这部影片只是一次实践过程，只要我真正认识到错误，是愿意努力改正的。如果这部影片的错误还没有到十条意见指出的那样严重程度，我建议应该重新上演，相信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锻炼的人民是会正确地鉴别它的。

热切地等待您的批评。

长春电影制片厂

张天民

一九七五年七月十八日

简介 张天民，男，1933年7月生于河北省涿县农村。及长，在北京四存中学和第四中学读书，1954年毕业于中央电影学

校（北京电影学院前身）编剧编辑系。1956年调入长春电影制片厂工作，在长影从事电影创作已27年，1983年调入北京电影制片厂任编剧，1986年任农村读物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1988年调入中央电视台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工作。

张天民从中学时代开始发表作品，写过诗、小说、电影电视剧本，主要创作有诗集2部，短篇小说40余篇，中篇小说9部，长篇小说1部，电影电视剧本20余部，其中有14部电影电视剧本被摄录成影片和电视剧。曾获1979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及其他多种奖励。

张天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全国及吉林省五届人大代表，中国作家协会吉林分会副主席，中国电影家协会理事，中国电影文学学会常务副会长，

1975年7月18日，张天民为影片《创业》受江青等人扼杀而上书邓小平同志转毛泽东主席，7月25日毛泽东对此信作出批示，在文艺界引起强烈震动，成为抗击“四人帮”的先声，并因此受到江青等人的调查和迫害。“四人帮”倒台后始获解放。

附(一)：

毛泽东关于电影《创业》的批示

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分了，不利调整党内的文艺政策。

毛泽东

一九七五年七月二十五日

此信增发文化部及来信人所在单位。

附(二):

文化部核心组对《创业》影片的意见

——刘庆棠于四月八日下午
二时三十分在文科部会议室传达
通称“十条意见”

1. 《创业》这部影片所表现的题材是好的，是重大的。是应该用各种文艺形式加以表现的。但现在这部影片并没有把这一题材表现好，不如报告文学感人，也不如报告文学脉络清楚。因为这是一个重大题材，所以不应等闲对待，应该特别严格要求，抓紧进行。

2. 影片中三次笼统地提到党中央和中央首长，如毛主席著作“是党中央派专机从北京送来的”，“帐篷是中央从上海特调的”，“中央首长和全国人民期望着我们”。这些显然有意无意地起到了给刘少奇、薄一波之流涂脂抹粉的作用。在报告文学中绝无这种含糊其词的提法，报告文学明确指出“石油会战是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党中央的英明决策”。王铁人的“两论起家”，是在一九五九年全国群英会上奖给他一套《毛泽东选集》，他学习毛主席著作更加勤奋、认真，是自己搞起来的，不是影片所写的那样，什么中央送书给他们。

3. 报告文学叙述了铁人光辉的一生，但同时写了王铁人是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英雄。大庆的一切胜利，都是毛

主席革命路线的胜利。并没有去着力宣扬活着的人，或把油田会战的胜利归功于大庆油田党委。影片《创业》较明显的存在着写活着的真人真事问题。片中主要人物的一些警句，有的是原话，有的是据原话稍加修改而来的，如周挺杉说：

“一个国家要有民气，一个队伍要有士气，一个人要有志气”；冯超说：“我们会战，是在困难的时期、困难的地点、困难的条件下上马的”；华程说：“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华程说：“干部要有个婆婆嘴，整天在你耳边嗡嗡，要重视第一性资料，我们要为油田负责一辈子”，华程说：“大家可以横挑鼻子竖挑眼，品头论足嘛”；周挺杉说：“政委是想建设一支拖不乱打不垮的石油队伍”，周挺杉说：“国家没有油，国家有压力，咱们是国家的主人，要分担这个压力”；华程对周挺杉说：“要观大局，辨风向”，（这是某某领导同志在一九五九年二十一期《红旗》杂志所写的一篇文章，题目就是观大局，看主流，辨风向，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此外，影片中的人物和事件也可以找到大量的生活原型，如某某领导同志原是玉门油田的军代表，后来是大庆油田的领导人，与影片华程的身份相似；另一个例子，打龙二井，水落油出的情节，与某某领导同志打萨尔图66号井的情况相似；周挺杉买豆受批评的情景，与某领导处理过类似的事件相似。

影片中使用的这些语言，是否全部合乎毛泽东思想，塑造领导干部典型形象，是否一定要选择这些语言，需要研究。所指内容，与真人无关，是创作上的问题。其中有些话，显然是错误的。这种写真人真事的风气，如果以合法的形式加以肯定，则是后患无穷。

4. 影片虽写了创业上的艰苦精神，但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表现较差，而后者，在报告文学中是做为重点方面之一来表现的。例如，工人群众中本来有“天当房子，地当炕”这一类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的豪言壮语，但在影片中却把这句话从一个落后人物春生嘴里做为讽刺话说了出来，乐观主义的警句变成了悲观主义的话柄，完全颠倒了。

5. 在周挺杉的性格刻画上，影片着重通过他爱冲动，爱发火一会儿甩石头，一会儿摔茶缸，一会儿又怒折树杈等一类行动，表现了一个鲁莽汉子的形象。基本上没有写他的智慧，他的政策观念和周密思考的方面。所以这个人物的形象是单薄的，有缺陷的，因而是非典型的。

6. 影片中有许多戏有意用贬低周挺杉的方式来抬高华程，如周说：“没有条件，想方设法拼死拼活也要上”，而华程接着说：“……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如周说：“我们工人阶级顶天立地的站着，自力更生的建设我们的国家”，而华程接着说：“团结其他劳动阶级，团结知识分子。”再如，在报告文学中，写了铁人他们打了一口井，质量较差，而铁人让大家推倒重来，但在此影片中，则把周挺杉写成一个在质量问题上受到批评的对象。

7. 工程师章易之的转变，一号人物周挺杉实际上并没有起到作用，他俩见面一谈就崩。在周受伤那场戏中，章的转变关键是章看到周腿部受了伤才转了情绪，这里有人情感化的倾向。

8. 报告文学脉络十分清楚，影片却有很多地方表述不清，让人看不懂。具体表现在：（1）情节上不清楚，如冯超因何被捕？老周师傅怎么被出卖的？冯超是怎样进行破坏，造成井喷的？龙富贵的来龙去脉不清，等等。（2）技术性术语太多，一般人无法懂。（3）有许多镜头组接上不清

楚，有乱蹦乱跳的地方。

9. 报告文学只用了很少的篇幅回述了铁人的过去，着力写他解放后的斗争生活，影片对周挺杉这个人物，也应该主要放在会战过程的矛盾冲突中塑造，但这里却用了很大篇幅去写他的解放之前，既造成浪费，又造成结构上的拖沓。

10. 主要人物的语言概念化。如华程的语言中，大量的生硬的使用了主席语录和国际歌的歌词。

刘庆棠在传达文化部核心组对《创业》影片的意见之前谈到：

过去道听途说的不算数，要以此为准。

传达完意见之后又谈到：

这些意见里主要强调报告文学的长处，我们没有很好的发挥。我们加了一些东西，有的加的妥当，有的不妥当，中央领导同志推荐“按报告文学搞”。

这部影片的颜色再拍时要注意，如工作服，在生活中井台上穿的衣服差不多，艺术嘛，就应该原于生活高于生活。

再一个景物，最早有吃野菜一段，还有一点显的颜色丰富，这场戏去掉之后，更显的单调。

还有一点，两位主要演员都是很好的演员，现在影片不是演员问题，主要是本子上的问题，对这两位演员不要批评，他们还是努力的，当然也要总结经验。

这两点不是正文，但是经过共同讨论过的看法，因不是主要方面，未写进正文。再拍时要做为考虑的方面。

下一段工作：

把部核心组根据有关领导同志指示精神，经过反复研究，做为建议，供省委、厂党委、全厂讨论做参考。下一步

是否先讨论这些意见。讨论时实事求是，只要同志们认真的全心全意地想把报告文学的铁人形象，用艺术概括脱离真人真事地搬上银幕，我们错了就改，可以改的更好，不要有更多的压力。大家要比较仔细地讨论。

第二步，在此基础上总结一下我们的工作，各方面的同志都要总结，小组的同志总结一下经验，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再以摄制组或厂的名义写一篇总结性的自我批评的文章。其他同志要写一个比较实事求是的评论，既说这个影片的长处，也说说这个影片存在的比较严重的问题。

核心组让我转告这个意见，用两三天的时间进行总结写出书面意见。总结性的自我批评的文章，可以回去搞，写文章需要一定的时间。

在总结文章的基础上，各种艺术形式都要表现，我们下决心把它搞好。

（根据记录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附(三):

影逢乱世：《创业》蒙难纪实

乔 迈

献给中国人民粉碎“四人帮”十周年

序

这是十一年前一椿惊心动魄的影坛轶事。

我孤陋寡闻，不知道在中国和世界电影史上，是否有过

任何一部别的影片、曾经象《创业》那样大起大落，忽而让人喜上眉尖、忽又叫人愁容惨澹，好就好得天堂上坐，坏就坏得地狱里卧，那导演于彦夫，那编剧张天民，两位斯文艺术家，一会儿受命写总结经验的文章，一会儿被逼作检查认罪的发言，庆功喜报还没有来得及在手心握热，又早隐约听见了镣铐丁当……岂止他们两个，就连整个长春电影制片厂、整个中国文化艺术界，都被弄得昏头昏脑，陀螺也似转，风车一般旋，脚下无根，心中无主，身如飘絮，随人仰俯——空间物理学称这种现象为“失重”。这是艺术的“失重”，政治的“失重”，整个中国大平面倾斜了，艺术必须要随之倾斜，人又何能免！

“好极了呀，《创业》！”亿万工人、农民、士兵和知识分子大声拍手说。

“坏透了呀，《创业》！”那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女人也大声拍手说。

于是，全中国就都愕然，茫然，昏昏然。

事情终于提到了最高领袖那里。

那是通过暗中的渠道，非常的手段，秘密的方式，地下工作的办法，而且冒了极大危险才送达的。其中紧张地动员起来的人虽只三五个，但那三五个人却有当时政局中相当重要的大人物，而下边则是蒙冤未解的贺龙元帅的女儿贺捷生。

贺捷生颜小个子的、柔弱的、说话细声细气、办事果断大胆、颇有大将风度的一位不寻常的女性。

唔，还有白桦，写过挨批评的电影剧本《太阳和人》的风流倜傥的才子。

然后是张天民！一介书生，然而竟敢作乱于天子脚下，

不顾了爱妻弱子，舍却了身家性命，莽莽撞撞大告其“御状”！

哦！《创业》何幸，竟受到最高领袖的关照，除了罪孽深重的《武训传》和《清宫秘史》，在中国，可还有别的电影有过这样的奇缘？

“此片无大错！”毛泽东一言而定乾坤。欢呼吧，跳跃吧，我们胜利了——长春电影制片厂一片沸腾，独有张天民半是笑脸半是苦脸。

他知道事情断不会到此结束。

他是对的……果然转眼重又大祸临头。

《创业》的出现及其遇逢到的难以想象的危险成了一个象征，表明一场恶梦将要过去，一个清醒的新时代的黎明将要到来。谁能说，它同一年之后出现的“四五运动”、亦即丙辰清明天安门广场群众革命浪潮没有血肉渊源呢？“文革”的沉沉黑夜以文艺的批判为序幕，似乎也将以文艺的批判为报晓的鸡啼——这就是电影《创业》。

第一章 从文学本到完成片

一 萨尔图风雪迎远客

狩猎人的小村落萨尔图静静地躺在北满荒原上，数百年来酣睡不起。

直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之初，几乎一夜之间，象从地底下冒出来似的，这儿及其附近平如镜面的大草原上，突然涌现了喧腾呼号的万马千军。其中一个人浓眉大眼，魁伟雄壮，他和他的伙伴，在一位号令千军奋一呼的独臂将军指挥

下，用一种钢铁的长东西凿地球，捅开了厚达数千尺的坚硬的地壳，从地心深处引出了一种黑而亮晶晶的液体，奔流汨汨。这个人后来以“铁人”的称呼名扬天下，萨尔图及其附近地方也同时获得了一个新的名字：大庆。

“铁人”在十年动乱中被七斗八斗，遂于1970年11月含恨病逝。但是，他的名字和由他体现的“大庆精神”却弥远弥珍。

早在“文革”之前，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就提出，希望文艺界、特别是电影界反映“铁人”和“大庆精神”。长春电影制片厂和上海电影制片厂为此派出过几位经验丰富的导演前往大庆，都因种种原因而放弃了努力。

1972年11月，即“铁人”逝世的整整两年之后，石油城萨尔图用冲天的大风雪迎来了几位客人。他们一下火车，就被这儿的广袤、深邃、无与伦比的雄奇景象激动得热血沸腾。

他们是于彦夫和张天民，还有另外几个人。

于彦夫和张天民来到萨尔图，迎接他们的，除了大风雪和大庆人，还有华克。

于彦夫和张天民以创作组组长和执笔者身份充实进来以后不久，当时的长影副导演，华发早生的高天红也来到大庆，参加了创作集体。

差不多与此同时，他们得到了江青的一个具体指示。

早在五十年代初期即担任过中宣部电影处处长的前电影演员江青，作为有身份的中国第一夫人，长时期里珍重芳姿，不肯轻易抛头露面，直到“文革”伊始，她才走到前台，始则出任权力极大、权威极重的“中共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副组长，继而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她的兴趣本来

已经转向政治领域，但仍不愿放弃她熟悉的文化艺术，作为昔日上海滩上的二、三流明星，江青在新中国文化艺术这条战线上指挥如意的地位是逐渐稳步确立起来的。批判电影《武训传》和《清宫秘史》、为批评红学权威俞平伯的“小人物”鸣锣开道，都有她隐蔽的影子在。当“文革”序幕即将拉开之际，差不多已经成了“副统帅”的林彪又助了她一臂之力。在《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这个杀机四伏的历史性文件里，她首次提出了所谓“十七年文艺黑线统治”论。正是这个论点，迫使中国文坛的耆宿们以及由这些耆宿率领的文艺大军，一齐臣服于她灿烂的石榴裙下。她毋须挟天子便可以号令天下。她的话成了文化战线的“最高指示”。

1972年9月，江青发出了关于大庆题材电影剧本创作的原则指令。她的话是：

“《中国文学》这篇文章很好，可以以这个材料为基础，不要写真人真事，不要用铁人的名字，用他的材料。不要局限在大庆，多跑几个地方，视野开阔些，要塑造典型嘛。”

“要从玉门写起，这是历史。”

江青提到的文章，指的是发表在1972年第七期《中国文学》（中文版）上的报告文学《铁人的故事》，该文作者署名为“大庆油田工人写作组”。江青的这一段话后来被概括为六个字：“照报告文学搞”。

长影《创业》创作组的成员们当时对江青并无二心。张天民后来说：“接受了执笔任务以后，我真想认认真真照江青的指示办，想使她满意。”但是，久矣养成的创作老习惯难改。他们比较仔细地读过那篇报告文学以后，就迈开双

脚，跑到生活里边去了，他们要用自己的眼睛看和用自己的心去体察，现成的东西化不成活生生的形象。一旦有了自己的真切感受，进入文学构思的时候，他们就把《铁人的故事》轻轻放到一边去了，这是日后他们遇到江青严厉斥责的一个重要原因。

张天民和他的伙伴们以很大的热情阅读了上百万字的文字材料，其中有历年的“大庆战报”，六十年代初期会战总指挥部的会议记录，前线指挥员们的重要讲话和“铁人”王进喜的事迹材料。他们都没有见过那个喊出了“石油工人一声吼，地球也要抖三抖”的英雄，只能依靠二手资料，好在大庆这块热土上，寻访“铁人”的足迹并不困难。

“小炉匠”们带他们到1205钻井队去，那里是王进喜生前劳动、战斗的岗位，他的战友和徒弟们都在。一谈起“铁人”老队长，这些天不怕地不怕的五尺汉子们都哭。说到在三年困难时期开展的石油会战，老队长不顾自己浮肿，把每餐的两个窝窝头分出一个给别人，深受感动的电影艺术家们就要求队里也给他们做一顿那样的窝窝头吃。

这不是寻常的“忆苦饭”。当他们拿起金黄的窝窝头，就仿佛看见那个人，穿一身沾满油污的破旧棉工装，披着老羊皮大衣，面色黄肿，然而始终不减刚强的、不屈服的笑容。

笑容突然消失了，他猛地站了起来，向着浩浩长天、茫茫大地，眼里射出火一样的光芒，他悲怆地、悲壮地吼道：

“我就不信，石油都埋在别人的地底下，咱们这么大的国家就没有油！……”

“铁人”的声音，他们听到了，听到了，“把石油落后的帽子，甩到太平洋里去吧！”他豪迈地叫着，以中国人民

的万难不屈的凛凛壮志。为了这个崇高的目的，他献出了自己的一切，而被窘迫的经济形势困扰着的国家所给予他们的只是每餐两个窝窝头。

窝窝头拿在手里，艺术家们都吃不下，好象它是那个把国家民族的危难担于一身的人的心，纵然死了，他的心也还在欢蹦跳动……大家泪眼望着泪眼，眼前矗起了一座丰碑。

“我们要塑造火一样的铁人形象。”事后，于彦夫静静地说。

“不然，我们对不起他。”张天民一边擦试着眼镜，一边凝神望着荒原，以及荒原上这里那里排列着的小小的、白色的井房和童话般的采油树。

短暂的秋天过去了，大风雪重又笼罩了草原的日日夜夜，《创业》创作组的同志心里不平静。作为一部以大庆会战为题材的影片，他们不能以单纯塑造工人形象为满足，他们的视角广阔很多。实际上，石油会战的胜利，处在关键部位的是指挥这场战斗的领导干部，打先锋的则是一群有作为的科学家。当李四光轻轻转动写字台上的小小地球仪，“陆相地层贫油”的理论就瓦解冰消。大庆会战指挥机关正是根据他的独创理论下了决心的。张天民他们手中并不缺少这样的生活典型。解放初期，石油战线留下了一批知识分子，后来其中的一些人成了总地质师，我们自己培养的一些年轻地质师也迅速成长起来。尽管根据“革命样板戏”的原则和当时国家的知识分子政策，在文学艺术作品中，知识分子只能作为工农兵的陪衬，并且总要强化他们的缺点即“劣根性”，但他们的爱国热忱和不可替代的贡献总是抹杀不了的，我们在《创业》中章易之这个形象身上，生动地看到了那个年代知识分子令人苦恼的左右为难、进退失踞、欲干不

能、欲罢不忍，并且无论怎样努力总要遇到批判的尴尬处境。

知识分子犹可说也，大成问题的是领导干部的形象。张天民们一经接触到这个问题，《创业》未来的命运就将决定了——江青必定要对影片进行尖锐的批判，因为他们面对的生活原型是江青深恶而痛绝的，始终欲置其于死地而未能的。

二 余秋里、康世恩和宋振明

“……还有余秋里”

他是国家民族的功臣。抛开战争时期不论（他把一条路膊留给了那场战争），他是中国的石油元勋。五十年代他接任石油部长的时候，我国每年要从国外进口大量的原油，号称“中国宝库”的西北某油田的产量，在偌大国家的整个需求中，不过是杯水车薪。迅速恶化的国际局势，又使进口原油面临着被彻底切断的危险。多少辆汽车被迫停止了运转，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无奈撤消了好多急需的军事演习项目，庆祝建国十周年的盛大节日里，北京街头出现了背负着沉重煤气包的公共汽车……缺油的巨大阴影笼罩在国务院总理面前的新的五年计划草案上，使他迟迟下不了决心。

毛泽东主席向余秋里打了招呼，长铗归来兮，车无油。
将军夜不能寐。

石油部长去找地质部长。

李四光笑指地质图上的新华厦沉降带，说：请你下决心。

余秋里决定孤注一掷，大胆提出，把有限的人力、财力、物力、集中使用在最关键的部位上，突破一点，带动全

局，一举改变中国石油工业落后的局面。他带上康世恩，率领数万石油大军，独臂挥师，北进北满草原，展开了一场震惊中外的石油大会战，这场会战后来以“石油战线的斯大林格勒战役”被写到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史上。

在大庆，流传着许多关于余秋里和康世恩的佳话，为艺术家们的创造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康世恩，清华大学的地质高材生，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玉门油矿时接管“美孚”公司的军代表。余秋里是大庆石油会战的总指挥，康世恩就是副总指挥。他们两个配合得这样得心应手，精神气质又这样相象，以致后来广泛流传于干部、工人中的他们的一些话，都分不清是两个人中哪个讲的了。

1964年，毛泽东评价说，余秋里是帅才。

1984年，胡耀邦在一份文件上批示：“石油部在世恩同志（带病工作）的领导下，这两年埋头苦干，工作是做得好的。”

遗憾的是，张天民他们到大庆的时候，两位功勋卓著的将军已经不在这里。创作组想去采访他们，被婉言谢绝了。

张天民他们只好又去收集二手资料。

许多老工人都能如数家珍地说出一些“老部长”（直到现在，他们还这样称呼余秋里）的故事。

强将手下无弱兵，余秋里、康世恩相继离开大庆以后，宋振明接过了他们的班。

宋振明在大庆叱咤风云，但他后来却不走运，他在石油部长上任时候，不幸发生了海上钻井船“渤海二号”沉船事件，他引咎辞职，忍痛离开了找油和采油的第一线——这是后话。

《创业》创作组来到大庆的时候，宋振明已经从“牛棚”回到了“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他是在“文革”初期作为余秋里、康世恩，因而也就是刘少奇的代理人被打倒的。当时他才四十来岁。他参加革命早，干过文工团，后来跟着康世恩，成了石油师的干将。

他出来了，由一把手降到三、四把手，还让他抓生产，但在工人和干部的心目中，他还是一把手。

张天民盯上了他，有一段时间，总跟着他转。观察他怎样主持会议，怎么跟“老总”和干部、工人们谈话，还跟着他坐上吉普车到处跑。到了井队，他的身边总围着一大群工人，他们请他喝酒，他也不客气，大家就团团围坐在大草原上，端着特大号搪瓷缸子，传来传去，一人一大口。张天民是戴眼镜的作家，起初，工人们对他这个摇笔杆子的秀才都不以为然，后来见他也能咕嘟咕嘟地大口喝酒，三、四两老白干打不住，又象是宋振明好朋友的样子，这才也对他亲近起来。

华程毕竟不是余秋里和康世恩，但这个形象却来自生活，就不可避免地反映了他们的某些特点，这就同报告文学《铁人的故事》完全不一样。《铁人的故事》也是写得好的，不过它只写到了王进喜，而没有涉及到别的人，更没有领导干部。一谈会战时期的领导干部，自然而然就会使人想到余和康，在当时，他们二位的身份很可疑，总被暗示为不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虽然他们为国家立下了盖世奇功。

《创业》和《铁人的故事》的不一样，从一开始就惹起了是非。影片开拍不久，就有流言传到摄制组，说《创业》有问题，可能是一株罕见的“毒草”，话讲得有鼻子有眼的。协助拍摄工作的大庆某些人员也徘徊起来，摄制组人心浮动，

于彦夫无奈下令停机待命。他和摄制组支部书记曲伟找到大庆政治部，请问油田领导采取何种态度，是否仍予支持。

政治部回答说，要汇报，然后答复。

摄制组的情绪七上八下，人心如同汤煮。

好歹答复来了，却是一个通知：请长影《创业》摄制组全体成员于次日到萨尔图二号院（总部）去，油田领导要和大家见面，有重要事情相商。临末还加了一句：请全组同志务必出席，不要遗漏。

于彦夫仿佛触到了一位丈二和尚，曲伟也摸不着头脑，有人就猜是要传达上边的批示，说不定要散伙，搞得不好还得追究责任。

第二天，于彦夫和曲伟集合了人，除了留下两个人看器材，余下的全体人马都一起上路。

一进二号院，宋振明和几位“老总”以及一大群干部迎了出来。

宋振明面带微笑，一一和大家握手，却没有往屋子里让，只抬起手划了一个弧线说：“天太热，来，同志们先解解暑。”

天啖西瓜的场面很快结束，因为人的肚皮容量终究有限，而西瓜丰富的汁水也极易使人满足。于彦夫偷眼望着宋振明，却不见他有招呼大家坐好开会的意思。不但不招呼开会，他反倒拉着一些人说闲话，还和演员们开玩笑。“老总”和工作人员们也分头三三两两跟大家唠闲嗑，有的在屋子里，有的在院心凉荫下。说话的内容又极其漫无边际，天气也谈，草原也唠，家长里短，南北东西，今来古往，名人胜事，只独独不谈《创业》，不谈摄制组的工作。

到底挨到了时间。只见一位工作人员走过来，俯身在宋

振明身边低声说了句什么。

宋振明便站起来，大声说：“好快，到开饭时间了，各位就在这儿随便吃一点便饭吧——也没有什么好东西。”

席间，宋振明继续谈笑风声，挨桌向大家敬酒，不停地道辛苦，还说计么：“祝同志们成功！向同志们学习！……”

然而觥筹之间，杯盘狼藉之时，宋振明悄然退席了，工作人员就来送摄制组返回驻地。没有“下文”了，完事了。

于彦夫和曲伟也明白了。

开过了支委会，他们就召集摄制组，下令开机，照原定计划干。

而在另一边，张天民正被文学剧本没完没了的修改搞得心烦意乱，一头碰死的心思都有。

三 艰难的送审和成功的喜悦

因为江青说过那么一番话，《创业》就成了通天的剧本。通天，在当时的环境下，对许多作者来说，是一种求之不得的幸福。某个地方、某个单位有了这样的剧本，在那个地方、那个单位领导同志和创作人员的大脑皮层上，都会增加几个兴奋点。兴奋会带来紧张，紧张会转化成烦恼，因此，幸福也就变成了不幸。

张天民未能免俗，听到文艺“旗手”关心《创业》创作，他似乎也兴奋了一下，但烦恼来得更快。因为这样一来，他就把自己的创作整个儿纳入了江青事先规定的轨道。众所周知，江青这位文坛总管家不是容易伺候的。

1973年6月，《创业》创作组在去了玉门、克拉玛依、胜利、大港等油田“跑面”深入生活以后，在北京石油部招

待所，张天民写出了剧本提纲。这个提纲写在一个黑色硬面道林纸笔记本上，蝇头小字，工整清晰，极少涂抹，看去好象后来专门誉写上去的，其实却是作者当时一挥而就，浑然天成的。

从当年六月到八月，《创业》创作组几次讨论了这个提纲，然后，在大庆，张天民写出了剧本的初稿。

同年十一月，二稿产生。

转年三月，写成三稿。

五月，剧本改定，是为四稿。

各级领导部门对《创业》的创作都很重视，长影党委对每一稿都召开厂务会议进行了认真讨论。从二稿起，开始报请中共吉林省委并国务院文化组（四届人大以后开始改为文化部）审查。江青始终没有审阅文学剧本，但她的指导思想始终被认真贯彻着，绝无敷衍。

对《创业》的历次修改稿，各级把关部门提出的意见尽管各有差异，但在下述一点上完全一致，即：生产斗争写得好，“阶级斗争”写得不好。

例如，1973年10月9日，在长影召开的一次有厂领导及各主要艺术部门负责人参加的讨论会上，对《创业》剧本提出的主要问题就有“阶级斗争这条线应该着重写，这样大的工程，敌人一定是要破坏的”，而“现在的这条线，象是贴上去的”，“阶级敌人象是借来的”，“是剧本中写得最失败的，是为了写阶级斗争而写进去的”，“他的活动还构不成罪行”，“没有和主要英雄人物斗起来”，“没有写出毛主席革命路线同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因此建议剧本中的对立面人物“应以阶级敌人和知识分子形象为代表”，因为“实际上，过去崇美的人，或是受美帝国主义影响较深的

人（意指知识分子），是最容易接受修正主义那一套的”。

对这样的意见，剧本执笔者和创作组成员们虽然说不上是心悦诚服的接受，但也一直是以积极认真的态度加以考虑的。他们当时的觉悟尚没有高到已经认识到了包容一切的“阶级斗争”学说的谬误，恰恰相反，他们苦恼着，焦灼着，是因为自己“政治水平低，路线觉悟差”，领会不了“阶级斗争”理论的宏旨要义，因而自觉不自觉地中了刘少奇“阶级斗争熄灭论”的毒而不能自拔。

张天民写在精美的道林纸笔记本上的剧本提纲里边，压根儿就没有阶级敌人存在，那里只有一位叫作“田家根”的人物，是一个小生产思想较为严重的农民，“创业油田”侵犯了他的自留地，他就想法搞一点阿Q偷尼姑庵萝卜式的破坏活动，对于整个伟大的油田建设，他的存在就象大象身边的一只牛虻。

这样的“阶级斗争”描写，在创作组讨论时就没有通过。但张天民的脑子里，实在搜寻不出什么“阶级斗争”的奇峰异壑，就是大庆的业余作者“小炉匠”、“门大炮”和王基，也提供不了这样的素材。难道阶级斗争真的熄灭了？几番搜索枯肠之后，他们组织了几个小分队，分头下去专门搞这样的调查。

唉唉！关于工人，关于干部，关于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创建民族伟业，材料俯拾皆是，用也用不完，怎的这“阶级斗争”就这样千呼万唤不出来，踏破铁鞋无觅处……不，功夫不负苦心人，到底被他们找到了一个阶级敌人。那是解放初期，在玉门油矿挖出的一个捣乱分子，同“美孚”公司一起接收过来的家伙，据说此人有破坏活动，被定为国民党的残渣余孽，施以无产阶级专政。创作组如获至宝，张天民立

刻把他写到了人物表上，取名“冯超”，树为本剧第一号“反面人物”。

冯超初进创业油田时候，身份只是一个普通职员，后来创作组不断给他加官晋爵，由生产处处长、专家工作处处长慢慢升为前线指挥所副指挥，地位仅次于政治委员兼指挥的华程，并且和总地质师章易之的关系越来越密切，破坏活动也越来越加码——“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越咬越紧了。小农田家根这时变成了富裕中龙富贵，他的阿Q偷萝卜式的捣蛋活动也正式进入了冯超整体阴谋的圈子。

这样，《创业》1975年2月的正式审定稿，就得到了各级党委的首肯。中共吉林省委的审查意见认为“这次阶级斗争突出了，说明长影党委执行中央精神是坚决的，这一点以后要坚持下去”。国务院文化组也赞扬“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结合的比较”好。

张天民松了一口气。他终于可以交差了。但他的剧本也因此留下了一个在今天回过头看是可笑的、甚至有些滑稽的缺陷，尽管从一开始他就不是心甘情愿这样处理的。

还在文学本紧张修改的时候，《创业》影片于1974年2月投入拍摄。当时的想法，是要抢在毛泽东关于“工业学大庆”指示发表十周年之前完成全片，作为献礼。

拍摄工作得到了油田、铁路和军队的有力支持。在玉门油田拍“解放了”一段戏，一次就动员了步兵五百人，骑兵一百二十人，以及坦克、装甲车、卡车和吉普车多辆，还有云雀式直升飞机一架。

全部样片以九个月零三天拍完，计一千一百多个镜头，放映时间长达三小时十分。

样片一经试映，立刻在厂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

1974年12月7日，大庆召开影片观摩座谈会，许多工人、干部流着眼泪发表了热烈的赞誉称颂之词。使张天民大出意料的是，尽管影片对章易之这样的知识分子做了不尽公正的描绘，但是，大庆的许多“老总”、地质师和技术员等“老九”，却激动地对长影的艺术家表示感谢，因为影片肯定了章易之是爱国的。张天民后来感慨万端地说：“我们国家的知识分子实在好，他们的要求竟这样低……”

完成片顺利在省委通过，送国务院文化组审查。文化组长吴德、副组长于会泳和“影筹”、“创办”的负责人分别审看了影片。

1974年12月16日正式传达的文化组意见指出：《创业》题材重大，主题鲜明，主要人物塑造得好，情节发展脉络清晰，主要演员表演有激情，有深度，生动感人，“是一部相当好的影片”，要准备总结经验，争取元旦上演。感到不足的是嫌放映时间太长，“中央负责同志”（即江青）指示要压，要压缩到两个半小时，并且提到这是（对工农兵）的“阶级感情问题”。

受到这样的鼓励，长影群情高涨，但是摄制组对自己的片子下不了手，第二次送审的双片仍然觉得太长，没有通过。不过，文化组的意见仍然说：看了这部片子的人都很兴奋，正在召开的四届人大也想早看，领导上的意思是希望好上加好，达到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另外还提了一些具体的修改意见。同时说，（放映）时间不能商量，必须是两小时三十分以内，这是“首长”（即江青）的指示，“首长”说：你们想让观众把椅子坐塌呀？元旦已过，这一次提出“争取春节上演”。

长影马不停蹄，进行修改，压缩，到底把放映时间缩短

到了两小时二十八分五十二秒。

1975年1月23日，第三次送审双片的时候，四届人大已经闭幕，文化组变成了文化部，于会泳就任部长。

于会泳看了双片，除提了一些诸如色彩、透明度、音乐和歌曲等意见外，表示满意，并指示长影再拿回去改，一定要在一月二十九日改后送来，春节一定上演。

一月二十九日，文化部通过了长影第四次修改的样片后并于当日呈报政治局，此前，片子已经送到钓鱼台。主持中央工作的王洪文在文化部的报告上批：“我粗看了一遍，总的感觉这部片子拍的是好的，拟同意上演。请春桥、江青、文元同志看。”张春桥、姚文元都划了圈。

当晚，江青在钓鱼台十七号楼批示：“最近感冒了，上呼吸道感染，不看了。请会泳同志定。”

除了身体不适，江青最近还比较忙，心情也不好。

1975年1月13日至17日，四届人大召开，江青只为她的追随者争到了三个内阁席位：文化部、卫生部和国家体委。石油功臣、“还有”不止的余秋里却被周恩来提名为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康世恩为石油化工部长。处在国务院第一副总理重要位置上的，则是江青的死对头邓小平。

在这种情境下，江青也没有心思审看一部影片。

文化部根据几位政治局委员和江青的批示精神，决定《创业》作为重点片在春节期间上映，并向国外发行，其他一批也早折腾过多少回的影片一并上映，“由《创业》带一带，带出去。”同时调集人力，准备写文章进行重点宣传。

1975年2月4日，中国电影公司向各地发出“彩色故事片《创业》宣传要点”，计五条，对影片评价甚高。

同日，中共吉林省委和“省革委”联名向长影发出贺信

和嘉奖令。

次日，长春电影制片厂举行祝捷大会，全厂各部门职工代表喜气洋洋集合在大剧场里，听取了“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郑季翘代表省委、“省革委”所作的讲话。郑季翘在讲话中赞扬《创业》“反映了时代精神，具有革命激情，有很大的教育意义。”

二月九日，新华社发出电讯稿，题为：“春节期间将上映《创业》第一批新影片”，该稿在简要介绍了《创业》的创作、拍摄过程之后，称赞该片“成功地塑造了主人公周挺杉的英雄形象，为我国工人阶级高唱赞歌。”

二月十日，《人民日报》在头版显著位置发表消息，报道优秀影片《创业》即将开始在全国上映。同日该报四版，刊出《创业》剧照五幅和大幅广告。

同日，长影艺术片二室《创业》创作组、摄制组共同写出题为《满腔热情地塑造中国工人阶级的英雄典型——影片〈创业〉创作总结》的长篇文章。文章在概括了影片的创作和拍摄过程之后，写道：“我们采用昂扬的调子，浓重的色彩，并以粗大的笔触，强烈的节奏，来充分展现艰苦创业的斗争气势，倾力抒发英雄人物的革命豪情”，“进行崭新的艺术创作，努力使影片成为颂扬工人阶级伟大业绩的战斗史诗。”喜悦、兴奋、自豪和踌躇满志的心情溢于言表——这也正是整个长影情绪的写照。

但是，他们万万不会料到，就在他们满怀豪情写出创作总结的这同一天，乌云已在钓鱼台上空聚集，并且很快将会伴随着惊雷和闪电，降下倾盆大雨，浇灭人们心头的热情之火。

第二章 骚动不安的春节

四 风云突变

1975年2月11日，农历乙卯年正月初一，电影《创业》在北京和全国各大城市正式上映，观众反应十分强烈。从后来中国电影公司和长影收到的大量来信可以看到，人们普遍受到感动，认为是一部难得的好影片。这种自发性欢迎和此前强制推行的学习“样板戏”活动形成了鲜明对比。

但是，就在这一天，敏感的人们已经注意到，形势在不知不觉间起了微妙的变化。《人民日报》上，《创业》的广告悄然消失了，代替它的又是标榜着“为工农兵演出”而“工农兵”早已看倒了胃口的“革命样板戏”。耐人寻味的是，该报同日广告栏里出现了哈尔滨话剧院演出的、也是以大庆为题材的话剧《先锋战士》。按照惯例，象《创业》这样的“重点”影片，在公映之后，立即就会有权威性的评论文章出现，以引导人们“理解”，“学习”。这样的文艺评论班子是现成的，如“江天”、“初澜”、“学青”等一班绕着“首长”名字给自己设计笔名的秀才，他们“路线水平”高，精神吃得透，出手也飞快，写这样的文章不费吹灰之力。但是评论文章没有出现。

二月十二日，亦即《创业》正式公映的第二天，中国电影公司给长影打来电话，那是一个不带任何解释的“通知”：“影片《创业》停印拷贝，停止宣传，停止向国外发行。”简称“三停”。

与此同时，新华社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和

各地电影公司也接到了相应通知。《创业》剧照被从各地追回。

消息迅速传开，在北京、长春、上海和其他上映《创业》的城市引起了极大的震动，人们很难理解：这是为什么？

岂止各地方，就是文化部大楼里边的人，也被惊慌失措的情绪紧紧攫住了灵魂。部长于会泳焦头烂额，副部长浩亮和刘庆赏六神无主，刚从医院治病出来的“影筹”负责人吕韧敏蒙头转向，工作人员们乱纷纷从这个房间跑到那个房间，但大家谁也不知道彼此跑来跑去究竟要干什么。文化部，真个象新四军“十八棵青松”之一郭建光放开嗓门唱的那样：“好一似汤浇蚁穴火燎蜂房啊……”

他们也说不清究竟发生了什么事。“首长”的药丸子此刻还装在她自己挎着的葫芦里。全中国被一个巨大的司芬克斯之谜困扰着，知道这个谜底的只有江青和姚文元，或者还有张春桥和王洪文。作为一个女人，江青实在够残忍的了，她的想法竟然连她亲密的追随者都不肯透露，笑看他们饱受折磨，以致那个相当于电影局长的吕韧敏，把“首长”看《创业》的日子都记错子（或者并没有错，留此存疑），他在后来谈到那几天的情景时说：“初一的晚上（？），首长看了影片。看完以后，从神态上看很不满意，问大家，‘你们觉得这片子怎么样？有什么问题？’大家愣住了。首长说，‘我看这部影片有严重问题，你们研究研究吧，我先不说。我们开了会，也不知道问题在什么地方。会泳同志也不知道。考虑到首长指出有严重问题，于是立即做了三个决定（即‘三停，）……’”

江青一定不是“初一”才第一次看该片的，此前她一定

早已“很不满意”过了，如果说“初一”晚上她确曾做出了“很不满意”的神态的话，那也是出于在于会泳等人面前制造神秘气氛的想法。她要了一个小小的机关，蒙过了她的追随者。

资料清楚地显示，1975年2月10日，也就是新华社发出关于《创业》即将上映电稿的第二天，《人民日报》刊登消息、剧照和广告的当天，长影《创业》创作、摄制两组写出豪情激荡的总结文章的同一日子，“江办”“遵江青同志嘱，打电话给文元同志”。电话全文如下：

“今天《人民日报》用了极大的篇幅吹捧《创业》，我建议《人民日报》和《红旗》今后不要再登这类东西。

“另外，我建议，对《创业》电影组织一篇有说服力的评论文章。这种评论权力我们不能放弃。可以评好，也可以批坏，总之，要按照毛主席的文艺路线努力来建设文艺理论队伍，没有评论队伍，是不能健康地繁荣创作的，有时间的话，我们确实要总结一下，建国以来文艺战线上的斗争。

“以上意见妥否，供参考。”

我们似应注意到，江青用了“吹捧”和“批坏”这样的字眼，说明她对《创业》不是欣赏的，并对《人民日报》的做法含有微词。

姚文元在政治局里是负责抓宣传的，《人民日报》更在他直接控制的范围内。

他在当天就给江青回电话。“江办”记录了他的电话原文：

“我完全同意江青同志的意见。中午我起床后就给《人民日报》打了电话，要他们以后不要登这类文章，要登要经我同意。我在电视上看了一半不到，给我的印象是很乱，不清楚，

别的还不能下评论。我还注意到当时中央首长给送《矛盾论》和《实践论》，是指的哪一位？”

这就是二月十日以后那些日子围绕《创业》发生的变故的秘密。

姚文元，这位当年只有四十四岁的政治新贵，本来是青年文艺理论家而成名的，他的所长是善于在文艺批评中敏锐地揪出政治问题，一举置被批评者于死地。江青十分宠爱地称他为“无产阶级金棍子”在他金棍子横扫之下，很有几位海内外享誉甚隆的文坛宿将顷刻丧生，一般文学艺术工作者更是闻其棍子的呼啸之声而胆寒。现在他又一下子抓住了“送《矛盾论》和《实践论》”这个要害部位——江青很可能还没有注意到——即使只有这一条，便可以判《创业》死刑了。后来的事态发展，证实了这一点

五 乌云笼罩着长影

《创业》不是“文革”以来电影遭逢厄运的孤例。在它之前，湘剧舞台纪录片《园丁之歌》被江青冠以“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招魂”、“向无产阶级反攻倒算”三顶大帽子，打成了“内容有严重错误的坏戏”。北京电影制片厂谢铁骊执导、钱江摄影的《海霞》也被江青斥为“基调很坏”，“不是部好影片”，要批，并且大骂谢、钱连资产阶级讲的心都没有，她还含沙射影地说《海霞》是“邓小平支持的片子”，“那位邓（颖超）大姐可喜欢呢”，“总政可支持呢”。

《园丁之歌》产生在毛泽东的老家，《海霞》出世在京畿。它们都有办法得庇荫佑，创作者们消息也灵通。《创业》的作者远在山海关外，“东边道”旁前“满洲映画株式会社”

的矮墙把长影变成一个闭目塞听的小世界。一旦有事，他们便什么正式消息都打听不到。这儿好象一口烧热了的锅，人们就是那锅上的蚂蚁。“北京可有什么消息？”成了大家每日必谈的题目，上班时也谈，茶余饭后互相串门时也谈。幸而北京庞大的流动人口里也有长影的人——都是办别的事情去的——这些人就自动担负起了刺探情报的使命。乱世谣言多。各种各样相互矛盾的消息，又叫人想听，又叫人不大敢信。

有的说，《创业》的乱子闹大了，恐怕是了不得的政治问题。

有的说，哈尔滨话剧院的《先锋战士》也停了，剧团已经离开北京，上边还要追究背景。

有的说，江青已经亲自主持召开了座谈会，进行批判，还让把报告文学《铁人的故事》作者请到北京去，重新搞《创业》，再不要长影插手。

有的消息比较令人鼓舞，说王（洪文）副主席给毛主席打了报告，请主席看片子，主席看了以后说，这部片子不是大毒草，就这么演吧，不增加拷贝就行了。也有的讲，毛主席批评了，说《创业》是两个拳头打人。还有的消息反驳说，毛主席根本没看。

忽然又有看来相当确凿的消息传回厂里，说北影正式传达了《创业》的事，是北影负责人在全厂大会上讲的，说影片在政治路线上有严重问题，艺术上公式化，概念化，几处提到党中央给油田送书，指的是哪个党中央？要知道，当时是刘少奇在主持中央工作。还有，戏里边有些话都是生活中的某人讲的，这么写，出于什么目的？

听到这样严重的罪名，厂领导的脑袋“嗡”地一声涨大了。最感到难以招架的是“军代表”，他们是被江青奉为

“无产阶级革命尊神”请来“占领”上层建筑的，如今被他们“占领”的地方出了这等事，让他们怎样交待？“军代表”去追问“结合”进班子的长影干部，长影干部只好去找那个惹祸的根苗张天民。张天民回北京“探亲”去了（结婚以后，他的家始终未搬到长春来）。好歹抓住了于彦夫。

二月十八日，和于彦夫一样被意外冲击搞得食不甘味、寝不安席的张天民，从北京写信给苏云并厂党委和摄制组党支部，通报他得到的消息。他在信里写道：

“……文化部负责同志请了各方面的人（“八一”厂陈亚丁等同志）又重新看了片子。在这个会上，文化部负责同志说，中央首长看了，认为片子‘有问题，你们请各方面看看，研究研究’。现在正在做这项工作，但没有讨论，讨论后拟向中央打报告。到昨晚为止，文化部也不知道具体意见，不知道是哪方面的问题。新华社等单位也在到处打听，但谁也不知道具体情况。这个情况是比较确实的，但又不是正式讲的。在这种情况下，请不要打电话问影筹，现在先不要问。看看形势的发展，文化部早晚会正式通知的。怎么办，请厂考虑。”

二月十九日，文化部“影筹”小组组长吕韧敏一行来到长春。长影以为他是奉旨前来宣示“钦命”的，省委领导就也忙不迭前后簇拥——《创业》出了事，他们也担干系——但年轻的组长只是微笑着，讲：“我们这次来，是向大家学习雷厉风行好作风和革命干劲的。”

众人都不知所云。中共吉林省委书记、省“革委会”主任王淮湘就赶紧检讨：“我们省委是想把长影搞好的，但是，由于我们不懂影片生产，想抓好也没有抓好。”

吕组长宽宏大量，也能一分为二看问题，他说：“长影

自从‘文革’以来，是拍片比较多、贡献比较大的一个厂，他们努力为电影事业做贡献的精神，是应该充分肯定的。”这才讲出他此行的目的，乃在传达“中央领导同志”对长影正在生产的几部故事片（重拍《平原游击队》、《车轮滚滚》、《长城新曲》）的指示精神，并落实1975年度的生产计划。

话虽这样说，谁知道他是不是还负有别的使命呢？但他绝口不提《创业》的事。

二十一日，省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听取苏云汇报长影七五年度的跃进计划。作为雄心不已的一位电影事业家，苏云周身正被重重绳索捆绑着，可怜他谈的所谓“跃进”，也不过是打算生产六部故事片，力争六部，确保五部，如此而已。王淮湘看准机会，就《创业》的事情插话说：“《创业》问题提出以后，我们感到大吃一惊，不知出了什么事，乱猜一阵。”他想引逗吕韧敏谈《创业》，但那位组长看了吉林省一把手一眼，竟又微笑着，“顾左右而言他”。

会后，省“革委会”主持文教工作的副主任药天禄也不顾身份，屈尊就教。吕韧敏也只说了一句话：“有严重问题。”

第二天，“影筹”一行人要走了，这才把《创业》摄制组一班人召集到下榻的省委一号招待所（今之松苑宾馆）讲《创业》的事，却不让省委和厂领导参加，很神秘的样子。

吕韧敏一开头就问：“组内同志的思想情况怎么样？听说有人讲，参加《创业》组是投错了庙？你们怎么想的？”

支部书记曲伟倒直截了当：“我们听了‘影筹’领导的传达，没想到对《创业》只字未提，一时摸不准问题出在什么地方，思想上转不过弯子来。”

吕韧敏沉不住气，也就交了底，说：“是啊，问题的产

生对我们也很突然，我们也正在转弯，现在还不能说是转过来了。我在医院里就听说《创业》是好片子，后来看了也认为是好片子，一直是肯定的。于部长也一直是肯定的嘛。这次出来前，我们又看了片子，开会研究，也还没有看出问题在哪里。准备再学习，思考。可以跟你们交底，我们确实不知道。”

大家就又两手空空地回去了。吕韧敏说了实话，谈吐之间似乎也有一种说不出的难言之隐，觉得在江青这样的“首长”手下工作大不易，她真喜欢异想天开，又过于颐指气使，她的思维叫人跟不上，总是使人陷于被动；看到手下那么多聪明人狼狈不堪的样子，她大概感到十分愉快，因为那样一来就突出了她的不平凡。吕韧敏是不是会有这样的苦恼呢？

送走了“影筹”几位大员，王淮湘对长影的军代表和苏云等几位负责人讲：“《创业》的事先不忙检查，还是等中央有了精神再说。不然，检查错了怎么办？”

这样，许多工作就都停了下来。长影大院里，弥漫着一种等候判决的沉重气氛。

这时候，也有胆子壮的。大庆油田照样放《创业》，工人们说：“不管谁说不好，我们就说好。”

第一汽车制造厂里，一幅“向周挺杉学习”的大红标语一直挂着，直到“十条罪状”下来了，厂里说：“拿下来吧！”工人们说：“挂着吧！”就又挂了好多天。

此时在北京，陈亚丁召集一些人研究《创业》，已经分析出了名堂，就给江青写了信报告。

张天民了解到江青找到了陈亚丁，但他不知道陈亚丁召集的一些人能量很大。他们没有费多大力气，就选准了突破口，查明了华程的生活原型依据，还弄清了《创业》中一些

语言的原始出处。

他们的“告密”证实了江青的怀疑。江青高兴地在陈亚丁等人的信上批道：“《创业》电影现已知是真人真事，但不是铁人”。

姚文元批：“有的同志告诉我：华政委的某些话几乎是有关同志原话（如“婆婆嘴”）。”

这是二月二十五日的事。

到了三月上旬，于会泳和浩亮依据“有的同志”提供的证据，已经能够整理出了一份相当完整的材料送江青。这份材料点了余秋里、康世恩的名，列举了《创业》里使用的他们的语言和他们做过的事，如：

——周挺杉说：“一个国家要有民气，一个队伍要有士气，一个人要有志气。”

——冯超说：“我们的会战是在困难的时期，困难的地点，困难的条件下，上马的。”

——华程说：“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

——华程说：“我就抓住周挺杉不放！（原话是：“我就是抓住你王老铁不放！”）

——华程说：“干部要有个婆婆嘴，整天在你耳边嗡嗡。要重视第一性资料，我们要为油田负责一辈子！”

——华程说：“大家可以横挑鼻子竖挑眼，品头论足嘛！”

——周挺杉说：政委是想“要建设一支拖不烂、打不垮的石油队伍。”

——周挺杉说：“国家没有油，国家有压力，咱们是国家的主人，要分担这个压力。”

——华程说“要观大局，辨风向……”（“有的同志”竟有本事查出来了，余秋里在1959年第21期《红旗》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题目就是：《观大局，看主流，辨风向，调动积极因素》）。

还有：

——康世恩是玉门油矿的军代表，后来是大庆油田的领导人，与影片中华程的身份相似。

——打龙二井“水落油出”的情节，与康世恩领导打萨尔图六十六号井的情况相似。

——周挺杉买土豆受批评的情节，又与康世恩处理过的类似事件相似。

江青十分高兴，以为抓到了把柄。她还针对于浩报告中写的“并不是说上述的语言本身存在什么错误”，批道：“其中有些话显然是错误的”。姚文元见江青批了，也就批道：“这些语言是否全部符合毛泽东思想，似可再研究一下”。

至此，江青关于《创业》“政治上，艺术上都有严重错误”的想法趋于成熟，她要开始放杀手锏了。

而在另外一边，《创业》班子已集合待命，准备承受打击。

六 “十大罪状”出笼

1975年4月1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刊出张春桥的长篇文章：《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这是张春桥就任国务院副总理（列邓小平之后）和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以后，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文章。该文凶恶地提出要“全部地打

掉资产阶级的一切土围子”的口号，并把当时“党内的主要危险”规定为“不是教条主义而是经验主义”，影射攻击周恩来、邓小平和中央其他老一辈领导人。余秋里、康世恩显然也在其列。

这天将近午夜时分，文化部先打电话给吉林省委，再打电话给长影，要省委主管文教的负责人和长影党委负责人，带领《创业》剧组主要艺术人员尽快赴京，听取中央领导同志对影片《创业》的指示。

第二天，省委召开常委会，研究《创业》人员进京事宜，决定由省“革委会”副主任药天禄带队，他的这项使命别人一定不会十分羡慕。

药天禄旋即来到长影，与长影党委讨论分析了进京以后可能出现的事态。

紧接着，省委召开当天的第二次常委会，听取了长影“革委会”副主任苏云的准备情况汇报，然后作出指示：

进京以后，要先作口头表态，话不宜太多，要留有余地，态度要诚恳，不能上推下卸，一不推，二不卸，三不辩解。要检查由于我们工作没做好，给文化部领导造成了麻烦。我们的态度越诚恳，领导会越高兴。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要把初步认识到的问题主动讲出来，要讲得具体，不要只是笼统的几条。回答问题不要信口开河，要认识到这是给我们改正错误的机会。

然后，又宣布了几条纪律：不要外传，不要写信，回来向省委汇报以后再决定怎样传达，不要象前一阵传小道消息那样乱搞。

四月三日，药天禄、苏云、于彦夫、张天民、王雷、周广钰和李仁堂一行七人乘60次快车离开长春，次日到达北

京，被安排住到了东方饭店。

长影的这些人，进京已经成了家常便饭，或是开会、或是看片子、或是送审影片，但是从来没有一次象这回这样，怀里揣着烦恼丝，肩上压着忧愁担，一个个揣揣不安，面带死相，不知道前边有什么在等待着自己，除了宣布罪状，还会有什么预料不到的举动呢？会抓人吗？估计不致于，也难说。“文革”以来，他们饱经沧桑，深知底蕴，江青的一张嘴，还不是她说什么就是什么，抓人很容易，有错抓的没有错放的，人进到无产阶级革命的监狱里，一定很难象李玉和那样高唱：“锁不住我雄心壮志冲云天！”最担心的就是这个。

有纪律的约束着，不能出去会朋友，也无心上街，就是在屋子里边静候时间悄悄流过去。时间流逝得很慢，虽只一天，已如三秋。不期而然，七个人之中有三个同时病了——于彦夫便秘，张天民和李仁堂犯了老关节炎，又怕人家说装病消极抗议，就都硬挺着。

四月五日下午，召唤他们开会的时候，于彦夫到底没有办法出席，只好告了病假。

文化部主管电影工作的副部长刘庆棠主持开会，他这个人不怎么拐弯抹角，开头就说：“今天请同志们来，是想听听拍摄过程中的一些情况。”

张天民一听就觉得不好，明白事情已经超出了剧本本身，是针对上边高级领导干部来的。

刘庆棠果然接着就反反复复要大家回忆剧本创作当时的情况，他说：“创作过程我不全了解，同志们了解，要实事求是把来龙去脉说一说，不论涉及任何人和事都没有关系。”

这就是“文革”中十分盛行的“查背景”、“抓黑手”，张天民明白。他原原本本讲了深入生活和写作的过程，并没有任何高级领导干部授意，他们也没采访过任何这样的领导人。他们的素材都是从各个油田采访来的。江青同志指示要“源于生活，高于生活”，他们一直是努力这样做的。

刘庆棠问到了有关党中央派专机给油田送书的情节。张天民回答，是大庆油田同志提供的材料，《大庆战报》也有记载，并不是杜撰。

出席会议的电影局负责人问到影片里的一些话，哪些句是生活中哪些人讲的，张天民回答说，是流行于油田工人中的语言，也有一些是某些领导说过的，觉得对塑造人物有利，就稍加变化写上了。

事情追查不到点子上，会议主持者只好暂时作罢，但是又讲：“这片子存在严重的政治上的问题，应该严肃认真地实事求是地总结，这一点很重要。”又下结论说，“片子写的是真人真事。要更加解除思想顾虑，回忆当时的情况，感到哪些地方有问题，要回忆出来，全面向文化部和中央负责同志汇报。”

最后，刘庆棠又说：“昨天晚上，中央负责同志有重要讲话，点了文艺界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表现不好的一些人的名，也给同志们传达一下。”

说得大家都面面相觑，不知道谁又遭殃了。

刘庆棠传达的是后来流传很广的江青在接见全国染印法会议代表时的讲话。王洪文等人一起接见的，江青在会上照例唱了独角戏。

她先吹嘘了一通自己的革命历史，说她从小就受到两个大反面教员——一个是封建主义，一个是洋鬼子——的教

育，“封建主义打我母亲，为了保护母亲，我被推倒在地，我的牙齿跌坏了，一个牙齿发黄，就是这个牙”——她齜着牙给代表、也就是她的听众看。她还讲了自己怎样为革命“奔走呼号”，怎样读了六遍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又讲她如何未能“保护使用”身体，三个月来“感冒了五次。接连几天几夜，狠命工作。”

说了这些以后，她忽然变得怒气冲冲，开始大骂一些导演和摄影师，说他们都“应该打屁股”，“是白吃饭的”，“钱迷”，“寄生虫”，“垃圾堆”，钱江的“那一套是修正主义的”，成荫“忘本了，是北影四大帅之一，还有四小帅，八一也有”，李文化“搞的东西丫丫乌”，总之，洪洞县里没有好人，谁都是坏蛋。

张天民他们明白，刘庆棠这种时候给他们传达这个，无非是敲山震虎，杀鸡给猴看，那分明是一种警告：你们如果不老实交待问题，就也会变成“无产阶级专政下表现不好的人”，说不定什么时候被“首长”点名痛骂一顿！

但他们没有办法表现得更好、他们实在讲不出自己背后的“黑手”是谁伸出来的。如果一定要说有这样的东西存在，那就是生活。他们是按照生活这位伟大的艺术之母进行创作的，虽然在他们的人物身上，确实闪耀着一些真实人的影子。

张天民想起来有些后悔，同时也更加敬佩余秋里、康世恩二位将军的远见卓识。

早在《创业》样片第一次送审的时候，当时的国务院文化组组长吴德考虑到影片是以大庆石油会战为背景的，就指示请会战总指挥余秋里看。余秋里推说“有会”，没有出席，文化组只好请了燃化部一些参加过会战的同志来看了，

人家也没有说什么。

四月七日，由文化部电影局负责人亚马主持，召集长影等几个人，又开了一上午会，仍然要大家回忆“来龙去脉”。于彦夫发了言，解释多于认错，背景材料毫未涉及——因为实际上不存在文化部要求交待的那种“背景”。

这三天其实开的是预备会，到四月八日下午，正式会议开场了。地点选在文化部会议室。由刘庆棠传达文化部核心组对《创业》的意见。名义上是部核心组意见，实质上是江青等人的看法。

亚马宣布开会以后，刘庆棠从皮包里拿出来一个大信封，当场启封。

于彦夫注意到，刘庆棠从信封里抽出来的是一份打字材料，天头和边页上有不少批语，正文也删改得密密麻麻。刘庆棠分明是刚刚看到这个改动过的稿子，他很快地翻了一下，脸上现出一种掩饰不住的惊慌，手在微微地抖。他照着稿子一个字一个字念，念得很慢，嗑嗑巴巴，经常顿住。

后来知道，这个材料就是于会泳和浩亮于三月十日根据“有的同志”的揭发，联名写给江青的报告，经过了江青、姚文元的批改，张春桥过目，拿来作为文化部核心组意见的，这也就是后来毛泽东所说“罪名有十条之多”的那个东西。

七 艺术的罪与罚

1973年4月21日，长影党委根据省委的指示，作出了关于传达、学习文化部核心组对《创业》“十条意见”的安排，要求“真正从思想上搞通”，作到“口服心服”。

但要达到这样的要求是比较难的。

此前，药天禄率领的那一小队人，在京被留下过了十四天，“学习、领会”，写出了个“自我批评”的材料，承认了“影片存在着严重的问题”，但分明口不应心，刘庆棠看了以后，很不满意，要求“省委领导关心一下”，然后，放他们回到长春，继续写“总结性的自我批评的文章”。

“十条意见”一经在全厂正式传达，立刻引起了一片混乱，人们的抵触情绪很大。但长影党委编印的《传达、学习简报》（上报省委、文化部），却不得不一期接一期地说什么，大家“一致认为”，文化部核心组的意见“很严肃，很明确”，大家“心情格外激动，深深感到了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温暖”之类。

说了这样一些拜年话以后，《简报》也还斗胆讲出了人们的不理解情绪，说“有的同志对《创业》影片的问题认识不清，对十条意见领会不够”。

岂止是“认识不清，领会不够”！那是一种强烈的不满，公开表达的抗议。

张天民也参加了学习讨论会。他是剧本的执笔者，“十条意见”讲的大部分是内容问题，他是首当其冲的人物，又有厂里的领导人来听会，他只好表现得态度好一些，但在承认有错的同时，他也时时使用“潜台词”表达自己相反的观点。例如他讲，石油会战《两论》起家，是大庆会战党委做出的决定，如果再写这样的题材，我们得写是工人自发学习毛主席著作的，不能给刘少奇、薄一波树碑立传，也不能给大庆党委树碑立传。

他还说，我们写本子的时候，没有想到华程就是余秋里，但是别人看了说是，别人说是就不行，这就是“真人真

事”，不能写活着的人。于彦夫就说，“样板戏”《夺袭白虎团》是根据杨育才的事迹改编的，杨育才还活着。为什么他那个行，我们就不行？张天民说，可能因为杨育才没当上国务院副总理。

但不认帐是不行的。不仅他们过不了关，长影党委和吉林省委都无法交差。文化部分明是不信任长影编印的那些尽说好听话的《简报》，他们不断派人来厂，感受气氛，收听反应。他们不辞辛苦，工作做得很细，逐个找《创业》组和厂内一些同志谈话，了解对“十条意见”的态度。

省委负责人也几次三番来厂里做工作。

重重压力下边，五月四日，长影召开全厂大会。苏云代表厂党委在会上讲：“最近几年，我厂接受中央交办的任务，除两部样板戏外，还有《战洪图》、《平原游击队》和《创业》。这三部故事片，都有不同程度的问题。有的是阶级斗争是贴上去的，没有表现好党的基本路线；有的是艺术上、技术上粗糙的；有的是在政治上、艺术上有严重问题的。”苏云的话，生动地表达了在那条路线下，电影工作者无所作为，无可奈何，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反而落得艺术上无功，政治上有过的尴尬处境。艺术家难，艺术的领导者更难。苏云此时难上加难。在长影领导班子里，虽然论座次，尚有军代表排在他前边，但他是专家，《创业》自始至终是他支持、领导拍出来的，出了错自然得由他带头检讨。

于彦夫和张天民能够体谅领导者的难处，同时也为自身过关考虑，他们在大会上作了联合检查发言。不管是诚心还是违心，他们承认，“《创业》存在的问题，不是一般性的问题”，“违反了革命样板戏的创作原则和根本经验”。但是，他们在发言中，也没有忽略适当地为自己辩护，并且暗

暗地发一点牢骚，他们说：“华程这个人物的性格、作风、气质和经历与某些真人类似，但《创业》的真人真事，既不是本人的要求，也不是大庆党委或长影党委的指示，而是我们虚构的东西”（请读者注意：这里，他们既承认‘与某些真人类似’，又使用了‘虚构’这个词），接着，他们就话中带刺地说，“虚构得好，成了美化；虚构不好，岂不就是歪曲？”

他们的态度，始终表现得时好时坏，亦好亦坏，不能令人满意。他们的“自我批评”文章就迟迟不能通过。从五月二日到六月十八日，这篇文章六易其稿，才勉强上报“中共吉林省委、文化部党的核心小组并江青同志”。

“黑手”终于没揪出来，“后台”也似有若无，追查了一阵“来龙去脉”，反反复复得到的也就是那么一点任何问题也说明不了的东西，想通过一部电影打击余秋里，再打邓小平和周恩来等“现代大儒”，尚嫌炮弹不足。独臂将军在副总理位置上，山一样兀立着，难以撼动。康部长忙着石油化工的事情，对江青和她的文化部睬也不睬。时间拖得久，长影成了一块橡皮糖，抻一抻变长了，一松手就又缩去回去。文化部也拖不起，锐气损销，热情缩减，吉林省委便也乐得放下这个恼人的刺猬，去干自己的公务——《创业》的事情似乎可以就这样不了了之了。

长影党委利用这短暂的喘息之机，赶紧派原《创业》摄制组人马上《锁龙湖》避难。张天民也悄悄到北京“探亲”去了。

大家便暂时相安无事。

有心的人们注意到，这一段时间，对《创业》的批评虽然搞得极其热闹红火，煞有介事的样子，但从二月江青发脾气

气到七月张天民给毛泽东写信，五个多月里，报刊上始终未见有批判文章发表，而当初江青给姚文元挂电话，本来曾经“建议，对《创业》电影组织一篇有说服力的评论文章”，姚文元也表示了“完全同意”的。

后来知道，江青这一阵子日子太好过。“正叹他人命不长，转眼自己归来丧”。她的事情犯了。

第三章 挑战者：恐怕与无畏

八 历史的契机

的确，对江青来说，1975年春夏之际，真有那么一点不知春归何处的味道，“文革”开始至今，她从来没有这样被触动过。

有着漂亮眼睛的年轻女人罗克珊·维特克是美国纽约宾翰顿大学历史学副教授，她在1972年7月来中国访问，“了解现代中国妇女状况”，新华社报道过这件事，新华社没有报道的是，这位女士对中国妇女状况的关心，主要体现在她“非常渴望拜见江青夫人”——她对我国接待部门就是这样提出要求的。

外国人要求单独会见一位政治局委员级的国家要人，这种事需要呈报中央主管外事工作的国务院总理。鉴于罗克珊·维特克并非重要人物，而且该女士访华后期表现不十分得体，周恩来批示：“江青同志，如你这两天精神好，可以见见此人，谈上一个钟头就可以了。如不愿见，也可不见。”话虽说得委婉，意思是很清楚的。

但江青很愿见，而且一口气谈了六个小时，依然余兴未

尽，执意约维特克到广州去深谈。女副教授自然求之不得。

周恩来不放心，让人传话给江青，重申不要多谈，只谈一次，最多两次，只谈文艺，不要谈其他问题。

江青哪里肯听周恩来的意见，她的主意已定，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她象患了痴迷症似地，只想着这件事。

江青飞到广州，同维特克又谈了六次，总计长达六十小时。除了文艺，她详细讲了自己的经历，还谈了包括党和国家的政治、军事、外交、人事和国土资源等许多方面的情况，又把中共党内斗争、中央多次会议的时间、地点、决议和解放战争期间的作战情况，以及我军总部番号等多种机密，一古脑讲了出去。最令人难以理解的是，她还把包括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以及中印边境武装冲突期间的许多作战地图，命人复制送给了那位受宠若惊的女学者，以致连维特克都感到不知所措。

“斯诺写了一本《西行漫记》，世界闻名，”江青玄机深藏地笑着，对维特克说，“我希望你能走斯诺的道路。”说着，她把自己拍摄的庐山汉阳峰照片送给了她的客人，并在照片背后，亲笔题写了她作的诗：“江上有奇峰，锁在云雾中，寻常看不，偶尔露峥嵘。”

从1974年开始，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华盛顿邮报》、英国《每日电讯报》等西方报刊和通讯社，开始报道江青与维特克谈话的有关内容。

此前，周恩来曾指示新华社社长朱穆之，查询维特克写文章的情况。新华社多次将有关事项上报，均被姚文元扣压。

但纸包不住火，事情到底暴露出来了。据当时的民间传说讲，毛泽东得知此事以后，大为震怒，急令赶江青出政治

局和自己的家。倒是周恩来宽仁大度，又担心在国际上影响不好，劝止了盛怒的毛泽东，只让邓小平主持中央政治局开会批评江青，作为处罚。

江青画虎不成反类犬，一时之间弄得颇为狼狈。使她在狼狈之中尤感不安的是，邓小平还抓住她和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沆瀣一气，背着大多数政治局委员搞小圈子的事，根据毛泽东创造的“四人帮”这个概念，在多次政治局会议上，对她进行严厉的“批评帮助”。邓小平显然无视江青作为毛泽东夫人的崇高地位，只把她看成一个犯有严重错误的普通政治局委员，而从他那严峻的、绝无通融表示的面容和抑扬顿挫的四川方言里，她还凛凛感到了一种藐视，甚至是蔑视，她恨死了这个小个子的、钢铁一样的巨人。“文革”初期，这个人曾经以中国第二号的“最大走资派”被她麾下的红卫兵小将“炮轰、火烧和油炸”，但是他奇迹般地复出了，先任国务院副总理，转而成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不久，又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病重以后，本由王洪文主持中央工作，现在这个大权也到了他的手里。国外新闻界惊呼邓小平为“不死的神鸟”，江青和她的伙伴感到万分沮丧。

江青后来谈到这段往事的时候，仍然旧恨难消，痛骂邓小平是“谣言公司的总经理”，“法西斯”，“反革命老师”，“斗了我四个月”。她自己解释被“斗”的原因时，自然没有提那位与她促膝交谈的外国女学者，而是讲邓小平作为“还乡团头子”，“凡是造反派都要整”，“我是首当其冲的，因为我是努力执行主席革命路线的”。

但在当时，江青和她的伙伴可没有这样的英雄气概。她深知毛泽东对她们几个的失望心境，她们不得不实行“韬

晦”之计。王洪文在一封致江青的信里写道：“主席已经多次教育我们了……我想我们是谨慎一些好”。张春桥也作了份检讨：“主席关于不搞‘四人帮’的指示，一定坚决照办。”

1975年6月28日，也就是长春电影制片厂《创业》摄制组六易其稿，写出上报“吉林省委、文化部并江青同志”的“自我批评”的十天之后，江青也写了一个“自我批评”，上报“主席，在京的政治局各位同志”。

江青在这份材料里，竟然使用了与《创业》组向她认错时用的极相类似的语言，例如“思想触动很大，但是思想上一时转不过来”，“是一个重大原则问题”等等。

历史安排得何等巧妙——拍《创业》的人在那边挨批评，作检讨，批《创作》的人在这边也挨批评，作检讨。双方又都口不应心，伺机翻案。这样出色的讽刺剧，除了历史，谁能创造得出来？

江青虽然检讨过了，但仍然不敢出头露面。“帮”里的其他成员，锋芒也有所收敛。

邓小平利用这种有利形势，不失时机地开始对军队、铁路，交通、冶金、能源、科研、农业和教育等各条战线的工作进行整顿。尽管大自然对中国人民的努力并未慨然相助，中原地区连降三个月大雨，洪水吞噬了好几个县的土地、生命和财产，长江以南、黄淮之间先是持续大旱，继之又有飓风和暴雨成灾——但这一年的国民经济，仍然出现了“文革”以来最好的局面。全国人民心里升起了希望之光，重病中的周恩来绽开了欣慰的笑容。

邓小平还顺应人心，着手整顿文艺。这年七月，他同毛泽东讨论文艺状况。毛泽东指出：样板戏太少，百花齐放都

没有了，怕写文章，怕写戏，缺少诗歌，缺少小说，缺少散文，缺少文艺评论，党的文艺政策应该调整一下。

据此，邓小平决定对文艺状况——包括电影《创业》问题——搞一点调查。但是，文艺大权仍然掌握在江青一伙手里，毛泽东的批评刚一透露出去，江青就指使文化部抢先进行反调查，并炮制材料，说什么自“文革”以来，中国文艺“呈现出万紫千红，春色满园，百花齐放，欣欣向荣的局面”，向邓小平实施反击。

邓小平无法，只好通过另一种方式了解情况。

九 贺捷生和她的战友

在当代中国女儿群里，贺捷生算得上一位传奇人物。

到1975年夏天，贺龙元帅尚未完全平反昭雪，她却开始了新的斗争，以元帅父亲的倔强的、不屈的精神为生命的火炬。一位作家很准确地把她描绘为“身带火种的女人”。

她确实负有播火的使命。

也正是七月流火的日子，贺捷生从俯视着天安门广场的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楼梯上走下来，在收发室，望望左右，拨了一个电话。

很快从楼上下下来了一位举止潇洒的青年。

“小范，有一件事，我先跟你一个人讲。这件事很重要，你还要找几个可靠的人帮我了解些情况。”当时，贺捷生就是这样开门见山说的。

“了解什么情况？”小贺捷生几岁的范曾凝眉问她。

“要写一份材料上交中央。国务院负责同志需要了解文艺界的情况。可能要在会上提些问题，同那些人摊牌。”

他们是挚友，范曾自然明白“那些人”指的是谁。他身上年轻的热血陡然加快了奔流，想一想，说：“可靠的人有，我想叫白桦、韩瀚、张锲……要不要讲是国务院负责同志的意思？”

“这可以讲的，”贺捷生肯定地说，“国务院总理、副总理有权了解情况。”

几个朋友就这样聚到了范曾家——北京东直门外新源里一套两个居室的小单元。一共五个人——一个女人和四个男人。韩瀚是诗人，张锲是作家，白桦是诗人兼作家。他们中间还有两个人是“摘帽右派”——张锲和白桦。他俩是电影厂从外地借来改剧本的，一个在北影，一个在“八一”。两厂都是消息灵通的所在。“十年磨一戏”，按此“样板戏”规则办事，创作都成了蜗牛运动，作家朋友们聚在一处，极有空闲发牢骚，骂江青，所以他们对文坛掌故无所不知。韩瀚在《人民中国》杂志当记者，接触人更多。

贺捷生比他们几个都更了解事关重大，因此也沉静得多，她向朋友们部署这件非比寻常的任务时，只是说：“中央政治局，周总理这条线，很想了解文艺界的情况。中央负责同志指示，‘要站在全党的角度检查一下我们党的文艺工作’，这个材料不要加主观分析，不要加马列语录，只把事实原原本本写下来就行了，让事实本身说明问题。”

她也设有忘记提醒大家：“这任务很危险。危险在哪里呢？假使送上去了，这倒可以放心，怕就怕搞材料的过程中或是我转送材料的路上，被他们发现了。所以，希望你们一定保密，从现在起，你们每个人的行动都要对这个集体负责。”她没有久留，说完这番话就提前走了。她的目标大。为了父亲的平反昭雪，她多次上书毛泽东，又请邓妈妈（颖

超)给周恩来转信,她同许多恢复了工作的、或仍然没有“回到”“革命路线”的老干部保持着联系,为一些同志的被屈含冤奔走呼号,她的住处和行踪,长期受到“有关部门”注意。她不能不慎之又慎。

此后的几天里,四个战友就在范曾的家里凑情况,然后分头起草,最后由范曾用大字把定稿抄到了一个硬皮日记本上,洋洋数万言,其中涉及到了电影《创业》、《海霞》和晋剧《三上桃峰》,还有所谓“黑画展”事件、陶钝事件以及“样板戏”、“样松团”、“三突出”创作原则等等。

这个材料没有得到首肯。

贺捷生传达“有关负责同志”的意思说:“这成了整黑材料了,象大批判文章,我们不能拿这样的材料,在政治局骂娘。”

几个人顿时感到清醒了不少。是啊,他们把复杂的形势估计得简单化了,他们以为既然连毛泽东都批评了江青,那么,扳倒这几个庞然大物,可能不会太费力气。事情哪会这样轻而易举!这是斗争,而斗争是要讲究策略的,稍一不慎,天平就可能向另一方倾斜,不仅会给参加斗争的个人酿成灾难,更要妨碍大局。

他们烧掉了那个笔记本,决定这一次只搞最容易切中要害的、置对方于无法辩驳地位的单项材料,那就是关于电影《创业》的情况。它应该能够成为一个突破口。它正是最好的突破口,这也是领导这场斗争的上边同志的指示。

这方面情况张锲了解得比较多。

1972年以后,他得到了可以搞创作的恩准。在北影招待所里,他和周挺杉的扮演者张连文住对面屋,两个人常在一起聊,《创业》的事情谈过不少。他清楚自己非正式的“摘

帽右派”的身份，他也明白自己将要起草的这种材料的性质。他和朋友们正在干的事情，说得白了，就是反江青。江青不是轻易可以反的，搞得不好，那就意味着灭顶之灾，特别对他这样的人来，更是如此。他早考虑过这样的后果了，从韩瀚找他那天开始。他已经烧掉了所有朋友，亲人的来信连同一本通讯录，向一位朋友交代了后事，“如果万一我回不去了，请一定告诉我的独生女儿，说他爸爸在北京没有干坏事”，这条汉子当时就是这样含泪说的。

这份材料经胡乔木亲笔修改，送到了邓小平手里。这是在张天民写信之前，文艺界向中央汇报江青一伙问题的最早的书面材料。

接下来要做的事情是请张天民也搞这样一份材料，加以配合。

《创业》问题在全国引起反响，远超出文艺界的另外几件大事，重要性更大，如果汇报材料出自该剧作者之手，显然有力得多。

当时任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的胡乔木向贺捷生讲了这个意思，希望她找到张天民，动员他写信。

贺捷生也觉得这个想法好，但是她以前没有接触过张天民，现在也不知道他在什么地方，特别是不了解他对这件事的态度，她觉得自己不便直接出面和张天民联系。她想通过长影的同志先侧面了解一下情况。她对这家电影制片厂一直很关注，长影的人她认识不少，苏云、苏里、林农……她都熟，也知道他们常在东方饭店住，找他们不会费事。但转念一想，这场斗争前途未卜，眼前做的事危险性很大，棍棒也很强，多一个人知道就多一个不稳定因素。她想，最好找一个既认识张天民又不在长影工作的人从中沟通。

就在她反复琢磨、拿不定主意的时候，白桦来了。

十 白桦造访张天民

张天民在长影递上了检讨书，回到家里闭门思过。西照的太阳火焰似地烧着，张天民到紧靠窗下的污水池倒水，忽地，从灰砖墙狭窄的过道里走来一个人，西斜的太阳照在他身上。逆光中，天民觉得来人恍惚是作家叶楠，待到走近，才认出是白桦，叶楠的孪生兄弟，陈氏兄弟作家中的另一位佼佼者。

他们是二十年的老朋友了。他很佩服这位中等身材、唇边时时挂着笑影的早慧的同行。

河南信阳人陈佑华从小酷爱俄罗斯作家，诗人屠格涅夫的作品，那位大作家笔下流出的俄罗斯草原风光使他深深着迷，十六岁那年，他定自己的笔名为“白桦”——美丽的、光洁的、蓬蓬勃勃的俄罗斯无边原野上生命的象征。刘邓大军南渡黄河时，青年白桦慨然从军，随陈庚兵团进淮海，走广西，入云南，憧憬中的异国风光让给了祖国大西南的壮美景色，同时使他感情的潮水破堤而出，他的诗和小说很快引人注目，然后就是幽美得让人醉的电影《山间铃响马帮来》。

直但是他成了右派分子。他的聪颖的天资和放浪形骸的气质使他必然逢此厄运。处分很重。他被开除军籍，放去当工本译不久，命运又垂青于他，一个偶然的的机会，他碰见了肖攀将军。将军也是诗人，惺惺惜惺惺，得知眼前这位青年锃亮是白桦，就把他调到武汉去，让他重新穿上了军装，并且还给了被剥夺的笔。

“文革”狂潮怒起，他很快被江青点名，连遭七年监禁。放出来后，仍让他写作，只不许用自己的名字发表作品——那是善于化腐朽为神奇的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宽宥。

可惜白桦不知感恩戴德，直视江青为人间狐媚。贺捷生一找他，他就不顾一切地投入到这场危险的游戏中来。

在目前这种境遇下，能有人来看自己，而且是老朋友，张天民很感动，急忙请白桦进屋坐，一面抱歉屋子大小，又没有电风扇，一面定定地望着他，只觉得白桦虽然华发早生，却精神不减，便也稍稍感到宽慰。

君子之交淡如水。张天民认识白桦还是在两个人翩翩年少时，但很少来往。白桦的突然到来，使张天民不由得产生了一种预感：一种不可名状的期待或许将要实现，看白桦的脸色就知道会有什么重大事情将要发生。因此他竟然不问白桦怎么会找到这隐伏在一片灰砖房中的蜗居，也顾不得多作久别重逢的寒暄，甚至连白桦这许多年的遭遇都不问——那还用问吗？只是瞪住他，等他说话。

白桦开门见山，一坐下就说起《创业》给他和许多人的感受。一股愤懑情绪，虽然强作压制，也不禁从他的眼睛里喷射而出。

白桦还是白桦——张天民作如是想。

白桦接着讲到许多朋友为此事愤愤不平，然后问张天民：“你呢？……你服了吗？”

“那个‘十条’理论荒谬，逻辑不通，所列罪状根本不符合实际，哪一条都没有说服力。”张天民说，“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我明白，这样大张挞伐，目的不在影片本身，而是针对某些人去的”。

“这就对了！”白桦脸上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笑意。

张天民却笑不起来。

白桦又问了一些《创业》的创作、拍摄和“十条意见”出笼前后的情况，张天民简略地讲了讲。

沉默一会儿，白桦突样问道：“天民，现在你打算怎么办？”

“怎么办？”这三个字在张天民心里出现过千百次了，是啊，怎么办呢？他站起来，在小屋的方寸空间转了一圈，然后站定，望着他的朋友，激动地说：“白桦，我是欲哭无泪，欲告无门——”

“如果有门呢？”白桦也站了起来，目光闪闪，“如果有人支持呢？你敢不敢给上边写一封信？”

“有人支持？可以告状？张天民的心怦怦急跳起来。

“我想过，”两个朋友重新坐好以后，张天民说，“问题是通过什么渠道送信。”

“这你不用担心，”白桦笑着说，“你只管写，有人给你送。”

“什么人？”

“大人物。”

“大人物？谁？”张天民惊讶地瞪大了眼睛。

白桦笑笑，终于没有说。张天民不便追问，但不知为什么，他立刻想到了周恩来和邓小平。甚至真的相信就是他们。

“有一个人想见见你。”白桦说。

“谁？”

“贺捷生——贺老总的女儿。”

贺捷生！张天民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陌生的名字，但

由于白桦的那个小注，这名字一下子就变得亲近起来。贺老总，他的眼睛前矗起了那个留小胡子的、目光炯炯的元帅形象，他虽死犹生，光辉永存，他就是一座丰碑，垒根在人们心里的推不倒的丰碑！由元帅而及他的女儿，张天民立刻对贺捷生产生了一种崇敬感和信赖感。的确如此。从这以后，他们的命运就连在一起了，虽然在后来被追踪、受迫害的日子里，朋友们难得见面，时至今日，也往来不频，但那种斗争中结成的友谊割不断了。

白桦留下一个地址，就匆匆告辞。

他按照白桦告诉的地址找了那座门，下了车，门影下边迎出来一位穿蓝色纺绸半袖衫的年轻女子，风度沉稳，面容亲切。双方立刻就认出来了。不必要地通报姓名之后，贺捷生引着张天民进院。在那个决战前夕的闷热的夏天，贺捷生显得平静而沉稳，甚至总是微笑着似地。然而此时此刻，有谁心头的压力比她更重呢？

白桦也在座。三个人就一起谈。

“北京炎热的夏天，政治气候也是炎热的，”诗人白桦这样概括当时首都的形势，“两军对垒，可以说到了白热化的程度。整个中国，就象一口沸水翻滚的锅。”

贺捷生依然表情沉静。此前，她没见过张天民，她曾在石油系统工作过十年，对石油战线有深厚的感情，她钦佩张天民的胆识和才干，《创业》横遭责难，她感到不平，她虽是将门之女，但心和普遍人是相通的。她相信作为主要当事人之一的张天民，会勇敢地投入到这场斗争中来，白桦已经告诉她了，张天民没有服，这就够了。她没有再试探张天民的决心，倒是觉得对这样一位同志，应该把可能发生的危险讲清楚，因为事情一旦开始，局面就再不能挽回，整个斗争

虽然不只他一个人，但最后暴露在明处的只能是他一个人，秘密保守得好，江青有可能不知道贺捷生和白桦，但一定会知道张天民，因为他要署名，只能由他署名，别人代替不了他。贺捷生曾想过，为了避免张天民承担风险，她自己写这封信，但作为影片的观众，那力量无论如何是不及影片编剧的。她能做的，只是尽量减少危险，为此，首先就要把危险讲透。讲透了比瞒着要好。“文革”以来，命途多舛，死里逃生，她对这样事情有深切的体会。

“白桦讲的很是，”她说，“现在仿佛已经到了转折关头，我们应该起来有所为了。”

“形势要求有人站出来，参加战斗。”白桦补充了一句。

“我们几个人已经开始这样做了，”贺捷生说着，从抽屉里拿出来几页纸，用手掂着，很深情地说，“你看，这是白桦我们搞的一份材料，送上去了。一定会起作用的。”

张天民接过那份材料，见是用美浓纸复写的，内容是关于《创业》如何受到群众的欢迎，江青一伙又怎样压制，备极详尽。

“再有你的一封信，和这个材料配合起来，就更有力了。”贺捷生轻轻地说“你写这封信，可能有两种结果。一是信送上去了，得到支持，这是我们最希望的，也是我们写信的目的；再就是信送不到，或即使送到了却得不到支持，反而怪罪下来，那样事情就会闹得更大，我们要遭殃，甚至可能坐牢——我们当然要尽力避免出这种结果。”

“我想过。”张天民平静地说。

“这就好。”贺捷生说，“我反复考虑过我们冒这种风险是值得的。我们终归不能坐以待毙。我们应该斗争。如果

成功了，不仅《创业》得以重见天日，而且会给那些人一个沉重的打击，全国人民也会通过这件事更加看清她们一伙的面目，加速她们的灭亡。”

贺捷生把事情分析得这样透辟入里，张天民听了也很感动，他问：“你觉得，这封信写给谁更有把握呢？”

“为了解决问题，只能写给毛主席。也可以写给邓副总理，请他转。”

“好吧。”张天民说。

“我们以后要少见面，”贺捷生提醒他，“我妈妈这里也不安全。我听说，你爱人是一位非常好的同志，以后就请她跟我联系，她的目标可能小一些，让她到革命历史博物馆找我。”

张天民点头。

“我们会成功的。”送别的时候，白桦笑着说，他似乎感到刚才交谈的时候，空气太沉了一点儿。

“写与不写，你可以再仔细考虑一下，”贺捷生紧紧握着张天民的手，一向柔和的目光闪着同志朋友的期待和信任，“这不是胆怯，斗争复杂，我们要慎重。”

“好吧，我考虑。”张天民也以同样的目光回报她。

十一 张天民写信

经过了一个不寻常的夜晚，张天民觉得心里轻松多了，第二天他就开始写信。

天热，心情激动，没有写上几行，已经汗流如注，他摘下乳白色框架的眼镜，擦了擦，就索性打起赤膊，只着短裤，在已经西斜、却仍火烫的太阳光照下，写了起来。事情

用不着现想，都在他的心里，块垒早积于胸中，不吐不快，他文思驰骋，笔墨酣畅，竟一发不能止，眨眼写了几千字。回头读一读，觉得确实宣泄了多少日子压抑着的郁愤之气，心里爽快多了。读给妻子赵亮听，她也说：“写的好！”又说，“就觉得短一点儿，还没有足。”

张天民说：“这样的信，要简单明了，不能写长了。”

赵亮点头说：“行。”

贺捷生建议说，信的笔调最好不要太冷，能够一点就透的地方不宜说得过满，要冷静，客观，字字有据，不让人感到偏激，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即或得不到支持，也争取少惹麻烦。同时一定要建议让影片重新公演。为了增加送信的成功率，她还提出可写两封信，一封致毛主席，另一封给邓小平副总理。

张天民觉得贺捷生的意见有道理，就把信从头到尾仔细推敲了几遍，这才定稿。

信写完以后，张天民原想用毛笔大字誊清，但那样一来，就太厚了，传出途中恐有不便，就仍用稿纸、钢笔抄了出来。赵亮上街买了两个牛皮纸大信封，带红框的。张天民恭敬地写好了，一封致毛泽东，一封给邓小平，并附上了文化部对《创业》的“十条意见”。信封上都没写发信人姓名地址。

按照约定，第二天，赵亮揣着这两封信，象怀抱着她一家人的性命，小心地离开了家，张天民在门口望着她，直到她的影子消失在纷乱的人流里。

赵亮来到座落在天安门广场东侧的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门前，转过身，站了一会儿，她想让自己的心跳恢复平稳，也担心后边会有什么人关注她，她始终有这样的感觉，就象

在旷野里走夜路的人总感到身后有脚步声一样。

并没有发现什么异样，她舒了口气。

她拨了电话，贺捷生很快下来了。

贺捷生站在台阶上，环顾左右，赵亮感到她的脸色十分苍白，嘴角也绷得紧。“看她那个样子，我都害怕，想，怪不得天民那么小心，连老总的儿女都紧张，”后来，赵亮回忆她当时的感受时这样说，“我想，这下完了，一定发生了什么事。”

她们说了几句闲话，赵亮拿出了信。贺捷生只说了句：“你等我的消息——”转身就上楼去了。

就在赵亮心里七上八下、前思后想的同时，贺捷生也在踌躇，她拿着的两封信、无异于两团火。这火能够烧别人，也能烧自己。她对自己倒考虑得不多，她想的是写信人的安危，赵亮那双信赖夹杂着担心的目光她久久难忘。她感到自己有责任保护他们，更重要的，作为在这场斗争里边出面牵头的人，她要千方百计保证信件如期安全送到，这是使这场斗争取得成果的前提。

张天民致邓小平副总理的信，于七月二十二日由贺捷生送到了胡乔木手里，请他转。另一封给毛泽东主席的信如何送法，贺捷生犹豫难决。她想最好不用同一条渠道，否则就失去了写两封信的意义，写二保一，只要有一封信到达毛泽东面前，就可以了。

她想请汪东兴、或者张玉凤给转，后来决定去找王海容。

王海容是毛泽东的侄孙女。她在“文革”前夜，以一篇“主席教我学外语”的讲话，在青年中间产生了很大影响。在那篇讲话里，毛泽东透露了他对现行教育体制和教育方法

的不满。他的想法本来可以发展成一场健康的教育改革，但“文革”一起，“左”的思潮迅速把他思想中有意义的内核推向极端，演变成了反对教育、反对知识的愚人运动。陈毅被打倒，外交部大乱，王海容的地位飞快上升，此时她已经作到了外交部副部长。毛泽东很喜欢她，常让她留在身边，直到后来毛远新进来，顶替了她的位置。王海容当时和另一位青年女性、作过礼宾司官员的唐闻生，被时人称作“王唐二小姐”，都能接近毛泽东。

离东四十字路口还有好远的地方，贺捷生下了车，一边走，一边想主意，转眼又到了外交部，这是今天她第三次来到这里了。

决心下定，她大步走向大门传达室。工作人员拦住她，问她是干什么的。

“我找王海容副部长，有封信要交给她。”她平静地说。

“放到这里，我们给你交。”

“不，我要亲自交。”

“你姓什么？”

“贺。”

那人拿起笔，在登记簿上写了个“何”字。

“不是何，我姓贺，”贺捷生说，“祝贺的贺。”

“什么？”那人还没听清。

“贺龙的贺。”贺捷生说，语气坚定。

这回听清了，他抬起头，盯住贺捷生看，仿佛要从这个羸弱中透出刚强的女人脸下寻找“贺龙的贺”几个字的含意。

“我看看你的工作证。”他说，看过之后，又问，“你认

识王副部长？”

“认识。”贺捷生只好回答。

“她约你来的？”

“我给她打过电话。”贺捷生说了一句意思模糊的话——她只能这样说。

“你再问问王副部长的秘书。”那人拨了号码，要通了，把话筒递给贺捷生。

“我刚才给你打过电话了，”贺捷生对着话筒说，“我在门口呢。工间操时间，能不能让我见一下？”

“你等等，我就来。”

不一会儿从大楼里出来一位举止文雅的年轻女同志，引着贺捷生到了王海容办公室。

宽大的房间里只剩下她们两个人的时候，王海容问她：

“你找我有事？”

贺捷生望着王海容清秀的面孔，剪得很短的头发，深色玳瑁框架眼镜，觉得她似乎没有太大的变化，但眉宇间隐约可见的倦色却表明她的心境也不安宁。她很年轻，贺捷生觉得跟她说话不宜拐弯抹角。

“很冒昧地来找你，是因为这事只有请你帮忙才能办到。”贺捷生说。

“什么事？”王海容稍稍偏过头来问。

“送一封信——给主席的。”

“是关于你父亲的吗？”王海容的声音显出了某种关切和警觉。

“不，”贺捷生摇摇头，“是关于电影《创业》的，你一定听说过这件事的来龙去脉——那是一部好片子。”

“是部好片子，”王海容点头说，“长了中国人民的志

气。”

听王海容赞扬《创业》，贺捷生很高兴，就说：“处理的不大公平，不能说服人。作者写了一封信，请你帮助送给主席，最好亲自念给他听。”

“我也不容易见到他，”王海容的话不象推诿，似有难言之隐。

“你不能送，我们就更没办法了，”贺捷生叹了口气，期待地望着王海容，“我恳求你……”

“他都写了什么？”过了一会儿，王海容问。

“也没有什么，就是汇报情况，还讲了不理解的问题……”

王海容没说话，转头望着窗外，象在沉思，贺捷生也不急着催她。

沉默有顷，王海容回过身，说：“好吧，你把信放到这儿，我给你送。”

“那太好了，”贺捷生高兴地说，“我替作者谢谢你。”

“主席身体好吗？”告别的时候，贺捷生轻轻问。

提到毛泽东的身体，王海容胸脯一提，深吸口气说：“还是那样，说话已经很困难，不过精神还好。”

“有机会时，代我给他老人家问好。”贺捷生握着王海容的手说。

王海容点点头。两个人默默分手了。

走在路上，贺捷生心情并不感到轻松。两封信都送了出去，她相信至少会有一封送到毛泽东手里，按照最近一个时期毛泽东的心境，以及当前中国的政治形势，很可能出现有利于《创业》的结果，但也可能恰恰相反。那样一来，她就

会成为“政治教唆犯”，要受到打击，而且毫不留情。她感到疲倦，她的病弱的身躯本来不堪承受如此紧张而充满了风险的斗争。

与此同时，那个执笔写信的人也正在期待中煎熬，一连三夜没有睡好觉，信是送给贺捷生了，但是，能不能顺利到达毛泽东那里呢？隐约听说毛泽东和邓小平此时都在北戴河，那末江青说不定也在那里吧？北戴河之夏，要人云集，信息灵通，不利于保密，谁知道会发生什么意想不到的事情！吉凶难测，此地已不可久留，他应该效西山黄鹤，飞去兮飞去了。

1975年7月21日凌晨，曙色将现未现时，张天民悄然搭车离开了北京。

第四章 “7.25批示”

十二 北京，喜讯初传

列车到达了天津站，张天民来了。他和于彦夫相约在这里聚齐，转车去大港。车没有到，两个伙伴漫无目的地在站站前广场上踟蹰，消磨时间。于彦夫感到张天民有点心神不定，话也少，以为他累了，就提议到候车室长椅子上去休息。

张天民没有附合，只沉思着慢慢挪动脚步。于彦夫愈加奇怪。

过了一会儿，张天民忽然站住了，叫了声：“老子！”

于彦夫见他很郑重的样子，就也站住了，说：“天民，有事儿？”

“……我捅了个漏子！”张天民定定地看着他的朋友说。

“什么事？”于彦夫感到突兀，急忙问。

“我给主席写了信。”张天民把事情简单地讲一讲，但是没说详情。

张天民说，“如果我坐了牢，希望你每月给我家寄点生活费，二十元足矣，我要是能够出来有可能还你，要是永远出不来，就拉倒了，谁让咱们是朋友。”

“可以。”于彦夫回答挺干脆，“就怕人家也不会放过我——咱俩是一条绳上的蚂蚱。”

两个朋友相对愀然。

张天民心里涌出一股热流，他为老子毫不犹豫的态度所打动，同时又有一股酸楚：做了一件于民于国有利的事，行使了一个普通公民的权力，却要同时为自己安排后事！

他无论如何没有想到，他们满心希望而又不敢奢望的那个最好的结果出现了。用后来赵亮的表述方式就是：咱们得救了。

原来就在这天上午，张天民接到了赵亮的电话。妻子惊喜地告诉他：“批了！……你快回来！……”

他顿时觉得脑海里嗡地一响，便不再听得清楚别的话。

赵亮大概还说了批示的内容，张天民信不过，反反复复问：“准不准？”

赵亮说没看见原文，只叫他快回来。他没有料到事情会发展得这样快。他没敢和于彦夫说，担心消息有误。

他当天赶回家里，见妻子春风满面，急忙要她快讲详情。

赵亮说，昨天下午，贺捷生到家里找她，说，张天民的

信，毛主席批了，说《创业》没有大错，应该发行。贺捷生讲的也是大概意思，不知道她见没见到原文，就是让张天民快回来。她说完就走了。赵亮赶紧骑车到西单电报大楼去挂电话。大港的电话很不好要，她求了熟人，帮忙到处找他，好歹找到了，回来了，她真高兴。

张天民听说贺捷生没带原文来，仍有些放心不下，就拽过自行车，飞也似跑到革命历史博物馆，给贺捷生办公室挂了电话。

贺捷生出来，迎着张天民微笑，他们就在走廊里谈起来。贺捷生告诉他：她是昨天、也就是二十六日早晨得到消息的。她一上班，就接到了王海容的电话。

电话里说：“捷生，你跑到哪去了，我昨晚就给你打了电话，找不到你。”

贺捷生说：“你往哪儿给我打电话？”

“我打到薛阿姨（薛明）家去的。”

“对不起，我没在薛妈妈那儿。”

“有好消息！”王海容很兴奋地说。

“你是说……？”贺捷生也没料到这么快就有消息。

“批了，”王海容说，“二十五日主席批的，支持了你们。”

“真的？”贺捷生兴奋地叫着：“太谢谢你了！”

“用不着谢我。”王海容的语气里似乎有一点点什么东西，贺捷生注意到了，连忙问：“海容，主席在哪封信上批的？是你送的那封吗？”她忘记了，张天民同时致邓小平那封信，她没有跟王海容提过。

“不是。是你们给邓副总理的信，主席批的。”贺捷生感觉到了，对方有一点责备的意思。但她一时也无法向朋友

解释，想，她终归能够理解的。

贺捷生说着话，拿出了一份抄件，张天民接过来一看，正是毛泽东批示的原文，话不多，但是意思明确，张天民觉得周身血往上涌，视线也变得模糊了。他激动地捧着那张纸，看了又看，心里边一块石头砰然落地。他很快把批示背了下来。

据后来听到的情况讲：邓小平接到胡乔木转来的张天民的信以后，很快就送给了毛泽东。毛泽东虽然沉痾在身，但仍然改不了嗜书的老习惯，这时视力不行了，就请北京大学中文系的讲师芦荻给他读文章。张天民的信就是芦荻读给他听的。毛泽东听后口授了意见，由芦荻记录整理，再由毛泽东过目，然后送给了邓小平。

胡乔木听到毛泽东的批示，双手合十，连声说：“这下可好了！这下可好了！……”

在七月二十六日这天，全中国知道这个喜讯的老百姓不会超过十个人。张锲是在北影招待所听到的。他当时也正闷闷的，心如乱絮，忽然接到了范曾的电话。那位画家用喜庆的语气对他说：“有好消息！快到东来顺去，贺捷生请吃烤鸭！”

张锲路远，他到东来顺的时候，二楼一间雅座里边，朋友们已经到齐，只见贺捷生面现红云，神采奕奕，再不是往日苍孱弱的影象，大家就乱纷纷要她快讲是怎样的好消息，也有自作聪明胡猜的，无奈贺捷生此时静若处子，只是说：“先不要忙，把这满桌子好菜扫荡光了再说。”

朋友们无法，只好耐着性子去对付那肥胖的烤鸭。好在都是食欲正旺的男子汉，对付好酒好菜并不费力，风卷残云一般，转眼间桌面上也就杯盘狼藉。大家重又痴痴地望着贺捷生。

贺捷生心里高兴，却偏要压一压朋友们的火性——隔墙

有耳，她也觉得这个地方不是谈这种话的合适场所——就站了起来，说：“好！今天大家表现不错，咱们出去走走。”

大家也只好随她的意。

直蹿到快近东华门了，贺捷生见周围行人减少，朋友们的耐性也快到了临界点，这才压低声音，讲了那个重要消息。

一番话说完，大家兴奋地欢呼起来，引得远远的行人为之侧目。

“如果不是在大街上，我真要喊‘万岁’了。”

批示的意义，无论怎样估计都不会过份，中国有希望了！”

“江青就要完蛋了！”

“……”

静静的护城河边，轻轻回荡着他们的笑声。他们走了很久，不觉得疲累，好象一次胜利大游行。

十三 长春热与冷

邓小平的动作很快。

七月二十五日，毛泽东作出关于影片《创业》的批示，第二天，邓小平就在国务院办公会上宣布了此事，并传达了批示全文。二十七日，中央办公厅发出中共中央文件（1975）第181号。该文件载明的毛泽东主席对张天民致邓小平副总理信的批示是：

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份了。不利调整党内的文艺政策。

毛泽东

1975年7月25日

第181号文件分送：毛主席，各位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在京中央政治局委员。并注明增发文化部及来信人所在单位。

七月二十八日，长影突然接到中国电影公司打来的电话。通告：彩色故事影片《创业》仍按重点影片发行。

苏云接到电话，马上和党委成员一起估计电话的背景，认为可能发生了某种他们尚不知晓的事情。紧接着，中央办公厅的电话也到了，该电话命长影党委速到机场接中央重要文件。

同日十四点三十分，长影党委看到了中央181号文件。文件后面附有张天民的信。于是真相了然。

当晚，吉林省“革委会”主管文教工作的副主任药天禄匆匆来到长影询问情况。

吉林省电影发行放映公司也来长影询问情况。他们接到了中国电影公司的通知，称：“根据中央指示，决定《创业》影片继续作为重点影片，在国内外发行。过去凡与此精神不符的，应予纠正，以此通知为准。”

这时在长影大院里边，消息早已不胫而走，人们喜盈盈奔走相告，其情景恰与五个多月以前“十条意见”初传时的气氛形成鲜明对照。

长影党委做出决定，立即派《创业》的制片主任周广钰持中央文件抄件前往大港油田，通报张天民和于彦夫，并指示周广钰以党委名义致意那位非党作家（张天民于197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那个瞒着他们贸然写信的人，“对他在文艺革命中认真负责的精神，给予热情鼓励。”

张天民从北京启程之前，去向贺捷生辞行，并致意。

那时，贺捷生已经从最初的兴奋中沉静下来，她的目光

恢复了惯常的柔和凝重，她希望张天民回厂之后，要敛藏锋芒，静观事态变化。

“有一句话，”贺捷生郑重地说，“地位很高的领导同志嘱咐你：不要张狂。”

在这种时候，张天民听到这句话，不啻醍醐灌顶。至于那位领导同志是谁，他当时理解，不是周恩来就是邓小平，但是他没问。他的心力只集中在咀嚼“不要张狂”这四个字上。变幻莫测，是这些年中国政治生活晴雨表的特色。他感到领导同志教给他的，不仅是对待眼前具体事情的方法，也是一种世界观。“物极必反”，这是物势的自然，也是生活经验中常见的现象。了解这个道理，对于面临的许多事物，当可前看一步，防患未然。他深深感激这种提醒，就也郑重地说：“请转告领导同志，我一定这样做。”

贺捷生又对他说，关于她给转信的事，回去以后，可以向苏云同志汇报，但请他不要再向任何人讲。

张天民后来这样做了。

七月的最后一天，张天民和于彦夫回到长春。苏云和厂党委其他成员到车站热烈欢迎。记者们围了一大群，纷纷要张天民发表感想。他牢记关于“不要张狂”的指示，凡有提问，只讲两个内容：感谢毛主席对文艺工作的关怀，今后要更努力工作。具体问题就采用敷衍的办法搪塞过去。

“你为什么把信写给邓副总理，而不给别的领导同志？”新华社记者提了这样一个问题。这问题很刁钻，它的潜意可理解为：你反映的是文艺问题，众所周知，文艺由江青抓，宣传工作是张春桥、姚文元管，你为什么不给他们写信，莫非你的信矛头是对着他们的？

“因为邓副总理主持中央工作，”张天民回答，理由也

很充分，“我请邓副总理转给毛主席。”

但一到长影大院，气氛就变了。省委原来的意思，中央文件只向长影党员干部和《创业》摄制组传达，但全厂群众强烈要求普遍传达。吉林省委请示了中央办公厅，得到答复以后，责成长影党委认真做好传达以后讨论的准备工作。为此，召开了一系列会议统一认识。这个认识就是：不要评论“十条意见”，要把对“十条”的认识统一到毛主席批示上来，避免犯新的错误。

八月五日，长影在大剧场召开全厂职工大会，正式传达“7.25批示”。人们记忆犹新，整整三个月以前，他们曾在这个地方，以同样的方式，召开大会，传达“十条意见”，并纷纷走上台作检查。稍有不同的是，那次大会倍加隆重，省委和省“革委”的领导人一齐莅临，黑鸦鸦坐满了主席台的前排座。今天的主席台冷清多了，省里要人竟无一人入座。而那次会传达的是文化部意见，这次会传达的是中央主席批示。孰轻孰重？难道省委的领导们不晓得？

尽管省委出于种种考虑，有意降低调门，但长影艺术家们内心的激愤遏制不了。他们没有受那个“统一认识”的框框约束，各个艺术部门的大讨论中，人们纷纷联系“批示”批“十条”，认为“十条意见”是虚伪的，诡辩论的，自相矛盾的，颠倒黑白的，无中生有的，强加于人的，强词夺理的，破坏性的，因而是反马列主义的。

省委主要领导慌了手脚，赶紧亲自出面做工作，他要求长影同志“不要站在维护《创业》的立场上，要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立场上”，“不要批‘十条’，不要抓住不放，象北影前一阵子那样，满院子大字报，那是不对的，也是不合适的。”

然而，火一旦烧了起来，就很难压住。在随后召开的又一次全厂大会上，有人就“十条意见”的出笼过程，抨击了文化部负责人的所作所为，更有甚者，有人对江青指名道姓进行批评。会场情绪热烈、激昂。

轮到张天民发言了。人们向他投去期待的目光，掌声象浪涛推送小船那样把他送到了讲台上。他往那里一站，人们以为立刻会感到一阵急风暴雨，从而把本次大会的气氛推向高潮。但是他们困惑了。张天民态度冷静，语气平和，无喜无愤，讲的仍然是他在车站上对付记者的那两条，人们还没有听到什么新东西，他就悄悄下去了。这使一些持激烈观点的同志感到很大的不满足。他们不明白，张天民何以不利用这千载难逢的大好时机，痛痛快快地吐一口闷气呢？现在有伟大领袖撑腰，就是把天插个洞，谁敢碰他一个指头？

苏云理解张天民。他已经知道了贺捷生起的作用。他懂得情况复杂，斗争激烈，江青虽然吃了一个败仗，但没有彻底垮掉，热度宜降不宜升。

张天民正是这样的想法。

八月中旬，他动身去大港油田，于彦夫带领《创业》摄制组主要艺术干部也随后前往。他们想尽快搞出石油三部曲的第二部来，把它作为明年给“7.25批示”一周年的献礼。《希望》，这将是新影片的名字。

他们仍然太乐观了，没有想到凡是希望，都会难产。

十四 夏天，美丽而短暂

作为国务院的一个部门负责人，于会泳必须听从主持工作的副总理的领导。7月28日，他奉命向部属文艺团体和在

京文化单位传达中央181号文件。主管电影事务的副部长刘庆棠再次被迫担当了一个尴尬的角色。

会议在能容纳二千四百人的北京展览馆大演出厅举行。与会者都已经知道了“批示”的内容，他们怀着很大的兴趣前来，是要看看文化部头头的狼狈相，听他们怎样解释“批示”和“十条意见”的关系。他们感到这是只知唯命是从却不学无术的部头头们应得惩罚。

脸色显得灰白的刘庆棠，在台上镇定地宣读了文件，然后就宣布散会。没有认错的表现，也没有认真的检讨。但是掌声响起来了，暴风雨般的掌声响起来了，飓风一样席卷过大厅，高大的穹窿在摇晃。刘庆棠愣了一下。他很快就意识到，掌声不是为他而鸣的，他站起来，头也不回地退场了。

“7.25批示”对江青也是个晴天霹雳。她得知消息以后，赶紧想办法向毛泽东告状，要求收回“批示”。但是，她迟了一步。“批示”已经形成中央文件，发出去了。文化部奉命派出的人不断把北京、长春和上海等地的情况反馈回来，江青更感到无法招架。但是她要反击。

八月某日，江青在钓鱼台十七号楼会议室邀集张春桥、姚文元，又召来于会泳和浩亮，还有王曼恬。

江青说：“事情搞清楚了。张天民写了两封信。一封呈主席，主席没批。另一封给邓小平转主席。是邓小平逼着主席批的。”

她的情报基本准确，但是“逼”字用错了。她为了动摇“批示”的合法性和权威性，忽略了事实。她没有、也无法解释中央副主席怎样“逼”得了中央主席。她自己显然也知道她的说法不能令人信服，所以又补充说：“主席并没看

《创业》。”

“逼”也好，不“逼”也好；看过也罢，没看也罢，反正白纸黑字，“批示”已是既成事实。毛泽东虽然有病，但仍在其位，江青无法否定这个文件的存在。她能做的只是按照自己的意思，对“批示”做某些修正，使它比较地易于接受。她说：“主席说无大错，那就是还有中错和小错。”

理论家张春桥也加以附合，说：“主席用词向来很严格，并没说是优秀影片嘛。”他还针对各地的反映，竭力缩小“批示”广泛的针对性，说：“主席说调整文艺政策，并没说别的。”

姚文元也就这一点发挥说：“每当党内要调整政策时，总有人借机闹事。五七年、五九年都是这样。”

在这种场合，于会泳除了在被问到什么情况时说几句话以外，大部分时间都毫无动静地坐着，然而手里总捏着本子和笔，极恭敬地记。浩亮更不插言。

从这以后，双方围绕《创业》及其他文艺问题的斗争——政治斗争——开始呈现胶着状态。

八月二十日，《人民日报》在二版刊出大庆油田1205钻井队长高金颖等人署名的四篇观后感规格的文章，评论《创业》，用的总标题是《赞彩色故事影片〈创业〉》。姚文元显然对这个“赞”字不满意，第二天，他指示《光明日报》，发文章时，要把“赞”改为“评”。他还说：“无大错并非十全十美”，“要注意不要把片子中的缺点，错误也评成好的。”

各报浮光掠影地“评”了一下，就偃旗息鼓，全不似以往对待“最高指示”的紧张、热烈、殷勤、迫切。而且各报都遵循《人民日报》的格调，差不多所有文章都由“工农

兵”来写，初澜、江天、学青们全偷懒。长影曾经应《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的约稿，费力写出了文章，送去之后，终于没有发出。

《解放军文艺》杂志很有想象力，该刊十月号发表了《创业》电影文学剧本。张春桥得知此事以后，立即以总政治部主任的身份加以训斥，并派人追查背景。

上海始终拒绝传达“7.25批示”，有关部门对几家电影厂（当时的“海燕”、“江南”、“天马”厂）的指示是：一、《创业》作为重点影片上映；二、“十条意见”收回；三、不要追问原因。

也有非要“追”个水落石出不可的。

事情的焦点在长春，反响强烈的是北京。北京不枉是历来政治风暴的中心。北京人关心政治，上海人关心文化，广州人关心经济——这种论断大致不错。北京人有最活跃的政治头脑，最敏锐的政治目光，最灵通的政治信息，最后的和最重要的一点，北京人有最坚定的政治魄力。该思考时善于思考，该行动时勇于行动。七月二十八日，北京文艺工作者以雷鸣般的、经久不息的掌声让刘庆棠领教了一下颜色。进入八月，各文艺单位结合“7.25批示”，批判文化部的声势风起云涌

首先是北影。早在毛泽东发出《创业》批示之前，北影就开始了行动。发难点是影片《海霞》。

六月二十六日，于会泳忧心忡忡地给江青挂电话，汇报《海霞》问题“情况很复杂，受到人的支持”，北影大院里，“有的人说话很粗”。

如前所述，二十六日这天，江青正苦着脸写检讨书，显然无心顾及它事，就又推说“我这两天又有点感冒”，让于会

泳“向春桥同志当面报告”。

七月下旬，在贺捷生、张镔等人参预下。被江青骂作“没有良心”的“坏人”的著名导演谢铁骊、摄影师钱江给毛泽东写信。

二十九日，毛泽东批示“印发政治局各同志”。

邓小平在得知毛泽东批示的当天，就召集在京政治局委员调看《海霞》，并通知于会泳出席陪看。于会泳拉着另一名文化部副部长张维民去了。

李先念副总理等八位政治局委员到场。江青拒绝出席。

谢铁骊、钱江坐在邓小平、李先念旁边，边看边汇报边回答询问，“我们没有说话的机会”，于会泳后来沮丧地说。

政治局决定：《海霞》可以上映。这是一周之内，文化部、即江青遭到的第二个挫折。

北影乘胜猛攻，开始全面批判文化部的工作。于会泳连写三封信给北影企图灭火，然而火势愈烈。

与此同时，贺捷生率领她的战友，也在加劲儿工作。关于“黑画展”事件、“陶钝事件”、“无标题音乐”事件等单项材料，源源不断送到中央，使江青穷于应付。

八月初，中央“五七”艺术大学音乐学院讨论“批示”，三十五岁的教员李春光三次发言，慷慨激烈。后来，他又把发言整理成大字报贴了出去。

李春光等人认为《创业》为大庆工人和大庆工委树碑立传是完全正义的事情，“十条意见”则是内容上，以致语言上都不可多得的奇文。他们还尖锐地批判了文化部执行的文艺政策、干部政策、行帮习气、霸道作风、特权思想，以及连文法的基本要求都不管的所谓“样板戏”经验。文化部大

为惊恐，然而无计可施。

长春和北京的信息传到湘江北去的地方，湖南省文化局于八月二十九日写信给文化部，提出湘剧高腔《园丁之歌》是好戏，舞台纪录片《园丁之歌》是好片子，要求准予上演、上映。这封信得到了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的支持。“文革”前夜，姚文元发表杀机四伏的《评〈海瑞罢官〉》，全国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除台湾省外），唯独湖南的报纸拒绝转载姚文，就是张平化的主意。他还敢当面顶撞江青。有一次，江青在许多省委书记面前，批评张平化在1974年请毛泽东看《园丁之歌》是“告状”，“强加于主席”，张平化回答：“我们认为《园丁之歌》是好戏，不是坏戏，不是毒草。”

北京起火，长沙复又冒烟，于会泳很紧张，九月四、五两日，他连续打电话和写信给江青、张春桥讨主意。

江青这时突然变得强硬起来，坚持认为“园丁应该是毛主席领导的中国共产党，而不是知识分子”，还说“有关教学问题，这个电影也是错误的。”

于会泳有了仗恃，就批评湖南省文化局搞“翻案”，“气焰嚣张”，竟敢给文化部下“最后通牒”。

《园丁之歌》未能得到平反，尽管它是几部作品里边毛泽东唯一看过并鼓了掌的。形势在不知不觉间起了微妙的变化。一叶落而知天下秋。《园丁之歌》就是那枚最先飘坠的树叶，它标志着1975年短暂的、热烈的夏天过去了，人们该打点衣服，准备迎接秋寒了。

八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最先透出了秋的信息。人们从第一版显著位置上看到了即将发行的《红旗》第九期目录，赫然排在头六名位置上的，都是关于评论《水浒》的文

章。

善于从不经意的信息中窥测时局变化的人们顿生疑窦：宋江出了什么事，要这样突然集中火力对付他？

事情果然发生得突然，而且来势迅猛，发展很快。仅从八月三十一日到九月五日，六天中间，《人民日报》就刊出《重视对〈水浒〉的评论》、《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投降主义路线的赞歌》等五篇重头文章。从此以后，这样的文章在全国各地报刊上便连篇累牍、不绝如缕了。《创业》的评论刚刚开头就进了尾声。

第五章 虎头山风云

十五 秋声中的思虑

毛泽东确实讲过：“《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又说，“《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屏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他以前在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过内容相近的话，1975年8月13日，他在和给他读书的北大中文系教员芦获谈话时，又说了这番话以及另外一些话。芦获把它整理了出来。

尽管芦获后来一再申明，说毛泽东评论《水浒》只是就一部具体古典作品而言的，并不涉及现实政治，但无可否认的事实是：作为“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者，毛泽东其时越来越不能容忍邓小平了。邓小平主持工作以来，全面推行整顿方针，系统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这是显而易见的，也是不能许可的。

江青一伙的反应恰好为这一事实做了有力的反证。

关于评论《水浒》的批示刚刚发出，三个小时之内，姚文元就行动起来，指令他们的写作班子赶写文章。如前所述，这些文章发得又急又集中，好象集束手榴弹，急于去摧毁目标。

他们也很能抓住问题的要害，知道怎样能够一举置对手于死地。姚文元后来在修改一篇文章时，就特意加进了一段话：评论《水浒》要“特别强调领导权的重要性。‘屏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就是修正主义者宋江篡夺了领导权，排斥了革命派晁盖。”江青对于会泳和浩亮说得更明白：“要害是架空晁盖，现在党内有人架空毛主席。”

报刊和广播中的大块文章，就是按照这样的调子，向全国人民扇去一阵强似一阵的刮面金风。

邓小平在困难的形势下支撑着局面，明知不能为之而勉强为之，政治局里，“左派”们重又飞扬跋扈，邓小平的战友人人忧心忡忡。他也不再能够依靠周恩来的强大支持。

九月七日中午，评《水浒》的紧锣密鼓声中，周恩来进行了他漫长政治生涯中最后一次外事活动。被会见者是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团长、罗共中央政治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书记维尔德茨。

客人们被让进北京医院简朴的国务院总理临时会客室，落座以后，一向豁达乐观、说话有如天籁的周恩来，此时讲的第一句话竟是：“马克思的请帖，我已经收到了。”

他依然说得从容，镇定，声调舒缓，却令举座震惊。

从第二天报纸上发表的会见照片看，向着美男子之誉的周恩来面容清瘦，白发萧疏，剑眉下的目光已大不如前，他仍旧笑着，然而那笑容中隐含着痛楚和悲凉，直使爱他、敬他的全中国人民看了心酸欲泪。

他没有忘记在这样时刻表达对战友的支持，他洞晓局势，无所不知，面对窗外满天秋意，他向客人含蓄地表示，尽管他和毛泽东重病在身，可能不久于人世，但中国的航船定会拨云破雾，驶向光明，因为中国共产党有着许多有才干、有能力的领导人。

“现在，副总理已经全面负起责任来了。”他凛然地、深情地说。

陪同人员担心客人没有听懂，补充说：“总理指的是邓小平同志。”

会见结束以后，周恩来身边的工作人员要求和总理一起照像。如果不是身体不好，周恩来本会主动提议这件事的，以前他常常这样做。

他们照了像，离去之前，周恩来望着大家，又说了一句令人震惊的话：“希望你们以后别在我脸上打叉。”

他说的仅仅是他自己吗？人们默默掂着这句话的分量，个个回肠百转。

几天以后，周恩来动了一次大的手术，十月，又动手术，从此，这位世界上最忙累的总理没有再站起来。

邓小平的处境继续恶化，他主持搞的关于整顿工业、科学、教育的提纲，即后来被点名批判的所谓“右倾翻案”的代表作“三株大毒草”，没有获得通过。上海、辽宁、河南、山东等地批判整顿的声浪扶摇直上，邓小平制订的拯救中国经济的方针在许多地方已经无法推行。

北京城里重又谣言蜂起，这次尽是不利于邓小平的传说，人们心里别是一种滋味。

贺捷生和她的战友也处境不妙。偏在这时，她们又行动不慎，鬼使神差，一封信落到了江青手里。

原来，于会泳曾给北影写信，希望平息因为电影《海霞》问题引起的愤怒情绪。不料，北影群众不买帐，继续联系《创业》、《海霞》等影片受到的不公正待遇，揭露、批判文化部奉行的错误政策。文化部封锁消息，不把情况报告国务院领导。

贺捷生告诉张锲，要他收集情况，写信上报邓小平副总理。

张锲很快把材料写好了，交给贺捷生，贺捷生觉得可以。以前，为了安全，类似材料定稿之后，要由贺捷生的女儿来誊抄清，把抄清稿上送。这次因为急，又感到张锲的原稿已很清楚，历来上送的东西都没有出过差错，就没重抄。张锲的原稿就在这种万无一失的错觉中送走了。

这封信被江青截获。形势陡然变得险恶起来。

贺捷生得到警报之后，冷静地分析了情况。她既后悔，又感到一点庆幸，好在信末并没有署名。张锲当时不是知名人士，也不是北影的人，目标不大，江青可能一时想不到他。但知道他搞这个材料的还有另外几个，难保不透露出一二点风声。万一发现张锲，对这个既有“右派”前科，又有写信“现行”行为的人，江青该是不会手软的。想到这里，她才急了，赶紧通知张锲想法避难。

张锲在谢铁骊的护送下，回到安徽，旋即由谢铁骊的老战友、蚌埠市委书记黄馭秘密派人送去淮北一个小县，一面隐居，一面体验生活，直到粉碎“四人帮”后才重新露面。

江青果然开始追查写信人。专案人员不认得张锲的笔迹，知情人又一律三缄其口，他们就确定马德波为“重大嫌疑犯”。马德波明知是张锲写的，只是不讲，结果也就始终作为“嫌疑犯”受到监视。

根据领导同志的指示，小集团里其他成员也决定分散活动，暂避锋芒。贺捷生去了当年红二方面军活动的地方湘鄂川黔，白桦同行。韩瀚去了广东。范曾打算留在北京观察动静，直到这年年底，才去了南方。

北影受到了很大压力，谢铁骊被立案审查。

“五七”艺术大学的李春光正接受“批判教育”，后来又被“采取果断措施”，“隔离审查”，连他的同情者也被要求检查交待。

报纸上对于那位生活、活动在八百多年以前的农民起义首领的辱骂，使张天民忧虑万分，他看得出这种辱骂背后潜伏着什么。通过《创业》，他的个人祸福已经和邓小平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他无法逃避，全中国都知道他曾经使江青难堪，如果形势恶化，他只能引颈待诛。在空前激烈的中国政治大搏斗中，他将作为一个令人瞩目的牺牲品被置放到胜者的祭坛之上。强烈的悲剧感笼罩着他，虽然在这悲剧意识中不乏积极进取的呼声，但知识分子的缠绵多思，使他不大容易看得清前途，他能看见的只是渤海上的洪波万顷，烟雨浩茫。这也是当时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的普遍心态。反复无常的政治动荡既使他们在感情上产生了极大的厌恶，又损害了他们智慧的光芒，在那个时候，理性的太阳并未能够普照中国知识分子封闭的内心世界。

张天民静夜自忖，觉得此前无愧于心，此后他能做的，也只是无论在何种时候，何种境地，绝不牵扯和出卖任何人，他要把一切前因后果都承担起来，虽然人微身轻，但也不妨一逞匹夫之勇。他知道自己永远做不成英雄，但也肯定不做帮助刽子手往朋友颈子上套绳索的软骨头。《希望》的文学剧本写写停停，进度不快也不慢，质量不好也不坏。

于彦夫带领的摄制组主要人员也在煎熬中度日，终日看秋风萧瑟，山岛耸峙，自觉凉气侵身，故而时时嗟叹。

九月十四日夜里，突然有长途电话召唤于彦夫。于彦夫赶去接了，听得清苏云的声音。

“张天民在不在？”那声音虽不十分急，但仍使人感到一定有什么重要事情发生了。

“在这儿……我们都在。”于彦夫有点纳闷，一时之间无法判断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那好，”苏云在那边仿佛轻轻舒了口气，“你通知张天民，还有曲伟、张连文——对了，李仁堂是不是党员？……好，你们几个，立刻放下手头工作，到北京去。”

“什么时候？”

“明天。明天一定要赶到……我也要去……住什么地方？还不知道。你们先到东方饭店。”

“是开会？还是……”于彦夫一听通知的是《创业》组的支部书记和主要演员，猜想此举一定和他们的影片有关，但又不清楚到底什么事，忍不住就问了一句。

“我也不知道要干什么，”苏云回答，听那口气，不象是明明知道却要保密，“是王主任（省革委会主任王淮湘）通知的。很突然……你先不要问，明天到北京就明白了。”

于彦夫放下话筒，见身旁已经聚来了好几个人，大家都望着他。他讲了电话里的通知。几个人立刻乱猜起来，都说毫无疑问是《创业》的事，看来这部片子的问题到毛泽东批示那儿还没算完，但议论到具体情况却又莫衷一是，谁也讲不清楚。

于彦夫他们直接从大港到了北京，住进东方饭店。这里是他们常来常往之地，原很熟，就找到饭店负责人，问可有

什么通知留给他们，回答说没有。到底心里没底，又不敢挪动脚步，就往电影局打电话，找亚马。亚马原先当过长影党委书记，后来调到中央，作了电影局长，他应该了解情况的。

但亚马说“不晓得。”

几个人面面相觑。

好歹从京西宾馆来了电话。高天红的声音在电话里告诉他们，就在原地等着，立刻有车去接，带上随身东西，都住京西宾馆。高天红还告诉他们：“王主任、苏云都来了。”

于彦夫们就又赶紧收拾行装，齐聚到门前等车。不一会儿，来了两辆小车，高天红从车上跳下来。于彦夫一看，都是军队牌号的车，开车的也是军人。

“老兄，知不知道什么事？”《创业》导演问《创业》副导演。

“不知道”。副导演说，只给他讲了昨晚怎么紧急通知的，以及都是哪些人来了。于彦夫就不再问。

京西宾馆当时是北京屈指可数的高层建筑，规格很高，门前有军人警卫，轻易进不去。他们的车子一到，立刻绿旗放行。

忽然不知道从哪儿传来消息，说邓小平和江青都不在北京，国务院将在山西省昔阳县召开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邓小平要去讲话，江青说不定也去了——大家不免感到奇怪，江青一向只注意意识形态的事，她怎么突然对农业感兴趣了？既然这两个人不在北京，那末，召他们来干什么呢，举动又如此郑重。莫非还是文化部？但文化部有事不一定调动了省委一把手，而且据说于会泳也没在家，部里只有副部长张维民看门。大家便又坠进五里雾中。

晚饭以后，王淮湘召集随他一起来的长影众人开会，又不象是开会。

“你们看《创业》这部片子到底怎么样？”王淮湘没头没脑地这样发问。大家一时都没反应过来，不知道省“革委会”主任的提问是什么意思。《创业》怎么样？折腾了几个回合以后，毛主席不是给作出结论了吗？难道主任同志没见到“7.25批示”？

“我是说，大家看看《创业》是不是还有什么缺点？”见人们都不开口，王淮湘补充说。他有一个习惯，跟人讲话的时候好眨眼睛，尤其是小范围讲话，比如今天这么几个人。说完了话，他的眼睛眨着，象在等待，又象启发人们深思。

“这要看怎样说，”提到影片的缺点，张天民觉得那首先应该是文学剧本的事，自己理应首先表态，就说，“我们始终没有认为《创业》是完美无缺的作品，我们马列水平不高，样板戏经验学得不好……”

“就是这样，就是这样，”王淮湘显然很高兴张天民能这么说，“主席讲没有大错，可还有中错和小错嘛。我们要正确理解主席的批示，另一方面，也要正确对待‘十条意见’和江青同志对我们的爱护、帮助……肯定我们的片子是爱护，批评也是爱护。”

在张天民当时的感觉里，于彦夫有点傻气。这位导演一听提到文化部和江青，就表现得不大冷静，他气冲冲地驳斥省委书记说：“主席批示和‘十条意见’不一样。主席是真正爱护的，于会泳（他没有直点江青，说明他的傻气还有一定限度）是要一棍子打死。为什么在‘文化大革命’发展到今天的情况下，他们还这样做？这不是偶然的，应该——”

他突然停下了；因为他感到小腿上仿佛被人使劲儿踢了一下，低头看时，发现张天民的一只脚刚刚缩回去。

这时候，门被推开了，有人进来报告，说文化部张维民副部长来访。王淮湘立刻起来出迎，又叮嘱大家先不要散。于彦夫后来听说，张维民是来探听消息的，文化部也不知道调长影同志来京的事。

过了一会儿，王淮湘回来了，他不再要求大家端正认识，只是讲：“江青同志现在山西参加重要会议，指示我们到大寨去，可能有重要指示，具体情况没有对省委讲，到了那里就知道了。同志们到了大寨，首长问到什么，该说的说，不该说的不要乱说。总之，要认识到这是首长对我们的关怀，是对文艺革命的促进……”

至此，大家才明白就里，一时之间也说不出话。

“明天，我们就出发……”王淮湘仿佛还说了这么一句，但大家都在想着江青要召见的事，没有很在意，恍恍惚惚会就散了。

走出房间，各人不免又一阵乱猜。江青沉寂了好几个月，突然到了大寨，又突然要见《创业》组人员，这意味着什么呢？

十六 酒无好酒宴无好宴

1975年9月16日，天气晴好，张天民、于彦夫一行人乘坐的火车驶过太行山的重要隘口——娘子关，进入山西。中午前后，车到阳泉。这是晋东的一个大站。他们下车之后，旋即改乘当地驻军派来接站的车，直向大寨驰去。

不过，消息中也有让人稍感宽慰的地方：邓小平也在昔

阳。有他在，或许江青不敢大动干戈。有他在，就会分担张天民等人身上的政治压力。

张天民刚一安顿下来，就碰见了山西小说作家兼电影剧作家孙谦。三言两语寒暄之后，孙谦告诉他，邓小平讲过话以后，连夜回北京去了，这里只有江青在。张天民的心一下子凉了。

“你要小心！”大张天民许多岁的孙谦兄长一样地关照他，“她要骂人！”

“那我怎么办？”张天民茫然问。

“你只不作声就是了，”孙谦说，“昨天她已经骂过了。我还替你说了好话，我说‘张天民年轻，肯用功，人也不错’。”

张天民知道，这位尊敬的老作家五十年代就认识江青，那时候，江青在中央电影局担任一点职务——孙谦为人耿直、纯朴，甚至有点不识时务，所以他敢在江青面前替张天民说好话，也不管对方高兴不高兴。两个人刚说到这儿，张天民一回头，发现于会泳站在他们身后，不冷不热、似看非看地盯着。孙谦到底是孙谦，竟在这种场合说了那些不该说的话。

江青要张天民他们来大寨，不只因为孙谦的几句话。在此之前，她找过前来参加学大寨会议的吉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阮泊生，问他关于张天民给毛泽东写信的情况，阮泊生推说自己在省里主管农业，电影的事情不知道，江青当即就发了火，说：“你怎么不知道？”还骂了一句“没头脑”。这时到了开晚饭时间，江青正在火头上，不肯放阮泊生走，就叫人把饭端来，说：“你就在这儿吃。”

阮泊生哪里吃得下，也只好慢慢往嘴里拨拉。

“气死我了！……”江青边看着阮泊生吃饭边说，连《创业》带作者捎挂着吉林省委，好一顿批。阮泊生不敢答言，饭也没吃上几口。

“王淮湘怎么没来？”江青忽然问。

“王主任省里有事——学大寨会议没要求一把手来。”阮泊生望着江青的脸色回答。

“你告诉他，我要见《创业》组的人，叫他带队来……”江青气哼哼地说，“叫张天民来……”

阮泊生只好答应。

当天晚上十点钟左右，王淮湘接到了阮泊生的电话，赶忙让省委办公厅召集在家的常委开会。半小时以后，苏云被叫到省委大楼——此后发生的事我们在前边已经叙述过了。

旅行社院子里的人越聚越多，大家乱纷纷叙旧，说闲话，这时候，于会泳过来说，江青今晚要请大家吃饭，“首长到山上照相去了，马上就下来，请同志们先到饭厅去。”

将近七点钟时候，有人喊：“首长来了！”大家一齐站起来，所有的眼睛都向门口望。

双扇门开处，江青脚步轻捷地走进来，后边跟着警卫、护士和于会泳、浩亮等一大群人。

江青身穿白色的确良短袖衫，银灰色西装裤，披灰色上衣，戴琥珀色框架眼镜，头发又厚又亮，身材高而苗条，走路姿态仍带有当年电影女明星隐约可辨的残迹，但嘴角似笑不笑，透出一种自我感觉十分良好的威严神态。

大家散成一个半弧形的圆圈极恭敬地迎接尊贵的女王，然而江青目不旁视，径直走到大厅中央，站住了，大声问：“张天民来了没？”

所有的人都悚然一惊，张天民觉得身后象有人推了一

把，禁不住向前迈了半步，在这一瞬间，在这百十余人聚集的大厅里，仿佛在冰天雪地里一个人孤零零地置身旷野，没有任何可以托庇依靠的东西，他要孤军奋战！孤独，孤独！巨大的孤独感攫就着他。看江青，脸上木木然毫无表情，那一定是内心仇恨的流露吧，这样的仇恨显然不是自己有个好态度就能解释的。他已经被逼到了绝路，前无救援，后无退路，只好听凭命运摆布了。这样一想，他反倒不十分紧张了，孙谦打过了招呼，江青要骂人，他不知道她会骂些什么或审问些什么，不过，知道要在这里见到江青，他打定了主意，对江青的态度要不卑不亢。因为在江青面前自己虽然是个小人物，但不是一般的小人物，他有毛泽东批示这把“尚方宝剑”。不问的绝不主动说，问到的绝不涉及别人，前因后果都由自己承担——这本来是与贺捷生商定了的“统一口径”：谁问到写信的事都说自己想不通。何况中国的传统道德告诉他，绝不做出卖人的小人。“你承担了吧”，他感到刚才后边的那一推大约就是这个意思。

“他来了。”这时听见于会泳在回复江青的问话，随即，文化部长走到长影人所在的一边，要他们过去。于是，王淮湘为首，苏云次之，于彦夫第三，张天民紧跟其后，几个人在于会泳的指点下，排队向江青走去。

“这是王淮湘同志……”部长向首长介绍说。握手。

介绍到苏云的时候，江青并没伸过手来，却又问：“张天民呢？”

“我是张天民。”那个写信告状的人走了过去，站在江青面前。

江青的目光从镜片后边很锐利地看着眼前这个年轻人，同时大声说：“啊，你就是张天民……”手直直地伸了过

来。

张天民握住江青的手，眼睛也从镜片后边观察对方，他感到江青的个子很高，远看很白皙的面孔这时竟透着褐黄，且带有铁青色，皱纹也堆积得很多，最引人注目的是在鼻翼右侧生着的一颗黄豆大小的瘰子，给那张阴沉的、毫无笑影的脸添了一股阴森之气——张天民后来在向我描述当时情景时，使用了“凶杀之气”这种说法，我想，那也许是由于他当时的心态中怀有恐惧感的缘故。

江青没有松开手，也没有改变面部表情，始终锐利地直视着张天民，说：“娃娃，你告了老娘一个刁状，老娘今天要教训教训你！”这才一甩手，把张天民扔到一边，招呼大家说：“吃饭、吃饭！……”笔直走到大厅一角的餐桌旁边去了。

所有的人刚才都屏神静息地听着，这时才总算有了一些活气，便也无声地乱纷纷入座。

有人注意到，在江青说到“教训教训”的时候，那个倒霉的《创业》编剧的脸腾地红了，然后又很快变为灰白。但是没有人想到安慰他，他们也被“教训”的字眼吓懵了，人人都在心里揣摩这番话的含意，并且为张天民手里攥一把汗。

“过来，过来，你们怎么都躲着我？”江青招手说——她坐的那张餐桌，除她以外，再没有别人过去。

“成荫、孙谦……崔嵬……”她点名叫着，分明很不乐意遭到尊敬的孤立，张天民，你也过来！”她又叫。

被点名的人慢慢蹭过去了，包括于会泳、浩亮和王淮湘。张天民感到背后又有人推了一下，就也身不由己地走了过去。

“张天民，你好大胆子，谁让你给主席写信的？”江青又提起了话头。

张天民低着头并不回答。

“你不说我也知道！”江青摇着头，笑着——这是今晚她头一回带笑说话，“好，好，先坐下吃饭，以后再说。”

张天民在她对面坐下了。

“这次请你们来，”江青环视大厅，慢慢地说，见所有人的眼睛都转过来了，才接着说：“一吃饭，二睡觉，三拉屎撒尿，四听我说话……”说着，她自己笑了起来，她一定希望给自己的形象加一点幽默感，可惜刚才的气氛过于森严，她的听众一时打不起精神，都笑不出来。

“我这菜一点儿不好吃，”江青作出苦相说，“大夫给定的食谱，他虐待我，来，你们尝尝，尝尝……”

张天民向她的盘子看去，果然全是绿色蔬菜，豆角什么的，仿佛有一样是苦菜。但是，没有人真的动筷子去尝。他当然也不敢，他怕江青由此得了什么传染病或中了什么毒。

“你们尝尝嘛……”江青又说，不知是让人体验她生活的清苦，还是为了表示本餐主人的殷勤。

“王淮湘你来尝……”江青命令道。王淮湘小心翼翼地夹了一点。

“怎么样，不好吃吧？”江青很感兴趣的样子，偏过头去问那位鉴赏家。

“是不好吃……”王淮湘顺着主人的意思说。

“大夫不准我吃肉，”江青说，“我吃你们的鱼……”说着，就伸出筷子把一个鱼头夹到自己面前，很有味地吃。这时候的女皇便从云头上降落下来，回到人间，使人感到颇有一点可爱的俗民气息了。

大厅里，也随之弥漫起一片轻轻的碗筷声响，夹杂着低声谈话，气氛轻松多了。

但人情味并没有在江青身上停留多久，刚吃了几口饭，她就象忽然想起了似地，拿筷子指点着张天民说：“你告了我的状，我很高兴……我才不怕哪！……”

张天民低着头默不作声。

“给他们看片子！……”江青忽然变换话题，对于会泳说。她的部长赶紧拿过笔和本子来记。

“不要记！”她声严厉厉地大喊，又对全屋的人挥了下手，“今晚我说的话都不准记！……新华社的人来了没有？不要发消息！”

于会泳赶紧收起了本子，只有相邻桌子上的华克，借着桌子的掩护，仍然对她有言必录——后来回到长影，华克成了当时场景的权威发言人。

“张天民，你谎报军情！”江青又把题目拉了回来。

“首长，我没谎报军情……”张天民低声辩了一句，江青显然没有听到，她的耳朵不大好。

“《创业》的样片我没看，就是这些蠢才”——手向于会泳、浩亮一指，“给你们吹，你们自己也吹，说如何如何好。我看了几次才看下去……看了几本，我问：后边还有什么好看的没有哇？放映员也给你们吹，我一问，不敢说话了。”

听她发这番感慨的人也不敢说话。大厅里静静的，只有她一个人的声音在响。

“十条意见不是我的，只有我一条，”她很气愤地说，“第八条是我的，是艺术处理上的，其他都是这些蠢才搞的，我们没批准。我只对第八条负点责任……”接着，她就

对第八条发挥起来，“你那冲突是断断续续的。冲突倒很尖锐，可是一下子就没了……技术术语太多，我听不懂，找砂样看不懂，你应该把砂样的重要性介绍出来，电影是视觉艺术，要让人看清什么是砂样。还有，你那镜头蹦来蹦去的，看起来很吃力，连我都看不懂……导演呢？《创业》那导演是谁，来了没有？”

于彦夫赶紧站起来，江青示意让他坐下。

“你那片子拍了多少镜头？”

“一千多个。”

“哎哟，吓死人了！”江青叫着，“怎么能这样拍！……今晚放几部国外的片子给你们看，你数数，人家拍多少镜头……北影的，你们拿表掐掐时间，看人家的长镜头有多长。”

北影的和长影的人就都点头。

“《在那些年代里》只有二百多个镜头。看片子时你数数，”江青又对于彦夫说，“影片出国叫外国人笑话，他们专挑技巧……你们的片子太粗。”说着，就又转向张天民，

“你概括能力差，我给你找个伙伴，和你一起搞，就是孙谦，还要找上大庆工人写作组，搞一部新《创业》。”

孙谦和张天民一听，就都心里叫苦。孙谦从来是写农村题材的，叫他搞大庆的本子，即使概括能力强也有劲使不上，何况是遵旨文学，他和马烽奉江青之命搞电影《山花》还是就近以大寨为背景的，不也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依然难产。张天民听了江青的话，不禁有点犯疑，“搞一部新《创业》”莫非这就是召他们到这里来的目的？但新《创业》是怎么个搞法，应该是怎么个样子，他无论如何想象不出。一部《创业》就够伤脑筋的了，再来一部说不定连小命都得搭

上。他感到心往下沉，就索性闷着头不作声。

“应该从退回奖金开始，旧社会的可以在最困难的时候回忆，这样就完整了。”她说的还是那个新《创业》，“李仁堂和小油娃还要准备演……”忽然她又提起了影片剪接的事，就问，“你们《创业》组搞剪接的来了没有……叫他们来，看看外国片是怎么搞的。”

就为了她这一句话，长影的人赶忙往厂里打电话，《创业》的剪接祖述志奉命启程，风餐露宿，马不停蹄赶到了大寨，但江青再没提这个茬口，祖述稀里糊涂地到底不知道叫她急如星火地赶来干什么。

江青不停地说话，一会儿替文化部打抱不平，一会儿骂北影，一会儿讲伊思曼胶片，一会儿谈低密度曝光，她的思想天马行空，无所拘束，她的语言就东拉西扯，缺少逻辑，又兼喜怒无常，笑骂转换得很快，无规律可循，弄得大家十分紧张，饭也无心思认真吃，一顿借花献佛的“宴席”，说的是首长请客，实际上客人们倒挨了一顿训，就这样半饥半饱地放下了筷子。

张天民更是心事重重，一半是担心今后几天要继续挨骂，一半是因为江青说的要搞新《创业》，看她那时那个样子，不象是心血来潮、偶然说的，那可就要认真对待了。而且，从今天宴席上的情形观察，自己分明成了江青的主要关注对象，这可不是让人羡慕的好事情。

“张天民来了没？”果然，当天晚上在国际旅行社二楼小礼堂里看电影的时候。灯一灭，江青走进来，就在黑影里边叫。

十七 左派领袖的风姿

在去虎头山劳动以前，《创业》组奉命先听了江青对大寨社员的讲话录音。

别看江青常常不给知识分子好脸色看，可她在寨农民面前却表现得又活泼又恭敬。“我是来学习的，来当学生的，你们欢迎我这个学生吧？”她满面春风地做出讨人喜欢的样子说。

“欢迎！”大寨人只好齐声喊，因为她在前边还说了一句：“我是主席批准来这里的，是政治局同意的。”她对社员们报给她的掌声很满意，不过，当讲到评《水浒》的现实意义这个正题目的时候，恭敬、活泼的小学生就变成了杀气腾腾的斗士。她还宣布要把她的三种版本的《水浒》送给大寨农民同志传着看。

江青也没有忘记表现她热爱劳动的本色，她很自豪地告诉她的听众，“我已经打个泡了。”好象特地印证她的表白，前一天的《人民日报》在头版显著位置刊出了江青在大寨参加劳动的照片。读者们看到，这位久矣不见其肖像的政治局委员头系白羊肚毛巾，白衬衫扎在腰带里，正弯腰持锨掘土，又利落又潇洒——这就是昨天晚宴上她对吉林省委书记王淮湘说的“我在这儿，还挖了战壕呢”的现场留影。其时，已经有“深挖洞”的最高指示的发表，江青带头身体力行。

昨天晚上她还说：“明天你们参加劳动，我给你们拍几张照片。”又说，“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就是不爱劳动，不能在这儿吃闲饭呀。”

江青参加劳动的场面很威风。上山路上，她率领一大群老少不等的艺术家迤迤而行。江青喜欢骑马，不过今天没有骑，也许是警卫人员担心她的安全，没让骑马。从北京运来的四匹军马，由战士牵着，紧随其后。这些马都是又高又大又漂亮，善于驰行的，“竹批双耳峻，风入四蹄轻，”但今天它们的本事未得施展，便只“唉儿唉儿”地叫。人群和骏马后边，是一辆辆小车，共同组成了这支奇特的仪仗队。

“这地方好，照张像！”江青大声说。队伍便停下来，按照她的指点，摆姿势，此时，威炎炙手的女首长就又变成了技术高超的摄影家。

那天，江青兴致很好，照过几张像，就又叫，“张天民，过来！”张天民过去了。她说：“你那个《创业》——”一听谈《创业》，苏云也跟过去听。江青看见苏云，把嘴角一撇，说：“你这个导演不怎么样……”她把苏云当成了于彦夫。那时候，他们两个都穿又肥又大的蓝灰涤卡人民装，都剪小平头，个子也差不多，江青始终分不出他们哪个姓于哪个姓苏。后来，有一次开小会，江青还指着苏云说：“站起来！你说，你那戏是怎么拍的？……”苏云赶紧说：“我是苏云。”于彦夫也赶紧站起来，说：“我是于彦夫。”江青也笑了，摆手说：“你们两个我搞不清楚……”

合影之后，江青又和剧组每个成员单独拍照——这个威风赫赫的女人身上的人情味从来没这样生动、丰富地流露过。她和每个人都说了几句亲切的话。她对《创业》女支部书记曲伟说：“将来我们要培养几个女导演。”她又对《创业》副导演华克讲：“我们要培养年轻导演。”

虎头山上惊风不起，险云不生。大家席地而坐，摘花椒，有人递给江青一个小板凳，她就坐在上边摘，如果排除

了政治上的不协调因素，局外人看了这个场面，也许会感到有点象一个和乐的大家庭——年过六旬、孤家寡人的江青一定很少享受这样的乐趣，所以她兴奋。但《创业》组的人对她隔阂难消，尽管江青此时表现得象一个温和的老太太，他们还是离她远远的。花椒看似好摘，但花椒树上的刺扎手也疼。他们必得分外小心些，才能保护自己。

“张天民，你过来！”江青又在叫了，不过声调里已经剔除了昨天那样的威势。“昨天那两部片子你看怎么样？”她的目光迎着慢慢走过来的年轻作家问，手里还在摘那种红红的小颗粒。

昨天晚上，江青给他们看了从北京带来的美国影片《鸽子号》和墨西哥影片《在那些年代里》。

“拍得好，”张天民恭敬地回答，“有许多值得学习的地方。”

这时候，于会泳和浩亮也凑了过来。管文化的首长同人谈话，他们有义务陪谈和陪听。但是，江青变了脸色说：“滚蛋，滚蛋！今天我是和创作人员谈话。”于、浩一言未发，就悄悄离开，到土崖子底下抽烟去了。

江青如此粗暴地对待两位部长，使张天民十分震惊，因此他提醒自己千万不要忘记了眼前这位温和老太太的真正身份，哪怕一小会儿也不要忘。

“《鸽子号》拍得好，”江青对张天民说，仍然态度和蔼，“摄影也不错，表演也好，两个演员都很年轻……《在那些年代里》的历史背景你清楚不清楚？”

“不清楚。”张天民老老实实回答，或者本来他很清楚却不那样说。

“哦，”江青循循善诱地说，“这部影片写的是马克

思、恩格斯活动的年代，因为这一点，我重视这部片子。”

这样闲闲的对话过去以后，江青把谈话转入正题，笑着说：“小张呀，昨天我说要教训你，那是开玩笑，今天咱们平心静气地进行同志式的谈话，好不好？”

张天民自然不能说不好。

“那个《创业》，不是你的，是大家的，对吧？”江青笑着问。

“对，是大家的，集体创作。”张天民也笑着回答。

“坦白说，当初我让你们写《创业》，是要你们照《中国文学》那篇文章搞，《铁人的故事》你看过吧？那主要是围绕铁人写的，可你那油娃（指周挺杉）呢……你要搞一部新《创业》，如果有兴趣，不妨来个新的构思。”

谈到这个话头，江青的情绪越发高涨，不殚心力地替作者构思起故事来了，她说：“再搞的时候，要写一个男主角。现在的周挺杉，作为二号人物，是一号的师傅——师傅这个词不好，你们片子里老是叫这个师傅那个师傅的，旧社会说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是孔孟之道——再写一个女主角，是地质员……可从抵制发奖金写起，演铁人的是第二号男主角，第二号人物说不要奖金，后又找一号，告诉他，他说我顶了。第二号人物牺牲后，一号继承他的精神，可以放在别的环境里写。回忆旧社会插在中间就可以了。你写中国石油工业几十年的历史，一部片子写不了那么多……”

江青滔滔不绝地说着，张天民干听不说话，频频点头答应，心里在想着别的。

“行了，行了，我编不下去了，”江青说，“我给你说个大路子，剩下的是你们的事了……”转身又对于彦夫说：

“昨天看的那部片子（指《在那些年代里》）只有二百三十

个镜头，将来你们这部戏，不许超过三百个镜头。于彦夫，你们当导演的要学舞台啊，要搞沙盘，把中、近、全、推、拉、摇等镜头搞准，配合好。”

于彦夫就也含含糊糊答应。

就这样，一边干活一边说话，有一搭无一搭，其实也没干多少，倒是一帮记者围前围后地“啪啪”照了不少相。虎头山上空气清新，蓝天绿树金黄田野，大自然模糊了人们之间难以消除的隔膜，谁都觉得这一天过的还行。但是到了晚上，空气又骤然紧张起来。

被她召集到餐厅来的人很多，除长影以外，还有北影的创作人员，新华社、《人民日报》记者，法家著作注释组，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大批判写作班子，词曲音乐研究组，还有陈永贵、吴桂贤二位副总理和李素文副委员长，以及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郭风莲。

这又是一顿令人难以咽下的工作晚餐。江青好象执意要让人们吃得不舒服，菜还没有上，她就冷着脸出语惊人，她说：“今天请大家来，是要先讲一件事：在我们党内，路线斗争曲折得很，最近一个时期，居然有人——”她在“有人”两个字上加强了语气，提高了声音的力度，而且身子往上一挺，使人闹不清她要点什么人，说什么事，百十人的场面竟然鸦雀无声，端菜送饭的服务员也暂时停止了走路，好象生怕那个“有人”会是她们自己。只听江青接着说：“……有人把主席批评我的一封信，江某人的一封信——主席让我到政治局传达的，政治局还没讨论——就给传出去了！”结尾一句她又提高声音，愤怒、仇恨之情溢于言表。

当时，在场的人都不知道江青指的是什么信，也许就是本文前边引述过的江青六月二十八日“致主席和在京政治局

同志”，表示经过“几次政治局会议上同志们的批评、帮助，思想触动很大”的那个检讨书？

“现在社会上有人造我的谣言，”江青抓住这个题目不放，继续发挥着，“说我自杀了，说我到纺织厂劳改去了——你们听到这样的谣言没有？”

没有人吱声。

“你们听到没？”江青转向成荫和崔嵬问。北影的两个人直摇头。

“北影就有谣言！”江青说。

惊悸不安的工作晚餐不欢而散了，人们无精打彩地目送江青离场。她走到门口，突然转过身来，扬起一只手大叫：

“你们不要挑拨离间……”这才气哼哼返身走了。

“这是对我来的吗？”张天民想，一面拖着沉重的脚步夹在默然无声的人群里走到外面。

夜的天空灰蒙蒙一片，月色很淡。

张天民感觉得到，江青的无名火烧得很旺，她的气没有出够，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烧起来，自己得有足够的思想准备才行。

“我是天天有人骂，修正主义骂我——”次日下午，江青在小会议室单独召集长影、北影的人开会，王淮湘也应召出席了，大家刚一坐好，江青就接着昨天的话说起来，“共产党员还怕骂吗？”她冷笑一声，二十几个听众就不免紧张。

“他们上了台，我就得坐牢，就得杀我的头。主席万一有个三长两短，我就自杀……”她停顿了一下，紧接着就挺起胸脯，挥动着拳头，大声说：“不，我不自杀，我要斗争！”

话说到这个程度，她还担心人们听不明白，又进一步进

行“路线交底”，她说：“我给同志们透露一个情况，就是在我们党内有两派，一个是温和派，一个是激进派——外国人讲，激进派就是左派——左派的领袖就是我！……”

室内的空气紧张到了极点。人们屏住了呼吸。一直在逐字逐句记录江青讲话的华克后来谈到当时人们的心情，说：

“老说分裂党中央，她这不是公开在讲党中央的分裂吗？我们生怕她在这种场合点到周总理，要是那样就不好办了，看她当时激动的样子，是随时都可能把我们怕听的那几个字点出来的。”

好在江青没有丧失理智到那个地步，她没有点周恩来，但却点了邓小平的名字，那是在她说到“宋江架空晁盖，现在有人架空毛主席”的时候，一下子就转到了邓小平，她影射攻击邓小平向毛泽东封锁文件，“文件不给主席送，都是我批了才给主席看的嘛”，她还讲到主席对邓小平是三七开，二八开。她又突然破口大骂，说四届人大“弄了一帮乌龟王八蛋进了政府”。

在座的人如坐针毡，听也不是，不听也不是，坐也坐不得，走也走不了。事后大家嘀咕，都觉得江青的这番话关系重大，苏云悄悄对于彦夫说，这事恐怕不简单，说不定上边以后要追查，有些事追记一下，以备万一。

张天民当时也象听到炸雷似地被震得懵了，他知道江青的话虽然不是说他，但也和他有关，今天的事情到这儿绝没有完。他估计得很对。江青一旦提到了邓小平，顺便就把他拉出来了。

“张天民，你写信是听到了什么小道消息？”江青指点着张天民问，脸色阴沉得可怕。

“我没听到什么消息。”张天民既有所准备，回答得就

也比较从容。

“没听到消息你敢写信？”江青的面孔板得象一块生铁，“你斗胆？”

“我是没听到……”张天民说。

“那我问你，你是什么时候写的信？”

“七月十八日。”

“好嘛！”江青象一位决心治人以罪的法官抓到了证据似地叫着，“主席十四日刚找我谈完话，十八日你就写信，你不知道就敢写？”

“主席是谈《创业》问题吗？”张天民鼓起勇气问了一句。

“是呀，”江青居然把实情说了出来，“你说，谁给你送了什么消息？”

“没人送消息。”张天民还是这句话，这时，他完全明白了，刚才那番话才是江青此次召见他们的主旨，她要通过追查，寻找证据，好把“分裂党中央”的罪名加到邓小平头上。因此，他更下定了决心，什么话也不讲。

“我知道你不会说，”江青这话分量很重，她急于了解情况，但是她没有办法，只好说，“我不问你了，你不说我也知道。”

张天民见她不追问，就更不说话。

“你不听我的话呀，”江青又说，“不听我的话，就是不听党的话。主席对我要求严格，你们一告状，主席就批评我。我怕主席生气，我都得听着。”说着，她做出一副受了委屈而又能忍辱负重的样子，同时，好象是在关心着张天民，她说：“你不要同他们搞到一块去。主席给你的信做批示，是爱护你，我接见你，也是爱护你。我不接见你，以后

翻过来就不好办了。”

她没有讲以后什么“翻过来”，但是人们都懂得她的弦外之音。邓小平在大寨露了一下面，就回北京去了，江青却在这里自由来去，随意讲话，而报纸上和电台里，对宋江和“投降派”的批判声日甚一日，虎头山上落叶惊秋，明眼人早窥见了中国政治局势的未来演变。但是，张天民已经没有退路可寻，“不好办”也得硬挺下去了。

十八 压不服的写信人

九月十八日，江青单独召集长影、北影的与会人员，以座谈影片《康贝尔王国》和《简爱》为名，再一次施加压力，逼张天民就范。

“你们看这么多片子了，”江青说，“联系你们的《创业》，看看有什么问题？”

大家呆坐着，都不想开口。

“张天民，你先说！”江青毫不客气地点着那个和她一样面无表情的编剧。苏云忙以目视张天民，让他说话。

“我不能把《创业》说得一钱不值——毛主席已经肯定了这部片子。”张天民在心里说，他能选择的只有回避，他说，“这几部外国影片，政治上是反动的，艺术上很精细，我们可以借鉴。”他用江青常讲的话，回答了江青的提问，关于《创业》，却只字不提。

见张天民不讲《创业》，王淮湘忙站起来说：“联系到我们的《创业》，虽然没有大错，中错、小错也不少，比如艺术上粗糙，镜头跳来跳去……”

江青冲王淮湘点了点头，又转对张天民说：“你谎报军

情。你说我第二天就不让印拷贝了，是第二天吗？第二天我还没看完呢。你还说我禁演了。我没禁演……谎报军情嘛，你要做自我批评。”

江青抓住“谎报军情”不放，张天民知道无法和她辩理，索性仍以沉默表示异议。

“你那片子就是搞的真人真事，”江青提起了她最为仇恨的题目，话也讲得十分露骨，“‘横挑鼻子竖挑眼’，这是余秋里的话，余还活着，在一部影片里，为什么把两个还活的高级干部牵进去？华程的长相都象余秋里——这是后患无穷的。”这样，她就否定了只有第八条意见是她的这种说法。真人真事问题在“十条意见”中列为第三条。

“你要向主席报告，要求重拍一部新《创业》，”江青直瞪瞪地逼视着张天民说，“你还要向主席建议，影片不要向国外发行。”这里，江青的想法比昨天又进了一步，令人难以招架。

见张天民对她的话毫无反应，江青急了，追问道：“张天民，你还给不给主席写信了！”

张天民恍惚中没有听懂江青的意思，以为她是责备自己不该写那封告状信，就答道：“不写了。”

“你还得写！”江青叫了起来，连身子都颤了一下“你还要写上党中央……”

苏云明白，写上“党中央”，江青就可以过问了——她想得很周全。

张天民依然不置可否。江青不再理他，只指示新《创业》要拍成宽窄两种银幕，还指定孙兼参加编剧工作——待他完成《山花》的修改任务以后就投进去。

会后，王淮湘找到苏云，传达江青的指示：一定要想办

法动员张天民给毛泽东写信。江青将在二十日启程返京，走之前她要看到这封信。苏云不敢保证一定能说服张天民。他感到自己不大好和张天民说话。王淮湘就提议由他们两个一块对张天民做工作。

月影朦胧中，万籁俱寂时。一脸烦恼的张天民被叫到王淮湘在大寨期间专用的一辆上海牌小车里，三个人进行了一场艰难的讨价还价式的谈话。

“江青同志说了，让你给主席再写一封信，你考虑得怎么样了？”王淮湘温和地问。作为有权威的省委第一书记，他知道在这种情况下不能态度生硬地下命令，即使下了命令，也怕对方不服。他一定对这个敢告江青御状的人存有三分惧意，只能对他劝导。

“这样的信，你们看能写吗？”张天民这时果然表现得不大容易对付，他一开口就把球踢了回去。

“不写不好交待呀。”王淮湘没有正面解答对方的反提问。

“让我承认谎报军情，我倒没什么，”张天民说，他的话绵里藏针，“可是，我们把毛主席置于何地呢，毛主席洞察一切，难道说被我蒙骗了？”

这样的反诘更难答辩，王淮湘哑口无言、苏云因有省委领导在场，自己就乐得不讲话。

“毛主席说影片可以公开发行，我要求不发行，还要重拍，这样的责任谁来承担？”张天民说。他想得细，理由也充分，这样，从谈话的一开始就占据了上风。

“你说的当然也有道理。”王淮湘只好这样说，“但是江青同志已经作了指示，我们不写就是个态度问题，我们同样承担不了。”

“信还是要写，”苏云说，“要不然咱们都走不了，不

过，怎样写可以研究。”他想打破僵局，寻找一种妥协方案，使大家都能脱身。

既然说到可以研究，张天民不好再僵硬下去，就顺着苏云的思路说：“如果实在要我写信，那有几件事不能涉及：我不能说谎报军情，也不要求重拍《创业》，我只承认《创业》不是十全十美的，至于要不要向国外发行，那是文化部职权范围内的事，用不着请示主席。我只写一条，就是看到主席对《创业》的批示，我非常受感动，一直想写一封感谢信还没有写，我写感谢毛主席的关怀，表示今后一定要努力深入生活，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我这样写行不行呢？”

王淮湘思忖着张天民的话，没有立刻答复。他想说“不行”，又怕张天民干脆拒绝写，就说：“写什么先不用细致研究了，反正是要写。”

苏云也说：“我看就先那么写吧。”他的想法，只要有一封信在江青那里敷衍一下，说不定就过去了。

王淮湘一时想不出别的办法，也只好答应，让张天民写出来再看。

张天民很快写出了指定要他写的那封信。他在信里真诚地感谢毛泽东的光辉批示，表示要以“反映石油工人创社会主义大业的新影片”作为报答，他还写上了“江青同志在大寨领导我们学习您的批示”，“帮助”了我们，使我们认识到“此片无大错还有小错”这样带有某种揶揄的内容，难道江青会看不出这样的内容吗？张天民也算得上胆大妄为，甘犯天颜了。

信经苏云转给了王淮湘。

王淮湘皱着眉头对写信人说：“你这信……江青同志讲那几条都没写呀，比如说，要求拍新《创业》，这是首长多

次说过的……”

“我这信里不是有一句，要写‘反映石油工人创社会主义大业的新影片’吗？”张天民说。他在这里耍了一点小小的尖滑，他把这句话理解为他于彦夫正在搞的新片《希望》以及石油三部曲中的第三部，但也可以蒙混成“新《创业》”，他坚持不使用“新《创业》”这个词，精心地用一个模糊的概念取代严谨的概念。

但王淮湘也不是轻易蒙混得了的，他分明看出了张天民李代桃僵的手法，就坚持要张天民对信进行修改，一定明确地写上要求拍新《创业》和建议不向国外发行的内容。

张天民拒绝这样做。

双方僵持不下，王淮湘就要苏云说服张天民。

张天民再一次表示，这样的内容向毛泽东报告不合适，它完全是文化部的事，如果非写不可，就向文化部打报告好了，但事关一部影片，他不能独自行动，要写就以厂或《创业》摄制组的名义去写。苏云也觉得这样好，向王淮湘汇报之后，就找来于彦夫，几个人一起研究起草给文化部的信。

在大寨的最后一天，苏云和长影的几个人就在这种又气恼又无可奈何的心境下推敲这两封信。王淮湘不断来催，于会泳也代表他的首长来看，但长影的几个人干劲不足，发一会儿牢骚写几个字，直到有人催促上车了，信还没有定稿。

九月二十日将近中午时分，江青带领她的大队随员登上专车，为了表示领导者的关切之情，她头上扎着白毛巾到处看了看，或点点头，或说几句话。

这时候，两封涂改得一塌糊涂的信稿交给华克誉清。华克把张天民致毛泽东信里的“反映石油工人创社会主义大业的新影片”一句，改成了“反映石油工人创业精神的新影

片”，这样更明确、具体些，而原则精神仍然没变。

华克年轻气盛，他认为以摄制组名义致文化部的报告内容不妥，将来会成为一种罪状，他坚决反对交这封信，说：

“抄写可以，但我概不负责。”

摄制组内部意见无法统一，只好允许有人保留，但信还是要交。张天民的信经王淮湘、于会泳递交江青，但江青也不糊涂，她一定知道，由她转交这封信，岂不明明白白表示，信是她布置写的？因此，江青看也不看，就让王淮湘直接交给党中央。幸亏她没看，不然，这封肯定不会使她满意的信，不知又会给写信人带来什么样的麻烦！

王淮湘根据江青的指示，到达北京以后，就把摄制组致文化部的信交给了于会泳，但张天民的信却没有交，原封不动回到了写信人手里。关于这种变化，当时有几种传言，一说是国务院某领导同志对王淮湘讲，你这样做是逼人作检讨，信不要交。另一种说法则讲，对王淮湘说那句话的是军队一位领导同志。

江青精心筹划的大寨之行，达到了她重新亮相的目的，并且为她制造反对邓小平的舆论提供了机会，但她想把张天民当作一块石头打人的盘算落空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大寨之行又是她的一个失败，她还有更多的失败。她的表演既使人们感到震惊，就不能不促使人们深思：江青要干什么？江青和她的同伙反被自己的行动进一步孤立起来了，待到人民反抗的怒涛起来刷洗山河的时候，就更会使人看清楚这种孤立的意义。

尾 声

大寨会议不是《创业》事件的结尾，恰恰相反，它可能

是新一轮斗争的开头。《创业》组的几个人都有这样的预感，所以一到北京，走下江青的专列，他们的心理就是赶快走散，此后再也见不到这个女人才好。苏云对于彦夫说：“抓紧时间离开北京吧，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去，说不定什么时候又要找。”于彦夫就带队逃难似地到了大港——不是去搞什么新《创业》，而且继续追寻他们渺茫的《希望》。

大港不是避风港，全中国剧烈跳动的脉搏他们感受得到。令人欣慰的消息再也听不到了，秋霜又比往年都落得早。评《水浒》浪头甚猛，已经明确点出了“党内的投降派”，邓小平的处境更难。十月，周恩来在北京做最后一次手术之前，强挣病体，当着一些政治局委员的面握住邓小平的手说：“你这一年干得很好，比我强得多……”这是这个伟人在意识到自己再也不能起来的最后时刻，对他的前途险恶的战友表示慰劳和支持。

十一日，电台突然提前广播了《红旗》杂志要刊登的梁效文章：《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这篇文章成了公开进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信号。清华、北大两校迅速整理出了邓小平的所谓右倾翻案言论汇编，发向全国。

也就在这个月里，文化部在北京召开创作评论会议，收集“右倾翻案风的奇谈怪论”，作为“从文艺方面批邓的专题”，《创业》影片前前后后的事就成了这种“奇谈怪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寒冬降临大地，1976年周恩来的辞世标志着中国“文革”以来的局势发展跌入了深深的谷底。

一月，毛泽东指令召开中央批邓打招呼会议。二月上旬到三月上旬，打招呼会议整整开了一个月。江青在会上极其活跃，她称邓小平为买办、地主资产阶级和国际资本家的代

理人，说《创业》作者给毛泽东写信是邓小平“授意”的，信也“确确实实”是邓小平转的，并断言是邓小平“逼迫主席表态”。

江青还跑到北京新华印刷厂，大骂“张天民告我的状，真是混帐王八蛋”。江青的追随者于会泳、谢静宜、王秀珍等人也在北京、上海等地宣称“主席批示来路不明，送信背景要严加追查”。这样，在长影、北影和新影等单位，就开始审查和张天民有过交往的人。

贺捷生受到了重大怀疑，文化部派人到她所在的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调查，她的家受到监视，来往客人都被盘查。

张天民自然是首当其冲。从大寨回到北京，他就整理了同志、朋友、相熟和不相熟人们的信件，统统烧毁了。他还把江青在大寨的主要言论写到了一张纸上，让他的妻子赵亮背熟了，再把那张纸烧掉。他原来设想，要想办法把江青的那些话报到中央去，他相信，江青的活动一定是背着中央干的，尽管她自己宣称是毛泽东派她到大寨去的。他曾经去找过贺捷生，但在门口，就被严密监视着的街道革命老太婆们发现了，他没能进去。他对妻子说：“如果有朝一日中央需要江青的这些材料，我又不在了，你一定要设法报告上去。”赵亮含泪点头，用了一天功夫，背下了那些话。

张天民在家的時候，发现他家周围常有黑影晃动。后来，又有消息打到大港，命他回厂。原来是江青先给王淮湘打了电话，问张天民的思想状况。王淮湘讲，张天民没有转过弯子来，认识上不去。江青就让王淮湘转告张天民，要放下包袱，轻装上阵，只要能够和邓小平划清界限，揭发批判“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就可以既往不咎，还让他写东西。

王淮湘向张天民转达了江青对他的关怀，要他写材料，揭发邓小平。张天民说：“我虽然给邓小平写过信，可是从来没和他见过面，我知道的事情都是报纸上登过的那些东西。”

过了几天，王淮湘又催，张天民还一个字没写。这时，《希望》的二稿已经修改完成，于彦夫正带领《创业》组的原班人马紧张筹拍。文化部得知这个消息以后，下令《希望》立即下马，说，“不停拍就是对首长的态度问题。”他们要《创业》组按照江青的规定，上那部所谓新《创业》。

张天民无法，同时为了逃避要他写材料“揭发邓小平”这件苦差事，就到大庆去了。

不久，孙谦和于彦夫也到大庆和张天民会合。他们还到了正在开发中的辽宁盘锦油田，就在那里，他们收听到了四月五日天安门广场革命群众悼念周恩来，支持邓小平，反对江青等人的消息。这个最终被镇压了的群众革命运动给他们留下了惊心动魄的记忆。他们商定把未来的剧本定名为《大地风雷》。但既然必须按照江青钦定的构架写，这个剧本就注定了将会流产。他们相信，随着政治斗争逐步趋向白热化，江青将无暇顾及此事。他们的想法后来应验了。

1976年伟大的十月之后，随着整个国家民族的新生，电影《创业》也最终获得了新生。在大庆市召开的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上，余秋里副总理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作的报告中，对《创业》和围绕《创业》的斗争做出了公正、明确的结论。会后，康世恩部长见到《创业》导演于彦夫，这才过去和他紧紧握手，连声说：“你们对石油战线做了很大贡献，谢谢你们！”

“良马不念秣，烈士不苟营。”中国电影史和政治史上

惊心动魄的一幕过去十一年了，张天民还是那个张天民，贺捷生也还是那个贺捷生——还是那样的心，还是那样的头颅。不管人们曾经怎样评价他们，历史总会对每个人做出公正的结论。

1986年7月～11月

献 国 策

——致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

序

应当让有无产阶级卓越政治远见的、心怀大志的、有才干的年青人担负国家之重任，以便为国家制订出革命的、行之有效的策略，引导人民为建设一个强盛的社会主义祖国而奋斗。为此，我建议：

中央应颁发求贤令，广招天下有志之士。

我愿自荐到国务院，为实现今日所献之十二条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献策人：李笑天

75.5.5

一 节制生育，控制人口

在今后二十五年内，实行“工两农壹”制方针。即凡属城镇、工矿非农业人口，任何一对夫妻，只许生养两个孩子以下；农业人口只许生养壹个孩子以下。此事必须作为法律固定下来，任何人不得违抗。各级机构专门设立一个由宣传、医务、政法三部份人组成的监督委员会。

此外，劝阻男高不到一公尺六五、女高不到一公尺五

五、或男女总高不到三米二者，结婚后不生育孩子。有先天性生理缺陷（如心脏病、近视眼、皮肤病等）的人；有严重后天性病患者（如麻风、肝炎、肺结核、神经病）及畸形怪状者，不准结婚，若结者，杜绝生育能力。目的在于对人类实行“优选化”，选择良种。

国家必须充分行使其职能，用无产阶级专政的铁的手腕与说服教育相结合的方法，坚决执行。这样，不但沉重地打击了人们中的私有制观念和传统的坏习惯，而且为国家减少了很多不应有的麻烦。教育、卫生、医药、粮食以及就业问题就好办得多了，知青下放问题及由此而产生的诸如“开后门”等怪现象也就不存在了。总之有百利无一弊。

二 缩小工农、城乡差别

实行“厂、矿、公社合一”的方针。（A）从一九七六年起，凡新建的一切厂矿企业，建在原料产地和农村（少在平原多在丘陵山区）并和相当数量的公社合并，造成“厂矿是公社办的、公社是厂矿办的”。坚决制止一切厂矿企业办在大城市或城镇郊区。（B）统一厂、矿、公社党的领导。（C）逐步把公社办成国营农场，之前，仍实行以生产队或公社为单位的经济核算制。厂、矿、公社实行粮食、蔬菜、肉类等自给。（D）把这些厂、矿、公社知青下放公社劳动；厂矿因扩大需增加人员时，从该公社招工。（E）公社在厂矿支援下，逐步走向机械化，集体食堂居民点（村）。（F）缩小工人内部、农民内部，工农之间的工资差别。原则是“抑工扬农”，即抑制工人工资，提高农民收入。

三 为农业人口提供福利

在一切未实行与厂、矿合一的公社，或合一但尚未过渡到国营农场者之社员，由国家提供有限的生活福利：A、无偿供给常年所需之食物和一定数量的糖、酒。B、免费就医。和工人一样享有公费医疗。C、每年国家发给每人十五至二十元的购买衣布和鞋袜等生活费，相应地减少工人生活、劳保福利开支，借以培养人们热爱农业劳动、想当农民的思想感情。我劝中央调查一下工人农民（不调查大城市、郊区经济作物区的农民）间的生活水平究竟相差到何种地步。我说，在工人中的一部份也太不知足了！必须加强对工人的共产主义教育，健全工人的学习制度，加强劳动纪律，狠批消极怠工装病者，处分无故旷工者。

四 教育革命问题

大学生的来源应这样：每年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用笔考《文化考试》录取当年大学招生名额的60%，40%从工人、农民中的优秀者各选一半。再将所录取之高中生由高教部统一下放农村劳动，进行政治考核。考核中，每年由本人写出年终考核总结，由带队干部、公社干部及贫下中农作出评审：及格或不及格，并负责对不及格者列举事实说明，公诸于世。不及格者及家长均可提出辩驳与质问。及格的条件是：1、认真学习马列主义，参加农村三大革命运动，严守国家法纪，在考核期中无盗窃、凶杀、诈骗、流氓等犯罪行为者；2、对当今国家之正确方针、政策无严重偏见者。但对

领导干部中的资产阶级作风能提出批评者另外；3、积极劳动生产，学会生产技能，每年出勤率在当地社员平均出勤率以上（如社员平均劳动出勤率在300天，则应在301天以上），病患者另外；4、能表现出共产主义风格和劳动态度者（如义务宣传党的政策，帮助社员学习，为公社、生产队、老弱病残者尽义务劳动）；原则是，上述四条无显著好表现，但能与当地社员政治表现相比拟者可谓及格，反之谓不及格。不及格者取消入学资格，所缺名额由所在生产队或公社下放（还乡）知青中的优秀者补及。但坚决杜绝当地干部利用职权营私舞弊、弄虚作假以达到自己或亲友之子女补其名额。违者依法惩办。群众可向上级检举。

若能依上述办理，就能保证大学生在德、智、体三方面全部及格，造就真正有才干的共产主义接班人。从这几年工农兵大学生的学习情况看，理工科学员，由于文化基础差，跟不上学习进度，深造几年未能达到深造之目的，只是表面镀了一层金，肚里无货，空有其名，于革命和建设无益。

为此，高中教材、学制全国统一。取消大、中、小学中的“开卷考试”制度，一律实行闭卷考试。因为开卷考试培养了学生的依赖性、懒惰性。闭卷考试不但训练了学生的记忆力，而且同样训练了学生的理解力和独立思考的分析力。试问：学生对问题都不能记住它，又如何能去深刻理解与分析它？

至(于)对小学、初中、高中以及各中级专科学校之招生、升学办法暂按现行制度办理。

五 知青下放问题

提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口号来动员知青下乡这是可笑的。因为这口号是有欺骗性，没有说实话。首先人们无法理解：知青为什么不去接受“人类最伟大的无产阶级”的再教育，而要去接受“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贫下中农再教育？难道他们还比工人阶级先进？正因为如此，所以90%知青到农村是出于被迫、免(勉)强。到了农村也不是为了改造世界观、扎根农村，而是心存侥幸，如努力走后门，碰运气有朝一日能招工、招学离开农村。这类人表现出消极拖混，或努力与干部拉关系。8%左右的知青基于家境无钱无势，颇能埋头苦干，积极锻炼，可惜又往往不为干部所宠爱，招工自然无份，乃受排挤。2%左右的知青是走上了“男盗女娼”的可悲道路或“反革命”道路。

鉴于中国之具体情况，今后知青必须继续下放。但必须对他们说真话，把城镇人口过剩，无业可就的事实告诉他们，把农村的艰苦生活和繁重的体力劳动告诉他们，把为了减少国家负担，把一个浪费者和潜在的犯罪者变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为了充实农村文化科学技术领域的薄弱点，让他们去过艰苦创业生活……等等告诉他们，知青的工作就好做得多了。今后知青下放最好不分散，而是集中办农场或知青生产队，办集体食堂，统一作息和学习。以利于教育知青在革命的道路上健康的成长。

六 医疗卫生工作问题

现在是城市厂矿老爷卫生部了。从全国的大医院、医疗设备、技术力量、药材分配情况看，按人口的比例看，重点仍在城市、厂矿。城市、厂矿的设备齐全，现代化，技术力量雄厚，药材品种多，质量高，而农村则相反。由于农村劳动条件差，强度大，又受大自然风雨、酷热、严寒的巨大影响，饮水不卫生，食物营养差，故生病率高于城市厂矿。但奇怪的是：农民体质差，生病多，却比城市厂矿人员看病、吃药的人次少。城市厂矿人员太懂得养身之道，长寿之道了！无病装病、小病装大病、动辄就休息不上班、不工作。从1976年起，规定一条，除高烧、内出血、心脏病、肝炎、高血压、严重肺结核、癌症、脑膜炎、女性生殖器官病和工伤骨折、外出血等病人开全日休息外，若其他病症开全日休息者，只领工资的1/2，无一切劳保福利，如糖、肉、酒等。口粮每天八两。一些医务工作人员工作极不负责，给亲友、熟人谎报病情。只愿给“干净”的人看病，不愿给“肮脏”的农民看病（不错，农民必须彻底改变不讲清洁卫生的坏习惯。但那也只能伴随经济地位的改变和宣传教育）。从1976年起，必须更有效的把医疗卫生工作重点转向农村。减少30%的城市大医院下放到农村。今后每年的医务人员，器具，药材的分配均按三七成分，即农村占70%。

七 干部问题

口头上的马列主义，行动上的修正主义，这是干部中产

生新资产阶级分子的普遍规律。对行使政权、生产管理权、产品分配权的干部，必须实行如下的限制：

(A) 厂、矿、公社、医院、文教、财贸、交通等一切部门，实行“开门办公”，民主理政，群众监督。如工厂解决工人、干部或生产、生活中的每件事，都公诸于世，让群众了解、通过。

(B) 干部每年写出全年工作总结，写成绩和缺点、错误，交群众审查通过。

(C) 健全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制度。如厂矿、企业中，每周由党委一、二把手带领各科室行政人员下到车间班组，参加两天全日劳动，并协助基层执行党的政策。政府部门中的各级干部分期分批下到基层。如省农业厅的干部则到公社、生产队；工业厅的干部则到厂矿车间跟班劳动。

(D) 对任职干部中的贪污、盗窃、营私舞弊、弄虚作假、谎报成绩、欺下瞒上、迫害群众、奸污等犯错犯罪者，除公开向所在单位群众检讨交待外，撤职降为普通劳动者，严重者依法处理。

(E) 干部任职期限问题：从国务院各部委到厂、矿、公社中的党委，领导机构中的一、二把手，不得连续任职十五年以上，满十五年者更换，下放当普通劳动者。中央的主席、国务院总理不得连任二十年。从1976年起，十五年内，使县级以上（或相当于此级的厂矿）干部全部做到工农化，即从县委书记到公社队长，一律是从工农群众中提拔的。二十年内，使地委、市级干部（或相当于此级的厂矿中的干部）一律做到工农化，既是地委书记又是生产队社员（或工厂工人）。三十年内，使省级或同级的厂矿干部一律做到工农化。即这级干部是从工农中提拔的。规定一条，今后凡提

拔到中央、省级当干部的人，一律给县委级待遇。

(F) 加强对干部、群众的宣传教育。打掉干部身上的等级观念、高人一等的精神贵族感、尊严感。同时打掉群众中的传统的畏官、崇官心理状态。不要认为老王当了县长就不叫老王了，而要改口尊称官名“王县长”。

八 纠正下述歪风邪气

限制干部身上的资产阶级法权，不是限制干部不行使其职权，不执行政策（干部敢于不执行政策者，查办）。现在有的干部在文革期间受了冤气，心中不满，嘴里又不敢直说，怕丢官，采取软拖硬抗来对抗中央各项政策的落实。

充分发挥群众的革命主人翁责任感，干预政治生活，也绝不是让错误的僻（偏）见干（涉）干部行使其职权。群众中的一部分，自认为了不起，放个屁也要叫干部点头，不是采取帮助干部、同心同德共同奋斗的态度，而是把干部当成敌手来挑剔、刁难——上述两种人必须改正。

九 刑法、定罪、治安问题

法制是健全的，作法则是不健全的。

(A) 从现在起，凡对国家领导人、党的方针、政策提出书面批评和口头指责者（即通常所说的反革命攻击、诬蔑言论）一律不打成反革命或反革命集团。只将他（们）的言论交所在单位群众辩论；90%的群众同意、赞成时，不检讨不批斗；否则交群众批斗，本人检讨、认错。如本人不认错仍坚持己见者，限令不得再散布，否则按反革命处理。

(B) 加强对工人、农民内部刑事犯的专政。如盗窃、凶杀、奸污、投机倒把、集众闹事者，依法拿办。加强对工矿工人及家属的治安，道德（社会公德）的教育。对打架、谩骂、破坏社会公物，蛮横不讲理的职工进行必要的行政处分，群众批斗到拘留开除劳教。

目前对“人民内部”犯罪犯错者，法律表现得太软弱无力了。赫鲁晓夫不是从“人民内部”纵容出去的吗？

(C) 将只占罪犯0.1%~0.3%左右的五七年大学生右派（后升级为反革命者）给予无罪释放并安置力所能及的适当工作。条件是：（1）在一九五七年反右斗争中划的大学生右派，年龄不超过二十岁者（不论是单干户还是右派集团），只是在口头或文字上（大字报，诗词文章上）的攻击诬蔑言论者；（2）这类右派后在送“劳教”、送农村监督劳动不满抵触而进行“攻击”、“诬蔑”等“反革命言行”被捕判刑者；（3）在劳改队无盗窃、破坏、流氓行为者；（4）在劳改（就业）队因“攻击”干部或国家政策、或编写“反动”诗词文章小说、剧本而加刑、重判者；（5）家庭出身不是地主恶霸、官僚资本家、亲属无镇压劳改者。即纯属政治思想、意识形态方面的犯罪者（大学生右派）一律无罪释放。对治理国家大事确有独特进步见解者，可担任国家干部。

现今劳改队中的一部分（如劳改农场）极不健康、正常（管理人员和犯人都是如此）。今后应采取必要措施纠正。

十 各项政治运动、方针政策的现实意义和群众基础

三面红旗、文化大革命、知青下放、教育革命等的提

出，究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还是中央里的少数人、甚至主席一人提出来的？全国人民事先对这些运动没有进行必要的讨论、参加意见。人民心中无数，不理解、不明确。所以当这些东西从天上突然掉下来时，象三面红旗、文化大革命那样，造成方向极不明确、极度的混乱，以至破坏大于建设，坏处多于好处。中央里有气迫（魄）的人似佛（乎）是太少了点。对明明是唯心的、错误的东西不敢抵制，怕丢官。对党和人民有利的东西，又因虑及阻力大，怕事情弄不好反而坏了“名声”得罪了“天下人”。这些人也就是徒有其共产党员名矣！

关于文化大革命，我认为是完全不必要的，坏处大大超过好处。

(A) 我们的许多好干部受到林彪一类的迫害；

(B) 我们的人民遭到前所未有的愚弄，受了坏人的唆使，象仇人一般相互厮杀；

(C) 让林彪一类大小坏蛋捞了便宜。小坏蛋搞打、砸、抢、抄、抓、奸淫、烧杀；大坏蛋搞阴谋诡计、篡党、夺权搞法西斯主义。为一切仇杀、个人报复大开绿灯；

(D) 国民经济遭到建国以来仅次于“自然灾害”年的空前大破坏。中央当然不可能知道文革期间全国工农业产值的真实数目。

(E) 在精神道德方面，由于林彪搞的神秘主义、宗教迷信、极权崇拜，使人们变得不诚实、伪善、奸滑。文革以来的各个生活领域里的“开后门”不正是人们道德败坏、奸滑的表现吗？如果说文化大革命有什么丰功伟绩的话，那也只不过是“文艺革命、教育革命、知青下放、‘五七’干校、赤脚医生……”然而没有文化大革命难道就不能

象现在由中央提出，再经人民讨论产生出这些“共产主义新事物”来吗？至于说文化大革命打倒了刘少奇、林彪，那刘少奇可暂且不忙谈。林彪一类中山狼的出现，纯粹是毛主席一个人的错误造成的。即使没有文化大革命，似林彪这样受宠爱得志的中山狼，迟早也会打主席的翻天战（仗）。哪谈得上是文化大革命的功绩？

关于三面红旗，虽然有人极力肯定，但我要否定。理论上谈得再好听，做起来都是最难者，那这样的理论、口号又有何用？下面我们再来看一看三面红旗是个什么样儿吧。

人民公社，它只表现出了“政府合一”的好处。而其他，则是“共产”风，大破坏，乌托邦的狂热。

(A) 办集体食堂是公社——上共产主义的天梯——的内容之一。每家每户的一切粮食、猪羊、鸡鸭、桌凳、碗筷、锅及一切生活用品，一律“共产”，统统交伙食堂。开初，尚能满吃满胀，不久就喝大锅汤，继而水肿病、死人。

(B) 修居民村。人民公社要修三五层洋房、还要安上电灯电话。于是把相当数量的草房、瓦房拆除、烧毁。结果是造成一部分农民无家可归，流离失所，四处外逃，这是造成农业生产遭大破坏的因素之一。

(C) 高产地，“卫星田”。电影上放映了广西某地亩产水稻十三万多斤的奇迹后，五八年的报刊上也不厌其烦地吹嘘哪儿又亩产三万斤、哪儿又亩产五万斤，搞得人们神魂颠倒，纷纷抛弃千万亩良田，而经营一两亩卫星地。重庆有一个生产营（大队）冬季只种了两亩小麦，用了一千斤种子，据大跃进家们的计算，可产一千乘一千（ $1\,000\text{斤} \times 1\,000\text{斤} = 1\,000\,000\text{斤}!!$ ）得一百万斤，结果产了 $1000\text{斤} \times 0\text{斤} = 0\text{斤}!!$ 使人惊讶的是：居然在公社的跃进打擂比武会上得了

第一名。层层干部弄虚作假，谎报成绩，欺下瞒上。

(D) 大兵团作战。这是公社的第四个内容。为了集合上千上万人搞大兵团作战，农民不得不携老扶幼，身背被盖、锄头到几十里的地方去劳动，这将是什么样儿？不堪设想。

大跃进又是什么内容？农村是大搞钢铁运动。重庆华云山，岳池县集中了三万人以上，上山大办钢铁。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在浪费了大批粮食、砍伐了大批树木，造成了大批的疾病而一事无成了事。只在报纸上记载了它生产了无形的千万吨钢铁。城市厂矿的大跃进，除发疯似地大量扩大人员外，还在车间里实行苦战，连续两天两夜，三天三夜的不下班，不离开车间。各厂矿唯恐自己“落后”，没有放出高产卫星，于是除了增加工人的劳动强度、时间外，又搞粗制滥造，谎报成绩、产量。大跃进的第二个年头（五九年）一切工农业产品减少，到了六〇年，就变得奇缺。人们仅能看到的商品、产品，统统是被人们讥笑成“跃进货”的劣质产品。跃进货，成了一切劣质品的代名词。

在没有遭到“自然灾害”以前的五八年、五九年，全国粮食、钢铁的谎报数字是多大？（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是九千亿斤粮食吧！）实际又是多少？所谓“自然灾害年”又是怎么个灾害法？气象局有何科学证据证明全中国都遭了天灾？中央难道不明白？即明白，那又怎么说明三面红旗是举对了的？明明是错的，却偏偏要说是对的，这除了愚昧人民，搅乱人们的正常神经外，就是为毛主席一个人的错误开脱罪责。现在又把刘少奇、陈伯达抓来作替死鬼、赎罪羊了。彭德怀的意见是对的、正确的。

十一 领袖的任期与功过问题

(A) 中央主席，不得连任二十年，即使无错，自己也得主动免选，至于在任职期犯错者，随时罢免。（体面的、不戴任何份子帽子的辞职）。

(B) 总理、“人大”委员长和各部委，任职均不得超过十五年。这样做，即避免了形成个人专制和宗派集团，也造就了更多的国家领导人，让人民中的更多的优秀人物都有机会管理国家事务。

(C) 不应该把一切功劳都算在毛主席一个人头上；也不应把一切罪过都栽到别人身上。过去和现在，无论是法律还是新闻宣传、文学艺术，或开会讲话、作报告，统统一律地把有史（共产党的历史）以来的一切丰功伟绩都归功于毛主席一个人，而不归功于党中央的集体领导，更不说周总理、朱委员长、邓小平副总理也该分一点功绩了。至于人民，这个“创造世界历史的真正动力”更是一群愚蠢的流氓。仿佛没有毛主席，地球就不转动、人类就不进步，女人也不生孩子了！

(D) 反对搞宗教神权和个人迷信。把毛主席吹捧上了天，简直是救世主下降。公然象封建帝王一般要天下人在一切场合高呼“万岁！万万岁”！而对于这种肉麻的吹捧，自称为是唯物主义者的人，居然乐意接受而不加阻止。唯物主义者相信人可以活万岁吗？说什么“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今后五十年至一百年是人类社会发生根本变化的翻天覆地的时代”等等伟大的空话，有什么意义呢？在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里，难道还需要一个从根本上推翻或动摇其专政的天

下大乱吗？难道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天下大乱就不能大治吗？再说，一百年内的事就被先知先觉了，那几年之间林彪就打翻身战（仗）的事为何又未曾预见到呢？毛主席由于长期养成了“我说的算数”，故“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只听得好话，吹捧阿谀的话，听不得反对自己做错了的“坏话”。林彪深知此窍，故此任何人都善于紧跟、高呼“最最最最伟大的毛主席，万万万万岁”！像赵高一般又善于指鹿为马，陷害开国功臣（如邓小平、贺龙、谭震林等）。紧紧（仅仅）是由于林彪会“高举”、“紧跟”，会拍马屁，于是主席就把他安置在“法定接班人”、“最亲密的战友”这把金交椅上，从此谁也不敢反对他，也要人民敬祝这个副救世主身体“永远健康、永远健康了”！也仅仅因为这个小丑要陷害主席，于是林彪突然从半空中掉下来变成了“猪屎堆”、“狗屎堆”！

请问：说林彪是亲密战友，是因为他同主席一起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建立了丰功伟绩吗？还是由于他会喊万万岁？说他是狗屎堆，是不是因为他要陷害毛主席？也许有人会说：“他不单是害毛主席，而是想另立中央，复辟资本主义”。

不对！他既是法定接班人，第二个救世主，他就是当今之中央，何曾需要另立！说另立话者，其实自己心中也自立有党中央。复辟资本主义么？老早就在干了。可是就在他搞法西斯主义时，主席还在拍手称赞呢！林彪说打谁，主席点头；林彪说爱谁，主席也表示照办。于是从中央到地方，不是有很多为革命事业忠心耿耿的好干部被打击、排挤、陷害置死吗？不是又有相当多的坏人在文革期间大大地发浅（泄）了一下私愤，大大地捞了一把成了膨胀了的暴发户吗？也许有人说：“我们已经为邓小平、贺龙等这些好人‘反评’了”。“平反”固然应该，但为何又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都怪林彪？

“文革”不是主席亲自发动、领导的吗？有了成绩就写到主席头上，错误、坏事就栽到林彪身上？好一个奇妙的办法！然此法能遮天下人耳目否？姚文元在一篇文章中曾移赐林彪两句诗：“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中山狼”是他代表那个阶级的本性，“猖狂”也是必然的。但“得志”呢？谁让他得志的？谁叫他是亲密的战友？法定接班人？狼吃人该挨打；但放狼出笼咬人的人也该打板子！不要认为自己一切都好，连错的也是对的。正由于过去中央有这种个人完全对了的风气，故传到以下各级党委班子，第一把手哪怕明明白白执行了错误路线，谁也不敢出声反对，反而还只得捧场、紧跟。

我认为上述的话是难听的，但是忠恳（中肯）的。如果主席不是立党为私，不是想把功劳都写到自己（而是党中央）的身上，不是过高地估价自己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那我奉劝主席量大一点，拿出无产阶级大公无私的政治家的高风格出来，主动让位给卓有远见、胸怀大志，有才干的青年人。

十二 关于共产主义社会的探讨

我认为，马克思所设想的共产主义不是，也不可能是到顶的天堂。否则那岂不是说运动就停止了？没有斗争没有矛盾了？这不是又和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相矛盾了？所以：

(A) 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还将在一定的领域行使其一定的职能。国家将不会消灭，斗争将永远存在。生产管理，产品的分配，维持社会治安（不可想象，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每个人，每个时刻都能保持其高度的共产主义觉悟而不干坏事），为着这一切，就必须有一定的行政机构，一定

的纪律制度。而这些，又恰恰是法律的变形（不是法律本质的改变），何况，为要防止在那些行使生产管理权、产品分配权的人身上产生把社会财富据为私有的事发生，纪律也是要的。又由于各民族语言、肤色、血统，以致导致集团的形成、对立、斗争，所以法律也是必要的。

（B）私有观念和私有制，仍然存在于一定的范围，并受到法律的限制。假设在原始公社末期，有一套完整的法律来限制头脑非常简单、掌握着生产管理权、产品分配权的人，产生把财富（猎物等）攫为己有、独占的念头（想法）和做法，那且（岂）不是不会出现私有制吗？由此可见，起约束力的法律是何等的不可不要！所以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法律、国家不会消灭。更由于“汽车是分配给我的”、“妻子是我的、不是你的”这个“我的”、“你的”本身，就是私有观念和私有制在语言文字上的反映。产品分配给个人也就变为个人所有，不可能会有“妻子是我们大家的”语言、事实出现。否则男女的配偶岂不象现在我们所看到的牛、羊群一般不分彼此了？因此，家庭——这个私有制的产物——也将存在。

（C）劳动不会变成生活中的第一需要。不错，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劳动不会再是谋生的手段，但也绝不会成为人们生活中的第一需要。假设是如此，那你每天想去劳动，我也去劳动，大家去劳动，试问，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一个人就可以操纵全世界的机器运转的情况下，这个劳动队伍如何排法？一个人活一百岁，也轮不到自己去劳动一班。那没有享受到这种生活的第一需要的人们，将会如何？吵嘴、打架？

（D）共产主义的文艺又是什么样子？还是不是作为阶级斗争的武器？或只是一种欣赏品？艺术（音乐、舞蹈、诗歌、

戏剧)又以什么现实生活为其表现内容?是不是还起着“教育人民,打击敌人”的作用?果真象马克思所设想的共产主义会实现,那文艺也就消灭了。然而这是不可能的事。故,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学说是完全的,有的带有神秘的宗教色彩。

一九七五年三月一日

简介 李天德(1939年~)，男，出身于四川荣县一个穷苦工匠家庭。幼年丧父，童年丧母，靠大哥抚养读完小学，中学。1956年9月考入重庆大学。在1957年“反右斗争”中，因对当时个别班的反右提出异议，被打成右派，下放到农村“监督劳动改造”。旋因曾与云南籍右派学生在劳改时不堪折磨，谈到想去云南混碗舒心饭吃，而被打成“妄图偷越国境”的“反革命小集团骨干”，于1958年12月被捕入狱，次年被判处5年徒刑。他在狱中阅读了大量马列经典著作和中外哲学、社会科学名著，并开始对大跃进进行反思。出狱后，不放弃忧国忧民之志，1965年底，他写了5幕9场话剧剧本《和平里的战争》，投寄《人民文学》和《剧本》两个杂志。剧本以他亲身经历的重庆大学1957年反右斗争为背景，对建国后一系列政治运动的“整人”性质有所抨击，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1967年7月，又以“现行历史反革命”罪被判6年徒刑。1972年刑满释放后，仍被戴上“反革命分子”帽子在四川苗溪茶场管制劳动。1975年1月全国四届人大提出了建设繁荣昌盛的四个现代化的新中国的

历史任务，确定了以周恩来、邓小平为核心的国务院领导班子人选。他心中燃起希望之火，决定毛遂自荐，上北京献治国安邦的国策。1975年5月5日，他以李笑天的化名写了《献国策——致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这份上书。《献国策》共12条：1. 节制生育，控制人口，优化种族；2. 缩小工农和城乡差别；3. 为农业人口提供社会福利；4. 教育革命问题，大学招生实行文化考试和民主评议结合的择优录取制度；5. 知青下放问题；6. 医疗卫生问题；7. 干部问题；8. 限制干部特权和无能现象，确定人民政治主权；9. 刑法、定罪、治安问题：废除对国家领导人、党的方针政策的“恶毒攻击罪”，加强刑事执法，无罪释放和合理安置1957年大学生右派；10. 重新认识三面红旗、文化大革命、知青下放、教育革命等问题，以及人民公社的乌托邦问题，大跃进祸国殃民问题；11. 领袖的任期与功过问题；12. 关于共产主义社会的探讨。8月，他卖去仅有的蚊帐、箱子和铝锅等全部家产，凑齐路费上北京献国策。他给中共中央、朱德委员长各寄出一份《献国策》，又闯新华门想见邓小平副总理面呈一份，被北京市公安局以现行反革命罪逮捕，押回四川。1976年3月他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1979年2月无罪释放出狱。后被安置在雅安汽车配件厂技工学校任教。因反映不正之风，遭上级主管部门负责人嫉恨，又被强加“七大罪状”，雅安地区公安局决定将其调往泗坪并限令其“长期在泗坪”。1983年3月，李天德写信给中共中央组织部反映自己所受迫害，得到批示。但主管负责人仍以“政治思想上有自由化倾向”的罪名被驱出属于公安部门的雅安汽车配件厂，1984年元旦被调往雅安矿山机器厂。1984年3月，他上书胡耀邦和王兆国，申诉自己的处境。得到胡耀邦的重视和亲自

批示。在胡耀邦的关怀和过问下，中共四川省委组织部派工作组前往调查，证实李天德被人罗致的“七大罪状”纯属诬陷。8月，雅安地区中级人民法院改变释放时的判决，为其彻底平反。1984年7月，李天德被任命为雅安矿山机器厂副厂长。1985年4月，《献国策》为中国革命博物馆作为“珍贵的革命文物”收集并展出。李天德现在中共四川自贡市委政策研究室工作。

附：

九死一生献国策

叶永烈

“反革命”万言书存入革命博物馆

《人民日报》海外版上一则短讯，像一星灿烂的火花，从我的眼帘中闪过：

本报讯，四川省雅安地区一位名叫李天德的知识分子，一九七五年写的致中共中央、国务院的万言书——《献国策》原件，最近被中国革命博物馆作为革命文物收藏。《献国策》的核心是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当时，李天德因写这份万言书被“四人帮”打成现行反革命，判处死刑，后经雅安地区中级人民法院改判为有期徒刑二十年，直到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才得到平反。……

飞机。火车。汽车。千里迢迢，我从东海之滨的上海，

赶到西南古城雅安——当年西康省的省会。

在雅安地区中级人民法院，我见到了刑二庭庭长杨正全。他曾为李天德平反冤案，熟知详情。他用一口浓重的四川话兴奋地告诉我：“一九八五年四月，我们收到中国革命博物馆的来信。信中说，李天德的《献国策》是珍贵的革命文物，他们要征集、收藏原件，希望得到我院的支持。我们经过研究，同意把《献国策》原件移交中国革命博物馆，让千千万万的人——特别是那些没有经历过‘文革’磨难的青少年，从中得到教育。”

“你们手头有《献国策》影印件吗？”我赶紧问道。

“你可以在这儿看到原件。”杨庭长告诉我，“李天德当时把《献国策》抄写了三份。其中两份投邮寄往党中央，一份亲自送往当时的中央办公厅接待站。这三份原件都在——十年前，那是作为李天德进行‘现行反革命活动’的重大罪证保存的。这次送交中国革命博物馆，只是其中的一份原件。”

就这样，我在封面上赫然写着“案由：反革命”的案卷里，有幸全文拜读了《献国策》原件。这是一篇以生命为代价写下来的征讨“四人帮”的檄文……

震聋发聩、力透纸背的《献国策》

笔写下来的，斧头也砍不掉。在和煦明媚的春日，读着在一灯如豆的寒夜中写成的万言书，我的心中充满着对作者的敬意。他超越了时代。他的许多真知灼见，即使在挣脱了“四人帮”的禁锢后的一九七七年、一九七八以至一九七九年，也未必为人们所接受。《献国策》的作者具有政治上的

火眼金睛。

端端正正的字，写在二十二页五百字方格稿纸上。首页写着“献国策——致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

《献国策》锋芒所向，直指那场“好得很，就是好”的“文化大革命”。他指出：

“关于文化大革命，我认为是完全不必要的，坏处大大超过好处。

“〔A〕我们的许多好干部受到林彪一类的迫害。

“〔B〕我们的人民遭到前所未有的愚弄，受了坏人的唆使，像仇人一般互相厮杀。

“〔C〕让林彪一类大小坏蛋捞了便宜。小坏蛋搞打、砸、抢、抄、抓、奸淫、烧杀；大坏蛋搞阴谋诡计、篡党、夺政、搞法西斯主义。为一切仇杀、个人报复大开绿灯。

“〔D〕国民经济遭到建国以来仅次于‘自然灾害’年的空前大破坏。中央当然不可能知道文革期间中全国工农业产值的真实数目。

“〔E〕在精神道德方面，由于林彪搞的神秘主义宗教迷信，极权崇拜，使人们变得不诚实、伪善，变得奸滑。……”

他还进而从“文革”上溯“三面红旗”和反右派扩大化，痛斥种种“左”的所为：

“关于三面红旗，虽然有人极力肯定，但我要否定。……人民公社是‘共产’风，大破坏，乌托邦的狂热。……层层的干部弄虚作假，谎报成绩，欺下瞒上。……大跃进的第二个年头（五九年）一切工农业产品减少，到了六〇年，就变得奇缺。……彭德怀的意见是对的、正确的。”

“大学生右派一律无罪释放。对治理国家大事确有独特

进步见解者，可担任国家干部。”

他那犀利的笔锋，触及当时人们讳言的个人迷信，要求正确评价毛主席的功与过，尖锐地指出毛主席晚年的严重错误。

他建议废除干部终身制，明确提出“中央主席，不得连任二十年”。“总理、‘人大’委员长和各部委，任职均不得超过十五年”。他认为：“这样做，即（既）避免了形成个人专制和宗派集团，也造就了更多的国家领导人，让人民中的更多的优秀人物都有机会管理国家事务。”

他在万言书中，提出整整十二个方面的国策。

在同一案卷里，我又读到十年前——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四日雅安地区中级人民法院的《对现行反革命李天德审理总结》，我的心一下子收紧了。

“李犯天德曾因反革命犯罪两次判刑，不思悔改，公然流窜到首都，疯狂进行反革命活动，实属罪大恶极、屡教不改、死心塌地的反革命分子。建议判处李犯天德死刑，立即执行。”

人妖颠倒，明珠暗投，革命志士李天德险些被作为“反革命分子”押上断头台。九死一生，劫后幸存，我终于找到了依旧健在于人间的李天德……

他追求光明，但被投进了黑暗

一个中等身材、瘦削的中年人，穿着一身旧的蓝色公安制服，向我走来。他，就是李天德。看上去普普通通，只是眼角、嘴巴的皱纹使他显得比四十七岁更苍老一点。

“我的青春年华，是在铁窗下度过的。”他长叹一口气

说，“一九五八年，我才十九岁，就被错划为‘右派’。当年被捕入狱。此后，在漫长的二十年中，我的身份一直是‘囚徒’、‘反革命’、‘现管分子’。直到一九七九年二月十七日，我才被摘掉了‘反革命分子’的帽子，但是仍然给我留下了一条，‘有政治错误’的尾巴。在一九八一年国庆节，我四十二岁了，这才结婚，有了小家庭。艳艳出生的时候，我已经四十三岁了。如果不是粉碎“四人帮”，如果没有党中央的领导同志对我的关心，我今天还在监狱里。尽管我一生坎坷，甚至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还有人整我，但是，我从来没有动摇过对党的信念。我在监狱里的漫长的日子，就是全靠坚信党才挺了过来……”

一九三九年，李天德出生在四川荣县李子乡，父亲李佛海靠染布为生。他才二岁，父亲就被日本飞机炸死。母亲是文盲，在他十一岁时死去。靠着大哥的照料，他才艰难地念完小学、中学。他十二岁入队，十五岁入团。高中毕业后，做了一年中学代课教师，终于在一九五六年九月戴上了重庆大学校徽。

虽然他念的是冶金系，却酷爱文学。他担任了系学生会宣传部副部长，写过诗，演过京剧《捉放曹》中的陈宫……他，沿着“红领巾——共青团——布尔什维克”的道路前进。他，向往的英雄是卓娅、马特罗索夫、邱少云、黄继光、吴运铎。他，读了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斯大林的《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他，是五十年代纯真向上的大学生中的一员。

然而，一九五八年三月，他的书桌上，他的宿舍里，被贴了许许多多触目惊心的标语：“警告你，狡猾的狐狸李天德！”“反党分子李天德必须低头认罪！”……

他被戴上“右派分子”帽子，保留学籍，劳动考察。我在一九七九年二月十四日中共重庆大学核心办公室所发的一份平反文件上，查到如下的话：“在五七年反右中，李天德对当时个别班的反右斗争提出了意见，写了三张大字报和一些诗。根据中央一九七八年五十五号文件 and 中央一九五七年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六条标准》衡量，不是右派言论。原划李天德为右派骨干分子实属错划，应予以改正，恢复政治名誉”。然而，这份平反文件发到李天德手中时，他已步入不惑之年了！

祸不单行。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十五日，在重庆南桐矿区分下放劳动的李天德，正在吃力地背着铁矿石，突然，他被叫到操场上开会。重庆市公安局派人出席大会，当众宣布逮捕四名反革命小集团骨干分子。李天德刚听见念到自己的名字，双手就被冰凉的手铐反铐起来。从此，手铐脚镣如同家常便饭。

一九五九年三月十七日，他被判处五年徒刑。罪名相当可怕——“妄图偷越国境”！原来，他被划为“右派”之后，跟几个“右派”学生一起劳动。其中一个云南籍的“右派”学生说他的家乡土地肥沃、气候温暖，大家不如到那儿混口饭吃，起码比“监督劳动”要自由自在些。不料，打算去云南被说成“妄图偷越国境”，打成了“反革命小集团”。

逆境中冰水般的生活，没有使他那颗火热的心变冷，别的犯人觉得狱中的时间格外漫长，度日如年，无处打发那无穷无尽的时光；他却深感光阴似箭，分分秒秒一去不返。白天，他给犯人们上机械制图课，为制造小火车头而设计夹具，搞工艺；夜晚，他把时间花费在苦读上。他读了《毛泽

东选集》，读了《资本论》，反反复复研究了《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还读了黑格尔、亚里士多德、费尔巴哈、康德、尼采等哲学名著，写下数十万字的读书笔记。

读了大量的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他心明眼亮。在许多人沉醉于“大跃进”狂热之中的时候，他的头脑十分冷静。他在一份《反省书》中，写下了鞭辟入里、透云穿雾的文字：

“对于我个人的言行，勿需反省，历史会作出公正的结论。我坚持我自己的观点，这就是：

“（一）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实事求是，各国共产党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必须结合本国的实际，搞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

“（二）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不是阶级斗争，党的主要任务是大力发展生产力，搞好经济建设，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反‘右’运动把阶级斗争放在第一位，这是违背‘八大’路线的；

“（三）总路线的提法含有极左因素，反映了一部份群众中的冒进情绪，违背了我国现阶段的客观条件。‘大跃进’、‘公社化’、‘反右倾’斗争便是这条路线‘左’倾因素的产物。”

《反省书》交上去了，“顽固不化”、“坚持反动立场”的大帽子扣了下来。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五日，李天德终于刑满。但是，他的头上依旧戴着“反革命分子”帽子，留厂管制就业。

一九六五年底，他写了五幕九场话剧剧本《和平里的战争》，投寄给《人民文学》和《剧本》两杂志。剧本以他亲身经历的重庆大学“五七风云”为背景。一九六七年七月二

十四日，四川省石棉县人民法院判处他六年徒刑。判决书上这样写着：“李犯天德借写剧本为名，大肆散布右派分子向党进攻的反动言论，污蔑、攻击党的各项政策，污蔑‘五反’、‘肃反’搞糟了，妄图反革命复辟。……”

在法庭上，李天德面不改色，从容自若。因为他早已听惯这类“大批判”词句，他坚信：真理决不是权势的儿子。

“一时强弱在于力，千秋胜负在于理”！

在困难当头的日子里他忧国忧民

一九七五年春天，李天德仿佛与往昔判若两人似的，变得十分“积极”：干活抢在头里，连星期天也不休息。一向“顽固不化”的他，忽然常常找干部汇报思想，“检查”自己的“错误”……“顽石”点头了！

就在管教干部的表扬中，李天德递上了申请回家探亲的报告。跟他同住多年的犯人，第一次听他说起，他还有家！

他，一九七二年十月刑满后，仍然戴帽，在四川苗溪茶场管制劳动。在将近二十年的监禁生活中，他不敢跟哥哥、姐姐联系，生怕祸水横流，牵连兄姐。在漫长的岁月里，兄姐甚至不知道他是否还在人间。

此时此刻，他为什么萌发了思乡怀亲之情？

天天细心阅报的他，在一九七五年一月中旬关于四届人大的报道中，读到了确定以周恩来、邓小平为领导核心的国务院人选，燃起了心中的希望之火。

他打算仿效毛遂自荐，前往北京献国策——他在狱中思索多年的心血结晶。尽管他人卑言微，但是他决心以自己细弱之力尽匡正时弊之责。

他深知此行凶多吉少，无异于自投罗网，但是，与其庸碌碌而生，不如壮烈烈而死。他记起文天祥的名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他记起《国际歌》震撼人心的歌声——“这是最后的斗争”！

世伪识忠贤。他身在囚笼，心怀华夏。他常常在小板床上辗转反侧，夜不能寐，构思着《献国策》。

只能记在心里，不能形诸笔墨，因为他身处那样的逆境，被剥夺了言论的自由。他更无法从苗溪把《献国策》寄往北京，因为他的一切信件要经过检查才能付邮。

唯一的办法是亲自冒死晋京，递送《献国策》。

要进京，必须设法从劳改茶场脱身。于是，他想到了申请“探亲假”——他毕竟近二十年来未探亲。

要探亲，必须表现“积极”。要进京，必须积攒路费。从成都到北京，硬座票也要三十元五角。他每月才二十九元工资，除去十六元生活费，每月省下七元。好不容易，才悄悄积存三十多元钱。

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盼来了探亲假——总共十天。

此行必死无疑。然而，启程前，他不动声色。他把蚊帐暗地里抵给别人，换了八元钱，一床被子换来五元钱，一只箱子换了五元钱，一口铝锅换了二元钱——他抵押了他的如此“全部家产”，不过换来二十元钱而已！

踏上旅程的刹那，形销骨立的他，心境是极其复杂的：他欢欣，终于成行。他忧愁，忧国忧民。他焦急，急于把腹稿付诸于笔端。他痛楚，自知飞蛾赴火，难免杀身之祸。真的如同打翻了五味瓶似的，他的心中说不出是什么滋味。面对“四人帮”的高压政策，敢怒者众，敢言者寡。他敢怒而敢言，置生死于度外，喊出人民心声。

他计划中的头一桩大事，就是把《献国策》赶紧写出来。要写万言书，得找个地方住下来。他来到成都，在老南门总算找到一个住宿费最低廉的红星旅馆，十几个人睡一个大铺，每夜三角钱。他又花了三角钱，买了一刀方格稿纸。白天，趁别的旅客外出办事，他躲在旅店里写作。

才住了一天，他就发觉那里不安全。因为民兵查铺查得很紧。他的身边既没有工作证，也没有户口簿，只有劳改农场开的探亲证明——正是民兵重点盘查的对象。万一被查出《献国策》，那就糟了！

没办法，只好搬到新南门旅馆去住。那里六个人住一个房间，民兵不大“光顾”，不过要五角钱一天——对于他来说，是相当可观的支出了。

白天，他躲进离新南门不太远、在四川大学附近的望江公园里。竹林茂密、幽静，倒是写作的好地方。可是，在公园里写东西，游人一走近，他就不安心，仍旧写不成。

想来想去，还是躲到旅馆里写。白天，旅客们都出去了，他关门写作。写好一页，就往床板底下塞。为了以防万一，他的稿纸旁放着红色的语录本，还写了好几页学习毛主席著作体会，随时可用来遮住写作中的《献国策》。

写出初稿以后，反反复复地修改，端端正正地抄写了三份。然后烧毁了草稿。那三份《献国策》，用塑料薄膜包好，塞进随身所带的一件破棉衣里……

为了《献国策》，他真的被打入了地狱

北京。陶然亭公园对面的永定门车站。子夜，一个疲惫不堪的男人，坐在候车室的长椅上，呼呼甜睡。他就是李天

德。

他是在八月十二日到达北京的。一下火车，他就直奔新华门——那是他在梦中思念已久的地方，国务院的神圣大门！他听说过，周总理、邓副总理坐的是红旗牌轿车，就向人详详细细打听红旗牌轿车是什么样儿的。他打算当红旗牌轿车从里面驶出来的时候，上前拦车，当面向首长呈送《献国策》——他生怕邮寄到不了周总理、邓副总理手中。

新华门毕竟门卫森严。他不敢在门口滞留。装成一个普通的行人似的，从门前走过。过了一会儿，赶回来，又从门前走过。走了几个来回，仍不见一辆浑身乌黑、车头镶着透亮红旗的轿车。不知道是由于心里紧张，还是真的如此，他似乎觉得有人在注意他。

他不得不赶紧走开，步行到永定门车站过夜，打算第二天再去新华门等候。

然而，候车室里曾遇到过一场盘查的虚惊，使他意识到必须加紧行动，意识到那件破棉衣并非“保险箱”。第二天清早，取出了三份《献国策》，扔掉了破棉衣。他把其中的两份，用纸包好，一份写“中共中央收”，一份写“‘人大’常委会朱德委员长收”，投进了永定门车站邮筒。

他怀揣着最后一份《献国策》，又向新华门进发，他知道周总理正身罹重病，住在医院。他决心无论如何要面见邓小平副总理，递上《献国策》。

新华门红色的大门敞开着，警卫守候两侧，显得那么庄重。他又在门前走过来，踱回去，依旧不见红旗牌轿车的影子。他下定决心，径直朝敞开的大门走过去。

警卫拦住了他，问清事由后，由一位工作人员领着李天德，来到了太平街八号接待站。门口，站着的、坐着的、半躺

着的，挤满了操着各种口音的人，都是进京上访的。

李天德想离开这里，因为他明白在这里不可能见到邓副总理。但是那位工作人员一直陪着他，使他无法走开。一直到下午四点多，终于轮到李天德。

接待室里，坐着一个女接待员，说的倒是一口四川话。

“什么事？”

“我从四川来，要面见邓副总理，送一份文件。”

“你把文件交给我，我可以代为转交。”

“我一定要面交。”

“交给我就行，我一定给你转交。”

李天德终于掏出了《献国策》，交给女接待员。

她当即开阅。起初，她的眉头皱了一下。接着，脸拉长了。紧接着，她满脸愠怒，用恶狠狠的目光扫视了一下李天德。

“你坐在这儿等着。不许走开！”她用命令般的口气，冷冷地说道。

李天德意识到大祸即将降临。但是，他镇定自若地坐在那里。如同《老子》七十四章所言：“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他正是以“杀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的英雄气概，决心燃烧自己，照亮别人，这才不远千里晋京死谏。逆境是一面筛子，弱者早已筛去，强者才留存下来，才会坦然坐在接待室的椅子上。在那“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的年月，他宁直毋曲。

晚上八点，呼啸的警车把他押往北京市公安局审讯室。他落进“四人帮”爪牙之中。

长途电话从北京打到了四川苗溪茶场核査……

一九七五年八月十九日，北京市公安局以现行反革命罪

逮捕李天德——这是他平生第三次接到逮捕证了。八月二十八日，四川派出的四名公安人员，抵达北京。翌日，李天德被用囚车送到北京站，押上火车。他双手戴着手铐，铁链把手铐紧紧锁在车厢的茶几上，两边坐着佩枪的公安人员。就这样，他“免费”坐上南下的火车，回到四川苗溪茶场……

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四日，“建议判处李犯天德死刑，立即执行”，已明明白白写在雅安地区中级人民法院的报告上。

但也有人指出：李天德终究是亲自进京直接向中央献万言书。除此之外，他未向任何人阐述他的政治见解。判处死刑未免过重。

判决书终于正式下达了。李天德以“反革命罪”，被判处二十年有期徒刑。刑期自一九七五年八月十九日被捕算起，至一九九五年八月十八日止。

如果不是发生在十年前的“十月革命”，李天德迄今还身陷囹圄……

宜人的春风与料峭的春寒

难忘的一九七九年二月十七日。这一天，雅安劳改大队接到雅安地区中级人民法院的通知书：“现押你队李天德，经我院改判无罪释放，摘掉反革命分子帽子。特送上判决书一份。……”

李天德像冲出囚笼的小鸟，奔向邮电局。

当他写好给姐姐的电报，递给营业员，顿时整个邮电局轰动起来：

“你就是李天德！”

“你从三元宫（监狱所在地）里出来啦！”

“如果不是粉碎‘四人帮’，你连命都没有喽！”

一张张笑脸，一双双热情的手，使李天德第一次感受到春天的温暖。

就这样，李天德终于重见天日。

根据李天德的专长，他被分配在雅安汽车配件厂技工学校担任教师，教机械制图和工程力学。这家工厂是劳改工厂，隶属公安部门。本来，李天德判刑后，他就在这家工厂里劳改。如今，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他穿上公安警服，成了公安干部。

一九七九年八月，他被任命为校务主任。

饱受三九寒彻骨的人，最知春日春风暖人心。

不料，即使在春回大地之时，也会有春寒料峭。

春寒料峭使李天德再度陷入困境。

一九八三年二月二十七日，雅安地区公安处作出了错误的决定：“李天德同志已不适合作公安劳改工作，应调出劳改单位，另行安排工作。”

调令下达了。李天德被调离公安部门，调往远离雅安的泥巴山脚下的泗坪。调令上特别注明，李天德今后“长期在泗坪”。

事出有因。李天德在出狱之后，依然还是那般刚正不阿。他看不惯不正之风，曾向上级反映。如同捅了马蜂窝，有人把他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于是，趁整顿公安队伍之际，便抓住他的“尾巴”，把他赶出公安部门。

所谓“尾巴”，是一九七九年二月为李天德平反时，限于当时的认识水平，还不能完全理解李天德在《献国策》中对“左”的尖锐批评，在平反结论中虽肯定了李天德的革命

热情，但仍保留着“对党的方针政策有曲解，是有政治错误”这样的“尾巴”。

逆风起，浪连浪。很快的，波及到雅安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党组成员杨正全同志——李天德作为县人民代表候选人，是他提名的。

杨正全正气凛然，仗义直言：“在国难当头的时候，李天德能够写出《献国策》，他的爱国热情是难能可贵的。我是依据国家法律为他平反。他平反后，不再是劳改犯，而是公民。宪法规定，公民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我提名他为县人民代表候选人，是符合宪法规定的。在选举中，李天德的得票数大大超过其他候选人。他是通过公民选举当选为县人民代表的，这也完全符合法定手续。我作为人民法院的一位工作人员，依法办事是我的天职。”

杨正全在歪风邪气面前不低头，不弯腰，坚决维护法律的严肃性。

李天德向来嫉恶如仇，无所畏惧。然而，如今有了爱妻娇女，他不能不为她们考虑。李天德决定向党中央反映情况，他对妻子说：“春华，如果我出了事，你一定要跟我离婚。把女儿交给我姐姐……”妻子在严峻的考验面前，如同荷花一般高洁，如同竹子一般刚直，她坚强地说：“你要是出了事，我就带上孩子进京告状！”

阳光下的小事

一九八三年三月，李天德在多次向雅安地区公安处和地委某领导反映情况而无济于事之后，寄出了写给中共中央组织部的信。

中组部领导同志十分重视这位历尽苦难的知识分子的呼吁，在信上作了重要批示。

四月，四川省委组织部接到批示，当即电告雅安地委有关部门，要求认真调查李天德和他的《献国策》情况，认真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下旬，雅安地区公安处才送上了一份“调查报告”。这份“调查报告”列举了李天德“政治思想上有自由化倾向”等七个问题，坚持要把李天德清除出公安队伍，还指责了雅安地区中级人民法院“错误”地推荐李天德为人民代表候选人。

就在这时，公安部门的雅安汽车配件厂党总支对李天德作出了最后的决定：“停止工作，停发工资，限期离厂。”

李天德终于被驱出公安部门，于一九八四年元旦调往雅安矿山机器厂，做一名普通的技术员。

实在忍无可忍，李天德于一九八四年三月，写信给胡耀邦、王兆国同志，倾吐了内心对“左”的愤懑……

在李天德发信后的第八天，就清晰地听到来自党中央的亲切回音！

四川省委组织部长冯振伍同志调阅了《献国策》，不由得拍案叫绝，连声道：“好，好，真是个难得的人才！”

雷厉风行，省委组织部派出了工作组前往雅安仔仔细细地调查了李天德一案。他们发现，那些网织李天德七条“罪状”的人，居然没有读过《献国策》，这位对党赤胆忠心的知识分子，竟然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重遇“左”的打击！

为了认真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一九八四年七月，冯振伍部长亲赴雅安。

七月二十五日，雅安地区公安处政治处写出了《关于

对李天德同志问题进行复查的情况报告》。八月七日，雅安地区中级人民法院（84）法刑申字第83号刑事裁定书，彻底纠正了给李天德留“政治尾巴”的错误，指出原裁定书中写有李天德“‘对党的方针政策有曲解，是有政治错误’的结论不当，应予纠正，特此裁定”。

恶风险浪终于过去。党的阳光，照进李天德心中。他双喜临门：

一九八四年七月，被任命为雅安矿山机器厂副厂长；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他被批准为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下旬转正。

李天德貌不出众，言语朴实，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一棵平平常常的小草。我跟他久久地促膝而谈。他说，一次又一次的蒙冤受屈已成为过去，他的目光注视着未来；宝贵的青春年华已在历史的误会中耗尽，他要抓紧有限的分分秒秒为党为国竭尽全力。

历史是公正的，最终承认了《献国策》的真正价值，存入了庄严的中国革命博物馆。然而，他的作者却不止一次地对我说：“《献国策》写得太肤浅了，太幼稚了……”

面对中国的未来，他正陷入新的更深刻的思索之中……

朱锦多关于张春桥、江青等人问题 上毛泽东书

毛主席老人家，您好！

汇报四点看法，供参考。

一、张春桥不是一个光明正大的共产党员，他是林彪复辟资本主义的党内基础，现在他要做的首先不是教育人家，而是解剖自己，把思想上的阴暗面公之于毛主席，公之于党。今天毛主席还健在，他改正错误的机会很好，否则，一害党，二害人民，三害自己。

二、上海民兵的编制情况和装备情况不仅要上报中央，而且要让毛主席和全体政治局同志都详细知道。它的领导权应无条件地归于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

三、有些人惯于反面文章正面做，他们上欺老，下骗小，他们比林彪有“远见”。他们正在积累力量，一旦“大树”倒了，就要兴风作浪，对于这些危害革命的“革命者”，我们不能不引起注意。

四、毛主席、周总理二位老人家的衣食住行，要成为全党全国人民关心的大事，二位老人家健在一天，我们的事情就好办一天。我们要时时提防“无毒不丈夫”，我们要时时注意这“万一”。

祝老人家身体健康！

朱锦多

1975.8.3

毛主席老人家，您好！

您对《创业》的批示于本月二十三日知道。联想很多，有个问题很令人发闷，为什么某些人总是为江青唱赞歌呢？为什么把她捧得如此完美无缺呢？他们这么干是出于对江青的尊敬和爱护吗？看来不是。他们可能是另有用心，他们可能是“借助吕后”，“欲霸天下”。我也许是“杞人无事忧天倾”吧，但是许多迹象不能不驱使我这么想，我们要考虑到主席百年之后。我们是党和毛主席培育下成长起来的新一代，我们不能让老一辈开创的大业付之东流，我们要时时警惕资本主义复辟，我们要时时警惕修正主义上台。今天主席还健在，许多事情好处理，我们十分珍惜今天，我们也十分警惕着明天。

祝老人家身体健康！

朱锦多

1975.8.26.

简介 朱锦多（1945年5月～）江苏泰县人。1954年上中国海员子弟小学，这是一所公费学校。1958年上光辉中学。他自小对共产党毛泽东主席有感恩之情。1966年“文化大革命”初期，曾以“忠于毛主席”的虔诚态度加入红卫兵。他1968年上山下乡，后被工厂招工，参加工作，又调入上海越剧团。1973年7月至1975年8月，先后二次上书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揭露张春桥、江青等人的问题。

“文革”前陈毅曾任上海市长，在上海人心中地位很高。中共“九大”前后，张春桥到上海，在一次电视讲话中公然以“革命左派”自居，污蔑攻击陈毅。引起朱锦多的议论和不满。陈毅去世，毛泽东亲自参加追悼大会，朱锦多对此深为感动。但张春桥等人依然攻击陈毅“不会打仗，只会写几句歪诗，是常败将军。”并多次攻击其他没有被打倒的中央领导人。以张春桥为首的“上海帮”在上海横行霸道，不可一世。

1973年7月28日，朱锦多冒死上书，给毛泽东主席写了第一封信，揭发张春桥背着毛主席和党中央，攻击陈毅和中央其他领导人的问题。1975年春夏间，社会上到处流传着有关江青、张春桥等人的“小道消息”，这触发了朱锦多内心的强烈共鸣和对上海一系列社会现象的思考，尤其对他们在上海民兵建设中自立体系，与解放军部队对立，很有看法，他担心“上海帮”会拥兵作乱，祸国殃民。1975年8月3日，他再次上书毛泽东，提出自己对张春桥一伙在上海所作所为的四点看法。就在这封信发出后没几天，8月23日，上海越剧团正式传达了毛泽东对《创业》的批示。大家喜气洋洋，对江青的恶劣行径议论纷纷，朱锦多和同宿舍的邹建国一直谈到深夜：为什么工农兵都说《创业》好，有人偏给它加上十大罪状？毛泽东的批示打中了江青，为什么张春桥之流把江青捧上了天，还要我们文艺工作者为江青“争气”？联想到批林批孔、评法批儒时，江青对汉朝吕后那么大的兴趣，对其大肆吹捧，这里面有没有阴谋？他们担心毛泽东主席百年之后党和国家的命运。三天以后，朱锦多再次给毛泽东写信，汇报自己对张春桥、江青等人的上述看法。同一天，他还把同样内容的另外三封信，分别寄给周恩来和中央其

他领导人。他在前后六封信上，都写明自己的姓名、地址和工作单位。很快，他以“恶毒攻击中央领导同志”罪被“依法拘留”，受到残酷的肉体和精神迫害。剧团里他周围的同事也受牵连被“严格审查”。

“四人帮”倒台后，1976年11月26日，《文汇报》报道了朱锦多受政治迫害的情况，他很快被释放出狱，成为“四人帮”倒台后全国第一个得到平反的人士。此后被封为全国青联委员、文联代表、政协委员、上海越剧团副团长等职。因他在1981年8月全国政协会议上，自动上台发言对决议表示不同意见，打破当时政协会议不发异议的惯例，次年被免去政协委员等职。1983年秋，他辞去上海越剧团副团长的职务。现仍在该剧团工作。

(编者)

附：

多难之邦忧国难

朱锦多

一九四五年五月，我出生在江苏泰县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八岁那年，在上海当码头工人的伯父带我到上海。第二年，我便进了中国海员子弟小学念书。这是一所专门接纳贫苦海员子弟及码头工人后代的公费学校。对共产党的感情和对毛泽东的崇敬，是我跨进这所学校后产生的。

一九五八年，总路线的口号响彻神州大地，十五年赶超英国，共产主义社会即将到来的美景振奋着亿万贫穷的中国

人，这年九月，我进入光辉中学学习。由于优异的学习成绩和积极参加扫盲等各种社会活动，我被破例（年龄未到）吸收为共青团员并兼任少先队大队长。“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成了我的人生指南。报纸的宣传、老师的教导、党团领导人的指示，我都深信无疑。一九五九年暑假，我回泰县老家度假，一个活生生的事实令我茫然不知所措，当母亲从公社食堂打饭回来时，只见瓦盆内的麦粉粥稀清照人，上面浮着几片黄菜叶，我问母亲：这是偶然一次吗？母亲说：“公社刚成立的几天，食堂曾烧过几顿干饭，并叫大家把饭端到公路边上去吃，后来，就一直吃稀饭，并且越来越稀了”。望着全家七口人各自捧着的那碗清汤，我的心灵受到了一次巨大的撞击，报纸上不是明明白白地写着公社的优越和社员的富裕么！校长和老师不也是这么说的嘛！怎么眼前……回上海后，在一次偶然的场合，我脱口说了几句家乡的情况，不知怎么搞的，团组织很快知道这件事。如果不是我的成绩优异和一贯的良好表现，我的团籍肯定保不住。但我的档案里已留下了那么一笔，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

一九六六年，中国爆发了“文化大革命”。二十一岁的我被无情地卷入政治漩涡，面对着全国性的整人运动和对各级共产党组织的否定，我感情上怎么也接受不了，对身处逆境的人们，我表示了极大的同情。记得有一次晚上，我发觉一位被隔离的干部披头散发、呆呆地伫门而立，我担心她自杀，在窗外足足守候了几个小时，直到她关灯躺下，我才回宿舍睡觉。形势的发展使我无法理解，为什么中央对那些无法无天的造反者一再怂恿支持。我千方百计试图从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及红旗杂志、人民日报的社论中找到有利于保守派的字句，但都事与愿违。“一月夺权”风潮中，造反派的胜利

使自己第一次尝到了政治失败的痛苦。这以后，我下农村进工厂入干校，默默地拚命干活，我要用汗水向胜利者显示：我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

一九七五年春夏间，社会上到处流传着有关江青、张春桥等人的小道新闻，这触发了我内心的强烈共鸣和对上海一系列社会现象的思考。毛泽东对电影《创业》的批示，激发了我上书毛主席的念头和勇气。一九七五年八月间，我先后二次写信给毛主席，陈述了自己对一些问题的疑虑和看法。民间有种说法：“三十三，乱刀斩”。一九七五年九月九日，我被拘留审查，时年三十三岁。

在狭窄拥挤的牢房里，我常常为失去自由而苦恼。可又常常反问，在外面的人们又能比我多多少少自由呢？想到这里，焦躁的心情反而平静了。狱中最主要的活动是背监规及毛泽东选集。《敦促杜聿明投降书》、《南京政府向何处去》等几篇文章是一定要背的，看守员说这些文章能促使犯人改造思想交待罪行。好吧，背文章以消磨白天的时光倒也不错。不几天，我把文章背得滚瓜烂熟。每当夜深人静之际，不免会思念家人，特别是白发苍苍的老母亲闪现在眼前时，深深的愧疚会令我痛苦不堪。在中国这个国度里，那家出了反革命分子，那家就注定要遭受无穷无尽的折磨，想到这里，我就感到不寒而栗。

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十六日，《文汇报》头版通栏标题，报道了朱锦多遭受政治迫害的事实。我有幸成了全国第一个得到政治平反的人。同年十二月中旬，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台、及全国各大报纸均在显要的位置报道了我的情况。强大而有效的宣传，在二十四小时之内，就使一个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反动分子”变成了轰动全国的“无产阶级

反潮流英雄”。全国青联委员、全国文联代表、全国政协委员等等桂冠重叠在我头上，党政各级领导人对我表示了极大的兴趣和亲睐。如此快速的移位，使我很感不适应，眼花缭乱的现实令我晕头转向，我以为我得到了自由，我以为我得到了民主。都三十多岁的人了，还是那么幼稚、天真和轻信。这实在是我的最大不幸！

一九八一年八月的一天下午，人民大会堂灯火辉煌，会议大厅的走廊及过道内排列着供委员发表意见的话筒，二楼的一侧，外国使节和记者的长焦照相机摄像机正在搜索着会场里的有价值的镜头。大厅里洋溢着派民主气氛，当播音员读完一份决议文件后，大会执行主席宣布：“委员如有不同意见请发表”。我鼓足了勇气走向邻近的话筒，当我吐出第一句话的第一个字时，执行主席也同时讲话了，请委员举手表决和对决议文件不满意的声音同时混响在会场的空间，整个大厅内出现混乱。这种混乱证明：我们的党政领导人是多么地缺乏民主意识，他们过惯了我说了算的政治生活，在他们眼里，台下的几千个代表或委员，只不过是一架表决机器而已。那天晚上，在团中央的一次宴会上，一位外宾问：“今天下午大会上发言的那位年轻委员会不会遇到麻烦。”我们的团中央书记毫不含糊地说：“发表不同意见是那位委员应有的权力，他不会遇到麻烦”。第二年，我头上的桂冠稍稍地被摘掉了，没有任何领导人找我谈过话，也没有任何一级组织向我说明解职的原因。我确实没有遇到什么麻烦。

一九八三年秋，我辞去副团长职务，报名参加文化局举办的艺术管理班学习二年。当我重新翻开记载几千年中国历史的书的时候，从字里行间庞然大悟的发现了“安份守己”

四个大字。这不正是几千年中国历史的结晶吗！这不正是中华民族繁衍生存的根本吗！而我却违背传统忘记根本，成了一个背祖忘典的不肖子孙，我能怨谁呢？如今已经四十六岁了，也许还能活上十年二十年，慢慢去吞咽自酿的苦果吧！

1989.3.10.

刘冰等4人就迟群、谢静宜问题

上毛泽东书

小平同志转呈主席：

我们是在清华大学领导班子中工作的几个共产党员。自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七日，在您老人家亲切关怀下，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开进学校，贯彻执行您的革命路线，学校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现在学校教育革命形势很好，广大干部和教职工为之欢欣鼓舞，目前正在贯彻执行您的三项指示，为把教育革命搞好而努力工作。

迟群同志随宣传队进校，做为学校的主要负责人，我们就同他相处共事，前几年他的工作是努力的，群众反映是好的，对于他所传达的中央和上级精神，我们一直是认真领会坚决执行的。但是，近几年来，迟群同志在赞扬声中经不起考验，没有自知之明，也没有知人之明，思想和作风上起了严重变化，官做大了个人野心也大了，飞扬跋扈，毫无党的观念，搞一言堂，搞家长制，资产阶级生活作风越来越严重，背离了主席接班人五项条件的要求。

由于清华所处的地位和对外影响，一年多来，我们的心情十分沉重，为了党的事业，我们从维护大局出发，对迟群同志的问题总是尽量在我们几个主要负责人内部解决，对于他从爱护教育出发，多次劝说和帮助，谢静宜同志也对他做

过严肃认真地批评，但他拒不接受，却一意孤行。学习了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他口头上说要改正，但实际上没有什么变化，越来越糟糕。我们本着对党的事业负责的态度，向您老人家如实报告，请求中央派人解决。

对迟群同志的问题，我们是有缺点错误的，主要是我们党性不强，有私心杂念，因此对他的错误斗争不力，一味迁就，这是我们应向您老人家、向党中央做深刻检讨的，并衷心地接受对我们的批评教育。我们一定要努力工作，把学校教育工作搞上去。

敬祝

您老人家健康长寿！

中共清华大学委员会

副书记 刘冰

副书记 惠宪钧

副书记 柳一安

常委 吕方正

一九七五年八月十三日

附件：关于迟群同志问题的材料

一、资产阶级个人野心严重。

他经常在谢静宜同志不在场的时候宣耀自己：“我和小谢是主席的两个兵”，“我可以到省里干一干”，“到军区干干”，“我要当官有的是，让我当国防科委主任，我都不干”，“清华大学是个社会，当好一个部长不一定能管好我这个清华大学”，还说什么一个清华的校长，就能当总理。

十大和四届人大后，他没有当上中央委员，没有当上部

长，极端不满，多次大哭大闹，不接电话，不看文件，不工作。连续几个星期不分昼夜地吃安眠药、喝酒、睡大觉。烧毁了兩床公家被褥，不刷牙，不洗脸，装疯卖傻，躺倒不干。深夜一个人跑到校外马路上、野地里乱窜，惊动了清华、北大一些教职工四处寻找。大发雷霆，骂不绝口，乱蹦乱跳，撞坏眼睛，摔裂肋骨。把公家的几套茶具统统摔碎，把两张大写字台的玻璃板全部打碎，多次撕破公家窗帘，把工作人员辛勤种的蔬菜统统拨下来扔掉，发泄不满。骂这个是“混蛋”，那个要“滚蛋”。甚至大骂“四届人大常委有什么了不起”，“人大也有右派参加”，“别人不提我当四届人大代表，主席提我。”

在谢静宜同志面前讽刺挖苦，在背后骂她“一个臭机要员”，“当中央委员有什么了不起”，多次吵闹不休地要搬出清华，说什么“我在这里你就别在，你在这里我就走”，多次半夜三更去踢谢静宜同志的门，发泄不满，几次叫嚷“你们给我召集党委扩大会，我要讲话，把所有问题都端出来，我不当党委书记了。”同志们不同意他召开会议，他就自己下手拨电话，叫总机通知开党委会，后被制止才没开成。后来，在一次基层干部会上，他突然闯来，狂呼大叫：“我是反革命，我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我讲这些话，你们回去都给我传达。”影响极为恶劣。

二、毫无党的观念。

不接受市委领导。不请示汇报工作，布置下来的工作，他就打折扣。近四年来，市委要求党委书记参加的会，他一次也没有去过。市委召开会议，传达中央文件，因等吴德同志延长了半天时间，他就不满地说：“吴德，一个普通工作人员，你们就那么重视。”市委要求副书记参加的会，他常不让去，派

工作人员顶替。市委确定清华在会上介绍经验，常常遭到他的阻挠，如一次市委科教组已通知北京市各大专院校和有关局，在北京展览馆召开千人会，交流批林批孔情况，市委通知清华在会上发言，头一天晚上，他一知道就给否定了，市委科教组几次来电话催问，我们三番五次地向他请示说服，但他固执己见，结果把这个会搅的没有开成。

教育部成立后，他极为不满，他听说教育部要求每期《清华战报》送一份给教育部，就立即告诉校政治部：“《清华战报》除了市委送一份外，其他一律不给，教育部也不准给。”对国务院科教组负责人他挨着个骂，骂“刘西尧是老右”，骂“李琦吃社会主义，在家抱孙子”。

三、搞一言堂、家长式的恶劣作风。

身为党委书记经常不参加党委会议，他要参加的会一般都是中途到场，开口就是：“我刚才又处理了几个首长交办的事情”，“看了一大堆文件”。经常不听委员们讨论发言，就下车伊始，乱说一通。一旦激动起来，就倒背着手，在会议室里来回踱步，趾高气扬地向委员们训话。党委做出的决议，他一个人就可以推翻。例如系里领导班子几年定不下来，就是因为他一会同意，一会又推翻。

他讲话时，嘴上说叫别人补充，别人真的插了话，他就不高兴了。他一讲话就要人写反映，下午讲了话，晚上就要看情况反映，稍有迟缓就发脾气。简报上写了迟群的名字他就高兴，写了别人的名字就不满地说：“是谁在领导。”

今年他更是一手遮天，撇开主管书记，今天说我要直接管保卫部，明天说我要直接管政治部，背这个书记骂那个书记，对谁也不信任。校机关人员常日以继夜，辛辛苦苦地工作，都被他说得一无是处，叫骂“政治部要改组”，“教改

处不得力”，“保卫部是哪家的！？”

四、任人唯亲，封官许愿，违反党的干部政策。

中层以上干部的配备讨论只是个形式，实际上只有他一个人说了算数。

他从清华选到国务院科教组的一个军代表，教育部让本人回部队，他就将其弄到学校，说：“我要叫他当人事处长，给他们（指教育部）看看。”别人不同意才做了副处长。

一个工宣队员说过：“对迟群和谢静宜同志的态度，就是对中央的态度。”他虽然口头上说这个话不对，但实际上他很欣赏这个人，要他当了武装保卫部长，不是党委成员，却让他同时领导人事处，规定“别人不要去乱叨咕”，把主管人保工作的副书记甩在一边。

他提一批干部，过了不久又换掉，再提一批，使得干部长期不能稳定。市委管的干部他不报告，随意撤换和提拔。

封官许愿。对一位管常务的副书记说：“我是政委，你就是司令员；我当书记，你当校长。”并且立即向外单位的同志介绍说“这是我们的校长”。

五、资产阶级生活作风。

半年前，实际上他有自己使用的公务、警卫人员二人，司机一人，秘书一人，现在略有减少。由一名二十三级转业干部长年侍候他，给他打饭，洗衣服等。去年，曾同时在城里占用三个四合院，不缴房费。他的办公室装双层玻璃，双层门，说是为了保密。叫人修房子，修了他又骂人家帮倒忙。在机关院里都装上灯，通夜开着，还指定管保卫的副书记每天注意去给开灯。

向保卫部的同志说：“中央首长都关心我的安全，你们

要加强保卫工作。”他住的地方周围会议室不准开会，进机关办事的教职工不准进机关二道门，不准进他的院，甚至连几个党委副书记到他的房子谈工作，都得先在外面等候，由他的工作人员请示他同意后才能进去。

深夜曾叫人陪着他用录音机放音乐，说是“我现在要靠这个来调剂脑筋”。借吃安眠药装糊涂乱摸一个女工作人员。

刘冰等人再次上毛泽东书

邓副主席并呈毛主席：

关于迟群同志的问题，我们曾于八月十三日向您和毛主席老人家做了报告，我们希望他改正错误，好好工作。可是两个月来，他表现更为不好，搞了许多违背党的原则的活动。尽管我们努力落实毛主席老人家的三项指示，想把学校工作搞好，但他的这些活动，使我们在工作中遇到困难。这使我们不得不再次向您和毛主席老人家报告他的情况。

八月十四日市委常委、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政治部主任吕方正同志（军宣队）调回部队。因为当面向迟群同志提了点意见，引起了他的不满，临走前两个小时，他借口对吕方正同志评价太高，背着党委的几个书记，私自决定要修改吕方正同志的鉴定。

八月十三日，党委副书记（工宣队主要负责人之一）柳一安同志，从哲学社会科学部完成任务返回学校。迟群同志对于带职在外，日以继夜工作了九个月的党委主要领导人之一，“七·二七”以来一块战斗了七年的战友，不知他听了什么鬼话和什么原因，毫无道理不给工作，命令他在学校或者到工厂听候分配工作。一直到九月二日在我们提了意见之后，他才被迫召开书记会分配柳一安同志的工作。刚刚分配之后，迟群同志又背着党委的几位书记，完全违背党的原

则，找了一个机关工作人员研究柳一安同志的情况，并立即向柳一安同志原在的单位的负责人提出请求，希望把柳一安调走，并捏造说“柳一安表现很不好。”

八月二十四日，他违背党委一元化的原则，背着大部分党委书记和党委常委会，私自决定召开工宣队员大会。并说“今天要开纯宣传队员大会，学校的人包括刘冰在内一个都不准参加。”在会上他煽动说“有人同我们保持距离，我们要提高警惕，我们要准备迎接一场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我们有办法有能力解决。我迟群还要做党委书记，有人盼着我走办不到。”这些煽动性的讲话，在同志们思想上引起了混乱。

九月三日，他又背着大部分党委书记和宣传队几个主要领导人，授意一个忠实于他的宣传队员（政治部副主任）私自召开各单位宣传队负责人会议。在这个会上，这位宣传队员大讲“迟群没有错误”，“谁反对迟群就是否定教育革命，就是否定工人阶级领导。”要求到会的人把这些话传达到全体宣传队员，

八月二十四日（星期天）晚上，他不抓工作，不知道那里去了。我们召集各部处负责人办公会议，研究了下周工作安排，并连夜向他写了报告。第二天下午又向他做了口头汇报。他抓住所谓在安排中没有提到民兵会议传达时间，大发雷霆，骂我们“口头上讲战争、讲战备，实际上不搞战备，没有战争观念。”说什么“搞一张日程表干什么？没有用处。”推翻了办公会议的安排。

八月三十一日（星期天）夜上，他不抓工作，又不知那里去了。我们象过去一样在办公会上研究了一周的工作安排，并向他写了报告，第二天下午他睡大觉起来后，连续召开书记会、各部处负责人会议，宣布说“象昨天晚上那样的

会议没有必要开，今后不要再開这样的会，要发挥各职能部门的作用，书记们以后可以超脱一点。”又一次推翻了办公会议的安排，剥夺了几位书记正常工作的权利。

九月十四日至十九日，他不向校党委打招呼，离校五、六天不上班工作，不知道他哪里去了，在这中间除了跟吹捧他的一个机关保卫干部联系外，在校的几位党委书记哪一个他都没联系过。市委有关领导召开的落实毛主席三项指示经验交流会，他不但不去参加，并且对这次会议如何贯彻不问不闻。送给他请他审定的贯彻落实会议精神意见，他押起来不退给我们，等了三天不见回音，我们只好召开常委会讨论后迅速传达贯彻了，九月十九日学校召开打击刑事犯罪分子落实政策万人大会，送给他审定的党委讲话稿，等到开会了一直还不退回来，搞得我们非常被动。

九月十九日晚上，他回到学校，在我们的催促下，他答应星期天（九月二十一日）晚上召开书记会议研究工作，星期天晚上七点半钟书记们都到会议室等他开会，一直等到九点半钟不见他回来，为了不误工作我们只好改为机关办公会议研究工作。

从九月初到十月一日前，他基本上不抓工作。整天呆在房子里不开会，不见群众，不找干部谈话，不知道他在干什么。

最近，他和我们谈话时，我们建议他召开书记会，请上级领导参加解决我们班子的问题。但是他没有改正错误和解决问题的诚意，他和个别书记谈话中又讲了一些损害团结的言论。迟群同志的这些行为，给党的事业已经带来损失，发展下去将会使党的事业受到更大的损失。

为了迟群同志能够改正错误，为了党的事业，我们希望

谢静宜同志也能站在党的立场上同他的错误作斗争。谢静宜同志曾对迟群同志的错误做过批评，我们在上次报告中曾经提到过，我们也曾向她反映过对迟群有意见，每次她都劝说我们。最近，我们向她反映对迟群的意见后，她越来越明显地袒护迟群的错误，在一次书记会上，因为一个干部的批准手续问题，她借题发挥，用威胁的口气说“岂有此理，你们告去吧！”联想起十大以后迟群发泄不满情绪时，她跪在迟群面前握着迟群的手讲些不合原则的话，当时我们就实在看下去。我们希望谢静宜同志在党内是非问题上坚持党性原则，起到积极作用。我们盼望中央解决我们班子的问题，以便我们更好地朝气蓬勃地带领全校师生员工更加深入贯彻落实毛主席老人家的三项指示，把学校的工作搞好。我们一定要顾全大局，一定要坚持党的原则，按中央指示办事解决我们班子的问题，一定要按照毛主席老人家的教导“力戒骄傲”，努力工作。我们绝不因为对迟群同志有意见而影响对主席三项指示的贯彻。请毛主席老人家和中央放心。

上次报告由于仓促，迟群同志的错误事实遗漏了一些，现在补充送上（见关于迟群同志的错误补充情况）。

以上报告如有错误请中央指教和批评。

敬祝毛主席老人家健康、长寿！

中共清华大学委员会

副书记 刘冰

副书记 惠宪军

副书记 柳一安

一九七五年十月七日

附件：关于迟群同志的错误

党的十大、四届以后，由于没有当上中央委员，没有当上部长，迟群同志极为不满。他说：“主席身边的人都有职位了，为什么不给我安排？中央不信任我。”“总理老是给我出难题，难的地方都叫我去做”；“老子辛辛苦苦干了这些年，落了个下场”，“主席的两个兵‘屁’，什么两个兵？”

刘西尧、周荣鑫同志当了部长后，他把周围的工作人员召集起来讲话说：“你们不要光看现在，再过几年再看，”“别人不提我当四届人大代表，主席提我”，“我才四十岁，他们都六七十岁了，咱们走着瞧。”

骂“吴德是普通工作人员，你们就那么重视！？”市委其他领导同志更不放在眼里，骂丁国钰同志是“老右”，骂市委科教组负责人是“小毛毛虫”，骂“海军没有一个好东西”。批林批孔运动开始后，八三四一部队领导同志为了他的安全，给他派来两名战士，他骂张耀词同志给他派来两名“特务”。

谁触犯了他的尊严，他就打击报复，仅举一个例子：学校人事处处长徐心坦同志，因对一个复员军人打坏一个女青工的处理问题和几个落实政策对象补工资问题与他持有不同意见，不同意他形左实右的观点，他就提出要撤换人家，说什么“这是谁的人事处长？我随便找个工人都能干，这个人不能当人事处长。”因遭到我们的抵制才未撤掉。

在一些重大原则问题上忽左忽右。批林批孔运动开始时，他大反走后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运动开始时，他提出要

注意经验主义，并令校刊写了反对经验主义的文章。这些中央领导同志可能早已知道。现在再举几件事情：工物系一个女学员，因在家乡搞不正当的男女关系怀孕后在校自杀身死。他把死因归结到该系总支副书记（女）曹晓先同志有意对死者施加压力逼死的，因此采取极左的办法，指示政治部到系里多次对这个干部开批判会，并要开除这个干部的党籍，后因下面的同志思想不通才拖了下来。今年八月初，政治部一个工作人员，大白天窜到教职工宿舍，妄图强奸一个西北工业大学的女学生，因女方反抗，残（惨）遭毒打，门牙被打掉两个，头被打成脑震荡。虽然强奸未遂，但情节十分严重和恶劣，已构成强奸行凶罪。对这一个重大案件他不叫向公安机关报告，不同意狠狠打击，说“开一次小型批判会就可以了，再开批判会，会扩散不好的影响，也不符合中央当前的战略部署”，所以召开了一次小型批判会就送到农场去了。群众对此意见很大，受害者不服上诉法院，北京市公安局知道后也很不满意。直到九月上、中旬，在北京市全市开展打击刑事犯罪运动中（罪犯）才被公安机关拘捕。

今年七、八月间在落实毛主席三项指示的过程中，迟群同志提出了精简机构的问题。精简机构这本来是正确的，可是迟群同志在他的“不要把人当成商品”，“谁也不会把自己当成商品”的口号下，没有请示市委，把系一级副书记、革委会副主任和校机关副部长、副处长以上现职负责干部五十六人降职使用，下放到基层，同时又新提了二十多个这样职务的干部，在这些干部中引起了波动和不安，不利于干部相对稳定和积累经验，不利于安定团结。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也是有错误的，在当时虽然感觉不妥，但是没有敢于提出不同意见，违心地执行了他的意见，这是应该深刻检讨的。

还有一些问题就不一一报告了。

一九七五年十月三日

简介 迟群原是中央警卫部队的一个宣传科副科长；谢静宜是河南商丘县人，1953年初中毕业后分配在中共中央办公厅任机要员。1968年7月在“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和“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开进学校，接管各大、中学校领导权的高潮中，经毛泽东亲自点名，迟群、谢静宜参加清华大学“工宣队”、“军宣队”，接管清华大学的领导权，并成为江青一伙把持清华和搞乱教育界的两大得力干将。

1975年1月全国四届人大确定了以周恩来、邓小平为核心的国务院领导班子。“四人帮”一伙企图由江青组阁的阴谋化为泡影；他们原想把教育、文化、体育三个部委全部抓到手的企图也没能完全如愿。“四人帮”提名迟群任教育部长，但教育部长由老干部周荣鑫出任；谢静宜当选为中央委员，迟群在四届人大没有捞到官职，因此心怀不满。

1975年初，周恩来病重，邓小平担任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重任。由于江青在同美国人维特克女士谈话的“维特克事件”中触怒了毛泽东，又由于毛泽东对江青等人的不满情绪日益增长，在1974年7月政治局会议上宣布他们为“上海帮”，“四人小宗派”，批评江青设两个工厂（“钢铁工厂”、“帽子工厂”）；全国四届人大召开前夕又揭露和批评了江青“自己想当党的主席”、要组阁的“野心”。1975年5月~6月由邓小平主持，召开了批评“四人帮”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江青、王洪文等人做了检讨。历史出现了转变的契机。邓小平抓住时机，毅然领导进行了对各项工作的全面整

顿。1975年2月~5月，首先整顿严重混乱的工业交通。6月~9月，整顿工作全面展开。7月~8月召开国防工业重点企业会议，研究军工业整顿问题。在6月~7月的军委扩大会议上，邓小平强调军队的整顿工作，军队开始精简整编，调整各大单位领导结构。同时对科技工作和文艺界进行整顿。9月~10月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提出了对农业的整顿任务，并明确提出要对各项工作进行整顿，在听取科学院汇报时特别点了教育问题。此后，自“文革”以来受到祸害最深的教育界也开始进行整顿。10月，教育部在周荣鑫主持下起草教育工作汇报提纲，准备经中央批准后对教育界进行全面整顿。

清华大学是教育界整顿的斗争焦点。迟群身为党委第一书记，把持大权，工作上草包，作风上霸道，为所欲为，引起公愤。1975年8月13日和10月10日，原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等4人，先后给毛泽东两次上书，上书通过邓小平转呈毛泽东。信中报告了“四人帮”的两大干将迟群和谢静宜在政治上、工作上和生活作风等方面的严重问题，揭露他们狼狈为奸、争权夺利、专横跋扈，在清华大学大搞家长式封建专制统治的情况；特别是大胆揭发了迟群在中共十大和全国四届人大以后，由于没当上中央委员和部长，对周恩来总理和邓小平等人极为不满，公开攻击中央领导人，在群众中造成恶劣影响等事实。与此同时，刘冰等人还给当时中共北京市委主要负责人写了两封内容基本相同的信，并向市委教育组负责人作了同样内容的口头汇报。

9月底到11月初毛远新的几次汇报对毛泽东转变态度发生了重要影响。毛远新说：感觉到一股风，比1972年借批极左而否定文化大革命时还要凶些。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感到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批判

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文化大革命怎么看，批林批孔运动怎么看，主流、支流，三七开还是倒三七开，肯定还是否定？现在阴暗面讲了一大堆。教育革命文艺革命还对不对？三项指示为纲，其实只剩下一项指标，即把生产搞上去了。我担心中央，怕出反复。毛泽东不能容忍邓小平的整顿工作对“文化大革命”的否定意义。10月20日前后，他对邓小平转送的刘冰等人的上书作出批示，说信的矛头是对着他的，还说邓小平偏袒刘冰。清华所涉及的问题，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迟群等人得到毛泽东的支持，有恃无恐。1975年11月3日，迟群主持召开清华大学党委常委扩大会议，开始对刘冰等人进行有组织的围攻。11月18日召开全校大会，由迟群和谢静宜指使的15个人上台作证，对刘冰等人揭发的问题，作了完全颠倒黑白的所谓“澄清”，把两封揭发信打成“诬告信”，并叫嚷要“揪后台”。此后，迟群、谢静宜一方面打着“大辩论”的旗号，对刘冰等人进行全校性的批斗，把他们打成“正在走的走资派”、“投降派”、“右倾翻案风急先锋”，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停止组织活动，送清华大学农场等地监督劳动；另一方面借题发挥，把矛头指向周恩来和邓小平。风起于清华大学，一场“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由此刮向全国。全面整顿工作被迫中断。

(编者)

附：

毛泽东关于刘冰等人上书的谈话

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清华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

我们老同志就不犯错误？照样犯。要注意老中青三结合。有些老同志七、八年没管事了，许多事情都不知道，桃园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有的人受了点冲击，心里不高兴，有气，在情理之中，可以谅解。但不能把气发到大多数人身上，发到群众身上，站在对立面去指责。周荣鑫、刘冰他们得罪了多数，要翻案，大多数人不赞成，清华两万多人，他们孤立得很。

对目前形势和新的 历史任务的几点看法

——给毛主席、党中央和全国人民的信

序言

一 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规律的基本原理

二 我国历史的发展特点

三 关于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四 关于党的基本路线

五 目前形势和新的历史任务

六 完成任务的途径和方法

结束语

序 言

“马克思主义中有决定意义的东西，即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世界观。这个世界观，“所以叫做辩证唯物主义，是因为它对自然界现象的看法、它研究自然界现象的方法。它认识这些现象的方法是辩证的，而它对自然界现象的解释、它对自然界现象的了解、它的理论是唯物主义的。”

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哲学看来，并没有什么一层不变

的、绝对的、神圣的东西。辩证哲学认为一切事物中都有着不可避免的衰亡的印迹；在它看来，除了不断的发生和消灭的过程，除了无穷的由低级进到高级的上升过程以外，没有任何东西是永存的。辩证哲学本身只不过是这一过程在人的能思维的头脑中的简单反映而已。”

既然整个人类社会和人类社会的每一发展阶段，都和一切事物一样，永远处于不断的变化和发展之中，那么显然，要想在这样一个运动过程中找到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的固定不变的公式，就将是绝对不可能的。正象列宁所指出的那样：

“马克思和恩格斯总是说，‘我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他们公正地讥笑了只会背诵和简单重复‘公式’的人们，说明公式至多只能指出一般的任务，而这些任务是必须随着历史过程中每个特殊阶段的具体的经济和政治环境而改变的。”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也指出：“列宁说，对于具体情况作具体的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

毫无疑问，如果我们想使自己的努力达到预定的效果，就必须随时使自己的思想适应已经变化了的情况。根据新的具体的历史特点，修改自己的计划和政策等等，提出与新的情况相适应的新的历史任务和新的口号。

在我国漫长的历史中，曾经出现过各种不同的历史时代和历史发展时期，因而也有过各种不同的历史任务。例如，在新民主革命时期，唯一正确的口号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现在，大家都可以看到，我国正处于一个重要的历史发展时期，全国人民都希望实现已故总理周恩来同志在四届人大上提出的两步设想，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在这样一个

时期，我们将有怎样的历史任务呢？

同志们！考虑到二十多年来，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已经得到了巩固；

考虑到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的成就为我国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同时考虑到我国还不是一个强大的工业国，我国在经济上还比较落后；

考虑到我国已经拥有八亿人口，人民的物质需要正在增长；

考虑到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发动战争的危险性正在日益增加；

考虑到我国历史发展和目前形势的基本特点，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将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考虑到我国将在这个时期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全面现代化。

考虑到这一切，我们认为：调整我们的战略重心，把主要精力放到发展我国社会生产力方面来，使我国经济提高到世界先进水平，以保证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更加巩固，以加强我国的国防力量，以提高全国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这乃是我国在目前时期的首要问题和中心任务。我们认为，这个问题应该是当前一切工作的基本出发点。

鉴于上述考虑，我们将在这里提出我们对我国目前形势和新的历史任务的若干看法，供毛主席和党中央（参考），供同志们参考。

一 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规律的基本原理

恩格斯曾经说过：“正象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及其所阐述的基本原理。

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出发点是：“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

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体系中，生产或生产方式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体。“生产或生产方式既包括社会生产力，也包括人们的生产关系，而体现着两者在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的统一。”

整个人类历史处于不断地变化和发展之中。“凡在历史上依次更替的一切社会秩序，都不过是人类社会由低级到高级的无穷发展进程中的一些暂时阶段而已。”人类历史的这种发展，“社会的变化，主要地是由于社会内部矛盾的发展，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阶级之间的矛盾，新旧之间的矛盾，由于这些矛盾的发展，推动了社会的前进，推动了新旧社会的代谢。”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是一切社会形态所共有的基本矛盾；这一基本矛盾在各个不同的社会形态中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阶级社会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同时表现为对抗性的阶级矛盾。

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中，生产力是矛盾的主要的

和起决定作用的方面。“生产力不仅是生产中最活动、最革命的因素，而且是生产发展的决定性因素。”“生产关系的发展依赖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首先是依赖于生产工具的发展”，“因为的这种依赖关系，所以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迟早要引起生产关系相应的变化和发展。”生产力、从而生产关系的变化和发展，无可避免地改变着整个社会经济面貌，由此导致新旧社会的更替。“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

显然，如果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它就必然被抛弃。由此可以得出结论，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这一规律是一切社会形态所共有的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经济规律。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认为，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中，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中，生产力、经济基础一般地表现为矛盾的主要方面和起决定作用的方面；但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同时也承认经济因素并不是唯一决定性因素，它绝对不否认生产关系对于生产力的反作用，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实际上，在一定的条件下，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会由矛盾的非主要方面转化为主要方面，会由被决定因素转化为决定因素。“当着不变更生产关系，生产力就不能发展的时候，生产关系的变更就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例如，当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即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不相容的程度

时，消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就是生产力不断加速发展的唯一先决条件。同样，“当着政治文化等等上层建筑阻碍着经济基础的发展的时候，对于政治上和文化上的革新就成为主要的决定的东西了。”例如在旧中国，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已经使矛盾的发展，达到了“政治不改革，一切生产力都遭到破坏的命运”的程度，因而打倒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就是解决旧中国各种矛盾的先决条件。在一切社会革命时代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变革，都将成为矛盾的主要的和起决定作用的方面。

并且，在革命后的一段时期，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也会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这是因为，被推翻的腐朽的社会力量和被打倒的反动阶级还企图进行反抗和复辟，这是因为，新的生产关系和新的上层建筑，还需要有一个相对巩固和完善的时期。在这一时期，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仍将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和起决定作用的方面。

但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作用和反作用，不过是表现着矛盾双方的对立统一关系，显然，不能也不可能把这种对立统一关系割裂开来，并且，它们的作用和反作用，只能“是在归根到底总要为自己开辟道路的经济必然性的基础上的相互作用。”

应当注意下述几点。首先，旧的生产关系将转化为哪一种新的生产关系，不仅取决于它本身的性质，而且首先是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程度。其次，在社会革命即新旧社会更替时期，生产关系的变革无疑将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但是，这种由矛盾的非主要方面向主要方面的转化，正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正是这种发展激化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矛盾的结果。最后，新的生产关系一旦建立和相对巩固下来，生

产力的发展必然再度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它也不能不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否则，新的生产关系既不可能有巩固的基础，也不可能有任何充分的发展。

资本主义发展史为上述第三点提供了典型的例证。英国十七世纪的资产阶级革命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建立扫清了障碍，在长达几个世纪的资本的原始积累时期也已经确立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但是，同一时期的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及其所创造的生产力，既不足以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奠定稳固的物质基础，也不足以保证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获得更充分的发展。正如马克思所说：“真正的工场手工业时期并没有引起根本的改变”。只有十八世纪的产业革命和由此建立的资本主义大工业，才不仅为资本主义占领国内整个国民经济开辟了广阔的道路，而且为资本主义开拓了从美洲到亚洲的广大的世界市场。

由此可见，尽管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从来不认为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因素，但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从来都坚定不移地认为：“经济条件归根到底还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它构成一条贯穿于全部发展进程并唯一能使我们理解这个发展进程的红线。”而“经济发展总是毫无例外地和无情地为自己开辟道路”。

以上所述就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的和一般的规律。这个一般规律毫无例外地决定着包括各个不同民族在内的整个人类社会的变化和发展，但是，人类社会的一般发展规律并不排斥个别民族和个别社会发展阶段表现出特殊性。

人类社会的一般发展顺序是：原始公社制、奴隶占有制、封建制、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一般说来，所有各民族都会循次经历上述几个发展阶段。

但是，社会发展史已经证明，在一定的条件下，个别民族可以不经个别发展阶段。例如，日耳曼越过了奴隶占有制直接进入封建社会，美国人则越过了封建社会直接进入资本主义社会。更为重要的是，现代社会主义并不象马克思在十九世纪所估计的那样产生于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而是产生于小生产经济占优越的落后农业国。

在二十世纪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出现的社会主义国家，包括十月革命后的苏联和现在的中国、朝鲜、越南等等，在革命前或者是资本主义已经有了一定程度发展的不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或者是资本主义刚刚产生的半封建国家。它们共同的特点是：革命前的资本主义并未成为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形式，因而它们不是资本主义工业国，而是经济落后的农业国。在这些国家中，尽管革命前的俄国的资本主义比其余国家发达得多，但俄国仍然是小商品经济占优势的落后小农国家。

列宁在谈到俄国的情况和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时指出：“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

但是，列宁这里所说的“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是什么意思呢？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生产关系以及整个社会的变化和发展，必须依赖于社会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则已经证明，只有资本主义才能创造为实现社会主义所必须的社会生产力和客观的经济前提；社会主义只能而且必须从资本主义基础上产生出来。恩格斯写道：“正象马克思尖锐地、着重地指出资本主义生产的坏

的方面一样，同时他也明白地证明这一社会形态是使社会生产力发展到这样高度的水平所必需的；在这个水平上，社会全体成员的同样的、合乎人所应有的发展，才有可能。要达到这一点，以前一切社会形态都太薄弱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才第一次创造出为达到这一点所必需的财富和生产力。”马克思本人则在例如《资本论》中写道：资本主义“狂热地追求价值的增值，肆无忌惮地迫使人类去为生产而生产；从而去发展社会生产力，去创造生产的物质条件，而只有这样的条件，才能为一个更高级的、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创造现实基础。”

但是，一切小生产经济占优势的落后农业国不可能象资本主义国家一样创造出为实现社会主义所必需的强大生产力；另一方面，在小生产和社会主义大生产之间隔着整整一个历史时代。即资本主义生产时代，社会主义者不可能剥夺为数广大的小生产者并把他们分散而细小的生产资料转归全民或社会所有。显而易见，根据马克思主义的上述原理，这些落后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不足以保证这种国家直接进入社会主义，它本身不能提供实现社会主义的经济的和历史的必然性。

可是，假如落后国家中的无产阶级尽管由于资本主义的不发展而在人口中只占极小的比重，但由于一定的历史条件，它能够领导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进行革命，并进而夺取政权，无产阶级应当怎么办呢？

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者异口同声地答道：无产阶级不应当夺取政权，因为“我们还没有实现社会主义的客观的经济前提。”与此相反，列宁回答道：无产阶级应当夺取政权。我们不否认实现社会主义需要有一定的社会生产力水

平，但是，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夺取政权，然后再来使生产力发展到这个一定的水平呢？“你们说，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就需要文明。好极了，那末，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在我国创造这种文明的前提如驱逐地主、驱逐资本家，然后开始走向社会主义呢？你们究竟在哪些书上看到，说通常的历史顺序是不容有或不可能有这类变化的呢？”

很显然，列宁所说的“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就是：尽管落后国家的社会生产力并没有发展到足以实现社会主义的水平，尽管落后国家的小生产者阶级占人口的绝大多数。但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无产阶级能够首先取得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然后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再来发展社会生产力和在“空地上”创造前所未有的社会主义经济。

应当指出，一切小生产经济占优势的落后国家，在它向社会主义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都必然具有上述特殊性；对这些国家来说，这种特殊性已经具有普遍的和一般的意义。而迄今为止的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并不是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中所说的是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而是由小生产占优势的尚处于发展之中的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

由此就可以看到，在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的实践之间是有着重大差别的，实际上也不能不有差别。马克思是在十九世纪即自由资本主义时代，根据资本主义的经济运动规律，得出“资本主义社会必然要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这个结论”的。当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之后，尽管资本的高度集中和生产的全面社会化，为社会主义的必然到来创造了更为雄厚的物质基础，尽管无

产阶级革命已经成为必不可免的直接实践问题，但是，帝国主义同时产生了自由资本主义所不曾有过的新的特征和与此相联系的特殊规律。这些特征和特殊规律无可避免地要赋予人类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过程以某些新的内容；同样，它也无可避免地决定了必须发展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马克思主义只能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马克思不能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就预先具体地认识帝国主义时代的某些特异规律，因为帝国主义这个资本主义最后阶段还未到来，还无这种实践，只有列宁和斯大林才能担当此项任务。”

列宁主义作为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根据新的历史特点，在以下几个重要方面大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首先，列宁主义认为，“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夜。”其次，列宁主义认为：“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由此就应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或者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并且，无产阶级革命“不一定在工业比较发达等等的地方”首先爆发，“开始革命的国家，突破资本战线的国家，也许是资本主义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再次，列宁主义认为，对于那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已经开始民族解放运动的落后民族来说，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并不是不可避免的；“在先进国家无产阶级的帮助下，落后国家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过渡到苏维埃制度，然后经过一定的发展阶段过渡到共产主义。”

自从一九一七年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创了世界历史新纪元以来，列宁主义的上述原理已经为迄今为止的一切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所证明。

最后，我们还必须强调指出，正象处于不同时代的马克思和列宁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论不能不有所区别一样，落后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特殊性，与人类社会首先是发展生产力，然后变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一般规律，也不能不有着重大区别。但是，这种特殊性永远不能摆脱一般发展规律的支配和影响。问题是很清楚的。如果夺取了政权的无产阶级不能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无产阶级将不能维持和巩固自己的政治统治；如果无产阶级不能使生产力发展到超过资本主义的水平，无产阶级将不能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

无论各个民族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会有怎样的区别，代替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本身赖以存在的物质基础，只能是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社会化生产和更强大的社会生产力。而如果说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列宁主义曾经指导了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话，那末，列宁主义同时就是指导这些落后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正确理论。

二 我国历史的发展特点

“中国是世界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中国已有了将近四千年的有文字可考的历史。”但是，在中国这样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与欧洲中世纪的农奴制有着重大区别的中国专制封建主义，统治中国却达二千一百余年之久。

这个封建主义制度赖以存在的基础是中国农民的小生产经济。毛主席指出：“在农民群众方面，几千年来都是个体经济，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这种分散的个体生产，就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而使农民自己陷于永远的穷

苦。”

这种个体小生产本身，“既排斥生产资料的积聚，也排斥协作，排斥同一生产过程内部的分工，排斥社会对自然的统治和支配，排斥社会生产力的自由发展。它只同生产和社会的狭隘的自然生产的界限相容。”

历代封建统治阶级曾经在中国历史上，或者抵抗了外族的侵略，或者实现了中国的统一，或者缓和了当时的社会矛盾；但是，为了维护和巩固自己对农民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它们总是竭力维持使农民陷于悲惨境地的个体经济。

封建主义制度在其存在的两千余年中，造成了中国社会长期的闭塞和停滞。以刻苦耐劳著称于世的中国人民，在两千余年中未能使他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发生任何根本的变化。

中国商品经济尽管在明清时代获得了很大的发展，但却未能冲破封建主义制度的桎梏发展到资本主义；在满清帝国进行所谓洋务运动之前，中国没有任何资本主义性质的大机器工业；洋务运动本身典型地表现出封建主义制度甚至在近代也排斥资本主义的自由发展。

当世界历史已经进入资本主义时代以后，中国封建统治阶级还陶醉在“天朝”尽善尽美和万世长存的幻想之中；当中国清醒过来力图维新自强的时候，世界历史已经进入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了。

一八四〇年的鸦片战争标志着中国近代史的开始，但同时也标志着中国断绝了向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

这首先是因为，“帝国主义列强侵入中国的目的，决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帝国主义列强的目的和这相反，它们是要把中国变成它们的半殖民地和殖民

地。”

其次是因为，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必须完成的资产阶级革命只能由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来领导和完成。这样的资产阶级革命已经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而这样的“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

因此，近代中国所处的特定历史条件就排除了中国社会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

中国的封建主义制度，从一八四〇年开始了自己的解体过程；也从这时开始，到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习惯上称为旧中国。

在旧中国，“中国的广大人民，尤其是农民，日益贫困化以致大批地破产，他们过着饥寒交迫和毫无政治权利的生活。中国人民的贫困和不自由的程度，是世界所少见的。”

但是，就社会的基本经济结构说来，旧中国并不是资本主义社会，更不是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相反的，它是一个资本主义生产和社会生产力都极不发达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

在一八四〇年到一九四九年的一百多年中，中国已经不再是完全的封建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开办的企业以及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都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出现了中国在此以前所不曾有过的新的阶级，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但在这整整一个世纪中，资本主义的发展未能改变整个中国的基本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

资本主义几乎没有触动中国最主要的生产部门——农业。中国的整个工业并不完全是资本主义经济，个体手工业

仍然是中国农业的必要补充，它供给农民以大部分工业品。在资本主义性质的工业中，它不仅是主要轻工业如纺织工业部门，而且有一些工业实际上还处于工场手工业发展阶段。

旧中国的绝大部分经济，依然是和古代没有区别的小生产经济——农民的个体经济和手工业经济。在旧中国的整个国民经济中，这种小生产经济在抗日战争前和一九四九年，分别占百分之九十和百分之八十三。

显然，旧中国是一个小生产占优势的落后国家。

毛主席在一九四九年三月五日的《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中指出：

“中国还有大约百分之九十左右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这是落后的，这是和古代没有多大区别的，我们还有百分之九十左右的经济生活停留在古代。古代有封建的土地所有制，现在被我们废除了，或者即将被废除，在这点上，我们已经或者即将区别于古代，取得了或者即将取得使我们的农业和手工业逐步地向着现代化发展的可能性。但是，在今天，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们的农业和手工业，就其基本形态说来，还是和还将是分散的和个体的，即是说，是同古代近似的。谁要是忽视或轻视了这一点，谁就要犯‘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毛主席还强调指出：“中国的工业和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就全国范围来说，在抗日战争前，大约是现代性的工业占百分之十左右，农业和手工业占百分之九十左右。这是帝国主义制度和封建制度压迫中国的结果，这是旧中国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性质在经济上的表现，这也是中国革命的时期内和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一切问题的

基本出发点。”

这个拥有四亿农民的个体农业经济和拥有三千万手工业者的手工业经济，同时也是拥有四千年历史的古代和近代中国留给现代中国最严重的遗产。而在这份遗产中，最严重的问题不仅在于使小生产首先摆脱中国的传统观念，而且还主要在于：中国怎样才能使个体农民经济和手工业经济过渡到现代化的大农业经济和大工业经济。

以上所述，就是我们历史尤其是近代历史发展的基本特点。就是在这种历史所造成并遗留下来的极其落后的经济条件下，我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始走向社会主义。

三 关于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在一九四九年三月举行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指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中国共产党所面临的和应当解决的主要任务是：“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实际上，毛主席在这里指出的也就是我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

对我国来说，完成这个任务有下述两个主要问题：首先，我国根本没有强大的工业，特别是没有制造生产资料的强大重工业；其次，在土地改革完成后，我国同时存在着五种主要的经济形式：社会主义的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私人资本主义、个体所有制经济；在所有这些经济成分中，占优势的是个体所有制的小生产经济——小农经济和手工业经济。

应当怎样来解决这些问题，以便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

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呢？

应当指出，上述问题是旧中国整个经济和政治发展的必然产物，而我国在革命后所面临的全部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我国并不是由一个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而是由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

我们在第一部分可以看到，经济落后的国家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或顺序上具有与一般发展规律有着重大区别的特殊性，而能够解决落后国家实际上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理论首先是列宁主义。

列宁主义首先肯定了落后国家不仅可以向社会主义过渡；而且在一定条件下，落后国家可以越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向社会主义过渡。但是，列宁主义同时肯定这种过渡是极其困难的。因为，这种过渡是在这种特殊情况下开始的：在生产力没有发展到足以实现社会主义的条件下，首先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然后再发展生产力和建立社会主义经济；这种特殊性决定了落后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全部困难。列宁写道：“由于历史进程的曲折而不得不开始社会主义革命的那个国家愈落后，它由旧的资本主义关系过渡到社会主义关系就愈困难。这里，除破坏任务以外，还加上一些空前困难的新任务即组织任务。”这个新任务就是组织庞大而统一的社会主义大生产：“组织计算工作，监督各大企业，把全部国家经济机构变成一整架大机器，变成一个使几万万人人都遵照一个计划工作的经济机体——这就是放在我们肩上的巨大组织任务。”这个任务所以“空前困难”就在于落后国家拥有大量的资本主义以前的小生产，就在于必须使这种小生产越过资本主义生产过渡到社会主义大生产。而不解决这个任务，落后国家就不可能过渡到社会主义去。

一九五二年，斯大林概述了列宁关于落后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基本理论：

“（一）不要放过夺取政权的有利条件，无产阶级应该夺取政权，不要等到资本主义使千百万中小个体生产者居民破产的时候；

（二）剥夺工业中的生产资料，并把它们转归全民所有；

（三）至于中小个体生产者，那就应该逐步地把他们联合到生产合作社中，即联合到大规模的农业企业中，集体农庄中；

（四）用一切办法发展工业，为集体农庄建立大规模生产的现代技术基础，并且，不要剥夺集体农庄，相反地，要加紧供给它们头等的拖拉机和机器；

（五）为了保证城市和乡村、工业和农业的经济结合，要在一定时期内保持商品生产（通过买卖的交换）这个为农民唯一可以接受的与城市进行经济联系的形式，并且要全力发展苏维埃商业，即国营商业和合作社——集体农庄商业，把所有的一切资本家从商品流通中排挤出去。

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证明，列宁所规划的这条发展道路是完全正确的。

不容置疑，对于一切具有人数相当多的中小生产者阶级的资本主义国家，这条发展道路是使社会主义获得胜利的唯一可能的和适当的道路。”

毫无疑问，列宁所规划的并为苏联早期建设实践所证明的这条发展道路，同样是解决我国在革命后所出现的前述问题，保证我国过渡到社会主义去的正确道路。

一九五三年，我们党根据列宁主义和我国的具体情况，

制订了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毛主席对这个总路线作了如下指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社会建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

一九五五年七月，毛主席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再度阐明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我们现在不但正在进行关于社会制度方面的由私有制到公有制的革命，而且正在进行技术方面的由手工业生产到大规模现代化机器生产的革命，而这两种革命是结合在一起的。在农业方面，在我国条件下，（在资本主义国家内是使农业资本主义化），则必须先有合作化，然后才能使用大机器。由此可见，我们对于工业和农业，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农业改造这样两件事，决不可以分割起来和孤立起来去看，决不可以只强调一方面，减弱另一方面。”毛主席还指出：“中国只有在社会经济制度方面彻底地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又在技术方面，在一切能够使用机器操作的部门和地方，通过使用机器操作，才能使社会经济面貌全部改观。”

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目的和实质，就是消灭各种形式的私有制，完成社会制度方面的由私有制到公有制的社会主义革命，以消除私有制经济与人民民主专政（它实际上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之间不相适应的矛盾状况。在“空地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社会主义生产关系。

农业合作化是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主要内容，它是使占

人口绝大多数的五亿个体农民越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过渡到社会主义去的一个重要步骤。

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实质和目的，就是在我国建立社会主义赖以存在的强大的物质技术基础——即社会主义社会全民所有制的独立完整和强大的工业体系。首先是重工业体系，以保证用现代化技术装备改造包括农业在内的整个国民经济，保证社会生产不断增长以满足全体人民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保证社会主义经济取得完全胜利并为无产阶级专政奠定唯一稳固的物质基础，保证社会主义国家在世界上具有经济上和技术上的完全独立性并准备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物质条件。

显然，包括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两个内容的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是使我国完成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正确路线，是使社会主义在经济落后的我国获得胜利的唯一可能和适当的道路。

中国共产党在制订这个总路线的时候，预计它的实现将需要三个五年计划（从1953年）的时间。

一九五五年，毛主席在《关于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也肯定了这一宏伟计划：“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完成共有时间十八年。我们准备在这个时间内，同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基本上完成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基本上完成农业方面的社会主义的改造。”

但是，由于一系列新的严重问题的出现，我国未能在一九六七年完全实现党和毛主席所制订的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

四 关于党的基本路线

一九五六年底，即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我国比原计划提前十一年完成了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按照党的预定计划，中国应当继续完成尚未完成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发展生产力，完全实现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一九五七年，毛主席在分析当时的中国情况时，正是这样认识问题和提出问题的。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篇重要文章中說：“现在的情况是：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但是阶级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广大群众一面欢迎新制度，一面又感到还不大习惯；政治工作人员经验也还不够丰富，对一些具体政策的问题，应当继续考虑和探索。也就是说，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有一个继续建立和巩固的过程。人民群众对这个新制度还需要有一个习惯的过程，国家工作人员也需要有一个学习和取得经验的过程。在这个时候，我们提出划分敌我和人民两类矛盾的界线，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便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使全体人民比较顺利地走过目前的过渡时期，巩固我们的新制度，建设我们的新国家，就是十分必要的了。”毛主席在同一篇文章中还指出：“从一九五六年以来，情况就根本改变了。就全国说来，反革命分子的主要力量已经肃清。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

显然，毛主席当时认为，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中国的“根本任务”就是：“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技术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

但是，毛主席在这篇文章中同时提到了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这就是：“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刚刚建立，还没有完全建成，还不完全巩固”“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有一个继续建立和巩固的过程。”

一九五八年的人民公社化运动证明，我国年轻的社会主义制度确实还必须有一个“继续建立和巩固的过程”。我国进入六十年代以后，继续建立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问题成为压倒一切的严重问题，而毛主席在一九五七年指出的“保护和发展生产力”的“根本任务”，则不能不放到次要地位上去。

我国的社会主义新制度在六十年代受到了严峻的考验：

——国际上的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一切反动势力掀起了猖狂的反华活动，企图把我国置于死地；

——国内的所谓“四大自由”和“三自一包”，不仅严重地破坏和动摇着集体经济，而且还瓦解着国营经济；

——已经被推翻的剥削阶级残余势力伺机反攻倒算；在某些地方，他们实际上篡夺了一部分领导权；

——某些党和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被“和平演变”的方式所腐蚀，成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所有这些事实表明，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阶级斗争已经提到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面前；刚刚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不仅面临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可能，而且这种复辟危险几乎是迫在眉睫了。

六十年代的中国所面临的主要任务就只能是：“重新

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向着正在对我们猖狂进攻的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作尖锐的针锋相对的斗争，把他们的反革命气焰压下去”；集中力量使那些已经遭到削弱和破坏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重新稳固地建立起来，“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城乡社会主义阵地”。

因此，中国共产党应当根据新的历史情况，重新制订党的政治路线：“以便正确地领导绝大多数的人民群众，进行阶级斗争，进行两条道路的斗争，这是决定我们社会主义事业成败的根本问题。”

就在这个时候，党和毛主席提出了下述基本路线：“整个过渡时期存在着阶级矛盾，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

我国后来的实践证明，取代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党的基本路线，是解决六十年代所提出的上述政治任务，保证我国继续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正确路线。

从一九六二年毛主席发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以来，在党的基本路线的指引下，我国连续进行了十几年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和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极其成功地粉碎了包括刘少奇和林彪两个反党集团在内的一切想使中国复辟到资本主义乃至封建主义的反革命复辟势力，胜利地保卫和巩固了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对于巩固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有着巨大的意义，它使我国避免了有可能出现的暂时倒退现象。

这里需要指出，我国在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方面所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及其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不仅证明了在由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中，还依然存在着阶级和阶级

斗争，而且证明了我国无产阶级在掌握着政权和主要生产资料的条件下，完全能够击败和粉碎一切企图使我国复辟到资本主义乃至封建主义的反动阶级和反动势力，保证我国沿着毛主席所指引的社会主义道路胜利前进。

还应当指出，马克思曾经写道：“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就已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已对各个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我的新贡献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

很显然，既然阶级和由此而来的阶级斗争并不是从来就有的，它也不可能永远存在。但是，“没有无产阶级专政，阶级是不会消失的”。在无产阶级专政时代，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无可避免地将导致社会主义制度的更加巩固和向“无阶级社会的过渡”，而不是象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那样导致社会革命。应当说，我国二十余年来的阶级斗争实践已经和还将证明这一点。

此外，党的基本路线告诉我们，在我国进入无阶级社会之前，我国将继续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着两条道路和两条路线的斗争；因此，当我们在基本上解决镇压剥削者的反抗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任务之后，当我们开始解决历史正在提出的伟大的经济建设任务的时候，我们不应当放松自己的警惕。相反地，我们还必须强化无产阶级专政，镇压一切可能出现的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反动势力，以保证我国胜利完成伟大的建设任务。

五 目前形势和新的历史任务

在第四节“关于党的基本路线”中可以看到，毛主席在一九五七年就已经提到：“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同年七月，即在反右斗争的高潮中，毛主席在《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的报告里，再次提到了这个问题：毛主席说：

“必须懂得在我国建立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基础和现代化的农业基础，从现在起，还要十年至十五年，只有经过十年至十五年的社会生产力的比较充分的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才算获得了自己的比较充分的物质基础（现在，这个物质基础还很不充分），我们的国家（上层建筑）才算充分巩固，社会主义社会才算从根本上建成了。现在还未建成，还差十年至十五年的时间。”十年至十五年以后的任务，则是进一步发展生产力，进一步扩大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队伍，准备着逐步地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必要条件，准备以八个至十个五年计划在经济上赶上并超过美国。”“这是历史向我们提出的伟大任务。”

毛主席在这里提出了一个带根本性的重要问题：我国必须经过十年至十五年的社会生产力的比较充分的发展，才能使我国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获得比较充分的物质基础，才能从根本上建成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

我们在第四节也可以看到，由于我国在六十年代必须把自己的主要精力放在继续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方面，因而上述“历史向我们提出的伟大任务”不能不推迟其完成的时间。

现在，当这个迫切任务基本上得到解决之后，当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空前巩固之后，我国能否继续完成毛主席曾经指出的“发展生产力”的根本任务和伟大任务呢？我国目前的形势是否已经再度提出了这个任务呢？

我们可以先看一看我国目前存在的一些社会问题。

我国人口在过去二十五年中增加了将近一倍，并以每年百分之二的增长率继续增长；人口的这种发展速度无疑会同时引起社会需求的更大增长。可是，满足人民生活所必需的消费品却不能按同一比率增加，国家商店暂时还不能向人民提供不仅是稳定的、而且是不断增加的消费品；

在我国各地以不同形式存在着的程度不同的“自由市场”及其昂贵的黑市价格，首先是供求关系有所不相协调的具体表现。它不仅将随着国家供给的某些暂时不足继续存在，而且还会由于闲散居民的存在继续泛滥；

我国为数不多的闲散居民以各种形式从工人和农民那里得到部分货币或实物以维持其生活，其中的一部分就以所谓“二贩手”身份进入“自由市场”；

由于国家供应的消费品暂时有所不足，厂矿职工不能不高价购买黑市商品，因而他们工资的实际购买力正在有所下降；公社社员作为我国粮食的基本生产者，暂时地在不同范围和不同程度上要依赖于国家的“回销粮”来解决生活；

此外，随着我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我们已经和当今的世界在经济和政治各方面发生了不可分割的联系；我国也“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但是，由于经济力量的暂时有限，这就对我国履行应尽的国际义务方面有所影响；特别重要的是，我国国防力量暂时还不够强大，这与当前日益紧张的国际形势是有所不相适应的。

除了国际问题以外，以上所有这一切问题，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从自己的实际生活中看到和体会到，而且，这只是一些表面现象，而它们所说明的是什么呢？它们又是怎样产生的呢？

应当看到，在我国解放以来的短短二十余年中，我国的社会经济面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极其伟大的成就。

二十多年来，我国已经基本上完成了社会制度方面的由私有制到公有制的社会主义革命，建立和巩固了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从而不仅解放了生产力，而且为发展生产力创造了有利的社会条件和政治条件。与此同时，我们已经建立了旧中国从未有过的新的工业部门和新的工业基地，创建了初具规模的社会主义工业体系；我国的科学技术事业也有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发展，所有这些，都为我国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必要的基础。

但是，我们也还应当看到，我国是在几乎没有重工业的极其落后的经济条件下开始建设社会主义的。并且，由于我国革命的长期性和复杂性，我国在过去的二十多年中，不能不把主要精力和战略重心放在为建立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而进行的一系列政治运动方面。因而，我国在这段时间内，并没有由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发展为一个强大的工业国。

我国现在还是一个经济上比较落后的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我国现有的经济水平不仅大大落后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而且甚至没有达到包括广大第三世界在内的整个世界平均水平。在七十年代初，全世界按人口平均的钢产量是一百七十公斤，美国是五百八十公斤、苏联是五百一十公斤、中国只有二十六公斤左右；全世界按人口平均的粮食产量是

七百二十一斤、美国是二千三百斤、苏联是一千四百二十二斤、中国只有六百斤左右。

显而易见，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仍然是比较低的。如果我们注意到，一方面，我国拥有占总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即达六、七亿的农业人口，而我国农业却只能给每人生产六百斤左右的带壳粮；另一方面，我国人口还在不断增长，并且人民的生活水平也不能不要求继续提高，那就不能不得出下述结论：我国包括农业在内的整个经济的现有发展水平不可避免地要和日益增长的社会需求发生矛盾和冲突，由此将必然导致供不应求和与此相联系的一切社会问题。

更为严重的问题还在于：我国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在过去的二十多年中，基本上得到了稳定和巩固。但是，正如毛主席在《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中所说的那样，我国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还没有获得比较充分的物质基础。

二十多年来，我国没有能够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我们现在既没有独立、完整和强大的工业体系，也没有独立、完整和强大的社会主义国民经济体系；我们的整个工业本身并不是高度现代化的、大规模的社会化大机器生产，现代化工业总产值并未在国民经济中占居绝对优势。

我国农业已经由个体所有制经济过渡到集体所有制经济。集体经济的优越性不仅在于它消灭了私有制和解放了生产力、而且在于它是小生产越过资本主义生产向社会主义大生产过渡的唯一可能和适当的社会主义经济形式；只有通过它，我国五、六亿个体农民才能参加拥有现代化技术设备的社会主义大规模农业经济。

但是，由个体所有制到集体所有制的变革本身，不可能

改变中国传统农业的手工生产方式，这种使用锄头和耕牛的手工生产依然是现阶段我国农业生产的基本形式。毛主席早在一九五九年四月就已经指出：“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的确，“机器和拖拉机是经济繁荣的杠杆，是农业按社会主义道路发展的杠杆，谁能否认这一点呢？”可是，既然我国没有强大的重工业，既然没有必须为农业提供机器和拖拉机的强大的机械工业。我国就不可能实现农业机械化，我国农业也就不能不停留在古老的手工生产阶段上。与这种手工生产相适应，我国农业也不是高度社会化的大农业；相反地，我国整个农业并不是集中的有机的经济机体，而是一个松散的几乎是无法实行统一计划的生产部门。除了并不是生产组织形式的公社和大队以外，我国农业拥有将近五百万个生产队，每一个生产队都是一个独立的经济核算单位：“它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直接组织生产、组织收益分配。”

我国这种未能彻底实现技术改造的农业，就是我国目前经济的基础。但是，农业作为基础恰恰表明了下述严酷的现实：我国现在仍然是一个不发达的农业国，因而我们不能不把自己的整个国民经济以至全部社会主义制度建筑在技术落后、规模狭小的脆弱而分散的农业基础上。

这是一个极不稳固的基础。一次席卷全国的自然灾害就将破坏我国的整个农业，而以农业为基础的整个国民经济就将陷入混乱，刚刚巩固下来的社会主义制度就将面临新的考验。显然，我国的农业基础已经和基本巩固下来的社会主义制度处于严重的矛盾之中。

应当看到，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不能是农业，尤其不能是手工业生产；“社会主义的唯一的物质基础就是同时也能

改造农业的大机器工业。”而我国并没有强大的“同时也能改造农业的大机器工业”；毫无疑问，这正是我国经济上所面临的主要问题。

以上这一切，乃是我国整个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它同时构成我国目前形势的和过去有着区别的基本特点。

这个基本特点表明：只有把我国整个国民经济赖以存在的基础，由手工农业转变为现代化的大机器工业，才能使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获得强大而巩固的物质基础，才能彻底解决社会供给和社会需求不相适应的矛盾状况，才能保证我国拥有强大的国防力量和对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才能使我国社会主义社会顺利地开始向共产主义过渡。

由此可见，我国整个历史的发展和目前形势的特点，已经不可避免地向七十年代的我国人民再度提出了，毛主席曾经在五十年代提出的伟大历史任务，这些任务就是：

——建立独立、完整和强大的社会主义重工业体系。

“没有高度发达的大工业，那就根本谈不上社会主义，而对于一个农业国家来说，就更谈不上社会主义了。”

——把包括农业在内的整个国家经济，组织成为现代化的高度集中的社会主义国民经济体系，“只有新的更高的社会生产方式，只有用社会主义大生产代替资本主义生产和小资产阶级生产，才能是战胜资产阶级所必需的力量的最大源泉，才能是这种胜利牢不可破的唯一保证。”

——消除供不应求的矛盾状况，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和全体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不是要缩减个人需要，而是要竭力扩大和发展个人需要。不是要限制或拒绝满足这些需要，而是要全面地充分地满足有高度文化的劳动人民的一切需要”；

——建立强大的国防力量以对付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可能的颠覆和侵略，时刻准备解放我国的神圣领土台湾；

——创造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物质条件，没有这些条件，我国就不可能向共产主义过渡。

所有这一切任务归结起来就是：在五年至十年的时间内，动员我国现有的一切物质力量和技术力量，充分发挥我国人民的主动性和历史首创精神，全面实现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最充分地发展我国的社会生产力，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文化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这就是我国在目前时期所应当解决而且必须解决的“历史向我们提出的伟大任务。”

能否解决这个任务，是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命运的决定性关键。

六 完成任务的途径和方法

现在，任何人都可以清楚地看到，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比任何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都要先进；但是，我国的社会生产力却比这些国家落后了二十五年至五十年；我国现有的经济发展水平甚至未能达到现代整个世界的平均水平。我国必须在五年至十年的时间内，赶上和超过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或者我们做到这一点，或者我们被人压倒。历史已经和正在这样无情地提出问题。

但是，认识到历史所提出的伟大任务，仅仅是解决任务的第一步，为了解决任务，还必须明确解决任务的道路、方法和手段。

(一) 坚持优先发展重工业，同时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的经济建设路线。

毛主席在一九五七年已经提出了这个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路线。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指出：“我国的经济建设是以重工业为中心，这一点必须肯定。但是同时必须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

苏联在第一和第二仅仅两个五年计划期间，就使自己由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迅速发展为一个现代化工业国的经验证明，对于一切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国家来说，优先发展重工业，同时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的建设路线，是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组织庞大的社会主义大生产的正确路线。

资本主义的工业化首先是从轻工业开始的，因而它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社会主义工业化不允许在同样漫长的时期内重走资本主义工业化的老路。处于过渡时期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在尽可能短的时期内完成工业化，建立社会主义的唯一的物质基础——能够从技术上改造整个国民经济的重工业。因此，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中心，工业化的基础，就是发展重工业（燃料、金属等等），归根到底，就是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发展本国的机器制造业。”

但是，重工业即“生产资料生产的增长之所以必须占优先地位，不仅是因为这种生产应当保证自己的企业以及国民经济其它一切部门的企业所需要的装备，而且是因为没有这种生产就根本不可能实现扩大再生产。”

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扩大再生产的理论已经完全证明，优先发展重工业是扩大再生产，尤其是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的绝对规律。为了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增长，“为了扩大生产，必须首先生产生产资料，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扩大

制造生产资料的社会生产部门。”

对于我国来说，优先发展重工业是迅速改变落后经济面貌的中心环节；但是同时也要狠抓农业。

我国是一个大农业国。粮食问题是关系到全国人民生活的重大问题。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我国农民直接依赖耕种为生，他们的情况如何，对于我国经济的发展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巩固，关系极大。我国并无发达的畜牧业，城市人口维持生存所必须的粮食等等消费品，只能由农业来提供；农业同时为我国的轻工业和部分重工业生产原料，它本身作为我国工业的重要国内市场只能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而扩大。因此，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同时也必须狠抓农业。

应当注意，我国农业的根本出路只能是实现以机械化为主要内容的全面现代化。但是，我国农业本身不可能实现这种现代化。

我国农业和任何其它国家的农业一样，是以生产消费资料为主的消费资料生产部门；任何消费资料生产部门不可能为自己生产生产资料；实现农业现代化所必须的机器和拖拉机等等现代化装备只能由重工业部门生产出来。正如斯大林所指出的：迅速发展工业“是改造农业的钥匙”。不言而喻，实现农业现代化绝对必须的第一前提，就是我国工业的现代化，是重工业的优先发展。

其次，以生产队为独立核算单位的我国农业本身不可能有雄厚的积累基金用以购买现代化技术装备。假如重工业能够生产出足以实现农业现代化的一百六十万台拖拉机，我国农民也必须支付几十亿乃至几百亿人民币才能购买和使用这些拖拉机。毫无疑问，我国农民没有力量做到这一点。因此，农业现代化绝对必须的第二前提，只能是国家对农业

进行各种形式的投资和帮助。

由此可见，实现我国的农业现代化，同时也是解决工农业的正确结合、消灭工农差别和城乡差别的正确道路，只能是：优先发展重工业以生产农业机械；由国家对农业进行投资以保证我国农业得到这些农业机械。与此同时，逐步提高农业社会化程度即使生产队所有制逐渐向大队、公社所有制乃至全民所有制过渡。

在现阶段，我国农业还不可能实现全面现代化。因此，一方面国家要尽其可能支援农业，如提供优惠农业贷款等等；另一方面，应当继续巩固生产队所有制，坚持走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大寨道路。生产队和大队、公社应尽一切办法改变自己的落后面貌，尽一切力量以各种方式来扩大再生产，为实现农业机械化和全面现代化奠定必要的基础。

（二）坚定地实行社会主义的“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制度

“分配关系不过表示生产关系的一方面。”任何分配关系都决定于所有制关系。

社会主义消灭了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关系，因而它不可能按照例如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分配关系来分配消费品；但是，社会主义也不可能实行“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分配关系。

“社会主义的原则是：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每个人按他的能力进行工作，但不是按他的需要，而是按他为社会所做的工作取得消费品。这就是说，工人阶级文化技术水平还不很高，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依然存在，劳动生产率还没有达到能保证消费品丰裕的高度，所以社会只得不按社会各个成员的需要，而按他们为社会所做的工作来分配消费品。”

“各尽所能，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唯一可能实行的分配关系；但是，它同时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必须实行的分配关系。

在资本主义社会，雇佣工人只有出卖劳动力才能维持自己的生存。他们的劳动力同其它一切劳动产品一样，已经变成了商品。雇佣工人按照这个商品即劳动力的价值来分配消费品；劳动力价值决定着雇佣工人工资收入的平均水平。根据价值规律，劳动力价值同一切商品价值一样，与生产力的发展成反比。即使不谈资本主义所固有的失业现象，雇佣工人的生活状况也必然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日趋恶化。由此可以看到，资本主义所无法摆脱的下述对抗性矛盾，不仅是根源于社会生产力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而且是以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分配关系的必然结果。这个对抗性矛盾就是：两极对立的发展与生产力的发展成正比；一极是资本家的资本和财富的积累，另一极是雇佣工人的贫困和愚昧的积累。

社会主义社会则与资本主义完全相反。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不仅在于在这种制度下，社会生产力能够比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生产力获得更大的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优越性还在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全体劳动者的个人收入和生活水平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断增加和提高。这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工人生活状况与生产力发展成反比地恶化，有着绝对相反的根本区别。社会主义制度的上述优越性，同时就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主要内容。斯大林指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主要特点和要求，可以大致表述如下：用在高度技术基础上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增长和不断完善的办法，来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

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

而能够直接地和切实地保证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与生产力的发展成正比的，能够充分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这种优越性的，就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制度。在同一时间内所生产的产品量与生产力的发展成正比；这是一个确定不移的规律。这个规律表明，劳动者为社会所提供的劳动的数量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减少，例如八小时工作制将变为六小时工作制；但是，劳动者为社会所提供的劳动的质和量则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以更大的比例提高。以至于在六小时内生产的产品，要比以前在八小时内所生产的产品多几十倍。既然劳动者不仅按劳动的数量，而且按劳动的质量来分配消费品，那就可以看到，“按劳分配”制度本身就直接保证了劳动者所分配到的消费品与生产力发展成正比。

必须强调指出，同一时间内所生产的产品与生产力的发展成正比的规律，适应于任何一个社会形态，但在消费品按劳动力价值来分配的资本主义社会，这一规律必然导致工人生活水平与生产力发展成反比的结果；而在消费品按劳动的数量和质量来分配的社会主义社会，同一规律则导致工人生活水平与生产力发展成正比的结果。

综上所述，可以清楚地看到，在社会主义社会必须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制度，它本身就是整个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有机组成部分。如果说社会主义的所有制形式是社会生产力得到充分发展的唯一恰当形式的话，那么，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形式就是保证人民生活的不断增长的唯一恰当形式。

恩格斯说：“分配并不仅仅是生产和交换的消极的产物。反过来它又同样地影响生产和交换。”社会主义的“按

“按劳分配”制度不仅促使每一个劳动者努力提高自己的思想觉悟、劳动技能和文化技术水平，从而促进生产的发展和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对立的消灭。而且，它使千百万劳动者自觉地把个人的利益和命运与整个社会主义制度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千百万劳动者将自觉地维护和保卫社会主义制度，因为社会主义制度通过“按劳分配”制度使千百万劳动者看到，他们生活的任何改善和提高，只有在这种制度下才有可能。因而，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任何削弱和破坏，都是对千百万劳动者利益的最大损害。

由此可以看到，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制度与修正主义搞的“物质刺激”有着本质的区别。所谓“物质刺激”不仅在于它根本否认必须把社会主义政治思想工作放在首位，以培养和提高劳动者的共产主义觉悟的正确路线，而且在于，它竭力培植一个与人民利益根本对立的工人贵族阶层，造成千百万劳动者的日益贫困化。十分明显，“物质刺激”不仅与“按劳分配”毫无共同之处，而且是对“按劳分配”制度的严重破坏；而这两者的根本区别，就象抹煞修正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根本区别一样。

另一方面，还应当看到，无论“按劳分配”怎样适合于社会主义社会，它本身还不是完美无缺的。既然消费品是按劳动的数量和质量来进行分配，那么显然，不同等的个人所提供的劳动量是不同等的，因而他们所分配到的消费品将是不等量的。等量劳动分配等量产品的平等权利，实际上是以不平等为前提的。因此，“就产品‘按劳分配’这一点说，‘资产阶级法权’仍然占着统治地位。”

但是，正象马克思所指出的，这种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在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在它经过长久的阵痛刚刚

从资本主义社会里产生出来的形态中，是不可避免的。”要想消除这种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就必须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分配关系。而这必然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对于我国来说，更是一个极其长期的过程。缩小以至消除分配关系中的资产阶级法权，这是无产阶级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战略任务之一；如果有谁企图在一个早上或一个晚上解决这个问题，这实则和我国现阶段的实情是不相符合的，也是我国现阶段的实情所不允许的。

现在，坚定不移地彻底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制度，仍然是我们继续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一个重要任务之一。因此，我们既要反对刘少奇的“物质刺激”，又要反对林彪的“政治刺激”。

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必须坚持以下唯一正确的原则：保证社会主义政治思想教育和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两者的统一。任何只强调一个方面，忽视另一方面的做法，都是对整个社会主义事业的严重破坏。

在现阶段，我国工人正在努力生产，不断为社会主义祖国创造财富，我们应该注意使他们的生活有所改善和提高。

对于一切文教、科研、艺术以及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都应该对他们中的积极工作、努力完成任务、有所成就、有所发明、有所创造者给予政治的和一定形式的物质鼓励。基本原则就是随着国家的不断发展而使他们现有的生活水平有所改善和提高。

现阶段的农村，仍需实行与集体所有制关系相适应的工分制度。为了保证社员生活的稳定和逐步提高，不仅应当发展集体经济，而且应当使国家税收、集体经济的公共积累、社员个人收入三者之间保持适当的比例。

与此同时，也必须根据社会主义“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分配原则，采取适当措施，制止一切破坏和消极因素，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服务。

在现阶段，还应当妥善解决我国闲散居民的生活问题，应尽一切可能，把这些闲散劳动力充分调动到生产和建设中来。

最后，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不仅应当相应地提高工人的货币工资和农民的个人收入，而且应当适当降低全部消费品价格；保证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与生产力的发展成正比。

此外，我国人口继续不断的猛烈增长是与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不相适应的。因而，必须继续实行现在正在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采取一切可能的，并为人民所能接受的有效措施降低人口增长率。应当强调，这也是现阶段我们应当解决的重大任务之一。

（三）促进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文化教育事业

上层建筑领域内的社会主义革命，其目的是消除一切不适应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妨碍生产力发展的因素和现象，建立和巩固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必须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服务，必须为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服务。

在我国目前所处的重要历史时期，发展社会生产力，为我国社会主义建立强大的物质基础，是压倒一切工作的基本出发点。

在教育领域内，必须坚持毛主席提出的无产阶级教育方针，即“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绝对不允许把德、智、体三者对立起来或割裂开来的现象存在。因此，

即必须反对只强调“智育”的错误倾向，也必须反对只强调“德育”的错误倾向。“德育”与“智育”的关系，实际上是整个“红”与“专”、政治与业务、政治与技术这个总问题的一部分。毫无疑问，在“红”与“专”的对立统一关系中，“红”即无产阶级政治不能不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和起决定作用的方面。社会主义事业绝对不允许也绝对不可能用资产阶级政治来代替无产阶级政治。但是，“专”并不因为只是矛盾的次要和被决定的方面而失去其存在的意义；恰恰相反，也和任何矛盾的事物一样，没有“专”，“红”本身也不能存在。因此，在“红”与“专”的对立统一关系中，任何破坏一个方面的做法，都不仅将破坏另一方面，而且将破坏整个对立统一体。因而，使两者对立和割裂开来的任何做法，都是荒谬的。

现在，不应当忘记毛主席的下述指示：“为了建成社会主义，工人阶级必须有自己的技术干部的队伍，必须有自己的教授、教员、科学家、新闻记者、文学家、艺术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队伍。这是一个宏大的队伍，人少了是不成的”。“在这个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宏大新部队没有造成以前，工人阶级的革命事业是不会充分巩固的。”

也不应当忘记斯大林同志的下述指示：“用提高工人文化技术水平达到技术人员水平的办法，来消灭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的本质区别，对于我们是不能不有头等意义的。”

由此，就规定了我国教育部门必须协同其它一切部门所应当完成的双重任务：一方面，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培养和输送足够数量的无产阶级的科学技术人材；另一方面，消灭一切文盲和半文盲现象，提高全体人民的文化技术水平。

我国工人阶级、我国青年和全体人民，要热烈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认真看书学习”，“努力学习技术，学业务，学理论，造成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新部队。”使自己成为既有高度社会主义觉悟，又有发达的文化技术水平的新型劳动者。

解放以来，广大受过高等教育和中等教育的知识分子，知识青年。他们当中的大多数，是我国发展社会生产力，建设我国社会主义的一支有生技术力量；应当合理地使用这支力量，使他们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出自己的全部才能和智慧。

在意识形态领域内，还将继续存在着阶级斗争。这不仅是因为封、资、修的文化思想以及一切传统观念还没有彻底消灭，而且还因为社会主义的文化思想还必须有一个充分发展、普及的过程。

正如毛主席指出的：“毫无疑问，我们应当批评各种各样的错误思想。”对于那些具有反动思想的反动分子，必须使用铁的手腕加以无情的打击。但对于千百万人头脑中的这样那样的错误思想却不能照此办理。毛主席指出：“思想斗争同其它斗争不同，它不能采取粗暴的强制的方法，只能用细致的讲理的方法。”这种思想斗争的方法，是解决人们头脑中的各种错误思想的正确方法，也是思想领域内的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展开斗争的恰当形式。

但是，这决不是唯一有效的方法和形式。应当明白，仅仅批判各种错误的思想和文化，并不能保证无产阶级从全部文化、思想阵地上肃清封、资、修文化、思想。要肃清和消灭这一切文化和思想，要保证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在文化思想阵地上获得完全胜利，就必须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文化。只有高度发展、普及社会主义文化，才是无产阶级在文化思

思想领域彻底战胜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强大有力的保证；也只有高度发展、繁荣、普及的社会主义文化艺术，才能满足全体人民不断增长的文化、精神需要。

为此，我国必须全面而完整地向人民灌输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不断提高全体人民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水平和思想水平；必须坚持毛主席所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

一切文学艺术作品必须把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所提出的六条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任何文艺作品都不能脱离无产阶级政治而存在，同样，也不能用政治标准来取代艺术标准，“我们的要求则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

（四）坚持无产阶级专政

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列宁指出：“人类只有经过无产阶级专政，才能达到社会主义。”并指出：“谁指望不通过社会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来实现社会主义，谁就不是社会主义者。”

我国“在现阶段，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为了“压迫国家内部的反动阶级、反动派和反抗社会主义革命的剥削者。压迫那些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破坏者；”“为了维护社会秩序和广大人民的利益”。为了镇压“盗窃犯、诈骗犯、杀人

放火犯、流氓集团和各种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坏分子”；为了“防御国家外部敌人的颠覆活动和可能的侵略……”为了这一切，我国在现阶段必须强化而不是削弱无产阶级专政。

无产阶级专政首先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反动分子实行专政。但是，“无产阶级专政不止是对剥削者使用的暴力，甚至主要的不是暴力。这种革命暴力的经济基础，它富有生命力和必获胜利的保证，在于无产阶级代表着并实现着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社会劳动组织。实质就在这里，共产主义的力量的源泉和必获全胜的保证就在这里。”作为无产阶级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并不仅仅行镇压职能，无产阶级专政并不仅仅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专政，“无产阶级专政是：（一）对资本家和地主使用不受法律限制的暴力，（二）无产阶级对农民实行领导，（三）对整个社会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无论除去专政的这三方面中的哪一方面，都不免有曲解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的危险。”

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无产阶级的目的是建成社会主义，消灭社会的阶级划分，使社会全体成员成为劳动者，消灭一切人剥削人的制度的基础；而“无产阶级需要国家政权，集中的强力组织，暴力组织，既为的是镇压剥削者的反抗，也为的是领导广大民众即农民、小资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来‘调整’社会主义经济。”

由此可见，“无产阶级专政不是目的本身。专政是走向社会主义的手段和道路。”

对于我国来说，“专政的目的是为了保卫全体人民进行和平劳动，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技术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

因此，在我国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基本上巩固下来的现

在，我国无产阶级专政作为社会主义的政治上层建筑，应当也必须执行上述双重职能。

——保护和巩固自己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即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组织和管理整个社会主义生产；制定和实行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具体政策和详细规划。

只有建立强大的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大工业，只有最充分地发展社会生产力，只有最大限度地满足全体人民的物质和精神生活需要，才能使我国无产阶级专政获得强大的生命力；才能使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确保巩固；才能使我国无产阶级彻底战胜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

我国无产阶级专政因此应当而且必须组织人民完成这个历史已经提出来的新的伟大任务。

（五）坚持党的一元化领导

我国正处在一个重要的历史发展时期，我国将在不远的将来完成伟大的历史任务。我国将由一个发展中国家变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伟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为了完成这一伟大任务，我国必须有一个统一和集中的领导核心，必须有一个团结一致和强大有力的最高司令部。

这个核心和司令部，只能是以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

“党是领导一切的。”要保证党能够领导一切。“思想上和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

只有制定正确的即不仅是科学地反映客观规律的，而且

是符合最广大人民最大利益的总路线和总政策、只有使人民不仅能理解，而且能变成人民自觉行动的这种总路线和总政策，才能保证党的正确领导和领导一切。

“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任何正确的政治路线必须由干部来贯彻执行，任何干部必须贯彻执行党的正确的政治路线。

我们伟大的党能够领导一切；我们伟大的党能够领导我国人民完成伟大的历史任务，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

我们党和国家的广大干部是党的、人民的宝贵财产。他们在过去整个革命时期和建设时期已经为人民，为我国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作出过卓越的贡献；我们坚信，他们还将在新的历史时期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继续执行党的正确路线，为人民立下新的不朽功勋，为伟大祖国的繁荣昌盛作出不可磨灭的新的贡献。

胜利属于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

结 束 语

中华人民共和国已故总理周恩来同志在去年元月举行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再度提出了一九六五年三届人大上曾经提出的发展我国国民经济的两步设想，这就是：“第一步，用十五年的时间，即在一九八〇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

周恩来同志所提出的这两步设想，在中国人民中间引起

了经久不息的巨大反响；它深刻地表明：中国人民的最大利益和最根本的利益，只能而且必然是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

现在，彻底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发展社会生产力，全面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文化的现代化，——历史已经把这一个伟大的任务再度提到了一切问题的首位。能否完成这一任务，是能否满足我国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的决定性关键，是我国社会主义能否取得完全胜利的决定性关键，是我国能否实现共产主义伟大目标的决定性关键。

我国正处于一个重要的历史发展时期，我国正在开始一个伟大的新的历史发展时期。我国人民盼望已久的现代化的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将在这个新的历史时期里建立起来，几千年来未被抛弃的手工业生产方式将和锄头一起放到历史博物馆里去，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将在这个历史时期变成全体人民的幸福乐园。

但是，我们也不能不看到，尽管我国的发展趋势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已经在社会表面深刻地显示出来，尽管国际紧张局已经把战争问题逐渐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而我们的一些同志至今都还没有认识到我国整个历史发展和目前形势的主要特点，也没有认识到正是这特点本身不可避免地提出了发展生产力的伟大历史任务。因此，这些同志在我国目前这样一个重要历史发展时期，还表现出种种令人难以理解的态度。而这对于我们整个国家和民族又将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我们完全相信，我们伟大祖国现在所处的重要历史发展时期同时也是我国历史上一个比较艰难的发展时期，我们伟大祖国在实现全面现代化的道路上还将有各种各样的困难；

但是，我们同时坚定不移地相信：在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伟大的人民一定能够完成伟大的新的历史任务，崭新而强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一定会像巨人一样永远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更加光辉灿烂的新时期不可避免地必然到来！

我们已经详细叙述了我们关于我国目前形势和新的历史任务的看法；至于这些看法是否正确，我们确信：有毛主席、党中央和全国人民作出最后的审定，有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作出最后的验证。

我们还应当强调指出的是：一八四〇年后出现的帝国主义集团凶恶宰割我国的历史不幸，除了反动统治阶级在政治上的腐败无能而外，我国经济的落后则是一个重要原因；“九·一八”以后日本帝国主义能够出入自由地蹂躏我们的家园，经济落后也仍然是一个重要原因。现在凡是年过四十的人，总该不会忘记“九·一八”以后的那种悲惨情景吧！

历史已经证明：穷凶极恶的帝国主义者从来不会因为我们的经济落后而放慢其发动侵略战争的步伐。今天，国际紧张形势日益加剧，帝国主义者所谓“缓和”丝毫没有改变它们的侵略本性；它们究竟有哪一天带来过和平，又究竟有哪一天断过磨刀声？“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而我国能否在下一次战争来临之前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呢？……

在本世纪二十年代、三十年代、四十年代，我国人民需要的是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主义、打倒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五十年代、六十年代，我国人民需要的是建立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为我国的发展开辟一条广阔的道路；而在目前时期呢？我国人民需要的不能不是：在党的领导下，团结起来，发展生产，加强国防；发展生产，改善生活；发展生

产，巩固和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

贵阳制药厂	李洪刚
贵州无线电厂	叶忠源
贵阳永恒精密电表厂	黄维鸣
贵阳制药厂	郭成望
贵阳制药厂	王大卫
贵阳制药厂	陈明云
贵阳黔灵印刷厂	卢 炎

1976. 1. 15. 初稿贵阳

1976. 3. 3. 定稿

附：

迎接光辉灿烂的新时代

——记1976年3月贵州街头“七人大字报”

寒流急时暖气吹

一九七六年春天，我们国家的政治气候出现了极其严重的“倒春寒”。“四人帮”通过他们控制的舆论工具，制造了一股又一股“寒流”，侵袭着祖国大地。

在这一股股“寒流”中，最使人感到寒凛和不能容忍的，就是“四人帮”疯狂破坏国民经济，扼杀四个现代化。他们把建设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污蔑为“资本主义化”，把罪恶的矛头指向提出四个现代化蓝图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向在四届人大宣布四个现代化蓝图的敬爱的周总理，指向积极实行四个现代化的敬爱的邓副主席等中央领导

同志。

就在那高天滚滚寒流急的险恶日子里，仍然处处惊雷响，大地暖气吹。真理同谬论、正义同邪恶激烈地搏斗着。

一九七六年三月十日，贵阳街头贴出了一份标题醒目的长篇大字报：《对目前形势和新的历史任务的几点看法》。它的中心论点和“四人帮”的反革命谬论针锋相对。这是一张真正反潮流的大字报，它理直气壮地宣传向四个现代化进军，它勇敢地捍卫毛主席提出的、周总理宣布的、亿万人民朝夕盼望的四个现代化。大字报大声疾呼：

——“现在，……我国正处于一个重要的历史发展时期，全国人民都希望实现已故总理周恩来同志在四届人大提出的两步设想，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把主要精力放到发展我国社会生产力方面来，使我国经济提高到世界先进水平，以保证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更加巩固，……乃是我国在目前时期的首要问题和中心任务。……”

——“……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文化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就是我国在目前时期所应当解决而且必须解决的‘历史向我们提出的伟大任务’。”

——“中国人民的最大利益和最根本的利益，只能而且必然是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

——“我们完全相信，崭新而强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一定会象巨人一样永远屹立在世界的东方。更加光辉灿烂的新时期不可避免地必然到来！”

说得何等的好啊！在“四害”横行，形而上学猖獗的时候，这种见解多么难能可贵！它反映了群众的意愿和要求，它说出了人们憋在心里想说而没有说出的话。人们围着它，一层，又一层，轻读，默记，摘抄，批上支持的赞语。很快，这份大字报的中心论点传遍了工厂、机关、学校、家庭……

当人们读完大字报，总是满怀敬佩，又忧心忡忡地注视着大字报末七个堂堂正正的落款：贵阳制药厂李洪刚，贵州无线电厂叶忠源，贵阳永恒精密电表厂黄维鸣，贵阳制药厂郭成望、王大卫、陈明云，贵阳黔灵印刷厂卢炎。

这就是当时人们所关注的“七人大字报”。

激流勇进七青年

“七人大字报”在当时那种政治气候下贴出，是冒着很大政治风险的。人们关心着这份大字报，更关心写大字报的七个青年。人们称赞着大字报的论点，更称赞这七个青年的大无畏精神。

文化大革命初期，除郭成望、王大卫是下乡知识青年外，其余五人都是贵阳一中学生，不同班级，彼此也并不熟悉。毛主席“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的号召，象无形的纽带，把他们结合在一起，共同战斗。他们在文化大革命的急风暴雨中锻炼、成长。就连本来不那么关心政治，在全班是唯一的一个既非团员又非入团申请人的黄维鸣，在毛主席的伟大号召下，也成了红卫兵运动的积极分子。

一九六九年，根据国家的安排，七个青年先后进厂当了工人。在新的岗位上，他们仍然以同样的激情，关心着国家大事，继续战斗着。但是，斗争的发展，许多他们万万料想不到的

事情发生了。特别是林彪自我爆炸，使他们震惊不已。震惊之余，他们问自己：“我为什么一点也看不出来？……”

他们开始冷静地检点自己的思想和行为，看到：几年来，既有许多值得珍贵、需要继续发扬的东西；也有不少令人遗憾、发人深省的教训。激情，在他们身上保持着；理智，在他们身上增长着。

在工厂里，他们从周围工人、干部顶着干扰破坏，辛勤为国家创造财富的平凡劳动中，清楚地看到了自己的榜样，不禁脸红、心跳。在社会上，他们从某些“反潮流好汉”的拙劣表演中，依稀看到了自己过去盲目莽撞的影子，不禁懊悔、气愤。他们还如饥似渴地学习革命理论，从中吸取了无穷的精神力量。他们开始懂得：怎样把自己的前途和党、祖国、社会主义的命运，紧紧地连在一起。

一九七五年一月，全国人民盼望已久的四届人大终于胜利召开了。毛主席提出、周总理宣布的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多么鼓舞人心啊！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前程似锦；青年人的未来，一片光明。李洪刚等七个青年，同全国人民一样，对现实充满喜悦，对前途充满信心，大家喜欢谈的是四个现代化，希望干的也是四个现代化。可是，三、四月间，相继出现姚文元、张春桥的两篇大块文章，通篇不提四个现代化。这是为什么？他们长久地深思着。

特别是在一九七六年一月，敬爱的周总理逝世前后，许多事情更令人难以理解了。革命的真理，一夜之间变成了“奇谈怪论”；落实毛主席的一系列指示，变成了“推行修正主义纲领”；建设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被视为洪水猛兽、大逆不道。

一月十二日，敬爱的周总理逝世后的第五天，在贵州无

电厂的一间宿舍内，李洪刚、叶忠源、黄维鸣、陈明云、卢炎又聚集在一起。泪眼不干，忧愤焚心。敬爱的周总理逝世了！他在四届人大讲坛上那坚毅热情、震撼寰宇的声音，仿佛正在这小小的房间内回响。祖国的命运，社会主义的前途，四个现代化的事业，这些经常讨论、关心的话题，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严峻地、急迫地、集中地摆在这五个青年工人面前。他们从下午两点，一直交谈到夜幕低垂。

李洪刚极力抑制着内心的激情，严峻地说：“不管张姚他们要干啥，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们的命运必然是可耻、可悲的！”停了一会，他接着说：“在这个重要的历史关头，我们，一定要把我们在一起讨论过多次的看法，写信向毛主席、党中央汇报，向全国人民汇报。一定！”

他环顾同志们，他看到四双眼睛，回答是明朗的、坚定的。

耿耿丹心涌笔端

李洪刚等五人决定写一封阐明自己观点的信，报告给毛主席和党中央。

谁来执笔起草呢？李洪刚最先想到的，是那个今天没有到场的郭成望。厂里对郭成望的评价是：进厂工作以来能积极参加厂和车间的各项政治活动，认真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遵守厂里的规章制度，工作埋头苦干，强责任心，服从分配。当“读书无用论”甚嚣尘上，很多人把藏书当故纸卖出的时候，郭成望却跑到书店买来了《资本论》，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

郭成望没有辜负大家的委托，他欣然同意执笔起草。

狭窄的斗室，十五瓦的电灯，四百度的眼镜。案头，摆

着省吃俭用买来的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床上，堆着长年累月写下的读书笔记。面前，是铺开的稿纸。马克思那句著名的话，又十分熟悉地回响在耳畔：“科学绝不是一种自私自利的享乐。有幸能够致力于科学研究的人，首先应该拿自己的学识为人类服务”！是啊，“首先”，首先应当拿自己学到的一点东西，为从理论上阐述周总理根据毛主席指示提出的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伟大理想服务。想到这里，他更感到了肩上的责任，他旋开了钢笔。

时间，在笔尖下悄悄流逝。稿子，一页页写出，在五个青年的手中传阅。后来，由于共同的志向，王大卫也积极加入了这个战斗的行列。他们以近乎于挑剔的认真的态度，对草稿反复琢磨。在黄维鸣新婚的小家庭里，一次又一次，他们阅读、讨论、争辩、改写、熬更守夜。有时，夜深了，寒气逼人，他们只好移到小灶房里，几个人你靠着我，我倚着你卷曲着腿，借着炉温取暖，继续进行热烈的争论、推敲。

就这样，李洪刚几乎忘记了爱人即将临产，郭成望不知道一九七六年的春节是怎样度过的。一稿、二稿、三稿……整整五十天过去，想说的话，已经痛痛快快地说了出来。终于定稿了！

三月三日晚上，厚厚的九十多页稿纸，静静地躺在黄维鸣家的桌子上。上面，写得密密麻麻，凝聚着七个青年的智慧，七个青年的心血。

此刻，他们正在信稿的篇末，庄严地写下自己的誓词和姓名。

李洪刚第一个拿起笔来：“我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上，依据我国宪法和党章的具体规定，对党在即将到来的历史新时期的有关任务提出几点建设性的看法，请毛主席和党中央作最后审定。这封信的立场和内容，完全代表了我的思想和

立场，我对它负完全责任。”

第二个写的是叶忠源：“……我们站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立场上提出这些看法，我对它负完全责任，敬请毛主席、党中央和全国人民审定。”

接着，黄维鸣写下了自己的决心：“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上，为了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为了广大人民的利益，为了伟大的祖国现阶段的发展，此篇文章的内容，代表了我的思想、立场和观点……”

第四个签字的是郭成望，这个执笔者的态度自不消说，王大卫、陈明云、卢炎都相继写下了自己的决心和誓言，坚定的信念、大无畏的革命精神跃然纸上。

铮铮誓言，耿耿丹心。李洪刚站起身来，郑重地把稿子交给王大卫。他，将担负起繁重的抄写任务，让这份三万多字的信稿，变成大字报，贴上街头，和广大人民群众见面。

斗争何须怕断头

三月九日晚，黄维鸣的家里。八十多页大纸的大字报，装订成册的三百份油印材料，已经把他们的命运和党、祖国、人民、四个现代化的命运紧紧连在一起了。今晚，大字报就要上街！卢炎和陈明云就要携带油印材料北上散发；保卫四个现代化、向倒行逆施的“四人帮”公开挑战的战斗就要打响。战友聚首，此时此地，该有多少话语涌到嘴边，该有多少往事浮在眼前。

七个人，何尝没有想到过这场斗争的危险、艰难，思索过可能发生的一切后果。六天前，当他们在大字报稿上写下

自己的决心、签上自己的姓名时，就清楚地看到了“四人帮”迫近的魔影。谁没有父母双亲，妻子朋友？六天来，在紧张抄写、刻印的同时，他们各自安排了“后事”——他们准备着大字报贴出后可能遭受到的最坏的境遇。

黄维鸣的妻子已经怀孕，他找到了两位女同学，说明情况，请代为照应。她们毫不犹豫地回答：“你放心去干，出了事，我们住到你家里去，轮班照顾……”

为筹措北上路费，七个人每人要在不多的收入中拿出三十元。李洪刚家里仅有十元钱了，他找到厂里的桂师傅，说明情况，向他暂借二十元，表示一定归还。老桂说：“这种时候，还说什么还不还？你爱人刚生小孩，有困难，我知道。钱，下午上班，我给你送来……”

父母年老，郭成望给姐姐写信，说明情况，请她回来照顾老人。一位老同学知道后，主动找上门来：“不管你这个独子出了什么事，家里的两老，一切由我包了……”

在这样的时候，有这么多人真诚地伸出援助之手来，使这些面临逆境的年轻战士，更加懂得了“友谊”、“同志”的含义，更加坚定地走向明天！

“请你记住：我不仅忠实于你，而且忠实于我们伟大的祖国……”郭成望正在给他的女朋友写信：

“……‘种族的利益总是要靠牺牲个体的利益来为自己开辟道路的’（马克思），我完全了解我们的民族需要我拿出什么，我没有任何理由感慨自己的个人不幸。

“假如我不幸离开人世，我给你的这最后一封信，就将是留给你的遗言。你以这封信将为我证明：我作为一个正直的中国青年，永远忠实于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

诗一样的语言，凯歌般的豪情，壮丽的青春！

当郭成望写完这封致女友的信时；当叶忠源、王大卫与自己的女友话别时；当陈明云、卢炎拿着简单的行装，离开舒适温暖的家庭时——正如李洪刚所说：“已经是‘义无反顾’了！”

贵阳矿山机器厂的青年工人郭荣、彭荣钦，一直关心着这份大字报的进展。当他们看完这份未贴出的大字报后，激动地说：“写得好！我们坚决支持！”

七个人的心更踏实，更坚定了。他们从贵阳矿山机器厂的两个工人身上，看到的不仅是两个工人支持的态度，而且看到了广大群众的心。

黄维鸣的母亲，从女儿那里得知儿子和几个青年在写什么文章，心里即刻压上了一块千斤重石，她担心孩子们超出了原则，卷进社会上的所谓“反潮流”里去。

她匆匆赶到黄维鸣家里：“你们在干啥？要是超出了原则，怎么得了啊？”母亲的两腮，挂着无比担忧的泪珠。青年们连忙围住母亲，安慰，解释。

李洪刚说：“黄妈，你别担心，我们写的，保证合你的意。你看，现在酱油都卖不到……”

“这倒是，不生产，哪里有啊？”母亲好象在自言自语地补充着李洪刚的话。

“是呀，我们写的就是讲要发展生产，实现毛主席提出、周总理宣布的四个现代化呀！”李洪刚接着说。

黄维鸣立刻拿来了大字报稿，耐心地读给母亲听。

听着孩子们引用的一段段革命导师的教导，黄妈妈不禁想起自己跟随毛主席、共产党干革命，多年来为之奋斗的伟大理想；读着读着，她慢慢理解了七个青年人的行动，心里的千斤重石坠地，眼前豁然开朗了。

是出发的时候了。

他们走向街头：抱着大字报，挑着浆糊桶。贵阳矿山机器厂的郭荣、彭荣钦加入了这个行列；一个来自鸭池河畔的农村民校教师，了解到这张大字报为的是保卫四个现代化，立即表示支持，也毅然加入了这个行列……

三月十日凌晨，大字报贴出了。凛冽的朔风，迎面袭来，令人发噤。但是，“七人大字报”的作者、支持者和广大群众，却比任何时候都更坚定不移地相信：现在既是残冬，春天也就不远了。

革命洪流无阻挡

大字报贴出了。犹如空谷一声呼喊，回响来自四面八方。

三月十二日，郭荣和彭荣钦贴出了第一份支持的大字报。接连几天，支持的、赞扬的大字报、小字报、批语、标语，不断出现；从长沙、武汉、郑州，从上海、甘肃、吉林等许多地方，给李洪刚等人寄来了上百封热情洋溢的信函。

一张支持的大字报上说：你们“为了党和国家的命运而不顾个人安危，是我们年轻人学习的榜样。”

一张支持的小字报指出：“此大字报的大方向完全正确，我们表示支持、赞同。……一两个林彪式的个人野心家，打着各式各样的革命口号，妄图阻止我们伟大社会主义祖国前进，必然要被历史的车轮碰得粉身碎骨。”

《浙江日报》的一位同志，看到了邮寄到报社的油印材料后，满腔热情地连续几次来信，对大字报表示坚决支持，并寄来一些资料，鼓励李洪刚等人坚持斗争。他在来信中义愤填膺地写道：“……那些野心家、阴谋家，已经把浙江搞

得一塌糊涂，不堪言状了！……”

长沙一位工农兵学员给七人大字报的作者们来信说：“倘若我们国家的每一个人都能象你们那样关心国家大事，我们的国家就有希望，……帝国主义预言家的梦想就会象长江流水一样一去不复返……”

来自武汉的一封信说：“……我为你们的勇敢精神所激励，并支持你们这种忘我的革命精神。”

在“四人帮”严密控制的上海，有一位工人来信说：“三月份，我从上海来贵阳办事，在火车站见到你们写的一封信，……内容很丰富，……深表支持和同情。”

一些革命老干部，冒着被打成“黑后台”、“走资派”的风险，对大字报给予高度评价和热情的支持。

当然，七人大字报象中流击水的岩石，在它的周围也激起了层层浊浪。它触动了“四人帮”及其在贵州的黑干将、爪牙们虚弱的神经。他们甩出了帽子，抡起了棍子。张明阴阳怪气地说：“七人大字报是“为邓小平鸣锣开道”，“说是反革命大字报，可以上这个纲；说反动大字报，可以说肯定。”有几个帮派同伙，大写什么耸人听闻的“紧急报告”，狂叫对几个革命领导干部要“立即拘留”、“审查”，要立即全部逮捕“七名炮制反动大字报者及其后台”。这张大字报后来被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的大字报”。一时间，乌云翻滚，浊浪排空。

“四人帮”在上海的帮刊《学习与批判》的大头目收到大字报油印稿后，立即叫人摘要打印，第二天就报给了张春桥、姚文元。“四人帮”的狗头军师张春桥，一下子就嗅出了这封信所反映的广大人民群众的情绪，对他们是何等可怕的威胁。他半藏杀机、半是悲鸣地在上报材料上批了“看来修

正主义（在“四人帮”的语言中，“修正主义”就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已后继有人”之类的话。

哪里有人民，哪里就有严峻的真理。广大干部群众，总是和正义站在一起。这七个青年中，有四人在贵阳制药厂。不用说，这个厂的党委因此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但是，党委的负责同志却始终关心着他们。为了摆脱社会上帮派势力的威胁，厂党委还对参与大字报的四个工人，采取了保护措施。有那么几个人，气势汹汹来到厂里，声言他们代表“革命群众”，要调查李洪刚等人的政治表现等等。厂党委的同志严辞拒绝，坚决挡驾。后来，干脆请吃闭门羹。那帮人无可奈何，只得怏怏而去。贵州无线电厂的叶忠源同志，在参与贴出大字报之后，厂党委继续让他在厂里领导团的工作，后来厂里成立民兵营，又让他担任了民兵连的副指导员。贵阳永恒精密电表厂、贵阳黔灵印刷厂，也都没有对黄维鸣、卢炎，组织什么“批判”。

热情的关怀、支持，来自各个方面，很多、很多……

李洪刚等七个年轻的战士，没有辜负广大群众的希望。他们在战斗中成长，前进！

四月十二日，李洪刚和他的战友们，针对“四人帮”帮派同伙妄图从他们身上打开缺口，打击迫害革命领导干部的阴谋，给中共贵州省委写了一封信，恳切地说：“我们……襟怀坦白，光明磊落地向党表示：关于这封信，是我们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以后的几点看法，我们七个人对它始终负完全责任。”

一九七六年十月，大快人心的时刻终于到来了。光明的中国，又大放光明。

“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结束，使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根据中国共产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全国人民在新时期的总任务是：——”

七个青年人人为之挺身战斗的伟大事业。写进了金光闪闪的新宪法。

伟大的新长征已经开始，向四个现代化挺进的大军已经出发。党和人民，正期待着两年前写下了“七人大字报”的七个青年回答：今天，当你们曾经用战斗去迎接的光辉灿烂的新时期已经到来的时候，为了亲爱的社会主义祖国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你们，将怎样工作、学习和生活？将作出怎样的贡献？……

肖应荣 何光渝 张 克
邓洪泰 王保民

后 记

本《上书集》由余习广主编。在收集上书原件、有关档案材料、作者生平及附件材料时，曾得到大多数上书作者及其亲属、有关单位和人士的大力帮助，在此表示谢意。郑谦、胡平林、张天荣、李鸣参加了本集收编工作，韩钢、张树军为本书编撰给予大力支持和帮助，谨在此一并致谢。

《“文化大革命”上书集》依计划共出三集。第二集、第三集及《知名人士“文革”遗书集》正在收编之中。欢迎对有关上书、遗书知情者提供线索。联系地址：北京1070信箱党史室 余习广。

编 者

1989年3月